

简 述
中 共
谎 言 录



简述中共谎言录

作者

金剑

前言

关于这个题目，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甚至中共的每一个谎言，都可以写一本专著，现在只是简单地列一列，也鼓励有能力的人解构这些谎言。

还有一些关于马列主义的谎言，如阶级斗争、奴隶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封建社会、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等等，是属于《金剑：马克思谬论》的主要内容，就不在本书列举。

中共造了许多谣言，实际都是谎言：

爬雪山北上抗日飞夺泸定桥、民众支持中共、敌后抗战、峨嵋山上摘桃、国民党发动内战、四大家族贪污、国民党军 800 万、小米加步枪、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把大陆大量黄金运到台湾、抗美援朝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者、联合国裹挟志愿军战俘去台湾、蒋介石放弃战争赔款、万恶的旧社会、翻身作主人、改革开放.....

共产党从历史到理论到现实都是谎言。中共伪造了许多弥天大谎，一直到今天还在造谣，真是生命不息，造谣不止。至今毫无悔意，真不知道中共要无耻到什么程度才能造出这等无耻至极的谎言。真相就是真相，永远不可篡改，即使是人糊涂了，老天爷还记着呢。继续伪造就是欺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劝告中共，别那么无耻，让老天爷有借口降低对你们的惩罚。“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中共做了坏事却具有无羞恶之心，而且还继续做恶，老天爷就不把他们当人来处理！

中共是谁都骗的，骗工人说：“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领导阶级”，结果工人长期低工资低劳保生活困苦，失业就说下岗。骗农民说：“没有农民就没有革命”、“我们是工农联盟的政权”，结果农民成了二等公民。要骗城市青年移民到农村、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就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面再加上一句“一辈子扎根农村”才是真正目的。骗民主人士说：“互相监督”、“长期共存，肝胆相照”，结果多少民主人士肝胆俱裂、照亮黄泉路。

如果中共以“推翻中华民国”为口号进行造反，连中共的党徒都无法聚集；如果中共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口号进行暴乱，没有多少国人跟随。于是毛用的是“打倒国民党独裁、建立新民主主义”为口号，欺骗了天下人。中共骂国民党独裁，其实中共比国民党独裁一千倍，中共骂国民党贪污，中共比国民党贪污一万倍。中共高呼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共上台后，从来没有搞过一天“新民主主义”，搞的是“新独裁主义”，以前是皇帝一人独裁，中共是一党独裁，最后集中到毛自己独裁。那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只是花瓶党，成了共产党的应声虫和打手。毛贼东很阴。所以中共一直感恩毛贼，是因为毛贼想出了这么一些阴招，才打败国民党。对于国民党来说，只是逃跑而已，最可怜的是我们民族，被中共糟蹋。

1949 年后，中共杀戮无辜的中国人是日本 14 年侵华战争的三倍多，中共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超过日本人的千倍，中共比日本人更坏。现在有不少中国人仇恨日本人却爱戴中共，真是认贼作父啊，被中共骗死而不自知。中共杀了中国人却自称是中国人的父亲，你见过杀自己儿子的父亲吗？中共很邪。

“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和充足的證據說：中國共產黨是從內部分裂國家的罪魁禍首。它是一個投敵叛國的黨，它是一個賣國求榮的黨。1979 年 2 月 26 日，胡耀邦在中央禮堂向全國中長篇小說座談會全體與會者作報告的時候冒出一句話：「要是讓人民知道了我們共產黨的歷史，人民就要起來造我們的反，就要推翻我們了！」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注 190）

中共编了很多很多的谎言，靠着谎言欺骗人民，至今都不改口。在宣传红军时，中共都还在鼓吹什么“红军过雪山”、“飞夺泸定桥”，在电影中把“过雪山”的雪山拍成厚雪高山，把“飞夺泸定桥”拍成十八勇士。如此明显的、被人揭穿的谎言都不想改，由此证明：中共一点从良的打算都没有。

这里引用林昭对中共说的话：

“老实警告先生们：从个人所历这些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我对于当前政治现实的认识是愈来愈深入本质而接触核心。随着认识的深化每使我从心底深处愕然震惊，但觉寒冷彻骨沉痛欲绝而悲愤无已！这样多的罪恶！——这样污秽！——这样暴虐！——这样酷厉！——这样残忍！——这样恶毒！——这样惨无人道！呵哟！先生们，供职于堂堂中央党报里的可敬的先生们哪！你们可也曾想过没有？对于已经作下的一切！你们到底准备怎样收场哪？……”

‘当复仇的大地血海潮起，
逐食的鸦群呵何枝可栖？！
……想到一个问题我每打冷噤：
天哪！谁知道你们将来怎么死？……’ ”

注释：

注 190：胡耀邦 79 年报告：人民知中共历史会推翻它

<https://www.tuidang.org/2015/12/03/70890/>

日本作家：胡耀邦知道的真相 习近平知道吗？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nnews/aboluonews/20160905/581326.html>

目录

- 简述中共谎言录.....2
- 前言3
- 目录5
- 一、大革命时期群魔乱舞丑恶无比.....7
 - 1、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7
 - 2、陈赞贤要求罢工店员涨 14 倍工资.....12
 - 3、工人运动使武汉失去成为首都的机会.....15
 - 4、农民运动更惨烈 地主生无可逃.....19
 - 5、南京事件及宁汉合流.....27
 - 6、焚烧湘粤大道（四百里长）两侧 15 公里内的民房.....30
 - 7、应该到日本搞工人运动才是爱中国.....33
 - 8、残酷的阶级斗争造成民族分裂.....34
 - 9、中国的无产阶级能当领导阶级吗.....37
 - 10、越左越飞黄腾达也越整人.....40
- 二、国共内战谁先动手？答案:共产党.....41
- 三、共产党杀的共产党远比国民党杀的共产党多得多.....48
- 四、爬雪山飞夺泸定桥北上抗日.....53
- 五、敌后抗战.....56
 - 附 1：延安——一个战争年代不设防的城市.....57
 - A、歌舞升平的延安.....57
 - B、弃妻另娶潮的延安.....57
 - C、极不平等的延安.....58
 - D、惨绝人寰的重庆与平安的延安.....59
 - E、日军的“斩首行动”.....60
 - F、中共的七大吹响了内战的号角.....61
 - 附 2：“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孙宇亭）.....62
- 六、峨嵋山上摘桃.....70
- 七、发动内战.....71
- 八、四大家族.....75
- 九、打败 800 万国民党军.....76
- 十、小米加步枪.....77
- 十一、农村包围城市.....83
- 十二、略述中共的暗黑战术.....87
 - 1、假承诺 真捅刀.....87
 - 2、种鸦片 毒化民族帮助侵略者.....91
 - 3、中共对中华民国发动了五次金融战.....92
 - 4、发动军队“打内战”与策动学潮“反内战”.....96
 - 5、地下党贪污败坏国民党的形象.....98
 - 6、假扮国军抢劫 打击民心.....100
 - 7、强迫地主冲锋消耗国军子弹.....100
 - 8、绑架百姓要挟国军.....100

9、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来发动内战.....	102
10、借助他国力量推翻合法政权.....	105
11、用敌国士兵与战俘打内战抢江山.....	106
12、小结.....	109
十三、国民党把大量黄金运到台湾.....	112
十四、抗美援朝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	117
十五、联合国裹挟志愿军战俘去台湾.....	123
十六、蒋介石放弃大陆的战争赔款.....	143
十七、一穷二白与万恶的旧社会.....	144
十八、翻身作主人.....	146
十九、民众支持中共？——77%民众坚决远离中共.....	147
1、中共用恐怖裹胁农民车轮滚滚.....	149
2、刘少奇是毛泽东的背锅侠.....	153
3、20 万日军战俘加入林彪部队.....	153
4、东北民众抵抗共军极度欢迎国军.....	160
5、本节注释：.....	167
二十、三年自然灾害与苏联逼债时期.....	168
廿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88
廿二、改革开放经济上走的是蒋介石道路.....	190
廿三、一分为二及辩证法.....	191
廿四、灭共是人类的事业.....	191
后记.....	193
版权声明.....	198

一、大革命时期群魔乱舞丑恶无比

中共的阶级革命对保卫民族有利吗？不但没有，反而极大有害！中共一贯以来，遮遮掩掩这段历史，甚至篡改这段历史，并把罪恶当成丰功伟绩来歌颂，我们就来揭开盖子，让世人看清楚它。

中共搞的大革命时期，真是群魔乱舞，罪恶无比，它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对中华民族的破坏极其恶劣，尤其在经济上的破坏，给我们这个艰难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致命的一击，败坏了中华民族的形象，给日夜觊觎中国的外国豺狼送去了明媚的梦幻，为日本人的侵略作足了准备。



1、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各地的罢工潮风起云涌，严重摧残了中国幼稚之工业，给这个正艰难走向工业化的落后农业国，杠上了致命的一击，给日夜觊觎中国的外国豺狼，带去了明媚的希望。

汉冶萍公司是当年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是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工人众多。被“阶级斗争有益论”者相中，要把它建成“**工人运动的基地和无产阶级的大本营**”（看清楚啊，搞工运不是因为工人生活辛苦，而是工人多、好利用，要搞成工人运动的大本营。其实当时农民生活更苦）。中共组织了汉冶萍总工会罢工和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安源煤矿是汉冶萍主要厂矿之一，文革时看到，中共的领导人夹着雨伞去安源组织罢工的巨型画像。刘少奇奉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和毛泽东委派，到安源路矿开展工人运动，并成功领导了 1922 年 9 月、1925 年 1 月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运动。

安源煤矿罢工胜利后，工会有最高的权力，并且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的警察及监狱等，工人还要求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共产党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当然什么都得管）。

但是，在胜利的喜悦中，出现了新的问题。许多工人头脑发热，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运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还要盲目行动，以致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就

是说如果形势好可以提出过高要求)。例如,要求再增加工资,超过了实际可能的程度;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 12 小时减至 4 小时以下,以致随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旷工;不听管理人员、工头指挥,自由行动;一些职员、工头不敢管工人,无法对工作负责任,任凭工人自由行动,把事情做坏,使产量下降,他们说:“工人们要这样,现在有工人俱乐部领导,我们管不着工人了”。“工厂也要有一种正当的厂规。有些工友以为厂规是资本家订的,不管他正当与否,故意不守”。生产减低的责任主要是工人俱乐部的。路矿当局也向工人施加压力。当时在二七罢工失败以后,资本家与军阀向工人进攻,全国都是如此,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独自为战,犹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实行退却与防御的方针,然而工人要求进攻(攫取更多利益)。这种情形使刘少奇“苦闷欲死”。(《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中共十大元老》——文博 编著)(6)。

刘少奇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具体的环境条件,确定了安源工人运动“立取守势”的策略,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竭力团结内部(可见,中共决定工人是否采取攻势,是看形势而非看公平与正义,这样的工运真是混帐到极!)。刘少奇认为,当时最重要的是教育工人“认清自己阶级的地位和真实目的”。

刘少奇指出,争得工人直接的利益,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并不是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而是“使大家认识阶级的利害而结合团体的一种手段”。他认为,这种经济斗争,从工人将来的全部的利益看来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须从这种利益很小的运动做起,使工人从切身利益中看见利害,“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阶级自觉的团结起来”。(可见,共产党搞罢工并不是真正为了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是把工人拉过来,作为打击资本家和推翻政权的棋子与工具,这种罢工不是经济罢工,而是政治罢工,毫无正当性可言)。

要算工人的幸福指数,古今中外都算在内,这时的安源煤矿工人算第一。汉冶萍总工会罢工和安源煤矿工人罢工,这两个罢工,致使经营异常艰难中的汉冶萍更加雪上加霜,最终停产。最后汉阳铁厂仅留下 200 余人看厂,其余工人遣散,部分失业的矿工与矿警后来被共产党拉走,成了共产党的兵,汉冶萍公司名存实亡。注意,连被共产党认为是资本家走狗的矿警也拉走,这时不讲阶级与阶级斗争。

汉冶萍公司全称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1907 年由湖北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三处企业合并而成,是当时中国最大也是最早的钢铁煤联合企业。公司成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期间发展到黄金时期,但随着一战之后世界经济陷入萧条而经营困难。

汉冶萍公司的存在关系到国家实业发展、国家兴亡。刘少奇认为,汉冶萍公司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关系到中国实业发展与民族自强。他指出,“汉冶萍在东亚,他的存在比平常产业有更深几层的重要。他不独在国民经济上占了极重要之地位;且为发展东方‘物质文明’之根据”,对其影响力予以高度重视。一战带来了世界军事工业的发展和钢铁市场的繁荣,钢铁价格突飞猛涨,作为当时中国最大钢铁企业的汉冶萍公司乘势发展。从 1915 年起,公司连年盈利,至 20 年代中期拥有多座化铁炉,年产生铁 15 万吨左右,占同期全国生铁产量的一半以上。而从一战前后中国铁制品的出口金额来看,1917 年尚盈利 180 万两。后来,中共在那里搞罢工,到 1925 年营利“竟至断绝”。

共产党和刘少奇一边说汉冶萍对国计民生如何重要,一边用阶级斗争与罢工来毁坏这重要的宝贝!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既有眼光又有良心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行为更加不可度量。1922 年汉阳铁厂炼钢炉全部停产。1924 年汉阳铁厂

3、4号高炉停产。1925年大冶铁厂高炉全部停产。1928年萍乡煤矿为江西省政府接管。至此，汉冶萍公司只剩下大冶铁矿一处继续生产，但已被盛宣怀抵押给日本，沦为日本制铁所的供矿单位，替日本人制造武器再侵略我们。汉阳铁厂仅留下200余人看厂，其余工人遣散，汉冶萍公司名存实亡。

从时间与结果上来看，中共搞的工人运动，无疑是国有企业汉冶萍停产的最直接和最后的“临门一脚”，不但国家企业遭受巨大的损失，也导致**百万民众**生计无所依托而流离失所。这是一次最大的祸国殃民行为，对中国当时及后来产生极其恶劣的后果。失业工人不少人加入了中共队伍，战死于内战战场。

汉冶萍公司停产，这给需要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的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给后来的抗日战争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受到损失的不仅是厂家，工人也损失很惨——没有了工作，最大的损失还是国家，汉冶萍是国企，如果汉冶萍正常运转，将巨大的支撑国家的各项建设，并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奠定军事基础。同时规模不如汉冶萍的日本八幡制铁所，为日本的国力与战争提供了巨大的支撑。其实处心积虑想关掉汉冶萍的应该是日本人，无论从经济角度、行业竞争角度、战争角度和世界格局考虑都应该是如此。某些组织做到了日本人该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不是汉X胜似汉X。

没有钢铁，如何制造武器？战争最需要的是武器与人，而中国不缺人，缺的是武器。中国军队战斗力不如日本军队的原因是武器数量不足、武器质量不好、训练不足，整个抗战期间，由于战争的破坏，中国制造的中正步枪总共才60万枝，加上各地生产的20多万支老式汉阳造步枪，制式步枪的生产一共不过80万枝，还缺子弹。这对于始终保持300万人以上的中国军队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和其他强国相比，德国仅仅在二战期间就生产了754万支毛瑟步枪，几乎是中国的10倍，这还是在兼顾坦克、大炮、飞机和舰船的情况下实现的。抗战中，中国军人几个人共用一支步枪，前面的人被打死了，后面的人拿起步枪接着打，子弹也很有限。中国如果有如德国那么多的武器，何至于开战时的战力弱？抗战初期只有苏联援助中国，是因为全世界都不看好中国，并害怕援助中国而得罪日本。只有苏联援助中国，在步枪方面仅援助（相当于出售）了5万枝，也解决了中国的燃眉之急，可见中国的武器缺到什么程度？缺工业缺到什么程度？罢工就是打击中国的工业、打击中国的抗战。

正常罢工应该只是经济斗争，不应该牵扯政治问题。共产党领导的罢工全部是政治罢工，是为打击资本家的罢工，甚至与经济无关。当时中国最需要工业、最需要的是资本家，中国最虚弱的也是资本家，打击资本家就是打击中国，是非常邪恶的汉X行为。

当时的安源煤矿工人工资待遇并不低，当时汉冶萍等于是“国企”，安源煤矿的管理层连股份都没有，也应该属于工人阶级，反对管理层的罢工斗争是没有道理的。罢工时提出“凡薪资每日在1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时未增工资者，照原薪增加5%。”当时1元（大洋）可以购买150斤谷子，够一家人一月的费用，其实农民的生活最苦，在当时全国小地主普遍破产的情况下，这真是天上工资。

看看这篇文章《真实的民国：1927年女工工资高于公务员科长》（注213），这是凤凰网历史专稿刊登《长江日报》记者王勇的文章，这是非常严肃的研究文章，实实在在的事实摆在那里。

文章4000多字，很长，摘编如下：

{

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第一年 14 元，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 30 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 10 至 13 元，巡长 16 至 18 元。《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 1 名科长，月薪也不过 30 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

而在当时，物价低廉，《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 1 担 3 到 4 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 3 个铜板，剃头 8 个铜板，绍兴酒 1 斤 1 角钱。拿了 1 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 8 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 20 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 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收入水平。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 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 0.45 元；1928 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 0.73 元，最低 0.18 元，平均 0.455 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 1929 年，山东各县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 12 元。

另据 1934 年 7 月 1 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 15 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 1.5 万，工资平均 20 元。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 10 元，最高 40 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 16 股分红，店东 12 股，经理 1 股，全体职工 3 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 10 个银元，第二年 15 个，第三年 20 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 72 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 72 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 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 4 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 500 多元。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 0.90 元增至 1.26 元，即月薪从 27 元涨到 37 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包惠僧在一本书中提到，只要 3 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 1 个月。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

1926 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 20 个银元以上。1933 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 39 至 56 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 60-80 元之间，可买 1 两黄金。1935 年，汉口的金价最高 90 元、最低 76 元，上海最高 96 元、最低 77 元。

}

“只要 3 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 1 个月”。现在，1000 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 1 个月”吗？根本不可能！由此可见，工人与教师的收入还是

相当高的。

1932 年时，广州的教师工资更高，初中高中教师按课时计算工资，按级别从 4 元/课时至 9 元/课时，如果月授课是 80 课时，最高月工资可达 720 元毫洋，相当于 562.5 元大洋（1933 年，128 元毫洋可换大洋 100 元）（注 213），相当于 2020 年的 5、6 万元人民币，当时可购买黄金 $562.5 / (90 + 76) / 2 = 6.78$ （两）= 211.8（克）（当时汉口金价每两在 90 到 76 大洋之间），如果按照现在的金价，那就是超过 10 万人民币。1938 年元旦，郭沫若任社长的《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广东最高军阀余汉谋捐助毫洋两千元作为开办费用。一个报刊复刊仅需 2000 毫洋，可见毫洋很值钱。

虽然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内战，虽然没有外国投资，中国的 GDP 增量还是达到 10%，当时的工人与教师的收入真不低。把中华民国时代称为什么的旧社会，那只是为打倒它制造的宣传而已。

可惜，这些好日子被工运搞乱，最终随着 1937 年日寇全面侵华而终结。

.....

安源煤矿罢工前工人的最高日工资是 1 元，这样的工资待遇真不低，就是放在近百年后的 2022 年，也是高收入。当时，更应该罢工的是农民与小地主。

如有 100 亩良田的南方小地主，100 亩相当于 9 个多足球场的大小，需要 6、7 个人才能耕种得了。当时丰收年亩产也就 3、400 斤，就按 350 斤算，一年两造， $100 \times 350 \times 2 = 70000$ 斤，全部租给别人（租出去容易算成本，收成一租金 = 成本，收入 = 租金），自己收一半的租金，就 35000 斤。 $35000 / 150 = 233$ （天）。也就是说，一个安源煤矿井下工人 233 天的收入，就是一个 100 亩良田的南方小地主、在丰收年时一年的总收入。如果按照 375 租金（减租就是这个标准），地主的收入 $7000 \times 0.375 = 26250$ （斤）， $26250 / 150 = 175$ （天）。也就是说，一个安源煤矿井下工人半年（175 天）的收入，就是一个 100 亩良田的南方小地主、在丰收年时一年租金的总收入。安源煤矿工人的收入还低吗？这样的收入还应该罢工吗？估计小地主更愿意到安源煤矿当井下工人。

在 1976 年前后，中国一个普通老干部退休前的月工资是 50 元左右，在黑市上（黑市才是正常的交易市场），差不多能买 50 斤谷子（有的地方够呛能买得到）。工人的工资比普通干部更低。就是说，大革命时期安源煤矿工人的日工资是毛时期一个退休前普通老干部的月工资的 3 倍。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后的 51 年，劳动效率已经提高了无数倍，竟然普通老干部的月工资不如 51 年前安源煤矿工人的日工资，如果说剥削，究竟谁更加剥削？

毛泽东在大城市北京北大图书馆工作时的月工资是 8 元，那是令一般人羡慕的工作，没有后门还找不到呢，可见汉冶萍的工人是高薪一族。1 元的日工资加上 4 小时的工作时间，还可以“随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旷工”，这是古今中外最幸福的工人。只是用“工人”这个词合不合适？是否更应该用“工老大”、“工霸”或者“打工皇帝”、打工流氓这些词？我充分理解一个词“贪婪”。汉冶萍是“国企”，可怜的中国人民，被罢工工人卖了。

安源煤矿罢工胜利后，工会有最高的权力，并且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的警察及监狱等，工人还要求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共产党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当然什么都得管）。整个安源煤矿罢工过程及其后都在刘少奇的领导之下，他是个比较理性的人，都无法改变 4 小时的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纪律，他向厂方作出退让，想改善工作纪律和稳定产量，都无法实现。（社会）整个形势要求工会实行退却与防御的方针，刘少奇根据形

势的变化和具体的环境条件，确定了安源工人运动“立取守势”的策略，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要遵守协议，保证矿区产量”，工人却要求进攻（用更剧烈措施获取更多利益）。这种情形使刘少奇“苦闷欲死”。因为刘的这种不全部按照工人的要求、要与厂方磋商、想改善工作纪律和稳定产量的做法，几十年后，他被打成“工贼”。可见，当时中共失去了对工运的强而有力的控制。

刘少奇无法说服工人，苦闷欲死，眼看企业产量下降走向破产，他也极度痛心，极度抑郁于心，以致在十多年后的1937年，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很明白，上述的现象，是中国革命工人运动初期的表现，幼稚的表现。‘流氓性’带得很重。”他把中国工人与流氓联系起来。此信落入毛的手里，刘少奇从延安整风时开始成为毛的极端拥护者。延安整风时，刘少奇从外地赶回延安，他一开始极端反对整风，突然一夜之间转变了态度，从极端反对变成极端拥护，并成为运动健将。从此，他密切配合毛的各项措施，作为回报，他被提拔高位直至成为接班人。

大革命时进行了广泛的工人罢工运动，有成功有失败。安源煤矿罢工成功了，上海罢工失败了。上海工人罢工不成功的原因，是工人来源复杂，致使不能团结。安源煤矿罢工成功的原因，是工人来源集中，乡土观念浓，比较团结，行动一致；还因为管理层连股份都没有，以致不能坚决捍卫企业利益。罢工起作用的因素不是阶级因素，而是乡土因素。乡土是地缘问题，阶级是经济问题，阶级与地缘是两个不同概念又相互排斥的东西，用乡土观念搞起阶级斗争，真是荒唐。属于“国际主义”中的“阶级斗争”靠其所批判的、甚至是敌对的“民族主义”中的“乡土主义”来实现，也就是用“民族主义”来实现“国际主义”。

可见，当时的中国工人运动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民族主义的变种。这也证明，中国的阶级斗争在大革命时期都行不通。正因为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人运动，所以，后来中共在工人中不受欢迎，中共失去了在城市立根的根基，工人领袖也纷纷向国民党投降，反过来清算中共，这是大革命在城市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国农民比工人更苦、知识水平更低、更容易上当受骗！中共失去在城市立根的根基，从此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2、陈赞贤要求罢工店员涨14倍工资

铁路工人罢工也给中国这个准备大力建设铁路的国家，带来巨大的危难。

北伐开始以后，工人运动如野火乱烧。陈赞贤在1926年下半年到赣州从事工人运动，把一万多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进行各种罢工。总工会要求商店店员的工资骤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不知道是用什么科学方法算的14倍），这是非常高的工资，大城市都没有这么高，还要求“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随之而来的是商店关门物价飞涨，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地方混乱（9）。

陈赞贤当然是烈士，现在还被敬仰。但是人们在纪念他的时候，除了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很少有人反思一下：倪弼等人与陈素不相识，为什么会下此毒手？从陈本人那里有什么问题值得反思？新中国成立后，在江西党史座谈会上，当年在赣南从事建党和农民运动的陈奇涵上将回忆：“陈赞贤同志……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与赣城资产阶级奋勇搏斗，最后牺牲了自己，这是十分光荣的。但是，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他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在洋货、绸缎、布匹店员进行加资减时斗争时，他不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以至造成工作中不应有的损失。那时洋货、绸缎店员的工资仿照钱业店员骤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钱业、洋货、绸缎店主资本雄厚，店员不多，还可负担。但是布匹店员的工资也照样增加到14倍，那就非布店主的力量所能胜任了。布店资本少，店员多，与农民群众联系广，随之而来的布匹涨价，引起了农民群众的不满。布匹店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到处做反革命的宣传，以至纠缠两个多月不能解决。要他到省委亲自解决，虽然到了，但省委也没有说服他。结果反革命分子蓄谋枪杀了他。令人十分惋惜的是，他不听党的话，私自回到赣州，不但招致了他自己的牺牲，接踵而来的是党的联系遭到破坏，党的工作全部坍台，这些则是最为惨痛的教训。”

激活
转到

（陈赞贤领导罢工，工人长 14 倍工资——QQ 新闻网）

陈赞贤可能不吃人间烟火，不明人间疾苦。当时，中国的经济非常不好，工业化程度很低，工厂很少，当然工人就少。陈赞贤找不到产业工人，就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人运动从商店员工那里着手，提出非常荒唐无理要求。一般的商店是小本经营，靠着薄利支撑着，长 1 倍工资已经是要命的事，你一下子要提高 14 倍工资、3 个至 5 个月探亲假，那还不亏本吗？还想着分红，能有红分吗？分债差不多！老板都会去当店员而不当老板。当然，工运中的老板是不敢开除员工的，否则就招来杀身之祸。既然敢于向你要求 14 倍工资，你还敢开除，不想活了？当时赣州几乎没有工厂，陈赞贤的阶级斗争对象就针对店主，开一个小店就算资本家了吗？我看中产阶级都算不上，为什么还要整他们？

陈的被杀与另一件事有关：罢工工人欲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彩排，遭拒则骚扰、污辱女二师，画男女生殖器种种齷齪不堪入目之图在校门照墙上，被本校职员李同志瞥见，将店员责备。彼等纠合罢工店员七八十人，将李同志捉去随拖随打，众拳交加，声言捆绑游街。拖至七姑庙门首，将李同志推跌在地，痛殴一顿。演剧会员闻讯追至，始救李同志出险。当即扶回校中，并飞报县署县党部（国民党）、总工会。由钟友千、陈铁、顾光理、谢溥泉、刘甲第、张俊宰、朱鼎勋到校，看明字画，录下盖章及验明殴打伤痕，当由县党部召集各级党部各公团开紧急会议，群情愤极，一致议决请该工会将肇事人查出严办。

工会不交人还召集大会筹商反抗，放言非拆毁县署县党部二女师不可。县党部继续召集各级党部各公团在县署开会。该工会委员长陈赞贤、钟友千、萧韶笙等纠合工人千余，包围县署并冯入会场。内外开会未及讨论，即怂恿工人大声叫打，会场秩序大乱，围打县党部主席筹备员兼赣县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陈铁、女二师校长欧阳魁及女生妇女各公团等。县署护警出而拦阻，亦被殴伤。幸隔壁兵站派出所所长闻警出队弹压，始各陆续散去。……自工会成立，各店员不特时有殴打店主事实，抑且日有捆绑店主游街，大书标语插在背上，如赴刑场者。工会恃其人众，任意横行，县党部县公署俱莫敢过问。前月涂县长因欲维持地方秩序，拥护农工政策，主张工会条例须遵照我国民政府所颁法令，乃陈赞贤、钟友千、萧韶笙等因恐一行遵守法令，则不能便其私图，故次日开仲裁会议时，不待

涂县长发言，即嗾使工人将涂县长包围殴打，致身受重伤，当晚被迫辞职而去(9)。

doczj.com/doc/af14332869-1.html

有关陈赞贤被害事件的一组电文

文件一：

赣州妇女解放协会等通电

(1927年1月1日)

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中央妇女部。探送谭主席蒋总司令总司令政治部政治委员会政务委员会省党部农工商学兵各团体各报馆钧鉴：

陷日下午三时赣州妇女解放协会假二女师校练习新剧，为革命工作，因练习时间未便来宾参观，不料有罢工洋货绸缎布正店员工七八十人强入校中，职员劝阻，该工人等乃在校门口照墙上乱写打倒二女师、男子睡上，女子睡下及污辱女生等种种不堪之语，并画男女生殖器龌龊图形，为职员李君瞥见，向涂画者责备。彼等遂蜂拥将李君捉住，众拳交加，随拖随打，声言捆去游街。拖至七建庙门首，将李君推堵在地，痛殴万状。幸校内演剧妇女闻讯赶至，救李君出险。旋由校飞请县署县党部总工会到校看明字画，录下盖章及验明殴打伤痕，当由县党部召集各公团开紧急会议，群情愤极，一致议决请该工会将肇事七八十人查出严办。该工会执行委员以夜深不及查拿，乃签字担保次日下午二时以前交出人犯。散会后，该工会立即召集秘密大会筹商反抗，放言非拆毁县署县党部二女师不可。迨至次日下午二时，该工会既未交出人犯，亦无任何答复。四时各党部各公团仍在县署开会，该总工会委员长钟友千、萧韶笙等纠合工友千余人包围县署并闯入会场内外。开会时未及讨论，群集工人即大声叫打，并围打县党部筹备处主任兼赣县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陈铁、女二师校长欧阳魁及各公团以及女生妇女等，县署护兵出而拦阻亦被殴伤。当时全场秩序大乱，叫打之声如雷霆地。隔壁兵站总监派出所亦在包围中，陆所长见势加急即派武装军士莅场弹压，逞凶工人才停声释手。似此该总工会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繁盛城市县署之中胆敢目无法纪，聚众暴动，摧残女界，捣毁党部，殴打各公团，直接扰乱后防秩序，间接影响前方战事，人心惶惶，农商歇业，全城民众日在危险恐慌中，对于革命前途实有莫大阻碍。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钟友千、萧韶笙等负有攸归，恳请主持从严惩办，以维地方安宁，党团幸甚。赣州妇女解放

4个字 中文(中国)

(文档之家——赣州妇女解放协会等通电有关陈赞贤被害电文)

陈赞贤领导的罢工，造成工人无理横行、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社会混乱，两个多月都不愿意退让，谁也无法作通他的思想。1927年3月，北伐军第一师在确实无奈之下把陈枪决。当时报纸控制在左派与中共手中，全国声讨该师，蒋介石只得把军官撤职。陈赞贤后来成为中共的烈士(9)。由于赣州工人运动极左和胡闹，从此当地人都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死心塌地地跟国民党跑，成为国民党的模范统治区，共产党在那里无立锥之地，这都是拜陈赞贤之赐。难怪中共上将陈奇涵恨死了，陈奇涵所说的：“接踵而来的是党的联系遭到破坏，党的工作全部坍台，这些则是最为惨痛的教训”。如果公开辩论，陈赞贤当不上烈士。

对于陈赞贤之死，另有一说：陈赞贤，于前一日由省返赣，意图抵抗命令，即于是日借欢宴为名，纠集暴徒千余人在衡府开会，并武装游行示威。全城市民惊恐万状，县长以工会拒绝立案，请陈赞贤来磋商。初尚藉词延宕，不料鱼(6)日下午八时彼忽率领暴徒来署。陈亲身闯入内室，胁迫县长承认已经立案，气势汹汹，不可想象。适有军官经过县署，见暴徒在署哄闹，当即入内，适陈正出手枪向县长轰击未中，幸军官郑承德等各出枪相拒，将陈格毙。暴徒一哄而散。县长将免于危险。除将陈手枪缴交检察厅并请莅场验明外，特此电呈赣县县长郭巩叩阳。

赣州妇女解放协会等通电

(1927年3月7日)

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总司令省政府省党部钧鉴：江（3）日公布临时政务委员会，取缔工商纠纷办法，适已被省党部停职撤回之非法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于前一日由省返赣，意图抵抗命令。即于是日借欢宴为名，纠集暴徒千余人在衡府开会，并武装游行示威。全城市民惊恐万状，县长以工会拒绝立案，请陈赞贤来磋商。初尚藉词延宕，不料（6）日下午八时彼忽率领暴徒来署。陈亲身闯入内室，胁迫县长承认已经立案，气势汹汹，不可想象。适有军官经过县署，见暴徒在署哄闹，当即入内。适陈正出手枪向县长轰击未中，幸军官郑承德等各出枪相拒，将陈格毙。暴徒一哄而散。县长将免于危险。除将陈手枪缴交检察厅并请莅场验明外，特此电呈赣县县长郭巩叩阳。

（赣县县长郭巩致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总司令省政府省党部电）

看看陈等工人所为，无法无天，胡作非为，这真是天上奇谈，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中华大地上。可见，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是毫无公正性的可言。指挥这种工人运动的斯大林等国际人士，真是胡来！这种工运，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非常有利于后来的日本侵略者。

陈赞贤之流的胡闹，是国民党清党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工运，国民党能不清党吗？如果是你，应该如何处置？

在共产党内，也有人陈赞贤有巨大的意见，不只是上面陈奇涵，文革之时，陈赞贤遭到剧烈的批判。除陈赞贤之外，广东彭湃也在文革之时，遭到剧烈的批判，亲人还受到打击。都是行动过于出格。

注 213：真实的民国：1927 年女工工资高于公务员科长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t/xz/200902/0226_5683_1034405.shtml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t/xz/wangyong/200902/0226_5762_1034405_2.shtml

盘点民国时期待遇最高的五大行业，教师远超公务员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2404681613773757&wfr=spider&for=pc>

30 年代，中国各地市长月薪有多少？相当于多少人民币？

https://www.sohu.com/a/647264932_121142100

民国老百姓买得起月饼吗

[http://read.lhwww.cn/ReadingZone/PaperInfo/8414853C-1F0B-42C2-88CC-](http://read.lhwww.cn/ReadingZone/PaperInfo/8414853C-1F0B-42C2-88CC-200EEBB1B837?aid=07AD9402-B6D0-4C20-B135-0B9F72B636B8)

[200EEBB1B837?aid=07AD9402-B6D0-4C20-B135-0B9F72B636B8](http://read.lhwww.cn/ReadingZone/PaperInfo/8414853C-1F0B-42C2-88CC-200EEBB1B837?aid=07AD9402-B6D0-4C20-B135-0B9F72B636B8)

3、工人运动使武汉失去成为首都的机会

武汉工人运动致使武汉失去成为首都的机会。

按理说，武汉的位置，比南京更适合作为首都，特别有利于抗战。可惜，就是因为武汉工人运动，使得武汉失去作为首都的机会。

其实，当时的中国，工业非常落后，根本就没有自己建立起全部工业基础的

能力，最需要外国投资者带着资金技术进入中国以提高中国的工业水平，也就是需要外国资本家的剥削，最好是全世界的外国资本家都来剥削我们中国，那样，中国就发达了。2000 年中国入世贸，外国的资本家蜂拥而至，都来剥削我们，中国很快成为世界工厂，结果，也就十来年时间，中国的国力暴涨，很快成为科技、工业与经济强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的二把手，眼看就要成为一把手。而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矛头最主要是对准外国资本家，要把外国资本家赶跑，或者干脆消灭。这样做了，其实真正消灭的是中国的国力与前途，非常愚蠢。想想看，如果 70 多年前，外国的资本家蜂拥而至，都来剥削我们，当时中国的 GDP 增量在没有外国投资的情况下都达到 10%，有外国大力投资后，可能是 20% 甚至更多，中国的国力在十几年内暴涨，中国将提前 70 年成为世界工厂，科技上也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当时的中国人没被辩证法污染，比现在人更聪明。日本人还敢打我们吗？许多外国人在中国有投资，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也就帮着我们抵抗日寇，日本人还敢打我们吗？还打得过我们吗？牺牲掉几千万人的卫国战争就可以避免！最好是外国的兵器（步枪小炮）工厂也来剥削我们，我们不用进口武器，直接从工厂搬出来打丫鬼子。前面讲过，当时工人的工资很高，那么，在外国工厂的工人工资更高，起码高 50% 甚至几倍，这算剥削吗？不愿意被剥削的人自己回家给自己干活呗，又没人强迫你干活，何必搞什么政治罢工。中国人吃苦耐劳手脚灵活，是最好的劳工群体，外国资本家来中国对他们也是有利的，没有针对他们的政治罢工，他们不会不想来中国。资本家赚一点钱也不容易，在外要对付同行的竞争，在内要应付工人的罢工，搞政治罢工就是要流氓。可以说，政治罢工打倒自己的资本家并赶跑外国资本家，其实是打倒中国经济，是断送了中国的前途与命脉，打断中国崛起之机，直到 70 多年后才接上这根断脉。深夜回想，真令人痛心疾首。只有像俄罗斯人那样的愚蠢程度才能相信得了这种打倒资本家的理论，可恶的是他们还向外推广，可悲的是中国还有人相信，这是中华历史中最大的书生误国事件！是什么人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在此一目了然。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门户开放对中国最有利，工人运动就是要关闭这扇门。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也是抗战初期，除苏联外没有国家援助我们的最重要原因——你胡闹，谁会帮你？可以说，武汉没做好，没资格成为首都。

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是拒绝工业化，满清拒绝工业化致使中国落后。中国人这么聪明与吃苦耐劳，一旦门户开放，中国很快就会崛起，很快就会走到世界的前头。满清愚蠢，搞工运者更加愚蠢，满清最后都知道要搞工业化了，而在满清几十年之后的搞工运者，竟然不知道，这不是比满清更愚蠢吗？又蠢又拧。它自己愚蠢不可怕，可恶的是，它要中国跟它一起愚蠢。政治罢工不仅是对付外国资本家，也同时对付本国资本家，对付中华民族的建设事业，使得中国的建设步履维艰。民国初期，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的铁路计划中和西北有关的部分是：中央铁路系统、西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国民政府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后，提出“开发西北”的口号，先后派遣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北学术考察团、西北实业考察团等进行实地考察，并接连通过了一系列开发议案，准备对中国大力建设。而政治罢工者就是要在这样的大建设中打入一个楔子，断送这些关系民族命运的建设。

1927 年 3 月，武汉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任主席，由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左派许多是共产党人）联合执政，共产党员苏兆征、谭平山分任劳工部长和农政部长，执行了苏联指示下的所谓“反帝反封建”的“左”的共产党工农政策。在这种左的政策驱使下，在北伐军到达前后，武汉掀起巨大的罢工工潮。

受工潮的影响，武汉企业倒闭狂潮、老板跑路狂潮涌起滔天巨浪，工厂也相继停工停产，许多人携家带口逃入租界或乘船东下，仅迁入租界避难的市民即达 3800 户，40000 多人。不少老板连厂都不要就跑掉逃命，跑慢就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粹，致使工人失业人口空前高涨，达十多万人，油、盐、柴、米和日常用品奇缺，价格陡涨，成了巨大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最终导致工人运动彻底失败。当时人们最恐惧的是共产主义的到来。鲍罗廷总结这一段时间的总的形势说：“**国民政府引进共产主义的传闻……给武汉国民政府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共产党就是这样干的，应该不算传闻。

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分析工运问题说：“工人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本国的大资本家并不很多。在武汉许多大企业都是外国人经营，我国资本家经营的大企业很少。今日要增进我国工人利益，必须劳资协作来抵抗外国的经济压迫，要在劳资两利中去求取工人的利益……现在共产党动辄以罢工手段来对付本国资本家，无异摧残我国幼稚之工业发展。工厂关闭，工人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纵然以罢工手段对付外国企业家，罢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资撤退，我国工人必然要遭受失业的痛苦。”

由于武汉政府无法通过恢复经济来处理工人失业问题，调解劳资纠纷遂成为处理工人失业问题的主要手段。由于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在处理劳资纠纷的问题时，政党分歧日益严重，长期受工人失业问题困扰的国民党，徒然增加了对工人运动的恶感，由支持工人运动转为压制工人运动，从而加快了汪精卫集团倒向反共的进程。在国民党的指责和干预下，中共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压制工人运动，严重地影响了党和工人群众的关系，中共对于工人运动也失去了强而有力的控制能力。同时，由于共产党无法处理工人的失业问题，严重地影响了中共的威信，国共关系破裂之后，中共丧失了在城市中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

这些是中共所领导的政策，致使共产党丧失了威信，并丧失了在城市中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武汉也失去了作为首都的唯一机会。在工运中，工人一边无理要求提高工资导致企业破产失去工作，一边失去工作后又要求增加工资来补偿，这就成了死循环。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极大地摧残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客观上帮助了日寇侵略。

很明显，这一切是罔顾人命、罔顾公平正义的极左路线造成的，而这个路线出自斯大林，引起托洛斯基的批评。斯大林为了推卸罪责并打倒托洛斯基，就把中国革命的失败原因说是“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成了替罪羊、成了托派在中国的首犯。斯大林坚持了他的错误路线，以致中国各个根据地和红军后来才有非常惨烈的“肃反”运动，中国人又经历了巨大的劫难。**托洛斯基更左，是马列原教旨主义者，他掌权死的人可能更多。**

刘少奇对当年工人运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反思。十多年后的 1937 年，他在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倘若你们看看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骂苏区国营企业的工人‘要求过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要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

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资本家软弱**”、

“很明白，上述的现象，是中国革命工人运动初期的表现，幼稚的表现。**‘流氓性’**带得很重。中国工人的流氓式生活，**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在一旦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的无所顾忌的**，不估计将来与前途的行动。工会干部没有估计到这些，常常不能控制工人，而为工人的这种潮流所屈服或者冲倒...**国家企业**（指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企业）工人经过多次审判、开除，长期教育，虽大体上纠正过来，然而遗毒还是留存很大。然而这个错误一发生，影响当然重大。所以预防这种错误，异常重要。”(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我想，这封信是刘被打成内奸工贼的重要把柄。

从多个例子来看，中共在工人运动中失去了强而有力的控制，中共被许多罢工工人所抛弃，工人随心所欲，根本就不听刘少奇等中共的领导。



（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

梁启超在家书中也揭露：“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拚耳”（注224）。

“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确属事实。至于“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1927年6月，武汉失业工人救济局有过一份统计，称当时武汉有失业工人14万人；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报告中，外交部长陈友仁则有另一个数据：“失业的将近二十万人。”汪精卫所估计的数据，则是“失业的工人现共有三十万之多。”

何以一场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宗旨**”的“工人运动”，最终带来的却是大量的工人失业？刘少奇的反思里其实提供了答案——“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

其实情况比刘少奇所描述的还要糟糕，据郑超麟回忆：工人们不但以武装化

的纠察队封闭商铺厂店，强迫店主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样激进的结果，自然只能是雇主关闭商铺厂店逃亡。张国焘还记载了运动的一种恶性循环——随着工厂的纷纷倒闭和雇主的纷纷逃亡，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成了：“工人们一方面要工厂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企业更难经营”——失业时间越长，工人生计越艰难，“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就提得越高，企业就越不敢重新开张……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在调查武汉纺织业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谈到：工会势力过于庞大，工人纷纷怠工，无病也要求带薪休假，管理者则“简直不敢说”，以至于“商人纷纷歇业，以避工人之锋”。

社会普遍的不满，也反馈到了主持“工人运动”的共产党那里。据刘少奇给张闻天的书信里说：“在起初，人们都期求共产党设办法，就是政府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责无旁贷答应政府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人们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革命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共产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取强迫办法（与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于工会与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中共正如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正应了梁启超的“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

注 224：梁启超对“大革命”的大恐惧——[辛亥百年，重温历史，认知革命（77）](#)

作者：[民主思想者](#)

转自：<https://szbbs.sznews.com/thread-3575458-1-1.html?from=indexlink1926>

4、农民运动更惨烈 地主生无可逃

当共产党开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起农民运动，群众抑郁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对土豪劣绅，农民采取吃大户、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罚款的手段，直至公审枪毙。一时间搞得天翻地覆。

其实，大多数农民天性憨厚老实，只要有几亩田能维持生计，一般不会去造反。特别是打人杀人这样的暴烈行动，轻易不会去做。共产党要发动和组织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和官府，是很不容易的。

农民运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只要是造反，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了。这一来搞得乡里大乱，地主乡绅头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四等的跑县城。他们到处制造舆论，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

农民运动的惨烈，地主无处可逃。毛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有土必豪，无绅不劣。”湖南等地农民运动异常激烈和极端，许多北伐军的亲人被极端迫害甚至杀害，造成各界恐慌和极端仇视，引发社会动荡，影响军队稳定，几乎断送北伐，这也是军人后来那么踊跃追随蒋介石“清党”的主要原因。



（大革命时期崇阳农民运动）

（地主也很瘦嘛，不知犯什么罪受如此折磨？）

犯的什么罪？

犯的是有钱罪！这是马克思给人的罪名！哪怕你的钱是勤劳得来的，哪怕你的钱是捡到钻石得来的，反正在马克思那里，**有钱就是有罪**。现在的人都比以前的人有钱，现在人可以天天大鱼大肉，而以前的中国人只有在过年时才有一点肉吃，地主也是如此，所以，现在的人一般都比以前的人有罪，马克思理论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现在的我们比以前的我们有罪，因为有钱就有罪！看看中共定地主的标准，几十亩地就定成地主了，而几十亩地仅够温饱，也就是，在中共的眼里，温饱即是地主。中共定地主的标准这么低，中共真够害人的。

农会搞的“**平粜阻禁运动**”。该运动的本意，是底层贫民担忧一旦遇上青黄不接的年份，省内粮价暴涨，进而威胁自己生计，故而以农民协会的名义，禁止一切粮食出境。这种措施既然是贫农自己所定，本来理应对贫农有利。但实际却不然。**措施最先损害的是佃农、自耕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们的利益——这些农民，都有在市场上自由出卖粮食的需求，“平粜阻禁”之后，粮食不能在丰收与荒歉之间流动，导致其价格极低，种地反成了亏损之事，中共的《向导》周报描述说：“政府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去”，政府对此也无计可施；**无力抗拒政府催赋的自耕农和佃农**，则纷纷抛荒或违背租佃契约逃走。蔡锷家中多是老弱妇孺，几亩薄田又无人愿意租耕，无奈只能流落上海，寄食乞讨于故旧之门。佃农、自耕农们放弃种地之后，粮食大量减产，贫农们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然也落了空——更严重的是：贫农们这样闹，将粮食控制在省内，不许外运，导致前线的北伐军补给出现了严重问题，激起了军队的愤怒。**而贫农们之所以能够将“平粜阻禁运动”付诸实施，是因为他们掌控了农民协会**。据时人的调查，农民协会不仅“参加乡村统治权”，而且取代政府，实行“农协专政”，执行司法行政大权，独裁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专政的机关”。不但乡村的一切权力归农会，

“并且已经进一步蚕食、干与县政府”，几乎所有的农民问题要交给农会，工人问题要交给工会，学生问题要交给学联才能解决，“而县政府则门可罗雀，简直等于一种装饰品”。这时的湖南，“统治权在城市确已转到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

乡绅的舆论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关注。主持湖南农民运动的李维汉(罗迈)晚年在回忆录中承认：“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等等……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9)。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版，第 349 页)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强烈的“愤懑”。这严重影响着国民党的北伐大业。

这样的农运，国民党能不清党吗？

随着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湖北地区很快出现“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的失控局面。湖南地区乡村农运伊始，即出现“**华容民众打死土豪、资兴县部驱逐知事、茶陵拘警所所长游街等**”轰动事件。中共党内陈独秀等人认为工农运动出现“过火”行为，在 1927 年 1 月的中共中央会议上，**陈独秀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应当予以控制。然而，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恰恰相反。

蒋介石 4.12 清党后，由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称湖南农民运动还不够激烈，还宣称：“农民受压迫过久，稳健分子不易起来。**是要痞子、流氓做先锋，真正农民才得起来**。”但面对“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工农运动，武汉政府与国民党军队的各级军官却表示了强烈不满与谴责。

在当时的武汉政府统治区，工会权力极大，可以任意抓人，私设公堂，随便中断交通，没收工厂、商户财物等；湖南农运的贫农专政则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不仅对土地所有者及乡绅游街、罚款、私分其田地、家财，而且随意捕杀，甚至出现了截扣军粮，抗捐抗税的行为。

武汉政府控制的两湖及江西三省，财政收入因此锐减 2/3 以上；而武汉政府赖以与蒋介石对抗的军队最高是湖南唐生智所部，该部官兵多来自湖南本地，农会除分其军官家中土地外，甚至截留士兵寄回家中的钱款，再加上政府欠饷，官兵怨声载道。武汉政府的国民党人自然要将这笔账记到共产党头上（摘自《“书生气浓的革命家”——瞿秋白》）。

据国民党方面调查 5 月间湖南情况说：“先是共产党大捕彼辈所认为土豪劣

绅者，各地监狱为之充满……各县乡村，同时宣布戒严，凡无农会工会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则视为奸细，或土豪劣绅逃亡者（连逃亡都不行，多恐怖）。于此时也，商不安于市，农不安于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汪精卫6月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气愤地说：“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9）。这不是汪精卫个人的看法，而是武汉政府中多数国民党人的看法。不久后，汪精卫也清共产党，最后汪精卫放弃武汉政权，并入南京国民政府，汪蒋合流。从此，汪精卫开始了他一生的极端反共生涯（他比蒋介石更反共）。

蒋介石 4.12 清党后，武汉政府这边的北伐军和各界纷纷响应。

5月17日，驻防武汉上游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兵变，进攻武汉，通电联蒋反共。

5月21日晚，驻扎长沙的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事变，查封了工会、农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武装，并以湖南省主席唐生智名义通电称：“三湘七泽，已成群魔乱舞之场；城市乡村，尽陷鸡犬不宁之境。”事变发生后，湖南各地纷纷效仿。

与此同时，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以“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令共产党员全体出境，同时查封全省工会、农会、学生会（摘自《“书生气浓的革命家”——瞿秋白》）。

湖南最大势力者何键也在动手。

据《革命的真相》的第15章（4）“夏斗寅兵变与马日事变”的记载：

{

杀人放火的土地革命引起全国各界、国民党和北伐军将领的一致反对。中共领袖陈独秀感到了北伐军将领们的不满情绪，主张将土地革命降温，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文中坦言：“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苏俄代表鲍罗廷也向莫斯科提出同样降温土地革命的建议。在苏共高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乘机联手抨击斯大林主导的中国政策。斯大林联手布哈林对抗托、季，坚称中国政策正确，利用国民党武汉中央可以“对抗帝国主义”，驳回了陈独秀、鲍罗廷将土地革命降温的建议，任命罗易接替维津斯基任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负责召开中共五大及继续推动中国的工农运动和反帝运动。奉斯大林之命，罗易起草了中共五大的纲领，政治决议、组织决议等全套文件。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顺应民意和多数国民党人、国民党军将领的呼声，发动了四一二事变，与苏俄决裂。

4月中，新任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罗易来到武汉。27日，罗易、维津斯基、多里奥召集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八十位中共代表举行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苏俄代表鲍罗廷、米夫及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徐谦、谭延闿、孙科等人出席了大会。会上，罗易宣读了莫斯科制定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要求将暴力剥夺地主的

土地革命继续升温。对此要求，陈独秀、谭平山等人向罗易进言说：暴力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已经引起国民党人，党军将领的普遍反对，建议缓行。罗易不清楚武汉国民党中央面临的危机，拒绝鲍罗廷降温意见，**坚持要求按莫斯科的指示办。**陈独秀表示继续将土地革命升级会影响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罗易严厉批评陈独秀的意见是“失败主义”和“右倾”，申明中共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必须执行《中国问题决议》。**鲍罗廷、陈独秀只好表示服从。根据罗易提出的大纲，陈独秀在向大会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随后，罗易宣布大会通过了他起草的土地革命等决议案，宣布了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刘少奇等二十九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宣布按照苏共模式设立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局。由于陈独秀表达了不同意见，罗易在给共产国际报告是称：“中共党的领导状况不佳”。

中共五大会后，鲍罗廷主持武汉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北伐，派唐生智、张发奎率军北入河南，同时下令禁止管制区内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动，以缓和武汉周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这里，鲍罗廷是在执行斯大林的指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在占领区内针对英美日的暴力反帝运动和工人武装接管政权的工人运动，在农村开展暴力杀地主的“土地革命”。了解武汉政府危机的鲍罗廷根据国民党内多数党员对工、农、反帝三运动日益强烈的不满情绪和列强武力干涉的警告，主张缓行暴力排外运动。斯大林批准了鲍罗廷的主张，指示约束北伐军排外，特别不准向日本人挑衅，以防止引发第二次日俄战争。而罗易在执行斯大林的另一指示，要求中共执行《中国问题决议》，继续在各地发动反帝运动和工农运动。

斯大林将农民运动升温的指示使中国暴力土地革命迅速蔓延，农民协会无法无天。中共举行五大时，**与章太炎齐名的湖南名士叶德辉因写对联抨击农会胡作非为而被湖南农会武装处决，震惊社会各界。**北伐军将士多为农民运动的受害者，武汉方面所属的北伐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家属大批成为农会的刀下之鬼，**军官中的反共情绪爆发。

5月14日，国民党北伐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武汉国民政府军主力二次北伐时武汉防务空虚，在宜昌发动兵变。他通电要求“清共”说：

“我北伐军之昭示于民众者，亦是曰为民众谋解放，为国际求平等而已。不料军事日益发展，而共产党徒乘机窃发，盘踞要津，借口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民政治扰乱我两湖。斗寅等以耳目所及，仅就我鄂人所受之痛苦言之：我鄂久处军阀铁蹄之下，民众憔悴于虐政者已非一日，望治之殷，百倍于他省。当局者苟措置有方，因势利导，饥而食之，渴而饮之，收效之速，将如响斯应。而共产党徒董用威（必武）、徐谦、邓演达、詹大悲、张国恩、李汉俊辈，一般宵小之徒，把持政柄，操枰时机，以法律赋予政权，为私人报恩报怨之具，不悉官吏为何物，政治为何事，谬托邪说，贪黷败常，举凡军阀所不敢为之箝制舆论，而悍然为之，军阀所不忍行之苛税细捐，而毅然行之，继奸佞横行市场以害商，教流痞扰乱闾阎以病民，诛锄非种，强奸民意，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斗寅等处此，忍无可忍，只有率我将士，为民请命，班师东下，扑杀诸獠，去此害马，重建新政，继续北伐，以竣初功。”

随后，夏斗寅率军进攻武汉，被叶挺的独立团击败。兵变虽被镇压，但夏斗寅为民请命，反抗赤化的义举在军中影响巨大。

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听到军中各级军官对农运暴行的控诉，决定亲自走访湖南农村，了解农民对农会和农运的看法。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到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我问：‘老张，你的东家对你怎样？现在湖南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成立了，要向你的东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给你们，还要把他扫地出门，活活的饿死，你的感想怎样？’张春生迟疑了多时，将我引入内房，才低声的对我说：‘我与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来都有做地主的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忙得很，偏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但现在的政权被他们所窃据，我们被它们所胁迫，真是无可奈何，希望你们军人设法解救我们啊！……’说至此时，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样子，他继续的说：‘我刚才和你所谈的话，你千万不要泄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祸害。’我便安慰他说：‘你不要性急，好好的应付环境，总有解脱枷锁的一天。’嗣后我更暗中访问许多农民，其答复均与张春生所言大同小异。至此我已经彻底明了农人的内心，是绝对厌恶共产党的。”

调查后，许克祥决定采取行动。正好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家乡的大宅也被农会抢劫，何父被农会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何因应各级军官的呼吁，决定在湖南动手镇压农民运动。

5月21日（马日），许克祥得到秘密情报中共准备于5月底在长沙发动大暴动，“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员大屠杀以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深仇大恨，让队员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从而死心塌地地跟着共产党走。”当晚，他率军查封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释放了被监押的地主乡绅，处决中共党员及工农运动骨干，民众“万人争睹，欢呼雀跃”，是为中共史书深恶痛绝的“马日事变”。随后，许克祥发起成立了湖南救党委员会，在得报鲍罗廷、谭平山、陈公博（后来的大汉奸）、彭泽湘等人将到湘视察后电令岳阳驻军将鲍等就地枪决。鲍等抵岳州后，得当地驻军团长彭德怀报信立即折回武汉才得保性命。被许克祥释放的地主士绅受尽折磨，对农会恨得咬牙切齿，回乡后变卖家财，组织武装杀中共党员、农会干部和农会会员复仇。

}

四川杨森部出宜昌，占仙桃，距武汉只有100余英里。5月13日夏斗寅在沙市发动兵变，并向武昌进攻。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第三十五军的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兵变。夏斗寅和杨森先后被叶挺和程潜率部击败，夏斗寅投靠了蒋介石，杨森返回四川，对武汉政府并没有造成致命影响。

但许克祥的后台是北伐军的重要将领何键，何键听命于唐生智。唐生智在口头上对许克祥进行激烈谴责，在实际行动上却对他不稍加制裁，并对湖南制造事件的部队慰勉有加。许克祥遂有恃无恐，在长沙杀共产党员，解散工农组织，取消农工纠察队，成立“救党委员会”（即清除共产党委员会），支持土豪劣绅反水。鲍罗廷前往长沙，想挽回事件的影响，但刚到岳阳就被湖南的军队阻回，许克祥还扬言要枪毙鲍罗廷。马日事变实质是又一次三二〇事变。

但汪精卫对马日事变表示“谅解”，说湖南工农运动幼稚，“从此统一党的权威，对于工农运动，加以严格训练、取缔，未始非湘省前途之福”。这就肯定

了许克祥的反共行为。

这些情况表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离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与南京合流已相去不远了。但鲍罗廷出于他对工农运动一贯不重视的态度，对汪精卫立场的这一重大变化没有引起任何警觉。对莫斯科来说，更是如此。

5月间先后发生了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反共后。这在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引起很大震动。陈独秀的秘书黄介然回忆：“陈独秀认为都是农民‘过火’引起的，流露出一种理亏、内疚的心情。事变发生后，蔡和森、任弼时等同志和陈独秀、谭平山等人争论得很厉害。我记得陈曾说过：‘中央开会就像起哄，吵吵嚷嚷的，意见难以统一。而在两党联席会议上党又要表示意见！’很觉为难。回想那时，陈独秀真是六神无主，束手无策，情绪焦躁、慌乱，心情坏透了。”

由于工农运动过分暴力、过分残忍，导致社会动荡、军心不稳。汪的部下纷纷反共，促成了汪精卫的分共。

国民党内部本有左右两派，蒋介石本属国民党内的“左派”。中共热衷工农运动，蒋本来并不反对。正如杨奎松指出的，蒋介石早年也受过激进思想影响，因而也长期赞成和拥护“扶助农工”的政策。所以，这时期，蒋介石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应否“扶助农工”，而是如何“扶助农工”。(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 1 月版，第 154 页)。但是，这样的工农政策闹下去，像蒋介石这样有责任心的领导人能不反共吗？汪精卫也是国民党中的左派，最终也走上反共的道路。国民党中真正的右派是西山会议派，早就开始反共了，他们才是先知先觉先行行动者。后来的中华民国国家主席林森就是这一派的主力。

中共怪罪汪精卫分共，就是不看看自己的农民运动如何的暴力，为什么不回头看看当时的农民运动？哪一个正常的政府？哪一个有责任的政权能允许这样的胡闹？这样的农民运动搞下去，这样的阶级斗争搞下去，还没有等到日本侵略，中国就全面崩溃，不但经济崩溃、还造成社会混乱甚至相互仇杀。那时，日本人轻易地接收中国，中国的许多人将把日本人当作救世主而帮助它，中国国民政府根本就没有能力抗日。中国人自古就没有把政府政权当回事，而是把仁义、公平公正当成最高追求，把亲情也当成最高追求，当他的父母亲人被无辜迫害，唯一的追求就是报仇，日本人的侵略就是契机，能不利用吗？

可以想像，如果按照中共当时的工农路线走下去，后来中国没有任何力量反抗日本侵略，其实不用日本攻打就已经自己完蛋。政治罢工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有巨大危害，“阶级斗争有益论”者看不到这一点，非常可悲，斯大林等人非常愚蠢。

梁启超在家书中说：“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万恶的军阀，离末日不远了，不复成多大的问题；而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见的。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鲍罗廷、加伦的羁绊……党军所至之地，即是共产党地盘，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现在两湖之中等阶级（中国本无资产阶级），已绝对的不能生存，全国生产力不久便须涸竭到底，前途真不堪设想。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地了。我看现在国内各党派中惟有‘国家主义青

年团’一派最有希望，近来我颇和他们为交谊的接洽。恐怕将来要救中国，还是要看这一派的发展运用如何。”（注 224）。

看来，梁启超不但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运作很了解，他的眼光也是对的。“国家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党的前身。该党与中共渊源极深，都是从少年中国学会分化出来的。青年党后来成为国、共之外的民国第三大政党，党魁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信奉“国家主义”，长期在政见上与中共分庭抗礼——青年党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中共推崇“工人无祖国”；青年党主张全民的民主政治，中共信奉无产阶级专政。多年后回过头来，才知道青年党的主张无比正确。只是现在的中共不敢再让人知道青年党的主张。

梁启超在家书中说：“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河南、山东人民简直是活不成，湖南、江西人民也简直活不成，在两种恶势力夹攻之下。全国真成活地狱了。不惟唐生智头痛，连蒋介石们也头痛。总而言之，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我们常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谁知陈铭枢给他的朋友的信（我亲看见的），说的也正是这两句话。现在倒蒋陈、倒唐之声大盛于两湖、江西，李济琛在广东想自己练些非共产的军队（四师），到底被他们破坏，练不成功。蒋、唐他们自己安慰自己道：‘好在军队不在他们手里。’不错，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不了。将来我们受苦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有磨练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注 224）。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有一段话，可谓大革命中的“民粹主义”的最佳注释：“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后增入“恶意地”三个字）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过分（后更改为“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间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据《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编译。1947 年 3 月出版；其他版本对文字有所修改，见括号内注释）

“必须不准人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这其中的民粹味道是很浓烈的。更何况当时还有这样的认识：“乡下农民中，还是那些闯祸不怕大，生事不怕多的游民无产阶级分子，才有胆来领导这个革命。”李维汉多年后反思这段历史说：毛泽东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农民运动中民粹若此，工人运动自然也不例外，知识阶级“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中共参与的北伐，所参与之处几乎全都闹出了巨大乱子。东路北伐军所在因无中共势力参合，且何应钦、白崇禧坚决制止任何骚乱，福建、浙江等地尚未酿成大乱。两湖乃至江西，既有苏俄顾问又有中共操作，局面就大不同了。这以前，列宁就说过：“中国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它永远保持沸腾”

（转引自《鲍威尔对华回忆录》，P140）。1925 年 5 月 18 日，斯大林亲自下令：“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协的两派”，“揭露民族资产阶级

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奋斗”（《六大以前》，P992）。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关于中国问题的指令是：“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周利生着：《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P207）。这些文件意思是一致的，都旨在搞乱中国，越乱越好，表述方式和用词隐讳程度不一罢了。

看看中共在北伐之中的所作所为，真的起到了反作用。没有共产党人参与的北伐，胜利更加容易与彻底。

5、南京事件及宁汉合流

南京事件在前，蒋介石清党在后，可以说，是中共听命于斯大林搞南京事件，才促使国民党与蒋介石采取清党行动。

在武汉政府，对蒋介石拿大主意的当然还是充当政府教导员角色的鲍罗廷。他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将蒋介石在上海的活动及时向莫斯科报告，以致联共（布）中央向他核实中共的报告是否属实。原因是鲍罗廷瞧不起蒋介石，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随时可以除掉蒋介石。到4月1日蒋介石已经与外国和平解决南京事件之后，他仍然认为要收拾蒋介石易如反掌。他说：“蒋介石一无所有，他是光杆总司令，可能他有第一师军队可以依靠，宁波的一些商人还支持他，就这些。南京被我们占领了。蒋介石呆在水上，他未去南京，现在他在上海，他在那里不露面。总司令现在处在游荡状态，他到处乱窜，不知道怎么办。而在武汉有一切，大多数军队跟随我们，我们有一切。”

蒋介石开始与中共有矛盾，引起共产国际的不满。3月26日，林伯渠在南京密谋发动政变，逮捕蒋介石，不料被南京卫戍司令程潜拒绝。另有文章介绍说：**程潜与蒋介石不和，被鲍罗廷看作是自己人。3月下旬武汉政府下了一道逮捕蒋介石的密令，交程潜执行。但“共产国际代表（指维经斯基）、军事部门（俄国军事顾问）和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认为，目前同蒋介石决裂还不是时候，为了革命还可以保留他”。“由于这种犹豫，第六军军长程潜未能及时执行逮捕蒋的命令”。“送逮捕令的交通员晚到南京一周的时间”。**其实，程潜已经受命逮捕蒋介石，用不着再等交通员的命令。他拒绝执行关系到武汉政府命运的这道密令，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对不起孙中山先生”。**程潜是被鲍罗廷和武汉政府看作是“左派”将领，在关键时刻就是不听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更何况其他将领！**

共产国际为了挑起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矛盾，斯大林命令中共：“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军的某党党员，在南京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外国人商店住家，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杀害轮奸外国侨民及外交人员。在袭击中，英国和日本领事馆成为袭击的首要目标。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J.E.Williams, 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此外英国侨民死亡2人，日本侨民死亡1人，法国侨民死亡1人。死伤者多为名人（名人效果好），特别是**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27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据日本报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伤5人，被强奸者35人。**

北伐军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军队，这些为国为民的军人，所到之处秋毫不犯，什么时候有过如此之差的军纪？没有人组织、没有上级指挥、没有在伟大理想诱导下怎么可能做出如此卑劣事情？北伐军是外地军人，没有本地人指引，如何能找到外国人聚集地？时间如此之短，如何能找到校长、领事等名人？做这件事情肯定不是总司令蒋介石指挥的，而是要打击蒋介石和“外国势力”的中共听命于斯大林干的。

据查，此次为第2军、第6军中的党代表、基层的共产党军官及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党员合谋设计的组织行动。袭击时有当地的共产党党员专为向导，执行对象与场所都有事先规划。前者只限外国人；后者则选定领事馆、教会、学校等洋人集中处（没本地人指引，语言不是很熟悉的、外地来的军人根本找不到）。第2军与第6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分别是中共的李富春（中共和国副总理）与林伯渠（中共和国人大副委员长）。

这就是南京事件，是另一个义和团事件，对中国危害巨大。这是军人干的，比义和团的民众更加臭名昭著，幸好时间短。

该事件导致在长江上的号称文明军人的英美军舰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2000余人。日本军舰被日本政府下令不得开炮，舰队司令自愧不能保护国民而自杀谢罪。经日本媒体报道后发酵，造成日本国民极端仇视中国，为日本侵华做足了日本人的情感准备。从此，日本走上侵略中国的不归路。可以说，中共不但是日寇侵华的得益者，也是日寇侵华的推动者。

该事件更直接加剧亲中、“不干涉中国内战、支持蒋介石统一运动”的日本若槻礼次郎首相内阁倒台，主张侵略中国的田中奏折的主角田中义一继任内阁首相。不久，侵略中国的计划书《田中奏折》出炉；又不久，日军为报复并且阻挠中国统一而制造了济南惨案，杀死杀伤1.7万余名中国人，中国政府所派交涉人员也被杀；再不久，九一八暴发，日寇走上侵略中国的不归路。

“南京事件”催生了日本的《田中奏折》。南京事件后的第三个月，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人乘机打着为“南京事件”专门在东京召开了11天的“东方会议”。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集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关东军和驻华使节等官员参加。会议通过《对华政策纲要》，制订了秘密的侵华“新大陆政策”，这就是《田中奏折》，从此日本人在侵略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中华民族血流成河。

南京国民政府当时下令处决该案“肇事士兵及流氓”33人，通缉第2军与第6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中共党员李富春（后来中共和国副总理）与林伯渠（后来中共和国人大副委员长）。

蒋介石当时即把事件原因查明并向外国通报、道歉及赔偿，南京事件造成巨大的外交危机，幸得蒋中正处理得当，方能稍稍化解。南京事件和张作霖搜查苏联大使馆事件是几天后的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清党行动的最直接原因。南京事件导致中国在上臭名昭著，外交处境艰难，直接导致不久后日本发动的济南惨案（杀死杀伤1.7万余名中国军民）与九一八事变、苏联发动的中东路事件，以及全面抗战初期，中国没有得到国际上应有的大力帮助。

南京政府、北京政府、武汉政府，中华民国三个政权都走上清共的道路。

1927年4月6日（在南方国民革命政府发动清党前），北京政府的张作霖派兵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搜出苏共给中共的秘密文件，其中就有这次的南京事件的指令。张作霖为此判了李大钊死刑，还根据李大钊的请求专门从美国买到一个绞刑架，完成了李大钊的夙愿。

邓寅达在大革命时期跟共产党混在一起，在农民运动中发挥了很不好的作用，他是农民运动的推动者之一，为共产党农民运动呐喊。1927年6月30日，他出席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后，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的告别书，谴责汪精卫与蒋介石合流、背叛革命的行径，表示自己“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如果我们的中央确固了革命纲领”，自己就“受中央的命令立即回来工作”。1927年7月8日，邓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我们现在又注意什么呢？》一文，文章指出有人一面唱革命，一面又惊骇社会的变动，否认工农革命运动，这是欺骗群众，是假革命。文章还着重指出当前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生死关头，有可能断送在“一民主义”或“半民主义”的蒋介石、戴季陶及其同类等叛徒手上。1927年7月13日，邓寅达再次公开发表《辞职宣言》，斥责汪精卫一伙叛变革命。大革命时期的中共污秽很多，不是本书的重点，这里就不详述。邓还如此作为，真是糊涂透顶了。

1927年7月15日，在武汉国民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上，主持者汪精卫宣读了一份名为《五月指示》的文件，宣读完毕后，会场先是一片寂静，而后转为哗然，孙科愤怒的喊道：“第三国际放个屁，也是香的！我们容纳共产党，真是太过信他们了！”早有主意的唐生智、李宗仁等人则趁机叫嚣分共刻不容缓！全部与会人员除宋庆龄代表陈友仁外全部附和。这一天就是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开始清党。

《五月指示》是什么样的文件？竟能激起国民党人对中共这样的敌视？

农民运动比工人运动更加惨烈，农会抢劫、杀害地主及军人家属，动摇北伐军心。在蒋介石执行蔡元培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清党”(4.12清党)指示后，武汉政府这边的北伐军和各界纷纷响应。五月，夏斗寅进攻武汉，许克祥在长沙清除共产党人，湖南的何键也在动手，江西也在动手，全国出现反共高潮。

一直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鉴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认为中国革命陷入危险境地，于是，5月份在苏联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紧急讨论了中国问题。6月初，共产国际向中共下达了革命行动指示，内容可以概言为“**加速土改、建立共产党军、夺取武汉国民政府领导权、肃清有反共倾向的国民党人**”。这份指示即《五月指示》。其意是要求**中共赶紧建立共军、颠覆武汉政府、枪毙反共人士**，彻底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极端无产阶级革命。《五月指示》是在武汉国民政府没有清党前发出来的，后来的南昌暴动、秋收暴动、海陆丰暴动、广州暴动等等，都是在《五月指示》的指导下进行的，你说国民党能不暴跳如雷吗？

这份指示首先送到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和鲍罗廷手中。鲍罗廷认为这份指示是胡言乱语，建议压制不发，而刚刚来中国三个月的印度人罗易，则认为这是拯救中国革命前途的法宝——只要有对的人执行就可以，谁是对的人呢？汪精卫。罗易认为汪精卫是中国最革命、最值得信任、最有领导魅力的革命领袖。在一个多月前，一表人才的汪精卫来到武汉时曾高喊口号“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罗易深信汪精卫的真诚，于是他没有将《五月指示》交由中共党部讨论，而是先拿给了汪精卫，以期得到这位“左派领袖”的支持。

中共及共产国际指责罗易把《五月指示》给汪精卫看，才导致汪精卫分共的。一直到现在，共产党及其追随者都是这样的看法。我们就不明白，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要搞秘密？既然是指示，就应该公开，让全国全世界人民都看看，除非见不得人的东西才不敢给人看。罗易根本没有错，错的是暴烈的工农运动，错的是祸害民族的阶级斗争。

罗易真愚蠢，他以为世界人民都相信共产主义，所有的革命者都会走马列暴力道路，才给汪精卫看消灭国民党及颠覆中华民国的计划书——《五月指示》。孙中山看了这个指示也会清党的。罗易虽然愚蠢，但是他很真诚，该怎么的就怎么的，不骗不藏，比起其他靠坑蒙拐骗的共产党，如朱德、刘伯承、周恩来、刘少奇、毛泽东之辈，及所有搞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在道德上是无比的高。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给罗易发“真诚”奖。其实，最愚蠢的不是罗易，而列宁、斯大林、托洛斯基、毛泽东、周恩来之辈，真诚地相信了极其荒谬的马克思主义及辩证法这些邪论，把人类推向毁灭的深渊。

汪精卫清理共产党后，并入南京国民政府，这就是宁汉合流。

国民党清理共产党远没有共产党清理共产党那么残酷，国民党许多是送他们走、赶他们走，只要能“自首”、哪怕是“假自首”也能获得自由并无尾巴，并且能在国民党内继续升官，如李友邦等人。中共对待中共党员可狠了。如，杀掉林野、李明瑞、季振同、黄中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

可以准确无误地说，中共大革命的失败原因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是“左倾屠戮主义”、“左倾恐怖主义”，是共产党的“左倾”工农运动造成的，左派的武汉国民政府被左派的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所摧毁，武汉也失去了成为首都的唯一机会，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危害巨大。几十年后的大陆教科书，还在篡改这段历史，真可恶！

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持比较现实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却持比较激进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抛开国民党干革命，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按照马列主义理论，革命就是应该如托洛斯基所说那样自己干，老是附体着国民党干什么？不过，理论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如果按照托洛斯基的要求，中共根本就没有任何夺权的机会，因为中国的民族性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历史与俄罗斯不同，中国社会结构也与俄罗斯不同，没有多少人跟随中共闹革命。俄罗斯在列宁革命之前是封建制度（或者可以称为农奴制度）；而中国自秦始皇统一时就结束了封建制度，中国社会更公平，中国人不习惯使用暴力。

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国民党政府顾问来指导中国革命，而托洛斯基却通过共产国际这个组织来指导中国革命。这样的双重指导，也给中共带来了很大麻烦，中共内部也分为现实的斯大林派和激进的托洛斯基派，在当时似乎支持激进革命论的人占了上风。

中共就是苏联的线控木偶，要干什就干什，所有经费全部由苏联支出，苏联出钱出力出理论出顾问颠覆他国合法政权，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制造国际混乱。

6、焚烧湘粤大道（四百里长）两侧 15 公里内的民房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书中还记载更疯狂的事迹：当朱德带部队占据宜章后，蒋介石为了打通湘粤大道，出动 7 个师，准备对朱德湘南暴动政权进行“会剿”。中共湘南特委为了执行省委“阻止敌人打通湘粤大道”的指示（阻断交通很无耻），在“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极左精神影响下，在烧杀中又提出“焦土战略”，提出了“坚壁清野”、焚烧城乡以分散敌人的目标、焚烧湘粤大道（四百里长）两侧 15 公里内的民房”、片瓦不留。如此恶毒的政策，招致了当地农民的坚决反对。中共郴县县委于 1928 年 3 月 21 日上午在郴县城隍

庙召开（烧房）群众动员大会，共产党干部们准备认真地、苦口婆心地劝说群众烧自己家的房子和他人的房子闹革命，愤怒的群众当场杀了曾志的丈夫夏明震等 9 名党政领导、300 多名干部、1000 多名共产党追随者。仅用大刀长矛就杀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场多大的怨恨与混乱？

朱德的工农革命军派一营兵力打回郴州，见到共产党人尸横遍野，战士们怒火中烧，见人就打，心然也伤及许多无辜。

相信“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种革命理论的人，不但良心有问题，智力也有问题。当时生产力很低，人们辛苦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才建下一个家。竟然用“革命”鼓动人家烧自家的房子，能行得通吗？烧了房子怎么活啊？那些革命者好像喝了鸡血酒中了邪似的，毫无理智。凶残到什么程度？才要把“四百里长两侧 15 公里内的房子烧掉”，可以与南京大屠杀相比了。幸好是群众制止了这场世纪大火，革命者的智力水平不如普通农民。“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招数与太平天国极为相似，这是多么无耻的阴谋啊！小资产变无产后，他们吃什么？住到哪里去？如何生存？列宁想出这一招，竟然不知道这是弱智加无耻的招术。

当事者几十年后他们自我回顾，轻描淡写地用一个“极左”就完全掩盖了罪恶，甚至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推给陈独秀的所谓“右倾”，还自我高喊“伟大光荣正确”，这是多么无耻的一个群体啊？！大革命时期都是这种思维，安源煤矿罢工后工人的 4 个小时工作时间，陈赞贤的涨 14 倍工资、3 至 5 个月探亲假，连一个“极左”字眼都不用，陈赞贤还成为烈士，烈士当然不会是极左的啰。领导安源煤矿罢工的刘少奇，想改善劳动纪律稳定产量，结果被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陈赞贤却成了烈士、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只是不知道要向他学习什么？学习他闹政治罢工？还是学习罢工工人在女师范学校门口的墙上画上男女性生殖器？学习陈的要涨 14 倍工资？还是学习他的 5 个月探亲假？共产党革命胜利了，陈赞贤的同志们掌权几十年后的今天，也没看到要实现陈赞贤当初理想的一点点企图，为什么不实现呢？

应该清理烈士队伍，看是不是符合烈士资格，不是死了就可以封烈士，不要像日本人那样搞什么死亡崇拜！

马克思讲“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是经济标准”。人的好坏竟然以钱的多少来确定，这是多么无知的理论。人的经济是变化的，怎么会被固定成了阶级呢？当时中国的地主生活也很清苦，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荤，他们剥削的成果哪里去了？中国近代的落后是生产力与科学技术落后造成的，不是剥削造成的。

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民族内部的斗争，在民族内部根据经济情况划分成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放大了人的仇富心里和妒忌心，煽动起穷人对富人的迫害，制造起贫富之间的仇恨，撕裂了中国社会，让两边大杀戮，把原本生产力比较落后、比较贫苦但还算和谐的中国，推向血雨腥风之中，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造成社会的巨大割裂。这么做是撕裂中国、搞乱中国、打垮中国，实际效果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收割。这种所谓的阶级革命，其实是群体迫害和群体灭绝，而且是在民族内部进行的，连纳粹都不如。纳粹（民族先进论者）只迫害其他民族，而阶级革命者（阶级先进论者）只迫害自己的同族。这样的革命，不但有罪，而且罪恶滔天！

仔细解剖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由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根本不能成立，由这个所谓的规律推演出的革命“伟大论”也根本不成立。否定之否定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一个把人类推向灭亡的谎言。

可见辩证法有多邪。而某些团体政党利用这个所谓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和“革命伟大论”，到处闹革命，甚至以是否革命来衡量对错，用革命来代替正邪、代替法律，完全颠覆了人世间原本就存在的是非对错标准，这是彻底走了邪路。辩证法使得人类思维混乱、暴力横行（请看《金剑：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所以，我把其创造者黑格尔定为人类近代十大罪（恶）人之九。

革命有坏有好，并非都是神圣的，多数时候革命是非法的。

复辟有好有坏，自卫是正义的。

我们并不反对所有的革命，而是反对坏的、罪恶的革命，正常的法律也是赋予了自卫的权利，从来没有赋予革命的权利。那么，革命者是不是连这种法律也要打倒？

在革命的名义下，撒谎、欺骗、杀人，什么坏事都可以做。这是有罪的革命，是罪大恶极的革命。

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有罪，而是不少革命是有罪的，这是对革命神圣论的否认，是对革命崇拜者的反驳。至今，许多中国人甚至世界人，把革命当成圣灵一样膜拜，一听说革命，瞬间魂飞魄散、见识全无、不知所措，以致胡乱跟随，闹出许多罪恶滔天的事故，害人害己，可悲至极！为此，本人写了“革命之罪”，以警来者。

革命轻一点是改革，我们也不要对改革崇拜。其实，人类的改革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只是说不说而已。

并不是反对改革，而是不要崇拜改革、小心改革，必然的胜利却得到失败的结果，这才是改革最应该小心警惕的。改革必须小心谨慎、如临深渊，一步不慎万劫不复，所以，心急者、心浮气燥者、求功名利禄者、想一蹴而就者，必须远远排除在改革核心圈之外。大清最著名的改革——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最主要责任在谁身上，在康有为身上，好事变坏事是谁的责任？是康有为！为什么不能好事变好事？这就是改革者的责任。改革如人患病，需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还得一步步地来，想一朝就好而用猛药，这会是什么结果？众人皆知。

不要对“改革”崇拜，改革有成有败，在历史上多数改革未成功。改革有好有坏，坏的改革真不少。最近一百年来，世界上多少国家从富有改革成贫穷，一夜暴富的国家没有见到，一夜暴穷的国家，数一数，一大堆：阿根廷、委内瑞拉、瑙鲁、津巴布韦、古巴、拉脱维亚、西班牙、马里、阿富汗、塞尔维亚、南非、蒙古、柬埔寨……有些因为革命、有些因为改革、有些因为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得国家从富有变成贫穷。许多政客许诺了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的到来，到来的却是毁天灭地的大杀戮，如柬埔寨、蒙古、苏联。

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对原来不限制生育政策的改革，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挖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黝黝的深坑。这项改革不但是错误的，更是罪恶的。

所以，不要对改革、革命之类的东西崇拜，对革命崇拜正是这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哀，动不动就高喊：“我是革命的，你是反革命的”，一说是反革命的，那就是死罪。我实在不明，世界特别是中国，怎么会闹出“革命崇拜”这一荒唐事情？其逻辑如何而来？事物自有好坏的标准，不能用是不是改革、是不是革命来代替好坏标准。正因为如此，我们人类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错一步则灾难沉重，甚至万劫不复！不是革命了、改革了，社会就会进步的。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确革命了不少东西、革新了不少东西，结果越革命、越改革，越穷、社会越落后，最后在毛死后，来了个反革命（或者叫做反改革）——改革开放，**也就是经济上走回蒋介石道路**，当时有一句顺口溜：“辛辛苦苦三十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喊出了所有人内心深处的辛酸，也喊出了所谓“**改革开放**”的**真正事实——走回头路**。

革命与改革崇拜者是思维简单，总想一蹴而就，想出一妙招吃遍天下，于是往往失败了。

正是：好坏自有标尺，不能用革命与改革代替！

7、应该到日本搞工人运动才是爱中国

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本能获得胜利，其根本原因是，日本的间谍在俄罗斯发动了巨大的反对沙皇的运动，迫使沙皇用很大的力量对付国内反对力量，从而使得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中共为什么不学日本人，到日本发动工运？

日本的工业更发达，产业工人更多、比例更高，也就是日本的无产阶级更多、更集中、更广泛。如果日本人也搞工运，今天罢工明天罢工后天罢工，提高14倍工资、4个小时工作时间、3至5个月探亲假，他们不但根本就没有能力侵略中国，可能当时日本国就报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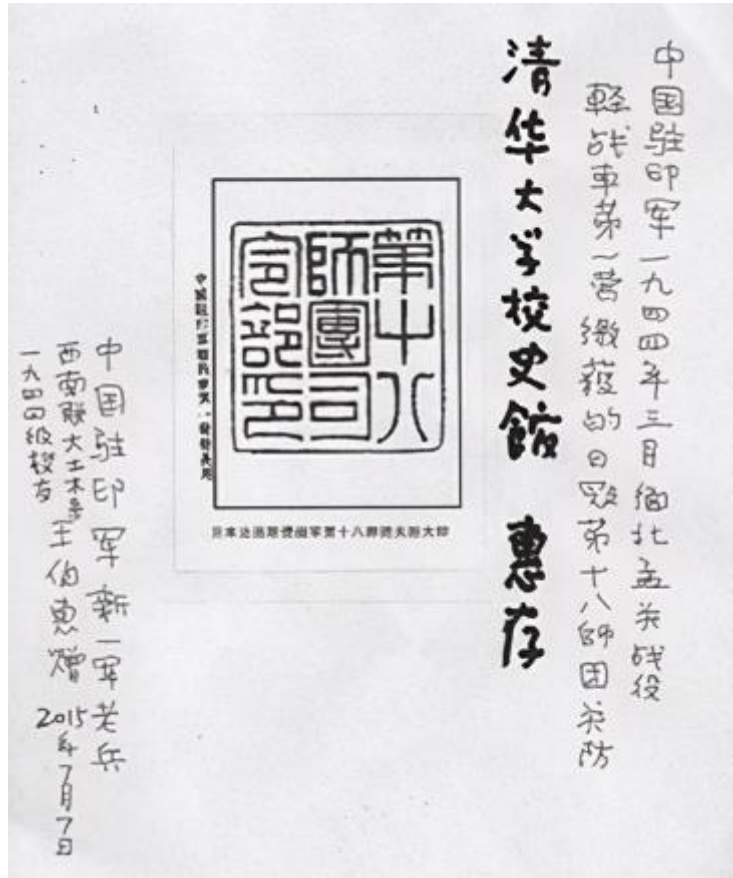
日本全体国民几乎都支持侵略，他们不懂阶级与阶级斗争。马列主义者如果真的想救中国的话，应该到日本宣传马列主义，造成日本八幡制铁所罢工、并最终关掉，中日战争就不会发生，中共用力用错地方了。哪一个国家想祸害中国，中共就派人去宣传“阶级斗争有益论”，让他们窝里斗，看着他们在窝里斗中灭亡，中国人坐享太平，多好？中国的“阶级斗争有益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由日本传过来的（不是首先从俄国传过来的），看来这不是日本人安什么好心。

中国近代的问题不是阶级压迫问题，而是民族压迫问题，是外来民族奴役中华民族、迫使中国签署许多不平等条约，让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灭亡。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搞阶级斗争，必然削弱自己民族的力量，无异于自我毁灭！特别是9.18日本侵略东北之后，某个党派高喊“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军队起义，武装保卫苏联”，无论它出于什么目的，它的理由表面上如何富丽堂皇，其客观效果必然是削弱中国的力量，帮助日本侵略者！

无知的人甚至高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日本侵略军也是无产阶级队伍——由日本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和小知识分子）组成的。对中国人最恶毒的是日本的无产阶级队伍——来自日本北九州的久留米十八师团，它是日军最精锐师团，这个师团来自日本贫穷的山区，师团成员大多数是来自山里的矿工和农民，穷山恶水让这里的男人以当兵为出路，苦难的生活使他们心中充满怨恨和凶恶，特殊的环境造就了这支令人发寒的魔鬼，所到之处经常大屠杀：**芜湖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广东登陆大屠杀、惠州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日军十八师团是日军最精锐部队，日军称之为“丛林作战之王”，但大家更愿意称呼它为

“丛林恶魔”，所到之处罕有对手，连英美军队都无招架之力，十八师团曾以死

伤9600余人的代价，成功占领马来半岛，毙伤俘获英美军共14万人，令世界为之震惊。在缅甸时，日军十八师团打得美军的打劫者部队（特种部队的前身）很恐慌。最后，也是在缅甸，该师团被中华民国新一军干净彻底消灭。还是中国军队利害！



（新一军俘获的日军十八师团关防大印）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与日军联合，这是卖国口号。日本皇帝连姓氏都没有，可以说是最最彻底的无产者，要不要与他联合受他领导，去完成“大世界共荣圈——共产主义”或者“八紘一字”的建设？

8、残酷的阶级斗争造成民族分裂

上面写了许多革命历史与许多生动的革命故事，这里再增加一些更加疯狂的革命故事。

中国的一些革命者对“革命”的狂热崇拜，只要见到“革命”二字，就好象见到圣灵一样马上五体投地，见到“革命”二字，就魂飞魄散，正常人的思维都不存在了。这种情形除了在文化大革命时出现较多之外，在大革命时期也特别特别的多。陶铸妻子曾志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里面记录了许多疯狂的革命崇拜（下面是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在大革命时期），当时湖南到处打豪绅（其实是对有钱人谋财害命），曾志的绅士父亲（非常老实的读书人，由于不会贪，官做不下去，做生意老亏本，被老婆骂为“昏君”）也害怕，到长沙躲避，路过衡阳想见在那里读书仅十几岁的曾志一面。曾志不愿见父亲，她只写信对父亲说：“我现在是革命者，你逃避农民运动就是反革命，我不能见你，以后也不承认你是我的父亲。”

从曾志的信中，我想起了中共上台后，特别是大饥荒与文革时，许多大陆人要逃到香港，如果被抓到，会很悲惨的，那是叛逃国家之罪、反革命之罪，

是个会连累家庭的巨大罪行。现在的朝鲜还是如此。连逃命都成为罪的国家，还是我们应该爱戴的国家吗？这个政权会是我们阶级的政权吗？我们应该秉承儒家的教育，谁迫害我们、谁把我们当成敌人，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孟子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方志敏杀了自己的亲叔叔，连古人说的“弑父不祥”也不顾了，看来曾志只差了这一步，对被别人无故加害的父亲落井下石，如果上级以革命的名义要求她枪毙逃避革命的父亲，她会怎么样呢？凭着她当时的心智就不好说了，七十多年后都看不到她对此事的一点点悔意，何况当时？真是昏头了。现在不是有人在网上忏悔在文革时出卖亲人的罪孽吗？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大潮中，这种事情很多，甚至很普遍，很可悲。在土改期间，晋绥行政公署主任武新宇，被群众强迫（？）牵着绳子拉他那鼻子上穿洞套绳父亲游街示众呢！估计在中华大地上的大革命时期、土改时期与文革时期，这种事情很多！

对于相信了阶级斗争的人来说，什么公平正义、什么法律良心、什么是非善恶、什么仁义道德、什么天理人情都可以抛弃；只要打上敌对阶级的标签，亲人就成了敌人；只要打上同一阶级的标签，仇人就成为战友。这是多么荒唐的人伦悲剧啊！只要打上革命的标签，烧杀抢掠都可以做，这是多么无知无耻的理论啊！相信这种理论的人是多么弱智啊！

文革时，陶铸与曾志被打倒，他们的儿女们并没有像曾志对待父亲那样对陶铸与曾志落井下石，否则，曾志早觉醒了，可惜。还是薄熙来够革命，据说他亲脚踹断父亲三根肋骨。大革命与文革时期，多少夫妻相抛弃，多少父母儿女相出卖，多少兄弟手足相残，这是古今中外最荒唐的人伦悲剧；多少文物古迹被摧毁，多少文化遗产被消灭；中华五千年演绎出来的先进文化，就这样被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革了命，都拜革命之手没了命。你说这个“革命”是罪还是功？傻子都能分辨，为什么革命者当时昏了头呢？还不是把“革命”当真理、当圣灵来崇拜造成的吗？还不是辩证法及否定之否定扭曲思维导致的吗？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书中还记载：1928年元月，朱德率南昌起义失败的部队来到宜章。他打着国民党军的旗号，在豪绅们的夹道欢迎下开进宜章县城。接着朱德设“鸿门宴”，将宜章县长和一批豪绅一网打尽（全部杀掉）。曾志的父亲如果不是身上有病，估计也会被朱德杀掉的。豪绅们并没有罪，朱德把他们一网打尽，公平正义在哪里？就没有想过人家的亲人怎么办？给社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另有记载：几乎在同一时期，41岁的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也在生死存亡间苦苦寻求革命道路。三河坝之战，朱德指挥分兵后的3000人阻击国军，血战三天三夜损兵过半，队伍行至赣南大余，士兵哄抢了县城里的当铺。能开当铺，是因为当地平静，没有土匪。有土匪的话，有钱也不敢开当铺。土匪抢当铺，这与共军何异？难怪1928年6月18日，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对中共革命之路感到遗憾，他甚至担心“中国的红军会把农民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一直到红四军召开了“八大”，结果争论依旧、问题依旧：“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思潮卷土重来，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等旧军队习气再度抬头，创建根据地工作也一度被放弃。更为严重的是，动摇了‘党指挥枪’原则、忽视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建设的红四军连战连败。”农村包围城市根本难以通行。没有后来的日本侵略让中共有喘息与发展之机、没有1945年后苏联对中共34亿美金（也有40亿之说）的武器援助，中共

根本不可能夺取政权。无知者总是在宣传“农村包围城市”，耽误了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革命胜利。

大革命时期的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那里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革命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崇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红色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后来，彭湃的少数亲人遭报复。彭湃本身是大地主，当然他很出名又有人脉，不会像林野那样被革命队伍清除掉，但是如果有党内高层斗争，还是存在不利因素。

刘胡兰斗地主、打地主、杀地主，被报复。复仇，很多时候是天经地义的。刘的12岁她妹妹亲眼看她死，几乎精神分裂，一辈子都痛苦、都不能忘记那个惨烈时刻。那么被刘胡兰杀的地主呢？被朱德杀掉的豪绅呢？他们的亲人怎么过？共产党如此残酷地斗地主、杀地主、分田地，想过别人没有？想过父母亲人被杀的林野、牵父亲鼻子的武新宇了吗？阶级斗争把一个几千年来善良且和睦的中华民族，变成一个残忍血腥且内斗的民族。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讲“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孔子学说与中国文化，就是让人减少暴力与杀戮，减少杀戮就减少相互仇杀。和平才能生存，生存才能发展，中国文化是人类未来的安全保障！都被辩证法、革命与阶级斗争所毁坏。

因为阶级是在民族内部划分的，搞阶级斗争的革命，只会撕裂民族，把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打垮，严重地摧残劳动工具、劳动者及生产力、生产关系，使整个社会急剧倒退，使得中国更加贫穷落后，还造成中国社会的撕裂，在民族内部埋下仇恨种子，把中国推向自我毁灭的深渊。这时，如果日本人打进来，会怎么样？对被朱德杀掉人的亲人来说，对于被刘胡兰迫害的地主来说，正是报仇的好机会，如果日本人再“美言”几句，报仇的人就更多了。复仇、报复，很多时候是天经地义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老天爷实行的复仇法律，我们自己也可以实施。搞阶级斗争，就是逼人当汉奸。

中国人自古以来国家民族概念很低，家族观念很重，正义感也很强，也就是更讲情义。当亲人无辜被杀，报仇的人肯定不少，找人代报仇也有的是。追其原由，都是滥杀无辜种下的仇恨种子发了芽。2018年春节发生了一件事，轰动整个中国：一个退役士兵张扣扣，等了许多年，终于找机会杀死了邻居村霸干部三兄弟，因为村霸兄弟22年前杀了他的母亲，又通过关系逃避了惩罚。整个社会的舆论都同情张扣扣，而不同情村干部。现在的人都能这样，过去的人更讲情义，那时复仇更是天经地义和司空见惯的。搞阶级斗争，只会撕裂民族，把民族推向内部相互仇杀之中，并且催生汉奸团体，是实实在在帮了日寇侵略者的大忙。

在这里再一次证明了，阶级斗争是民族毁灭的动力。

9、中国的无产阶级能当领导阶级吗

人民应该是平等的，一些理论竟然宣称某个阶级是先进阶级，并且要当领导阶级，要实行阶级专政。这是宣扬社会不公，准备建立不平等的社会。更加可笑的是，这个所谓的“先进阶级”还是一个文盲阶级、半文盲阶级，竟然是既先进且要当领导，这不是很荒谬吗？文盲都那么先进，我们还读书干什么？学科学技术干什么？这不是误导社会倒退吗？“阶级先进论”与“阶级当领导论”是个非常荒谬的伪理论。

中国的文字是表意文字，虽然远比拼音文字高明、效率高，比拼音文字的各方面都好，比拼音文字更加先进（汉语拼音就是拼音文字，它远不如汉字先进），只是中文有一个门坎，需要学习一下才能掌握。中国人生活艰苦，无产阶级更艰苦，就没有机会学习文字，所以，中国的无产阶级根本上就是文盲阶级、半文盲阶级。人类的知识主要是从文字上吸收的，文盲阶级摄入的知识就有限，知识少能力就受到限制，所以，中国的无产阶级很接近于无知阶级、低能阶级。这与外国有些不同，外国的文字是拼音文字，门坎低，普及率就广，外国的无产阶级虽然文化也不是很高，却不是文盲阶级，所以，外国的无产阶级还是有一些知识的，瞎指挥一下的能力还是有的。

要知道，人的能力是可以向下兼容而不能向上兼容的。比如，科学家可以当司机，但是，司机当不了科学家；程序员可以当流水线的工人，而流水线工人当不了程序员。要当科学家与程序员等科技工作者是要经过刻苦学习，甚至是多年的刻苦学习，并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胜任，这个过程是要付出巨大汗水、金钱、时间等，甚至还要牺牲自己的兴趣，有时也是痛苦的。即使是如此，还不是一般人能够当得了，是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的。如果，工人（阶级）是先进的，那么当工人就行了，谁还花那么巨大汗水、金钱、时间去当科学家与科技工作者？对自己来说，那是出力不讨好的傻逼行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那是极度不公平的制度，多数人没那么傻，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长久。当多数人不努力去争当科学家与科技工作者时，社会无疑会倒退。

前苏联虽然也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但是并没有全面落实，大部分和最重要的权力还是在有文化人的手里，而且苏联是表音文字，工人的知识还是比表意文字社会的工人高出许多。表音文字门坎低容易学，但是，表意文字更宽广、更准确、更高级、更适合当文字，是能脱离语言而存在的文字。可以说，表音文字是人类的初级文字，而表意文字是人类的高级文字。放弃表意文字而推广表音文字，是一种牺牲民族未来的弱智行为。

我们看到，当某国实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社会的科技是停止不前的。特别是中文这种表意文字，需要通过一定学习才能掌握的文字，工人的知识水平是很低的，根本不适合当领导。当一小部分工人当领导并且相信“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的时候，就会造成社会的停滞及混乱。所以，“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不是简单的号召，而是一个让社会不公、并迫使社会倒退的口号。

发明“无产阶级是先进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人，压根就没考虑过中国的特殊情况。而相信阶级斗争学说的中国人也跟着起哄，让工人阶级当领导，于是就坏事了，特别是大革命时代，斯大林特意要求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于是丑态百出，那些工人出身的领导人毫无能力，只能获得快活逍遥，权力却落入他

们的知识分子秘书们的手中。而且，中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并不低，生活最苦的是农民，所以，在中国，工人的革命意志并不坚决。甚至在中共党内，工人出身的许多领导人都叛共投敌去了。查一查前几届中央委员中工人出身的人有多少，又有多少叛变的就知道我所言不虚。这样的无产阶级当领导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实在不够格。到中共获政时，中央委员中工人出身的并不多，高级领导人中几乎没有。所以，“工人阶级当领导阶级”的实践在中国是失败的，斯大林后来就不再“强阶级所难”了。把中国的革命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实在是太荒唐，只能称为“共产党革命”。我能解释工人阶级的这些本质，而与工人打交道“苦闷欲死”的刘少奇竟然没有想到，他真的水平也不咋的。这也是他“苦闷欲死”的原因，中国工人不但能力低，还导致道德可疑……

刘少奇说：“很明白，中国革命工人运动初期的表现，幼稚的表现。**‘流氓性’**带得很重。中国工人的流氓式生活，**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在一旦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的无所顾忌的，不估计将来与前途的行动。”按刘少奇所说，中国工人又是幼稚、又是流氓性带的很重、又是流氓长期存在、又是随心所欲的、又是无所顾忌的、又是不估计将来与前途，再加上中国工人的文盲率高导致的知识贫乏、能力缺乏，最终在革命进步论的引导下胡来，导致道德可疑，他们根本当不了领导阶级。可见，工人阶级先进论根本不成立！

真是工字不出头，真让工字出头，就变成土字，入土了、坏事了。中国人的文字真神奇！

1928年6月18日，中共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的分析及革命指导：

一是依然否认中国中间营垒的存在，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认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当时中国的贫穷落后是科技落后造成的，改进了科技，中国将很快追上、甚至超过许多先进国家，后来的事实即能证明这一点。当时，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是民族敌人，是来自于民族外部的侵略，而马列主义者及阶级斗争主张者把中国的贫穷落后归罪于阶级剥削，在中华民族内部搞相互杀戮式的阶级斗争，分裂了中华民族，无异是帮助日寇侵略，真是糊涂之极、祸国殃民之极。

二是仍坚持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是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性条件。当时，具体负责指导六大的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十分悲观。他认为（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斯大林也这样认为），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同时，六大虽然承认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现在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但认为革命的高潮很快就能到来，到时就可以发动武装起义，夺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以至推翻国民党统治，这一一定程度上导致后来中共党内出现严重的“左”倾暴动主义。

三是在组织上强调党员成分的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党的六大一方面强调：“现在，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这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六大又强调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六大代表和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都是“工人化”，在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了41人；在六大选举产生的36名中央委员和

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占了 22 名。

现在，共产党说什么别人干涉他国内政。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才是最干涉他国内政的正党，国际主义就是干涉他国主义。

斯大林和苏联人搞的共产国际对中国文字的神奇性不了解，不知道中国工人的知识水平低下、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硬是把中共的领导权交给工人阶级，结果悲惨了。

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 36 个，其中工人占了 22 个，而这 22 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 1931 年 6 月 22 日被捕变节以外，相继投降了国民党的就有 14 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还多。这也就难怪，当向忠发被捕并被杀后，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明确表示想要接替向忠发做总书记（很直率），却不被共产国际所考虑。继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是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共领袖的事了。

由此可见，中国工人阶级对中国革命的破坏有多大？！大到斯大林从处处依赖到不敢碰！

大革命后，国民党颁行《共产党人自首法》和设立“反省院”，效用非常明显。中共在城市中各个秘密机关遭到巨大破坏，不但有工人领袖叛变，普通党员也叛变。杨奎松依据台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说，从 1933 年秋到 1934 年秋，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捕获的共产党员是 4505 人，而自首叛变者则达到 4213 人，“自首叛变率”竟达 95%。“这足以证明国民党这时的自首政策，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影响极大”（179）。极左的工农运动，对中国及中共危害巨大，没有苏联后来的倾力支持，中共就不再有上台机会。

中共往往描述国民党把中共杀得血流成河，这是不实的。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捕获的共产党员总共才 4505 人，“自首叛变率”竟达 95%，自首后就没事了，国民党没那么狠，坚决不自首的连陈独秀也只是坐几年牢而已，还能在监狱中逍遥快活搞研究，这是世界上最舒服的监狱。坐一坐日本人的监狱看看，坐坐中共的监狱看看。国民党为什么会败，太没原则了，对敌人太仁慈了。

共产党员只要能“自首”，哪怕是“假自首”也能获得自由并不留尾巴，还能在国民党内继续升官，如，李友邦等人。中共也利用这一条营救了许多共产党员，并在国民党党内隐藏下来很多间谍。最著名的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共中央利用“假自首”这一条一次就救下了 61 名中共地下党，并在中共党内一路高升，升得比其他人都快，文革时被毛利用来打击刘少奇的妙招。

.....

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人农民运动，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胡闹、血淋淋的胡闹、罪恶滔天的胡闹！特别是工人运动，肯定逼得许多外国投资者撤出中国，也有许多国内资本家破产，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和国力，给中国这个刚要走向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以最致命的一击，给日夜窥觊中国的日本侵略者送去了最厚重的一礼！共产国际指挥了许多罢工，我都怀疑，他们是否为了资本家跑到他们哪里投资！现在如果哪个国家还搞这种政治大罢工，无异断送自己国家的前途！我更怀疑，日本人传给我们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侵略中国的阴险诡计？！

10、越左越飞黄腾达也越整人

在共产党内部，往往是越左越安全，越左越飞黄腾达，也越能整人。

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当时陈元方在中共西北中央局工作。整风前，他办了一个墙报叫《西北风》，这个墙报上发表一些揭露延安阴暗面的文章，整风中，西北局书记高岗派人把陈元方用五花大绑从乡下抓回来，关在边区保安处监狱。整风转入审干以后，曾经同陈元方在中共陕西省委（地下）共事的H2，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并揭发陕西省委是“红旗党”，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特务党。H2由于坦白揭发有功，被康生等树立为特务投诚的典型，戴上红花四处讲演，绘声绘色地编造他进行特务活动的故事，动员其它人也出来“坦白”。有一天，H2到监狱去对陈元方劝降。他说：“元方，我已经彻底坦白了，组织上对我很好，每天吃猪肉、戴红花，你也坦白了吧。”陈元方问：“坦白什么？”H2说：“就是咱们一起当特务的问题嘛！”陈元方大骂：“王八蛋，你是特务，我不是特务。”H2假坦白，一时成为延安的风云人物；陈元方不说假话，却坐了三年半监狱。延安审干以后，H2在干部中臭不可闻，但仕途却扶摇直上。在解放战争中，他才是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的一个副科长，建国（建政）后，却成为中共甘肃省委的书记处书记，在两次“反右”和大跃进中，左得出奇，他是造成甘肃省死人（饿死）**100余万**（超过当时甘肃人口**10%**）的四个罪魁祸首之一。

1962年，在中央工作组整顿甘肃省委时被撤消职务。无人敢用，他的老上级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却当了东郭先生，把他安排黑龙江担任副专员。“文革”初期，这个忘恩负义的H2带上本专区造反派去造欧阳钦的反，又落得身败名裂。“文革”后期，H2又投靠了石油部长康世恩，到石油部作了一个局长。打倒“四人帮”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分明知道H2的种种劣迹，却把他要到陕西省，起先做副省长，后来又派到西安市委任第二书记，显然是要把陈元方顶下来。H2一到西安市，就同西安市旧有的恶势力结合起来，反对陈元方。就在1982年4月开了一周批判陈元方的会议，最后免去了陈元方的职务，让那位品质恶劣的H2接任西安市委第一书记（林牧回忆录《烛烬梦犹虚》）。

H2每次只会紧跟运动整人，造成那么多人死亡，被抓包后，通过运作，依然官运亨通，再次整人得逞。这就是共产党内部的官运模式——越左越安全，越左越飞黄腾达，越左越整人。这不是正常的社会形式，却是共产党人的生存与升迁之道，正常人无法在这种社会中得到很好的发展，甚至生存都困难。

二、国共内战谁先动手？答案:共产党

共产党总是在说，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分裂革命屠杀共产党员。那么，国共内战是谁先动手的呢？答案是共产党，国民党实在忍不住了才反击的。

1926年泸顺暴动中共屠杀国民党，其暴动的规模不比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大得多，支持的时间也长得多。真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人真得应该管一管这胆大妄为的性格。

1924-1927 共党屠杀的国民党的追星族远远超过国民党屠杀的共产党的追星族。

中共阴得很，如此大规模的暴动、打响中华民国内战的第一枪、共军的第一次创建，如此的大事迹它不宣传，即把南昌暴动拿出来大讲特讲，无非是中共的主要派别都在南昌暴动中现身，把四川暴动拿出来，那是宣扬其它派别的“功绩”，另一个是怕人民知道中共破坏国共合作、发动内战的事实。

作为中共夺取军权最早的大动作，是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吴玉章、杨闇公、朱德、刘伯承、陈毅等1926年12月1日在四川泸州、顺庆（今南充市）地区独立领导和策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此举远在1927年“4.12”之前数月。

国民党原本由熊克武、石青阳等建立了四川支部，并获得广州政府授予四川讨贼军第一路，刘伯承、贺龙均系熊克武旧部。熊、石1924年冬兵败离川赴穗，其国民党中央总部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仍在重庆，石青阳以国民党中执委身份兼任四川执行委员长。1925年8月吴玉章受邓演达委派抵达重庆，旋即改组四川执委会，发展众多中共党团员及左派，9人中除黄复生、邓懋修外，皆中共党员；至10月20日，吴玉章等已发展中共党员8000余人。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吴玉章获得委任，回重庆后即组建新的国民党四川党部，迁至莲花池，称“莲花池党部”。吴玉章“使它成了中共四川地委的公开机构；这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各省党部中是很特别的”（陈钧：《天府兵暴》，P33）；与黄复生等原国民党班子坚持的“总土地省党部”唱对台戏，可算是中共与国民党公开分庭抗礼的前驱。

刘安恭(1899-1929)，四川永川（今重庆永川）人；其父曾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率领群众推翻永川县满清政府，被推选任第一届民选县长；幼时随父迁居成都，受过中等教育；1918年前后考取官费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1922年后与旅德的章伯钧等结识，曾在比利时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党员，与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人）结识。刘安恭1924年回到成都，应川军将领杨森之聘任其军部参谋，同时任四川省邮政局长。军阀混战，杨森被逐出成都，驻扎在万县。杨森要刘安恭署理兵运事务，为自己招兵买马。

杨森在1926年4、5月间派代表到北京见李大钊，表示愿意脱离吴佩孚，加入国民革命。朱德1926年7月回国。朱德与杨森同系四川籍，曾在蔡锷之护国军中共过事，有一定旧谊，7月受陈独秀委派，回四川争取杨森支持北伐。8月间，杨森又派代表到长沙，与北伐军接洽，再三申请国民政府给以名义。8月11日，朱德抵达万县，杨欢迎朱德任其军中党代表。朱德再次与刘安恭相聚，分外高兴，他们又在一起为共党工作了。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在李大钊的指挥下制造了“3.18 暴乱”，因共党身份和叛乱嫌疑已经彻底暴露，不能在北京中法大学安身，通过与杨森有私交的北京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介绍，8月25

日来到杨森司令部工作。经过杨森的介绍，朱德结识了陈毅。陈毅见了朱德、刘安恭，三人积极策划夺取军权活动。1926年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万流”、“嘉禾”号等轮船，在长江云阳、涪陵流域，横冲直撞，多次撞沉民船和杨森部队的船只，淹死数人，沉没银元数十万元。杨森听取了朱德等人的建议，命部队扣下了英“万通”、“万县”两艘轮船。可是，英方拒不认错，反而要求赔偿扣留两轮船的损失费200万元。当无理要求遭到杨森的拒绝后，9月5日派军舰“柯克”、“威警”号武力劫船，并炮击万县的南津街、李家花园、万县中学，还发射燃烧弹，造成大火。杨森即与朱德、陈毅一道指挥部队将英舰击伤。中共重庆党组织，9月9日组织了“万县惨案雪耻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18日重庆市民六万多人愤怒集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当时又有十多人举行火炬游行；接着，重庆的英美烟草公司华工宣布罢工，10月5日，成都各界人士万余人也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全国各地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迫使英舰及其侵略分子不得不撤离四川。

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生于四川开县（今重庆市开县）。上过私塾，读过高小，后考入官立中学。1912年考入蜀军政府陆军将校学堂。1913年参加熊克武四川讨袁军，失败后，流亡上海。1914年，在上海加入孙中山中华革命党。1915年12月，刘伯承在涪陵成立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参加了第二次讨袁战争即护国战争。1916年3月在攻打丰都的战斗中，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一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穿透右眼而致残，后编入熊克武川军第五师，任第九旅参谋长。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熊克武四川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取得了成都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被誉为川中名将。1924年在成都养伤期间认识杨闇公；1925年，随吴玉章赴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考察。刘伯承是经过两年时间考虑，于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正式加入中共，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

杨闇公（1898-1927）又名杨尚述，杨尚昆的四哥，重庆潼南人，1913年入南京军官教导团学习，加入国民党从事反袁斗争；1917年东渡日本留学，1920年秋回国在重庆宣传马克思主义，1925年3月加入中共。1925年10月，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成立，杨闇公被选为书记。1926年2月，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重庆地委派共党刘孟伉、邓作楷、吴季藩、黄直峰等人在川军中发展中共的力量。到1926年夏秋，匪党重庆地委在川军各部中掌握和可能参加起义的部队有2万多人。

1926年夏，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在顺庆、泸州、合川三地举行起义。为此加紧了组织力量的筹备。1926年8月3日，中共四川省委向匪党中央呈送两份报告：《四川各派军阀动态》及《四川军事调查》，详尽地分析了四川各路军队的准确情况，为中共兵变提供了依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四川地委派童庸生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9月10日提交中共中央的《童庸生同志报告川中情形》称‘我们的武力：秦汉川旅长驻南冲（充）有枪二千余……；黄慕韵旅长驻会昌有枪二千余属邓锡侯部（请求党派代表往该军管理党务，并设法筹饷谋械）。’‘在川中若果我们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扬（杨）森现有委朱德为参谋长兼统一师之意。’所提秦汉川、黄慕韵（源）当时均为中共党员”（《考实》，P15）。此处“黄慕韵（源）”似应为黄慕颜。中共中央随即作出起义的有关指示和决定，“我们自然很希望在川中发生一个左派军队，发生自己的武力”（《文件集》2，P302）。中共中央同意了顺泸起义的计划。9月28日，杨闇公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名义，在重庆秘密召集川军

中 12 个“头头”开会，商议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事宜。

1926 年 8 月 13 日，四川军阀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等公开通电加盟国民军讨伐吴佩孚，这个通电随后载于报刊，如 8 月 31 日上海《时报》就刊登了“通电”全文，轰动一时。中共不可能充耳不闻。根据苏联顾问的部署，10 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最近的政纲和国民会议召集方案等重大问题。会上，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提出：“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等威胁甚大，共产党员同志要负责作川军的工作。”实际上，杨森此时已归顺国民党了，且陈独秀已派朱德前往杨部担任党代表。这个“威胁”只能理解为对左派及中共的威胁。根据吴玉章的建议和推荐，会议决定派刘伯承回川，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名义上说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实则全面负责中共在四川的军事工作，建立中共自己掌控的“左派军队”。

9 月 24 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任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党代表；刘湘部整编为国军第 21 军。整个四川部队皆于 10 月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所谓“四川军阀”已经不复存在，他们整编完成后即加入对北洋军阀作战的行列。

之后，刘安恭朱德积极策动杨森的一个团易帜，因机密泄露，杨森下令通缉，刘安恭迅即潜往武汉。11 月 16 日，杨森在宜昌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军长。在朱德的建议下，设立中国国民党第 20 军党部，由朱德任主任委员，并且在万县杜家花园建立第 20 军军事政治学校。由朱德带到万县的政治工作人员卢振纲、文强、熊荫寰、江亚中、滕代顺、湛杰分别担任教育长和五个大队的大队长。朱德通过政工人员加强对杨森部队的改造，引起了杨森的疑忌。他担心自己的部队被分化瓦解。泸顺起义爆发后，杨森就以第 20 军军事政治考察团赴武汉考察的名义，要朱德率团前往。12 月下旬，朱德率领由杨森部 80 余名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事政治考察团乘“永丰”号江轮离开万县，脱离了杨森的部队。

中共四川军委会并不理会川军已归附革命之现实，仍确定了组织泸顺起义的具体方案，并作出决定和分工：1) 杨闇公在重庆主持协调全面工作和与各路军阀进行周旋；2) 刘伯承负责起义的总指挥；3) 朱德赴万县做杨森的工作；4) 陈毅负责泸州策反；5) 童庸生负责顺庆策反。随后开始实施这个兵暴计划，此兵变实乃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的暴动。

11 月刘伯承由广州回到四川后，到万县会晤朱德。当时，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公开身份皆国民党四川省临时省党部执委。11 月中旬成立了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 3 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杨任书记，全权负责全川军事运动，统一指挥和具体领导四川的武装起义。中共重庆地、执委先后派人到顺庆、泸州、合川等地军阀部队中开展工作，发展了秦汉三、黄慕颜加入中共，而秦、黄二人手中各自掌握的两千人马自然归中共调遣。吴玉章、童庸生、何绍先、潘崇阶、陈毅等秘密联络川军中刘伯承之旧部，如首先发难的第四混成旅袁品文就是刘的老部下。杨闇公以川军中的共党和革命军官掌握的 6 个旅为骨干，成立了国民党川军各路总指挥部，由刘伯承任总指挥，总指挥部在栖乐山顶栖乐山寺内。

刘伯承等人制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争取驻顺庆的四川省长兼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所部之秦汉三、杜伯乾两旅首先起义，驻合川的四川清乡督办邓锡侯所部之江防军黄慕颜部起义，以顺庆为根据地，在川北站稳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赖部袁品文、陈兰亭两个旅起义；然后泸州起义部队进发到川北会合，扩编为 6 个师 1 个军，以刘伯承为军长；以后再根据实际发展情况，与冯玉祥的部队会合。起义时间定在 12 月 5 日；地点在顺庆，然后以顺庆为基地，向绥定（今达

县)进击,消灭最顽固的“军阀”刘存厚后,与北伐军会师武汉。

由于情况突变,“起义”提前于1926年12月1日首先在泸州开始。

泸州地处长江、沱江交汇处。驻防泸州市内的是赖心辉部的基本部队第2旅,旅长李章甫反共,李旅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要解决李旅必须智取。12月1日袁品文联络第十混成旅旅长陈兰亭,以请酒为名诱杀驻守泸州的第二混成旅兼城防司令李章甫,16时许,袁、陈两部宣布起义,并立即攻打毫无防备的李旅部队,基本全歼。其杀戮人数被中共掩盖,远超过“412政变”。袁品文、陈兰亭两旅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胜利占领泸州市。12月2日,袁、陈通电全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4路、第5路司令。7日上午,泸城各机关团体120多个单位及各界人士6万多人,在小较场集会庆祝起义胜利。

顺庆方面原定1926年12月5日何光烈在土门寺操场阅兵之时,将其生擒,但不慎泄密,便提前行动。何部旅长秦汉三、杜伯乾,在吴玉章等人策动下,逐渐靠拢中共。12月3日下午5时,秦汉三、杜伯乾分别指挥部队举行起义,消灭其师长何光烈及其亲信大部,次日晨占领顺庆。黄慕颜接到秦、杜的电报后即在合川举义。黄慕颜部举事后即打出“四川红军第一路”旗号,黄自任司令(《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3月本,P171),率部溯涪江而上,向西往大河坝前进。刘伯承在大河坝赶上了黄部,决定改变行进方向,挥戈北指顺庆。9日,刘伯承率合川起义军到达顺庆,10日,合川和顺庆的起义军7000多人在顺庆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正式就任总指挥,黄慕颜就任副总指挥兼第1路司令,秦汉三、杜伯乾分任第2、第3路司令。

邓锡侯、刘文辉等调遣万余人的部队分4路围攻顺庆,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敌我双方伤亡惨重。到13日午后4时许,刘伯承总指挥紧急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宣布立即撤离顺庆。正当顺庆义军准备撤离时,省委军委会突然来急电要求坚守。14日,敌军出动8个团分三路向起义军发动进攻。由于泸州起义部队未能按时移师顺庆,顺庆起义军处境所极度危艰。15日下午,起义军从栖乐垭出发,向金台方向转移。16日到达开江时部队仅2000余人,在刘伯承率领下于22日改编为一个旅。在开江,黄慕颜率起义军深入学校、农村,宣传共产理论,依靠骨干力量,相继组建了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等共产群众组织。经过休整补充后,黄慕颜率起义军转入鄂西。直至宁汉分裂后为才掩人耳目改称国民军,吴玉章在武汉国民政府为之申请国民革命军第35军番号,遭谭延闿质疑而未果。随后经邓演达操作于1927年5月上旬始授暂编第15军番号,刘伯承任军长。而那时武汉政府已被南京政府所取代,任命已失去合法性。

在顺庆方面艰苦战斗时,泸州方面的起义军也面临着更严峻的局面。12月3日,军委会急派陈毅赶往泸州督促起义军北上会师。但陈兰亭贪恋泸州巨额盐税,不愿离开,袁部团长皮光泽亦不愿北上,会师顺庆的计划落空。顺庆部队撤离后,泸州孤立无援,局势更加严重。1927年1月中旬,军委会在万县开会,决定刘伯承赴泸指挥起义军。刘星夜抵泸,于24日发出总指挥部布告,采取果断措施整顿军政、民政:整编队伍,增设第6路,升皮光泽为司令;并在各路设政治部,团设政治指导员,营、连设党代表;在部队中进行反帝、反军阀教育;加强军训,整肃军纪;开办泸纳军团联合军校。3月18日,刘伯承还公开纪念“巴黎公社”成立65周年,举行了群众大会,革命气氛浓烈。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开进南京。这两支部队的政治部分别由共党李富春、林伯渠掌控;入城后共产分子立即发生了有选择地抢劫各国领事馆及侨民的事件,造成外国人六死六伤。英军舰旋即反击,事后查明军人

死 24 伤 7；市民死 15 伤 9 人。苏共命令中共造谣说：“英国军舰开炮轰击，打死打伤我骨肉同胞 2000 余人。”中共重庆地委遂于 1927 年 3 月 31 日举行了“重庆各界反对英美枪击南京市民大会”。刘湘派军队打死 137 人，伤千余人（中共资料），制造了“三三一惨案”。1927 年 4 月 6 日杨闇公被枪毙。

随后，由赖心辉任总指挥的“川黔联军”4 万人诈称 10 万，从四面八方向泸州起义军进攻；同时派出大量奸细混入城中，进行策反。这些奸细混入城后，窜到各部进行秘密活动，都被起义军揭露和破获。刘伯承下令，将主谋者 10 人立即处决。起义军长期被围困，几至弹尽粮绝，官兵、市民食不果腹，陈兰亭、皮光泽悲观动摇。陈兰亭暗中勾结联军，阴谋劫持刘伯承和共党政工人员交联军邀赏，因遭袁品文等反对未遂。中共泸县特委和袁品文等力主刘伯承撤走，刘遂于 5 月 16 日拂晓偕韩伯诚、周国淦从龙透关秘密离泸；他们经大足、铜梁至达县，又由达县越过秦岭，到达西安。在两手空空之下，幸得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将军接济，才由西安转郑州，于 7 月 11 日抵达汉口，向周恩来汇报了泸顺起义经过。周任命刘伯承为南昌起义的参谋长。1927 年 5 月 17 日，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宣布接受刘湘改编，复因疑惧刘湘，于 5 月 23 日夜率部乘船经合江入黔，后被周西成、杨森分别收编。

中共说泸顺起义“为了策应北伐战争”纯属谎言。此前，四川各路地方军阀已经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吴佩孚，归顺国民革命军加入北伐。中共的努力仅仅是用暴动手段从北伐的军队里拉出一支自己独控的军队而已。事实上，**因泸顺起义引发的战事至 1927 年 6 月才结束，川军皆因此而无暇参与北伐作战。**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在“412”之前 4 个多月，中共即已先行暴动了**，从国民革命军中拉出一个军来。是蒋介石先叛变了革命还是革命先叛变了蒋介石？实际上，中共的建军节似乎应该定在 1926 年 12 月 1 日才对，比南昌起义早 9 个月，“红军第一路”旗号早已打出来过了！为了使中共夺权显得“正义”，吴玉章、刘伯承等只能委曲求全，**舍弃了打响起义第一枪的历史功勋，做一回无名英雄。**直至毛时代过去之后，才有越来越明晰地介绍泸顺起义的官方文书，甚至不乏赞扬他们首先创立共军的介绍。

泸顺起义也非孤立的事件，北伐军所占之处几乎全都闹出了许多乱子，**东路军所在因无中共势力参合，且何应钦、白崇禧坚决制止任何骚乱，福建、浙江等地尚未酿成大乱。**两湖乃至江西，既有苏俄顾问又有中共操作，局面就大不同了。这以前，列宁就说过：“中国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它永远保持沸腾”（转引自《鲍威尔对华回忆录》，P140）。1925 年 5 月 18 日，斯大林亲自下令：“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协的两派”，“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奋斗”（《六大以前》，P992）。6 月 25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68 号记录》关于中国问题的指令是：“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周利生着：《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P207）。这些文件意思是一致的，都旨在搞乱中国，越乱越好，表述方式和用词隐讳程度不一罢了（注 238）。

没有共产党人参与的北伐，胜利更加容易与彻底。看看中共在北伐之中的所作所为，真的起到了反作用。

参加中共四川暴动分子，在延安整风期间，也受到中共极其严厉的整肃，整风好像还整死了不少人。

中华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把中华民族拖入死亡的边沿，没有以蒋介石为首

的南方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中国就无法统一，不统一的中国根本不可能支撑下来抗日战争，中国就无法在抗战中获胜。事实上，对抗战起着很大不良作用的是军阀，军阀保存实力不肯拼命是常规操作。正是 1927 年北伐胜利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后，开启了经济十年的黄金时期，并使得中国人的信心暴增，为中国的抗战胜利铸下基础。中共在四川为夺权致使川军无法参与北伐，是破坏北伐的行为，无疑是最反动的反革命行为，对中华民国及中华民族危害巨大。

廖宗泽是中共早期党员，曾经多次领导中共暴动出生入死，黄埔军校四期毕业，1926 年毕业后，入川开展革命工作，先后参与领导了中共的泸州、顺庆暴动，遂宁、蓬溪暴动，以及广汉暴动，广汉暴动胜利后成立了红 26 军，廖宗泽任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军第一师政委、第一路纵队政治委员、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等职，为中共做了大量工作。如果他继续留在中共党内并且活着，最低也是大将，甚至与刘伯承一起位列元帅。他自从看清中共之后，一刀两断，1931 年主动**投降国民党**，从此廖宗泽一生坚决反共，杀过很多共产党，直到中共国成立之后，还在与中共不懈作战，1951 年被俘，1971 年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结束了他从坚定共党到坚定灭共党的一生。中共把四川共党所有的失败诿过于左倾，在抗战时期大整肃四川共产党，其实，左倾才是马列的原教旨。

廖宗泽的一大堆共党部下与同事都背叛了中共并成了中共的死对头。川军第 28 军江防军第 7 混成旅，是中共在四川兵运工作的重点。该部共产党的组织建立较早，1926 年，共产党员旷继勋任该旅第 2 团团长。中共川西特委为加强党在该旅的工作，先后派去一些党员，组成党的领导核心旅委会，团、营、连中也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多由共产党担任。1929 年夏初，由旷继勋代理旅长，6 月举行暴动，打出四川红军第 1 路的旗帜。全旅 3000 余人，编为两个师，一个先遣队。红 1 师师长**傅介藩**，党代表刘曼；红 2 师师长**马之骥**，党代表廖宗泽。

1946 年夏，在国民党就职的原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的同事在南京“介寿堂”有过一次聚会，他们是：**傅介藩**，原红一师师长，时任国民党兵役署总务局少将局长；**陈国儒**，原红一师党代表，时任国民党海军总部政工处少将处长；**马之骥**，原红二师师长，后另改名字，时为国军少将；**廖宗泽**，原红二师党代表，时任国民党兵工署警卫处少将处长；**黄孔乡**，原中共党员，时为国军少将；**徐昭俊**，原红军营长，时为军统中将；**曹仲英**，曾继任红一师党代表，时任南京《新民报》总编辑。后任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中将副局长的**李道庸**，很是调侃地讥笑道：“**继勋现在怎样啊？**”他们谈天说地，踌躇满志。是时，他们的共党上级旷继勋已经被中共清除杀害长眠于地下十三载。“继勋现在怎样啊？”有点调侃，调侃当年跟随共产党及继勋一起暴乱；有点悲凉，悲凉自己的老领导继勋的早歿；有点愤怒，愤怒他们的老领导被中共无辜杀戮；有点庆幸，庆幸他们没有继续当共产党跟随老领导继勋跑。

那么多中共四川最先暴动的主要干部都跑到了国民党那里反过来对抗中共，是因为他们看清了中共。上面领导暴动的人都是如此，那么底下参加暴动的人更是全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只是他们开启的祸乱仍然在中华大地上流传，把中华民族拉入灾难深渊，至今未能看到确切的结束时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人真得好好抑制那胆大妄为的脾气。

注 238: 樊斤品：国共内战，谁先动手？答案：共产党

http://blog.boxun.com/hero/201607/leisheng/12_1.shtml

三、共产党杀的共产党远比国民党杀的共产党多得多

共产党总是自扮苦主，说国民党如何发动反革命政变，如何屠杀共产党。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好了，我们现在就不用受共产党的荼毒了。只可惜，国民党并没有大量的屠杀共产党，事实上，只有共产党大量屠杀共产党。

一批批中国普通人，甚至是中华民族的精英，都倒在中共的屠刀下。为什么中共如此狠毒？因为中共怕人们看清它与马列主义，在人们看清之前或者之后，中共就下手，这就是中共经常鼓吹的“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还因为中共想用杀戮恐吓住中国人民。

当年投靠中共的人，有的慢慢看清中共的面目，于是中共先下手为强，把可能背叛中共的都干掉，有很多很早跟随中共的人被中共干掉。

邓小平鼓动的百色暴动，参与者许多都被中共屠杀，连带头的李明瑞将军也被中共干掉，其部下更难有活路。1931年12月14日，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1.7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带领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宁都暴动。过后，中共对这支部队进行了清洗，暴动的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被杀，一些主要领导人在战斗中莫名死掉，活到中共上台，最高官衔者仅是一个旅级副官而已——第26路军74旅旅部副官李达。

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和其它根据地对中共的屠杀，比中共在四川的屠杀更多更广泛，难道是中共在四川杀的共产党杀少了，那里的共产党才有机会跑到国民党那里去的？中共把一切罪过都说是王明路线，其实，王明路线才是马列主义原教旨，马列主义是所有的原罪。王明路线杀人不多，毛泽东路线杀人才多，中央根据地杀人最多。

中共的内部清洗是很利害的，大家都知道张国涛，他在红军内部搞“肃反”，杀了许多干部和军人，先杀出身不好的人，连女红军长得漂亮都是被杀的罪名。张国涛清洗不是最利害的，他是反派人物，总有人拿他来说事。中央苏区抓“AB团”杀的共产党干部和红军比张国涛多得多。

贺龙红军肃反，把30000多人的红军杀得只剩下3000多人（另外的说法：“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000人”）。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亲自下令屠杀中央苏区在关押的被中共审查的中共内部分子，大约一万人，基本是用石头、刀杀害。

在《在红军肃反中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萧克将军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赣西南苏区肃清AB团时，屠杀7万多红军。红二十军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四、五任。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只剩下了6000人；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000人，杀得只剩下5名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中央苏区肃反累计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有这么多。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减少50万）；中央苏区人口下降70万……毛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名（23万多人）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由于被杀的红军太多，红军长征前出发前紧急扩红8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



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000人



图书



添加到我的书库

写评价

目录



《萧克将军回忆录》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赣西南苏区肃清AB团时，屠杀7万多红军。红二十军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000人，杀得只剩下5名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中

央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这么多……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减少50多万）；中央苏区人口下降70万……毛泽东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名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被害6352人、改组派被害2万多人……”、“为了节省子弹，红军中通行的处决手段是用大刀、梭标、木

（Google 图书中查到的内容）

蒋介石派几个军都无法实现的目的，中共的共产党人帮助实现了，用斗争思维帮助蒋介石实现杀戮红军的目的。在各种大清洗中，出身富有家庭的人受害最惨，而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最坚定者和最先发起者，工人出身者反而容易叛变，这是中国革命及世界革命的特色之一，革命必然会有内部大清洗（自我杀戮），这就是革命者无法回避的最大难题。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1928年初参加朱德发动的湘南暴动，即任中共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林野出生于地主家庭。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其父母及家人被当地中共农会杀死。当地的农会共产党干部担心林野报复，要求朱德将林野交送地方处置，朱德不允。

1934年秋，中共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林野任野战军（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调他回中央苏区军区（留守部队）工作。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苏区来找他。林野向西江（会昌县属）中央苏区军区司令部报到的第二天，中共苏区就决定把他杀掉，凶手是项英、瞿秋白、阮啸仙、陈毅等人，主要推手是谭震林，最后连林野的妻子一起杀害（《龚楚回忆录》）。谭震林是中共党内狠心的杀人魔王。

在中共内部，林野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

在共产党内，谁能获得最高的权力，谁就拿到最多资源，于是，革命者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发生火拼，他们之间的杀戮，比对敌人的杀戮更加残酷。无论苏联、中共、朝鲜、蒙古、红色高棉、古巴、日本赤军，内部革命同志之间的屠戮，更加血淋淋式血腥。革命，不但革掉敌人的命，也要革掉同志的命。像林野这样的，却不是派系斗争所致，是中共过分杀人而防止别人报复所采取的预防措施。

共产党叫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实是反天反地反人类，就是杀天、杀地、杀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共产主义历史就是一部反天反地反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大规模屠杀的历史，数以亿计的人被共产主义者残酷杀害，连环境都遭破坏（反天反地）。

相反，蒋介石与国民党对待中共党员，可仁慈得多多，远比共产党对付共产党仁慈得多多！

革命者对付革命者比反革命对付革命者还要凶狠得多。大革命后，国民党颁行《共产党人自首法》和设立“反省院”。共产党员只要自首忏悔，不但可以活命，还可以恢复正常且自由的生活。从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捕获的共产党员是4505人，而自首叛变者则达到4213人，“自首叛变率”竟达95%，他们又变回普通人。

就是不自首不叛变也不一定会死。陈独秀公开活动而被捕，没有自首与叛变，并在法庭上承认要推翻国民政府，说“国民党以刺刀削去人民的伟大权利，以监狱堵塞人民喉舌。”国民党只是判他有期徒刑13年，同案的其他6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至五年不等。一年后，最高法院刑庭改判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陈独秀进入监狱服刑后，生活上得到了优待，每餐两菜一汤，一个人住一间监房，其他罪犯则住普通监房。由于陈独秀身份特殊，在社会上也有名望，因此在监狱服刑期间，并没有和外界断了联系，有不少人专门跑到监狱去探望他。来探望的人群中，还有不少的报社人、出版人。这些人大多是劝陈独秀能写一本自己的自传，并出版。他房中有两个大书架，摆满了书籍。可读经、史、子、集等书籍，亦可作诗，他在监狱中研究文字学，写的文章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妻子潘兰珍来探监，他们还能在监房里行男女之事。典狱长发现后就找人去劝陈独秀，说陈独秀是在这里坐牢，而不是住旅馆，要注意一点影响。但陈独秀神色自若，毫无赧颜。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他被特赦出狱！陈独秀在监狱中只生活了4年10个月。

而共产党对付共产党就没有那么仁慈了，只要对你怀疑，都可能被虐杀！上面列出来共产党自己清洗的人都是被虐杀的！无辜的地主、资本家都杀，何况像林野这样的被怀疑的可能不稳定分子。

全世界的共产党也是如此，杀害自己人远比敌人杀的多得多。

斯大林的大清洗，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式人员有4万多人被清洗，包括红军中5位元帅中的3位、15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3位、9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军长中的50位、186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在清洗中被处以死刑。最后几乎所有在[1917年俄国革命](#)和在[列宁](#)政府中起过重要角色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消灭。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位苏共领导人，除斯大林外全部被处死。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除斯大林和另外5人病死外，全被枪决。1934年参加第17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

人被捕，这些人几乎全部死于狱中。

丘吉尔的回忆录上，记载他有一次问斯大林：

“俄国在清党期间（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有多少人被杀死或被永远驱逐？”

“一千万人！”斯大林很坦白的回答：“这是很可怕的，.....但这是必要的。”

斯大林杀了 2000 万苏联人民，列宁比斯大林更狠，他当政时间非常短，而他干的比斯大林还多得多，仅在中部省份，最少有 3000 万人死于非命，仅圣彼得堡一地从 1917 到 1920 年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注 24）。列宁与斯大林两大恶魔总共干掉了超过俄国五分之一的人口。

看了列宁与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列宁“契卡”的所作所为，真的就理解了苏联人为什么欢迎德军了。



（苏联人欢迎德军）

自 1922 年到 1991 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 70 年。这 70 年里，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 70 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这是最暴力的政权。

当时全俄各地有 610 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 多个革命法庭。1918 年-1922 年 2 月被杀的人不少于 200 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 552 页）。

（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苏联刚刚成立就试验了以暴力杀人制造恐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列宁认为“专政是直接凭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赋予了契卡不经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研究表明，从 1917 年到 1922 年，直接被契卡绞死和枪决的人数就达到数百万。仅 1921 年一年，苏共制造的饥荒就饿死了大约 500 万人（《共产党的终极目的 4》）。



（苏联人民欢迎德军）

契卡们（秘密警察）奉有列宁的指示：“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注 24）。这是民族大屠杀、是人类大屠杀。这只是列宁时代的事情，斯大林的大屠杀还没开始呢，列宁的魔性比斯大林还大。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列宁创建的苏联是人间地狱”。托洛斯基是列宁主义的忠实追随者，他当家不会比斯大林好多少。说实在的，把共产国家称为奴隶社会是对奴隶社会的污蔑，共党国家是人间地狱。

注释：

注 24：《二十世纪俄国史》

注 238：樊斤品：国共内战, 谁先动手? 答案: 共产党

http://blog.boxun.com/hero/201607/leisheng/12_1.shtml

四、爬雪山飞夺泸定桥北上抗日

北上抗日：

红军被国军赶出根据地后，后来宣称要北上抗日。但是，日军在东北，红军却走西南，走的正好是相反的方向。这是北上吗？根本就不是北上抗日，而是西南逃窜。红军北上先遣队只是为红军西南逃窜打掩护的，是想扰乱国军围剿部署的行动，并非真正要抗日，再说那点人，根本就不能抗日。该部队进攻中华民国的各个县城，根本就不是抗日，而是内战。

中共与红军的领导人是躺在担架里被抬着长征的。我看过文章：在路上，毛泽东鼓动张闻天等人要求召开遵义会议，就是在担架上完成的，红军战士并头抬着他们各自的担架，他们一边躺着一边商量。当时的中共与红军领导人都很年轻，毛泽东才 42 岁，张闻天才 30 多岁，也躺担架，真的没有良心。红军到达陕北时，红军战士多数不是伤亡就是逃跑了，剩下的多数是红军干部。甚至在中途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红一方面军向红四方面军输送了大量红军干部。

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北渡黄河进攻的是中华民国的各个城市，目的是要打到内蒙古和蒙古去，接近苏联接收苏联武器打内战。后来，红军又向西进攻甘肃新疆，目的更加明显，是打通连接苏联之路接收苏联武器打内战，是打内战，那里没有日军，也根本不可能有日军。

红军长征，目的不是抗日，而是打内战！

飞夺泸定桥：

中共至今还在宣传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勇敢。中共真的够无耻的。



（红军所“飞夺”的泸定桥）

中共号称有一个团的国军守着泸定桥，国军把桥板拆掉，只剩几条铁索链，小时候的课本里还说铁索链被烧红了，红军 22 个人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从铁索

链上爬了过去，22个红军没有一个伤亡。

我们小时候的教科书里说，铁索链是烧红的。毛的诗里就写着：“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大渡桥横铁索寒”，意思是：“绵延不断的五岭在红军看来只不过是微波细浪在起伏，而气势雄伟的乌蒙山在红军眼里也不过是一颗泥丸，烧红的铁索在红军眼里也当成不够热”。也许是后来觉得太假，现在，中共把当年宣传的国民党“把铁索链烧红”这一段在教科书中去掉了。

谎言说得太大了。请问铁索链烧红了，人能爬得过去吗？就算铁索链没有烧红，22个红军从上面爬过去，一个排的敌军守住，红军能爬得过去吗？更不要说一个团了。就算桥板没有拆掉，一个团的敌军守住，22个红军往桥上冲，不是去当把子的吗？能冲得过去吗？而且没有伤亡，国军拿的是火烧棍吧？

泸定桥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九月，次年四月开始使用，至今完好。泸定桥长103.67米宽3米，由13根锁链组成。22个红军从上面进攻一个团的国军，能过得去？而且没有伤亡？这种情况，一个军都冲不过去。

实是：一个团的敌军在红军到来之前就调走了，桥板也没有拆掉，红军一边打枪一边轻松走过来的。当地90多岁的老人说：红军阴一枪阳一枪地打着枪过来（见《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如果再有人对你说什么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你就问他红军伤亡了多少人？为什么没有伤亡？怎么能赢得了一个团？

中共编如此低劣地谎言，至今还在坚守着这个破漏百出的谎言，真的是侮辱全世界人民的智商。

中共，别那么无耻好不好？这种一眼看穿的谎言就不要再坚持了！

红军过雪山：

中共宣传红军如何艰难地过了雪山，还拍成电影，过雪山时积雪过膝盖，风雪扑面。这又完全是谎言。

红军过的雪山是四川的夹金山，在成都西边直线距离120公里的地方，是中国的南方，与中国四大火炉在同一个纬度线上；过雪山的时间是6月12号，那是夏天，有雪吗？雪山虽然高（4000米），但是路不高；那个路、那个季节根本没有雪。如果积雪那么深，根本就不会走那条路，从旁边的路拐过去（见《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夏天的6月12号，东北都没有雪了，甚至3、4月东北都没雪了，6月12号的四川哪来的雪？所谓雪山，是冬天那个地方山上有少量的雪，于是当地百姓就称之为雪山，即使是冬天也不可能达到电影里那么大的雪。中共就用一个雪山的名词来欺骗天下，至今不肯消除这个谎言。那个过雪山电影里的雪景应该是在冬天的东北拍的，根本不可能是夏天拍的，更不可能是在夏天的四川拍的。

汶川与夹金山与成都形成100公里左右的等边三角形，汶川在夹金山之北70公里左右。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当时汶川的山上都没有雪了，5月12号汶川的山上都没有雪了，凭什么夹金山6月12号会有雪？而且是厚厚到膝盖的又深又厚的雪！



（中共拍的红军过雪山影视——右边是毛泽东）

中共号称爬雪山、北上抗日、飞夺泸定桥，如此违背常识的东西中共也敢吹嘘，其它不明显的吹嘘更多，中共真的是把天下人都当成了傻子。这么明显的谎言都敢讲，中共欺负中国人到了什么程度？中共的胆子真是太肥了。

五、敌后抗战

中共在日寇的敌后，根本就没有扰乱、没有抗日，只是在壮大自己并拖延时间，坐等中华民国崩溃，它好来收拾江山。

日寇为什么不进攻延安，甚至不轰炸延安，因为中共不抗日，就不用轰炸中共。中共甚至在日寇发动一号作战之时，下令两王部队跟随在日寇的后面，企图占领大半中国，两王部队在日寇的区域走来走去，却没有受到日寇的攻击，很安全。为什么？日寇与中共是同谋、有默契！

在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干了什么？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在延安就干了六件事：跳舞、换老婆、种鸦片、整人、与日寇勾结、打击国民政府及国军。

延安在抗日的最前线，离黄河只有七十多公里，对岸就是日本人的天下，延安就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在日军最大机场——运城机场眼皮底下歌舞升平。中共说自己是抗日的领导者，那么日本人为什么不进攻延安，毁掉这个抗日的领导基地？如果当时国民政府驻扎在延安，日军也不进攻吗？日军为什么只对四个小时飞行里程的重庆大轰炸（6年10个月大轰炸），也对延安之西500公里的兰州大轰炸，也轰炸延安周边县城，却不对近在眼前的延安大轰炸，只丢下无引信的炸弹，里面放了肥皂粉，唱双簧？而延安旁边的县城日寇都轰炸。

日本人对蒋中正很多次斩首行动，日本人为什么不对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斩首？日寇曾经对重庆昼夜连轴地持续轰炸7天7夜，为什么不轰炸经常大白天开大型盛会并且近在咫尺的延安？

延安——一个战争年代永不设防的城市！

对于那些坚持相信“共军是抗战主力”的人，只要问他“为什么日军不轰炸延安？”，问这句就够了。

请问五毛们：日本人为什么不轰炸延安？

真正在敌后抗击日寇的是中华民国的正规部队与地方游击队，国民党有100万正规军在敌后，在敌后许多地方都有中国国民政府的机场，地方游击队应该更多，是属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管辖的游击队，不是中共的游击队。看看青岛的抗日，看看英雄黄八妹，他们才是真正的抗日游击队。中共是有许多游击队，是游而不击的队。如果中共的游击队也像国民党地方游击队那样玩命抗日，日本鬼子坚持不了八年之久。

中共抗日时承诺：不搞阶级斗争、解散苏维埃政权、不在国民党中安插特务、军事上听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中共却这些全部违背，共军根本不听国民政府的指挥，坐等中华民国败亡，准备收拾江山。被阶级斗争及国际主义洗脑后的毛泽东与中共，根本没有一点点民族感情。

看看下面两篇文章，就知道中共是如何抗日的。

附 1：延安——一个战争年代不设防的城市

A、歌舞升平的延安

延安是共产党抗战的政治和军事中心，重要的军政目标比比皆是。一般说来，在战争环境下，这些目标需要隐蔽和保密，但延安却反其道而行之，经常公开举行各种大型活动。秧歌、腰鼓、戏剧、舞会，大白天高调举行，一片歌舞升平景象。1939年4月13日。延安的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乐队，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黄河大合唱》。观众千余，盛况空前，光是合唱队后来增加到500人之多。5月11日，毛泽东亲自观看鲁迅艺术学院的黄河大合唱，不但连声叫好，而且单独接见冼星海。在战争的环境下，没有与敌方有某种默契是不可能如此行事的。

延安——一个战争年代不设防的城市！

B、弃妻另娶潮的延安

与此同时，很多文学女青年从敌后涌入延安。交际舞成为延安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中共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十分热衷于跳交际舞，一些年轻的女同志则被邀请作为舞伴，交际舞会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就变得另有所图了。于是一个个奇异的婚姻在延安上演，年轻女子被安排嫁给父亲辈甚至祖父辈的共产党高官。共产党的老干部纷纷掀起了离婚潮，军队师以上干部离婚率高达80%。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茜。22岁的王定国被组织安排给了54岁的谢觉哉。19岁的朱明嫁给50多岁的林伯渠。44岁的刘伯承娶了18岁的汪荣华。46岁的贺龙娶了25岁的薛明。36岁的罗荣桓娶了23岁的林月琴。40岁的彭德怀娶了20岁的浦安修……。毛泽东将长征时与他并肩战斗的妻子贺子珍送往苏联“长期养病”，并在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来自上海的女电影明星，24岁的江青结婚。

这是换妻而不是光棍娶头妻。年轻貌美且文化水平高的女人，为什么要挤掉他人妻子并嫁给那些没多少文化的老男人呢？因为老男人们有权有势。可见，不但共产党的男人们道德低下，共党婆道德更低下，马列主义老太太是最可怕的。今日中共高官们两性关系之淫荡，是有历史师承的。唯一道德还算可以的是林彪，他是已经在苏联正式离婚，回国后再娶，中间有时间间隔，与上面搞换妻游戏的家伙们不同。我们看到，表面上道德最差的是叶剑英与习仲勋，当然，胡搞者道德更差，只是中共的史书不记载，难以全部知晓。

现在中共的太子党，多数是中共高官们换妻革命的成果，习近平的父皇也换妻，习近平就是换妻得来的成果。1943年，三十岁的习仲勋看上了十七岁的少女齐心，他循循善诱地教育她提高革命醒悟，在他的“循循善诱”下，两人相识仅半年，习仲勋就已经与齐心谈婚论嫁了。1944年4月，齐心与习仲勋结婚，同年10月，习仲勋与郝明珠正式离婚（**习仲勋当了6个月的重婚犯**）。郝明珠当时其实也不过只有二十六七岁，是中共的革命干部，是习仲勋的革命同志，她与三个孩子就这样地被**同党兼战友的夫君抛弃了**。当时的习仲勋起码犯了重婚罪。

抗战时期，高岗抛弃了原妻，看上了李力群。高岗事先也不与李力群求婚，甚至说都不说，就直接要与她举行婚礼。

下面是中共党史记载李力群的回忆：

{1940年元旦这天，王明、王若飞等领导人来请高岗和李力群吃饭。大家坐下以后，王若飞说：“今天煮了只鸡，煮了些枣，开个晚会，是要举办一场婚礼，这就是李力群与高岗的婚礼。”

李力群听后大惊，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边。后来王若飞找了过来，对李力群说：“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

就这样，李力群与高岗一天恋爱也没谈，就结婚了。不过婚后高岗对李力群很不错，两人一共生育了5个孩子。

}

当时李力群20岁。

古代有拉郎配，中共搞拉女配。只要披上了革命的名义，什么事都可以干，什么坏事都可以干。革命是个很邪的名词。

大革命时期，叶剑英抛弃了已经与他生有儿子和女儿的妻子冯华，与比他小13岁的革命同志女大学生曾宪植结婚。抗日战争时，叶剑英又把比他小13岁的妻子曾宪植再抛弃，另娶比他小20岁的吴博。他后来更是胡搞乱来，据说，他有九个妻子，现在中共官宣他有六位妻子。1948年时，叶剑英51岁，再次另娶了21岁的女大学生李刚，比他小30岁，比他的女儿都小。就是放在现在，叶剑英如此频繁换妻都是流氓，何况在看重道德的百年前。

那些被换下来的妻子们，都是和平地离婚了，小闹都没有闹过，或者这是她们唯一的保命手段。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氛围里，那些被换下来的妻子们，羞辱终生，生存也成危机，有的可能比死还惨，如果让她们自由选择，她们肯定愿意选择让丈夫娶姨太太而不愿意离婚。就是汉奸群体也没有如此大规模地休妻再娶，汉奸一般只是娶姨太太而极少休妻再娶。可以严肃地说，中共高官们对家庭对妻子的责任，远不如汉奸！对妻子尚且如此，对国家更差！

曾宪植被叶剑英换下来后，几乎疯了，一会跟这个小男人睡觉，一会跟那个小男人睡觉，反正延安男多女少，不愁无夫。共产共产，不但共产共妻，也共产共夫，整个人有时表现得疯疯癫癫那个样子。好歹也是曾国藩的后人，家族显赫，被人弃如鄙履，心有不甘哪！这时的曾宪植，是不是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呢，是不是觉得上了革命的当呢？不得而知。

只是不知道习近平的前妈是不是也像曾宪植那样疯疯癫癫呢？没看到有资料记载，不好瞎猜。

这里再次提醒中国的女人们，中国是男人社会，革命成果与你们没有多少关系，虽然你们也参加了革命，你的革命男人还是时刻可能抛弃你们，别再被革命这个虚假的名词欺骗了。

C、极不平等的延安

王实味形容当时的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共产党人生活在歌舞升平气象中，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全国人民沥血鏖战之日，在中国人民被屠杀几千万人之时，延安的共产党人过着“醉生梦死”般的“休妻再

聚”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比汉奸还恣意。延安是在抗战吗？说延安是领导抗日的中心，这不是在造谣吗？

（用鸦片）提高经济后，1943 年，延安规定了不同行政级别人员的吃肉标准，规定“1、西北局党委同志每人每月五斤猪肉，特别保健者经常委批准每月八斤猪肉（注 40）。”西北局都那么高，中央局就高得没顶了，文件里没有查到中央局具体是多少，估计要保密。陈云对众人解释说“毛主席被迫每天吃鸡‘这是革命任务’”，难怪抗日时毛泽东那么肥，蒋介石那么瘦。而同时期延安百姓的生活异常困苦，“农村经济十分贫困，一年吃肉的次数不一定，.....一年大概吃三五次（注 40）。”那是战争年代啊，中共干部吃得那么好，在毛当政后几十年的和平年代里，全中国的百姓都达不到这个水平！延安按人的级别给予相应的待遇，号称要现实平等社会的中共，搞的却是最不平等的等级制度。王实味形容当时延安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因为说几句真话被中共砍掉脑袋。

D、惨绝人寰的重庆与平安的延安

惨绝人寰的重庆（注 39）。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则是另外一番惨绝人寰的景象。

中国抗战史学者王康：“（日军对重庆）用了很多（燃烧弹），这个是日本特别可恶的地方。因为重庆的建筑主要不是砖头和石头，主要就是木竹，特别容易燃烧。日本人根据这个情况，就专门针对性地研制了燃烧弹。燃烧弹、爆炸弹、还有凝固汽油弹同时爆炸。整个重庆陷入普遍的恐慌之中。按照日本的想法，重庆当局或者妥协，或者投降，没有别的道路了。所以，重庆老百姓非常惨”。

据史料记载，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从 1938 年 2 月 18 日起至 1943 年 8 月 23 日，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 5 年半的战略轰炸。5 年间日军对重庆实施 218 次战略轰炸，出动飞机 9513 架次、空袭重庆及周边两百余次；造成重庆超过 17,600 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日军炸成一片废墟（注 43）。

仅 1939 年 5 月 3 日、4 日两次对重庆大轰炸中，日军共炸死三千九百九十一人，炸伤二千三百二十三人，损毁建筑物四千四百八十九栋，致使约二十万人无家可归（注 44）。



（图为 1938 年元旦被日军轰炸后的重庆街头难民）

在长达 7 年多的时间里，日军空袭陕西共出动飞机 3789 架次、空袭 567 次，投炸弹 13610 枚，炸死炸伤 10073 人，其中死 4331 人，伤 5742 人，平均每枚炸弹伤亡 74 人，日军空袭甘肃共 71 次！日军空袭宁夏共 5 次！

日本人没有去轰炸延安，当然不是说整个陕北地区、西北地区都没轰炸过。像银川、西安、西宁、宁夏都大城市被日军轰炸过，还有 20 几个像宝安县一样的县级地区，都被轰炸过。就唯独延安，基本没怎么被轰炸过。日本要轰炸重庆，在宜昌沦陷之前，要从武汉的 W 机场起飞，要飞很长的时间。而且重庆是个雾都又是山城，还有一定的防空力量，轰炸重庆的时候日军要冒很大的风险。而日本要轰炸延安太容易了，从（太原、运城）跨过黄河就是延安，延安是平原，空气干燥能见度还高，又没有高射机枪，轰炸起来太容易太安全。日军也对延安以西 500 公里的且有很大防空力量的兰州进行极其惨烈的轰炸，运城是重要的飞机场，而对眼皮底下的延安却没有怎么动（注 44）。如果延安是抗日中心，如果八路军是抗战的有生力量，日军会不炸延安吗？日军要用步兵拿下延安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延安只有 359 旅警卫，武器又差训练又少，战斗力极低，日军一、二个旅团可以轻松扫平延安，日本人为什么不做呢（注 43）？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还东渡西渡黄河，进行东征西征呢，对于世界第二海军吨位的日本人，过黄河易如反掌。

E、日军的“斩首行动”

中国社科院的杨天石教授有一篇文章，谈到了日本在抗战期间对蒋介石实行“斩首行动”，他举了大量事件，算了一下，大概有 20 宗。20 宗直接针对蒋介石本人“斩首行动”，可见蒋介石对于抗战胜利是何等重要。

1941 年 8 月，蒋介石将在黄山寓所召开军事会议，日军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得到情报后，立刻制订轰炸计划，命令第 60 战斗队执行。8 月 30 日上午

11 时，远藤率机自汉口出发。下午 3 时，27 架轰炸机入侵重庆黄山山庄上空投弹。蒋介石正在召开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参谋长最高军事会议，避入防空洞，蒋介石两名卫兵当场身亡，四名负伤。

更微妙的是，远藤三郎退役之后，1957 年居然被邀请到中国访问，是周恩来出面邀请的。在战后日本军阶地位比远藤三郎高的大有人在，他不过是一个中级军官而已，毛泽东居然破例会见他，而且两人互换礼物（远藤把祖传宝刀送给毛，毛送他齐白石的画），这些对通晓外交礼仪和惯例的人来说都是很不寻常的，他们是故友？毛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了，高规格、高诚恳会见这么一个中级军官的时候，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日本进攻中国这是好事情。到 1972 年他接见田中角荣，再一次说，日本皇军打进来，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是个好事情，你们不用道歉。我们要感谢你们，感谢的方式就是不要你们战争赔款。远藤作为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中等级别军人，受到毛泽东的破例接见，这和他 1941 年轰炸蒋介石的官邸有没有一种联系呢？许多学者强烈质疑，当时远藤的军事情报极有可能是中共提供的（注 39）。

1937 年宋美龄因赴前线慰问被敌机轰炸，扭伤腰摔折肋骨。中共有哪个高干在前线负伤？林彪不是直接作战受伤，是被国军误伤，他当时只是一个带领几千人的师长，与林彪同一个级别的国军将领战死多少？甚至比他更高级别的国军将领牺牲也很多。自 1929 至 1933 年从中央军校（黄埔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八年抗战当中，国军阵亡的将官有两百多人，其中包括八个上将，四十五个中将。

F、中共的七大吹响了内战的号角

抗战八年里，毛躲在窑洞里搞女人搞整风迫害干部，延安整风就是把有民族觉悟、有民族责任的良心知识分子，整成只有阶级仇恨的民族破坏者、为中共的政权（号称无产阶级政权）赴汤蹈火的机器人，成了中共夺江山的最大本钱。抗战快胜利了，他也准备好了，马上要从洞里爬出来摘桃子——抢夺胜利果实了。

毛反过来污蔑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躲在峨眉山上，他的这招叫“贼喊抓贼”，在毛与中共的历史上，这一招用的非常频繁。中共骂国民党独裁，其实中共比国民党独裁千倍。中共高呼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共上台后，从来没有搞过一天“新民主主义”，搞的是“新独裁主义”，以前是皇帝一人独裁，中共是一党独裁，最后集中到毛自己独裁。那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只是花瓶党，成了共产党的应声虫和打手。毛贼东很阴。所以中共一直感恩毛贼东，是因为毛贼想出了这么一个阴招，才打败国民党。对于国民党来说，只是逃跑而已，最可怜的是我们民族，被中共糟蹋了。

毛泽东在中共的七大上发表《论联合政府》，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进行了极度的污蔑，说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是大资产阶级、大买办的代理人，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这是一篇内战的宣言，是一通内战的号角。被毛用延安整风磨灭了良知的中共党员们，跟随着附和。中共召开七大是 1945 年 4 月 23 日—6 月 11 日抗日战争还没有胜利，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正在领导着全国人民进行艰难卓绝的抵抗和反攻，中共的情报员直通蒋的身边，毛对此了如指掌，毛却如此险恶用心地污蔑蒋躲在峨嵋山，可见毛是在向中共的干部和群众洗脑，灌输内战思维，在作内

战的精神准备，整个的中共七大是一个内战的动员会和准备会。中共七大整个会期，正是日本 10 万大军扑向芷江、正是 5 万日军扑向南阳，国军在艰难鏖战之时，中共却在磨刀霍霍，准备向艰难抗战中的国民政府开刀，一刀捅死他。

《延安日记》作了如下记载：

{
“整个七大的会议都是准备内战的号召”。……

1945 年 6 月 3 日

大会的气氛是公开反蒋的。

几乎所有的发言都指责国民党，对凡是咒骂蒋介石或国民党的话，代表们都热烈鼓掌。

……

实质上，中共的全部政策，都是从及早打一场无法避免的内战这一事实出发的。这一点有下列情况为证：新四军第七和第二步兵师的战斗行动；在陕西的备战活动；从特区调出部队；一批军队和党的干部同时调离特区，往同一方向调动；以及共产党在湖南和河南两省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为内战作准备。

1945 年 6 月 4 日

大会也讨论了同日军作战的问题，但每一个发言者都无例外地一方面忘记了要抗日，一方面却对国民党进行诽谤。每个人的讲话都是以抗日开头，而以号召同国民党作斗争结束。

中共的代表大会是为内战作准备的大会。不管代表们谈什么问题，最后一切都归结为要与国民党作斗争。

}

注 39：恶谋(中)：谁背叛了中华民族？重庆轰炸与红色间谍

http://blog.boxun.com/hero/201702/dwdl/12_1.shtml

注 40：王实味批延安舞会：同志们正倒在血泊中

<http://news.qq.com/a/20110322/000541.htm>

注 43：日军为什么从来不轰炸延安

<http://www.aboluowang.com/2016/0930/811800.html>

注 44：抗战时惨烈的兰州空战：迫使日寇暂停对兰州的空袭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50227/19328599_all.html

附 2：“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孙宇亭）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孙宇亭）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6-12-09

<http://www.mps.gov.cn/n16/n1327/n4834/n1452547/1467240.html>

登于《人民公安 2001 年 12 期》

<http://www.ilib2.com/P-ISSN~1004-5031~2001~12.html>

作者：孙宇亭，男，1930 年 7 月出生于河南省荣阳县。1949 年 6 月参加革命工作，1953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南公安部办公室研究科干事、科员，

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科员、副科长、副处长，调研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1992年初离休。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孙宇亭）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各机关紧张的政治气氛又陡然升级。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拉帮结派，组建各色各样的“战斗队”，向所谓的“走资派”夺权。各“战斗队”之间，争权夺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乱，机构瘫痪。这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机关和联系的部委派驻联络员，掌握动态，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他报告。

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是直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办事机构，负责联系和协调公安部、内务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任谢富治，副主任甘重斗。严佑民在“文革”前不久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我被从公安部办公厅借调到内务办公室，正好在他手下工作。

“一月风暴”之后，严佑民派我为内务部（现改称民政部）联络员。那时，内务部部长是曾山，副部长王一夫、黄庆熙。一个402人的部有七个造反组织。若以对待部领导的态度来划分，可分为两大派，一派称“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革联”），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称“红色革命者联合总部”（简称“红联”），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两派各视对方为寇讎，誓不两立。

9月间的一天，“革联”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对曾山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瞒过家属，避开“红联”，联络驻内务部机关内的学生“红卫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低头、弯腰、“喷气式”）。家属不见曾山的踪影，着急打电话向内务办求助。我立即询问“革联”，他们推说不知道。我又通知“红联”帮助寻找，得悉被“革联”揪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的情况。当家属赶到的时候，批斗会已散场，曾山身倚金水桥栏杆，两眼发直，似有轻生念头。我把所获情况当即报告严佑民，他又电话报告谢富治、周恩来。周总理就这一事件，要求内务办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并口述了文件的内容。严佑民把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务交给了我，并要求以最快速度完成。我把起草的文稿，冠以“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的标题，送严佑民、谢富治审阅后，报送周恩来总理签发。9月27日一早，严佑民和我就向内务部造反组织的头头传达了这个指示。全文为下：

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

一、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

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内务部平静下来了。但好景不长。10月，内务部造反派“革联”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工作人员提供的曾山曾经和日本人有接触的情况，武断地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

示，并得到批准。“革联”不相信曾山的辩解。“红联”站在曾山一边，对着干。两派互不相让，即将酿成一场武斗。

我向严佑民、谢富治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并参与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决策会议。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在太岳，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在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我说：“这事倒也好办，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谢、严都表示同意，并决定查阅档案的事由我来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我写了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分别签署同意。我拿着他们的批件，同内务办公室的赵雪瀛同志，驱车到了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我向严佑民报告后，他找×××（注①）补了一个手续。第二次到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仔细检视了批件，没有犹豫，即指示工作人员照办。共找到有关此项活动的四份电报，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难得的是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签名真迹。那时陈毅在延安参加整风，有的电报他也看了。这时，我身心无比轻松，感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事情虽然有了结果，但向上级汇报，不能空口无凭，需有真凭实据。可是，档案馆规定，此类机密，不能外借，不准抄录。经同军代表交涉，他们允许我摘抄主要内容（注④）。回机关后，顾不上吃饭，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后，报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却意外地发生了变化。10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顿脾气。我的办公室虽与之一墙之隔，但严的房门紧闭，听不见说些什么。谢走后，严佑民到我的办公室，神色有点仓皇，苦笑着对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注②），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我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我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的一天，谢富治通知严佑民、赵雪瀛和我开会。会场上只有我们四个人，谢的态度比较平和。

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他接着又说：“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今后，如果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说完就走了。

我认为，这场风波可能就此打住了。严佑民却认为不会这么简单，党内的斗争相当复杂，“文革”以来有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严佑民的分析是正确的。

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书、业务档案和敌伪档案，原来的档案管理人员封卷锁库后，立即撤离。接着，调派了三百名解放军进驻公安部，接管了这些档案。

有一天深夜，我已脱衣就寝。谢富治的秘书突然敲门，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并说：车已准备好，马上走。公安部 and 大会堂只隔着天安门广场，步行一刻钟就够了，却派汽车相送，可见事态的严重和急迫。

我从大会堂的南门进去，遥望安徽厅的门口蹲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厅内右侧摆了一张长条桌，桌后坐着三个人，从右至左为吴法宪、谢富治、×××。桌子右边横头旁，坐着严佑民和赵雪瀛。长条桌左侧横头旁放了一把椅子，我进门后，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立即在椅子上落座。厅门左侧靠墙放了一张桌子，有两名穿军装的人做记录。长条桌的对面三米处，有一个小方凳，没有坐人。我打量一下房中摆设，很明显地是“三堂会审”的架式。审谁？当然是我。我知趣地在小方凳上坐了下来。审问开始了。

谢富治首先开口：“你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分？”

他这十足审问犯人的口吻，使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此前我在公安部机关工作 13 年，谢富治当公安部长后我在他身边工作 8 年，他对我的身世太熟悉了。此刻，既然他已把我视为敌人，我便不能再抱幻想，只能以慎重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回答，力图证明自己的无辜。我的情绪镇静下来，回答了他的第一个提问。

谢：“你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混进公安部的？”

答：“我没有混进公安部。我是 1954 年大行政区撤销后，从中南公安部奉调进京的。当时从中南公安部选调了 60 名干部，由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带队到北京报到。”

因为提到了杨奇清，谢富治向旁边的吴法宪小声说：“杨奇清也有问题。”接着，谢又板起了面孔对我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我据实申辩：“这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

我在详谈了内务部两派斗争的情况后接着说：“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副总理，×主任（注①）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错，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们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转向×××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冲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接着×××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严厉地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很不高兴地问：“你是从哪个部队来的。”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从学部把我挑来的。”

又问：“你是造反派？”

军代表答：“是的。”

×××又问：“学部的人怎么穿上了军装？”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派人送给我的。”

这时，×××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可能是他的秘书，或是办案 门人员）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并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

我和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目睹了这几位中央首长表演这滑稽的一幕。我注意到，吴法宪一直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

审问继续进行。

谢富治问我：“你为什么要包庇曾山和陈毅？”

我回答说：“我作为驻内务部的联络员，弄清事实，协助领导平息纷争，是我的职责。既然曾山问题成了纷争的焦点，就需要设法澄清。查档案，是为了澄清问题。我和曾山没有私交，在我当联络员之前，彼此素不相识，没有来往，我没有理由包庇他。至于陈毅，他是元帅，我知道他，他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个小人物。”

谢富治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因事关紧要，我还没有想好回答的措辞，没有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

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这时，吴法宪睁开了眼睛，说肚子饿了，让服务员拿夜餐来。服务员端上了包子和馄饨。吴法宪劝我们吃些夜餐。我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便说我不饿。

谢富治说：“既然不想吃，回家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半夜的遭遇，真是一节生动的课程，使我受益匪浅。我这个“小字辈”，在这几位资深的“老领导”面前，一下子增长了许多社会知识和党内斗争的知识。然而，更增加了我的害怕和不安。怕的是那些看来道貌岸然，内心却龌龊阴险的人，若不慎跌入他们预设的陷阱，定会万劫不复；不安的是为尊敬的严佑民同志担心，他心怀坦诚，承担责任，把我从政治泥沼中拉出来，但他若因此而身遭不测，我于心难安。

1968年春节过后，公安部召开干部大会，谢富治、×××、吴法宪出现在讲台上。谢富治宣布，由解放军接管公安部机关，公安部的全体人员，统统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后，谢富治又委托严佑民召集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开会，宣布撤销机构，移交档案，由军队接管。

公安部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是政治上、组织上肃清异己的“集中营”。非重点对象，两个星期尚可回家一次；重点对象（多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不好，以及个人历史复杂者），则不准回家，家属送来日用品还要经过造反派的检查。夜深人静，是抓人送进监狱的时刻。吉普车一响，不用问，就是又有人上路了。我算了一下，仅1968年3月、4月内，我所认识的人中，就有37人身陷囹圄，严佑民便是其中的一个。

严佑民的被捕，本是意料中事。在心情激动和沉重的同时，陷入了更为沉静的思索。我试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对某些人炮制的这起冤案进行解剖。罪名当然是所谓的“盗窃核心机密”。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核心机密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抗战末期（注③），日军为了摆脱困境，向新四军提出谈判的要求，商谈相互妥协的条件。新四军作不了主，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和他们接触，并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做好大反攻准备的方针和策略。于是才有新四军代表曾山和日本军方代表的接触，相互讨价还价的事情。第二个问题，这件事，算不算核心机密？在当时，它是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同时，为了防止在国际、国内造成影响，陷我于政治上的被动，必须严格保密，定为核心机密并不过

分。但是，时过境迁，它的机密性也就丧失了。同时，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敌对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乃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惯用的手段，并不新鲜。第三个问题，既然算不上核心机密，而决策者们又一口咬定是核心机密，就是把所谓的“机密”当成打人的棍子。曾山是新四军的组织部长，他的后面是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如果曾山在威逼之下坚守秘密，肯定要受皮肉之苦，而对当权者却有益无害；如果曾山认为事情已过去多年，又是经中央批准的而讲了出去，那么，刘少奇、陈毅的“投降派罪名”又多了一条证据。所以他们睁眼看着造反派胡闹下去（当然也不排除这场闹剧是他们幕后导演的）。第四个问题，即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一事，是怎样和整个事态联系起来的。我和严佑民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考虑到事情如此之奥妙，仅是凭着做人的良知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行事的。

谢富治、×××事先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政治漩涡，一旦觉察，急于脱身，就需要找个替罪羊。我便成了首选对象，我出身不好，没有后台，掀不起一点浪花。只是到了关键时刻，严佑民挺身而出，才把我救了出来。

通过上述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奸人预设的政治陷阱，他们想要猎捕的对象是曾山，是我无意之中做了与曾山老人有益的事，而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严佑民又救了我。

严佑民，这位坚贞的共产党员，由于中华文化的长期熏陶，此刻他做到了俯仰无愧。然而正因为如此，他身陷绝境。

我不仅无力营救我的良师益友脱离“天牢”，而且还要随时准备着身遭不测。我能够办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对自己的亲属后代略作交代，留下遗言；二是竭尽智慧，逃避时刻可能到来的更大的劫难。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恩师、挚友严佑民含冤忍垢的 1460 天里，我虽经过了下放劳动、党员登记、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等政治浪潮，却都坎坎坷坷地走了过来。多少人间生死荣辱事，也一件件在我面前走过。1971 年 9 月，林彪折戟沉沙后吴法宪锒铛入狱。1972 年 3 月，谢富治患癌症，在挣扎中痛苦死去。党内残酷斗争中的幸存者曾山同志故去时，所谓“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冤案的涉嫌人严佑民还在狱中。

1972 年 9 月，得悉严佑民被从秦城监狱假释出来，住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由夫人林喧陪伴。我设法避开公安部调研室造反派头头的纠缠，前往探望。四年的牢狱生活，和相继发生的心脏病、白内障、风湿性关节炎，折磨得这位很健壮的老人变了形状。但他性格依然开朗，谈吐依然妙趣横生，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虽十分忧虑却又满怀信心。在这样一位有恩于我的长者面前，我再也压不住激动的感情，久埋心底的话，一下子冒了出来：“查档案的这件事，不管它冤不冤，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

没有想到他听后竟冷冷地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停一会儿他才接着说：“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很可能病死狱中……”说着，严老也越来越动情。我怕勾起他四年冤狱中的种种伤心事，就转换话题谈社会现象，谈读书心得，谈诗文。他说：“在监狱里，我读了《资本论》，《毛选》至少读了四遍。”我说：“我看了一些历史书籍《史记》、《汉书》、《隋书》和《三国志》，还心有所感，写了一首诗。”他问我什么诗，我吟给他听，并写出来给他看。

严 君

春秋几番是非缠，
敢笑廷尉羁张盘。
友情泣血染浊水，
正气凌空刺云天。
枫叶沐霜色更美，
志士逢凶胆不寒。
四年囹圄等闲事，
收拾行装再向前。

他看后，哈哈大笑，说：“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喜欢最后两句，‘四年囹圄等闲事，收拾行装再向前’。”

粉碎“四人帮”后，严佑民被委以重任，赴上海扫荡“四人帮”的老巢，以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和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本篇文章来自公安部网站，有很多转载。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 --- 孙宇亭，文章曾刊登于以下期刊：

《广州研究》1985年 第01期

《炎黄春秋》1999年 06期

《中国社会导刊》1999年 第10期

《南京史志》2000年 01期

《人民公安》2001年 12期

《政府法制》2002年 第12期

《旧闻秘录》2007年 某期

注释：

注①：“xxx”、“x主任”——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的是汪东兴。

文中有：“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

中央办公厅主任正是汪东兴。

“xxx”、“x主任”——是汪东兴无疑。严佑民儿媳的文章里直接写汪东兴。

注②：“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的是康生。但是康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他能指挥的了谢富治、汪东兴和吴法宪吗？汪只听毛和周的。这位中央负责同志绝对不是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的任何一人，否则早就写出名字了，正好向他们推罪，更不可能是康生，作者和刊登者不可能为康生隐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只能是正面人物，绝不是反面人物。

1967年以后，中央各部委都瘫痪了，中央文革接掌了大权，刘少奇、邓小平又被打倒，这时能说上话又能指挥的了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就只有周恩来和毛了。历史上经常出现故弄玄虚的事，1949年国共两党和谈期间，在报纸上突然宣布要惩治“战争罪犯”的文章，并把“战犯”的名字列了出来，用的是“中共的一位权威人士”这种称呼来玄虚天下人，其实“权威人士”是毛自己本人。

本文中的“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应该是电报签字人之一周恩来。

注③：“抗战末期”： 不是抗战末期，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着：电报跨越时间很长。

注④：本文中只写了他自己，在有的期刊中是写：我（孙宇亭）和赵雪瀛等四个人花了四天时间查了中央秘密档案馆。他们为了向上级汇报，当时抄出了电报中缔结条约的具体条文。电报很多，跨越时间很长。

注⑤：严佑民：十年动乱中，严佑民同志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1975年10月恢复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长。1976年10月任中央派赴上海工作组成员。1977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注：严佑民的被迫害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根本没有任何一点关系。是“一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迫害。1975年10月正是四人帮很凶的时候他恢复了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长’。可见四人帮根本就不理他。他又的确有后台，所以敢扛事。他不但恢复了工作，而且还升了官。

注⑥：严佑民后来经常说：“我被捕后，没有人敢再碰(整)曾山。保护了曾山。”其实他根本保护不了曾山。曾山也被“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所迫害：在严佑民出事前后被捕（其实是灭口），在“四人帮”垮台后的1977年病死于劳改农场。

严佑民：

文革前，秦城监狱是由公安部管的，严佑民当然清楚坐牢的滋味。于1968年3月12日被捕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10月恢复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长。1976年10月任中央派赴上海工作组成员。1977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后兼任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1981年2月，调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兼省纪委第一书记、政法委书记，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中纪委委员。1983年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派驻广东省委联络组组长。1985年为中央派驻中南五省整党巡视组组长，后任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等职。严佑民同志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等作出了突出贡献。严佑民同志是党的十二大代表、十三大列席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七届人大代表。

注：严佑民的被迫害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根本没有任何一点关系。是“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周恩来）的迫害。1975年10月正是四人帮很凶的时候他恢复了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长’。可见四人帮根本就不理他。他又的确有过硬后台，所以敢扛事。他不但恢复了工作，而且还升了官。他的后台可能是邓小平。

六、峨嵋山上摘桃

中共污蔑蒋介石在峨嵋山上，等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么做的是中共。蒋介石是领导中国抗战的最重要领导，弄死蒋介石日本人就赢了，所以，日寇针对蒋介石进行了二十多次斩首行动，差点把蒋介石杀掉。也差点把宋美玲炸死，她的腿伤正是日寇所为。

1941年8月30日，远藤三郎带领27架轰炸机直奔重庆黄山山庄，轰炸正在开会的蒋中正及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各战区司令官与参谋长，蒋介石两名卫兵当场身亡、四名负伤。日军怎么有如此准确的情报和地形图（注206）？中共上台后，毛泽东接见并互换礼物的第一个日本人是远藤三郎，他是差点炸死蒋中正及中国将领的凶手。战后日本军阶地位比远藤三郎高的大有人在，他不过是一个中下级军官而已，他以前与毛有交情吗？毛为什么邀请、接见并送他礼物（齐白石的画）？互换贵重礼物在外交上是不常见的，是堵住他的嘴，还是对他轰炸蒋中正的嘉奖？

而日寇并没有针对近在咫尺的延安进行轰炸。等待摘桃子的是中共。

曾庆红的父亲曾山曾经与日寇签订秘密条约，潘汉年曾经给日寇提供情报打击国军、并救走汪精卫与日军参谋长。

抗战初淞沪会战之时，蒋介石欲往前线视察军队，白崇禧建议他坐英国大使的车前往。英国大使第二天坐覆盖着英国国旗的小车去上海，中途遭到日机专门针对性的轰炸与扫射，司机身亡，大使许阁森重伤差点丧命。蒋介石不在车上，因为蒋介石觉得，前线战士正在浴血奋战，自己不能与他们一起战斗也罢，反而为了安全坐着外国大使的车往前线，会挫伤士兵的士气。蒋介石坐着自己的车上前线才躲过大劫难。

如果蒋介石不抗日，日本人为什么还要费尽周折想尽一切办法多次暗杀他？难道要换一个坚决抗日的人当领袖吗？

七、发动内战

中共造谣说蒋介石 1946 年 6 月 26 日发动内战。

且看中共党史是怎么说的：“1946 年 6 月 26 日，国民党军队在完成内战准备后，悍然进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其后，国民党军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而真正发动内战的是中共，是 1945 年听说日本投降之时发动的内战，是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来发动内战。本人为此写了一本专门的书，书名叫做和《中共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来发动内战》。里面证据丰富，全面也论述上中共发动内战的经过。

在 1946 年 6 月 26 日前，中共早已毫无顾忌地全面开打。

且看看周保中的一段经历：

“1946 年 1 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周保中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吉辽军区司令员。4 月 14 日下午，东北民主联军部分主力，加上吉辽（吉林）军区部队，在周保中司令员、林枫政委指挥下，分成 3 路纵队向长春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于 4 月 18 日第一次解放长春。此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东北保安第二、四总队和由伪警察、宪兵、特务、土匪组成的反动武装两万余人，是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对于振奋人心，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遏制其进犯速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段文字在周保中的公开经历中可以找到。这不就是内战吗？

对国民党直接进攻的上党战役比周保中的内战更早。

毛泽东被斯大林逼去参加重庆谈判。在毛的欢送会上，有高级干部问，我们在这边打战，主席在重庆安不安全？毛回答：“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这段话在中共的教科书里经常出现。“打得越好，越安全”，真是流氓逻辑，好像别人被打怕了才保护你的。斯大林和罗斯福给他的安全保证，他隐瞒下来，欺骗他的忠实部下——很贼。国军抗日英勇顽强，日本人没办法，转而对蒋介石本人进行了 20 多次斩首行动，就是说，部下打得越好，领导者越不安全！可见毛贼东真是胡吹骗人。

毛赴重庆谈判前就下达了上党战役的作战命令。1945 年 8 月 26 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各地军事部署的指示中，要求太行军区应立即集结主力，“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8 月 28 日，毛带领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8 月 31 日他再度命令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称阎锡山国军“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刘邓在军民中广泛进行政治动员，提出“打好上党战役，支援重庆谈判”的口号。邓小平说：“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真是流氓法则。

把抢劫中国政府控制的地区行为称为“收复”，对国军“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这还不是内战吗？“打好上党战役，支援重庆谈判”，无耻之极的口号。既然中共这边要打战，那谈判不就是假的吗？

毛在和谈结束刚刚回到延安时，又马上向他的军队发出了“立即向蒋管区发动进攻”的命令。毛泽东有何丝毫“和谈”的诚意？还是他自己说得好：“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这才是毛的真心话，因为他要欺骗国人的目的达到了。其实共产党的确不要和平、不要团

结，这不是造谣。

毛澤東 10 月 11 日一返回延安，立即開始軍事行動，拒蔣軍于滿洲外。林彪被任命為東北紅軍總司令，上萬幹部（領導人由蘇聯飛機）在 9 月中旬已秘送至東北（注 42）。不是苏联飞机运送，延安到东北又是一次长征，将是遥不可及。

重庆谈判，中共认认真真地谈判，根本就不考虑执行。

在双十协定的第三天，中共发了一个文件《中央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注 19），其第（三）条：“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在谈判中，我方提出四十三三个师，是对彼方现有二百六十三三个师的七分之一。后来彼方提出编整国防军计划拟编一百二十个师，故我方答应到那时可以编为二十个师，也是七分之一。.....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地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

还有一件事，毛泽东在重庆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他一回到延安，即布置其秘书陈伯达写《中国四大家族》一书（注 20），造谣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抗战时贪污国家财产 200 亿美金”。（二战时，美国总共向中国提供了 8.45 亿美金的租借物资（不是现金）；中国四大银行的总资产（不是现金）才 30 亿美金，大部分落入敌手，如何才能把这些物资与资产变换成现金？如何能弄到 200 亿美金之多？可见谣言吹多大！）。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前与事后，所思所行都是在发动内战。

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议之后，1946 年，国军大裁军，把军裁撤成整编师，直接就减少 1/3 人员，首先就从国军最精锐部队开始。五大主力之首七十四军裁成整编七十四师，从 3 师 9 团的甲种军裁成了 3 旅 6 团的整编师，整整三个团被裁没了，裁掉了一万多人。七十四军如果不被裁就绝不会被粟裕打败。中央军的精锐被他裁掉的不在少数，更别说地方军队。青年军的 10 个师大部分都退伍回去上学了，留下在部队的是极少数，像 10 军、54 军等中央系的主力部队，也有大量的士兵退伍回到乡下种田。

战争是军事力量的直接对撞，蒋介石裁撤军队，自断肱股，是在做着战争准备吗？

世界上只见过开战前扩军的，哪里见过**开战前裁撤部队**的。所以，指挥国民党发动内战是不成立的，真正开启内战的不是蒋介石与国民党，而是毛泽东与共产党。

蒋介石裁军，不但减少了打仗的军人，也减少将军，更重要的是造成军心动摇，当时有四百名将军大哭中山陵。当时的中国军人都是职业军人，许多人很早就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多数没有其他谋生技能，甚至没钱回家。中共此时打出口号“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泽东；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专门想办法把这些被裁的军人招了去。如果中共不想发动内战，招兵买马干什么？蒋总统裁军，中共却招兵买马，这就证明中共在发动内战！（详见《金剑：中共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来发动内战》）。

在《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了一个文件《中央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其第（三）条：“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在谈判中，我方提出四十三三个师，是对彼方现有二百六十三三个师的七分之一。后来彼方提出编整国防军计划拟编一百二十个师，故我方答应到那时可以编为二十个师，也是七分之一。.....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地主力**计划，

继续执行不变。”.....

可见，毛泽东的重庆谈判是假的，签署的《双十协定》也是假的，是欺骗国民党和全国人民，欺骗国民政府裁撤国军，是异常恶劣的欺诈。

一个号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党，怎么可能不用战争手段呢？！不挑起战争如何用战争手段？！所以，无论是 1945 年还是 1946 年发动的内战，都是中共所为。

在日军投降后，共军才开始大肆破坏铁路，为阻止国军前来接收日军投降，共军开始大肆破坏铁路。1945 年，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司令部公布反攻后两个半月（8 月 15—10 月 31 日）战绩：“（其中）（七）破坏铁路二百三十里（津浦道一百九十里，陇海道四十里），破坏炸毁桥梁八十余座。”（《新四军第四师发展史（详细资料）》）。日军都投降了才开始疯狂地扒铁路炸桥梁，也才开始进攻日军。日军 8 月 15 日宣布投降，之后新四军才开始扒路炸桥，扒中国路炸中国桥，真是太恶毒了!!! 这就是内战！是中共利用日寇投降混乱之时发动的内战，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来发动内战，共军炸的是中国的铁路与桥梁，这就是内战！

日本一投降，共军就抢夺日军受降权，这时的共军一边玩了命抢夺接收，一边拼命阻止、进攻去受降的政府军（从逻辑上讲就是保护日军，不让它投降），八路军成了“扒路军”，把中国原有的道路和日本人修建的道路，凡是有利于国军前进的全扒掉（搞大破坏），**共军在全国范围内大肆决堤河流：共军在河南决堤黄河，在江苏、山东决运河，在河北决永定河、子牙河（注 9）**。决堤河流的危害巨大，中共这时什么都不顾，好象发了疯似的，连这种手段都如此广泛的使用，它坏到什么程度。1946 年 3 月 23 日毛致电东北局及林彪：“你们应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迟则无用。”（注 30）。看清楚了吗？1946 年 3 月还要求大力破坏铁路。



（1946 年本溪 被共军士兵和游击队破坏的铁路）

共军坚决阻击国军前进，攻击国军，短短的路程，国军走了好几个月，比战争年代前进还慢。中共还把这写在教科书上，以表现它的能耐，却是在无意中展示了它的罪行（注 1）。

怎么说，共军也不应该扒中国的铁路、决中国的河流啊，如此祸国殃民的事都能做得出来，中共的士兵绝对是被洗脑成残，中了邪了。

《延安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

1945 年 8 月 19 日

延安发布了秘密指示：消灭一切坚持向前推进的国民党部队。而且，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可能，就把他们从新占的地区赶出去。

}

这不就是内战的指示吗？

注释

注 1. 《最后一战——中国的 1945 年》，大陆出版

注 9. 《誰是新中国》辛灏年講演錄---中共是怎样發動內戰、打敗國民黨的？

注 19: 《中央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

——《毛泽东手书真迹-文稿卷》

注 20: “四大家族的来龙去脉”——《凤凰周刊》2013 年 24 期

<http://www.ifengweekly.com/display.php?newsId=7161>

<http://www.ifengweekly.com/detil.php?id=922>

注 30: 《林彪军事生涯——阎峻著》

<http://wx.cclawnet.com/linbiao/06%E6%9E%97%E5%BD%AA%E5%86%9B%E4%BA%8B%E7%94%9F%E6%B6%AF/lb15.htm>

注 42: 郭國汀譯著：《匪首毛澤東》12、發動國共內戰的罪魁是毛澤東！

<http://www.wpoforum.com/viewarticle.php?cid=3&aid=57429>

注 206: 恶谋（中）：谁背叛了中华民族？重庆轰炸与红色间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SmDPwOWAKo>

八、四大家族

中共造谣说“四大家族贪污 200 亿美金”。这又是无中生有的谎言。

“四大家族”中除了蒋就是陈家权势最大，陈家兄长陈果夫，60 岁就贫病交加而死于台湾，蒋介石送他 5000 大洋也未能救得了他；弟弟陈立夫 50 多岁时，夫妻在美国靠摆地摊卖皮蛋度日，陈立夫 25 岁即跻身国民党中央，长期担任要职，位高权重。去美国后却不畏辛劳，凡事亲力亲为。借钱办养鸡场的时候，50 岁的陈立夫自己扛着 200 斤重（与习近平扛得一样重）的饲料去喂鸡，开点心店的时候，他又亲手制作糕饼、粽子和皮蛋，并忙于送货。蒋中正得知陈在美养鸡的生活非常艰苦，曾多次托人汇款给陈，才帮助其渡过几次生活上的难关。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清廉程度世所罕见，这就是中共指责的贪污犯，陈家兄弟贪污几百亿美金的钱呢？中共无耻到什么程度？

蒋家也是清廉的，蒋家后人现在过着平常人的生活，哪里有几百亿美金巨款的痕迹？蒋经国去世后，他的夫人由于没钱，回不了娘家探亲。宋子文与孔祥熙也不算富翁，宋家与孔家的财产与贪污无关（注 15）。

1992 年，当蒋经国的夫人接见故国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正、副市长时，两位市长请她回故乡看一看，她小声地说：“我没钱”。她穷得连一张机票的钱都没有，不知中共如何能造出他们家贪污 200 亿美金的谣言？钱哪里去了？可见这是中共的政治谣言。连“四大家族”都是造谣，还有什么是真的？

相对来说，整个国民党很清廉，非常的清廉，令人感动式的清廉！

“国民党贪污”、“四大家族贪污 200 亿美金”是陈伯达为中共制造的谣言，它是中共阻断美援、破坏抗战的最重要凶器，是中共窃政的最重要凶器，时至今日，中共一直在坚守着这些谣言、使用着这些凶器。中共不灭亡，中国没有近代史！

本节注释

注 15:【私密档案】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的“贪腐”真相

https://blog.boxun.com/hero/201210/jjp/3_1.shtml

九、打败 800 万国民党军

国军是 300 多万人，1946 年还裁撤了不少，变成 200 多万，后来又加回到 300 多万，从来没有达到 800 万之多，而共军在中共上台前已经达到 550 万之多。

抗戰勝利時國軍有 300 萬人，至 1946 年的中期裁減至 260 萬，1947 年略增至 270 萬。國軍空軍抗戰勝利時有 1000 架飛機，但到 1947 年中期，僅 277 架能有效起飛。反之，共軍則從 1945 年中期的 475000 人劇增至 1946 年中期的 1278000 人（**国军裁军时共军扩军**）；而一年後又增至 1950000 人；到 1948 年漲至 280 萬人；1949 年 2 月達 400 萬人，超过国民党军队。1949 年底共軍已有 219 個師，73 個軍，23 個集團軍，已擁有 12667 輛裝甲車，199692 挺機槍；2992258 枝來福槍；數千門大炮。同期在馬歇爾嚴重誤導下**美國政府自 1946 年 7 月始對國民政府實行武器禁運**（注 42）！有一百七十多万国军战俘被中共变成了共军。

更重要的是，**蘇聯早在 1945 年 9 月間已用飛機運送了數千中共幹部至滿洲**，为中共占领东北聚集了巨大的人才库。否则没有苏联飞机，他们如何能从延安去得了东北？万里迢迢，兵荒马乱，还要过国军和日军防地，他们要走到东北得用一年时间，内战早结束了。1945 年 8 月美国人的飞机只有一次运了 20 名中共干部去了山西黎城长宁，真正起作用、大量运送中共干部去东北的是苏联飞机，这为中共获取江山提供人才保障。

研究表明，**苏军又混编进四野，一路打进关去（注 23）。由共军、伪军、日军、朝鲜军、苏军等所组成的林彪 100 万大军（估计远超百万），**人数已经远远超过国军在东北的部队，武器又比国军处于压倒性优势，国军在东北的失败已经注定了，东北一失，大陆就失去了。国民党是被中共、苏俄、日寇三家合谋下，又被美国及国际民主力量抛弃，才失败的。不仅是国民党失败，是中国人失败了。抗日时在前有日寇后有共军的情况下，还能最终赢得胜利，国民党真了不起！

本节注释：

注 23：按察使：林彪的东北野战军 一个“国际联合部队”

注 42：郭國汀譯著：《匪首毛澤東》12、發動國共內戰的罪魁是毛澤東！

<http://www.wpoforum.com/viewarticle.php?cid=3&aid=57429>

十、小米加步枪

中共编造一个巨大的谎言——“小米加步枪”，总让人觉得，共军是拾国军的枪，回过头来再打败国军的。不是这回事！

苏联暗中巨大帮助中共，苏联把 80 万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日军在朝鲜的武器，和日本在东北的武器库里的武器（大大超过 80 万关东军武器）给中共。苏联把剩余的美援大约 34 亿（也有 40 亿之说）美金的武器转给中共（应该是有偿的），这是中共夺取江山的武力因素。于是当时东北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景观：国军因为美国武器禁运导致所用的美式武器缺乏弹药，不得不拿起库存的日本三八大盖，推出日军的山炮搞防守，而四野清一色美式装备——美国坦克、装甲车、美国榴弹炮、美国四轮卡车。

苏联不但把武器直接给东北林彪的共军，还利用苏联军舰运送到山东，给中共山东部队。不只是林彪部队武器比国军好，粟裕部队的武器也比与之对仗的国军武器还好得太多。



（1949 年 3 月 25 日北平西苑机场，毛泽东乘美式吉普车检阅部队——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图片上有大量的高射炮，在之后的中共国开国典礼上，共军有大量的高射炮，哪里来的高射炮？国军和东北日军都没有高射炮，一定是苏联人给的。高射炮都那么多，坦克大炮肯定更是不计其数。苏联人的武器不是白给的，估计大饥饿时还的债有不少是这些武器的债）。

中共编造一个巨大的谎言——“小米加步枪”，总让人觉得，共军是拾国军的枪，回过头来再打败国军的。这根本就是谣言。



（无边无际的坦克——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苑机场）

我还看到林彪在其它地方视察部队的照片，也是无边无际的坦克。

中共中央从西北坡搬往北京，林彪一次性就给1000辆卡车。卡车哪来的？国军送的？国军有那么多卡车吗？

国军认为天津能坚守3个月，林彪一天就打下，用的是坦克大炮，打了7万多发炮弹，比淮海战役总攻一周花得还多。炮弹哪来的？国军送的？

苏联用军舰给山东的共军送军火。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曾说：“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注21）。



1949年开国大典，朱德在聂荣臻陪同下检阅部队

（朱德在伪开国大典检阅部队，有大批坦克——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朱德检阅坦克部队的照片。这是小米加步枪呢，还是坦克加大炮？

东北与华东，因为交通方便，共军获得军事援助最多，所以中共在这两个地方最早获胜。

从二战开始的 1938 年到 1949 年，美国对华武器援助只有 8.45 亿美圆，而且这些武器大部份都用于二战中对日战场。从 1942 年至 1949 年，美国通过美援、一共才为国民政府武装了 45 个步兵师；但从 1945 到 1948 年之间，中共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 210 个步兵师。

1946 年 7 月，美国政府对华实施军火禁运，到 1948 年 11 月才解除，这时国民政府的败亡已经不可逆转了。解除后，运来武器已经是半年后的事了，共军已经渡江。



1949年开国大典上受阅的摩托化步兵

（1949年，共军一望无际摩托化部队——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看看共军的摩托化部队，这是小米加步枪呢。还是坦克加大炮？**这些头盔应该是苏军式头盔吧？这是什么冲锋枪？**

这是中共后方的武器与军事力量。南方还在打仗，广州还没打下，中共不可能从南方调部队并带武器回去参加典礼，可见，中共前线部队的武器更好！

无论是北京西苑的阅兵还是天安门伪开国大典上的阅兵，这时南方的战争还没有结束，那些部队还没有回来北方，那些精锐的武器还在前线，参加阅兵的是三流部队与二流武器，而阅兵上的武器都已经这么惊人了，前线的武器会更加利害。问这些武器都是从国军那里缴获的吗？不可能，缴获的武器杂乱、残缺、数量少、弹药少，绝对不可能出现如此盛况。国军有这么好武器的话，还会败吗？不会！可见，“小米加步枪”是个巨大的谎言，这些武器都是从苏联人那里弄来的，当然不会是白给的。

共军从苏联那里，获得美国援助**苏联的美式武器是 40 亿**（也有 34 亿之说）**美金**，外加 80 万关东军武器，和日军在东北武器库的武器（东北是日本战争的大后方，和最重要的武器生产地与武器库，武器库的武器总量应该远远超过 80 万关东军的几倍。北满日军武器库，仅机枪就在万挺以上，炮数千门。侵华日军 70% 弹药在东北生产。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完整的重工业基地，飞机制造厂都有，1944 年，东北的国民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1945 年，全中国工业总产值东北占 85%，台湾占 10%，**连年战争的中国其余部分只占 5%。**）。国军获得美式武器的援助是 8 亿多美金，大部分用在抗日战场，后来禁运没子弹。在武器上，共军对国军处于压倒性优势。

1946 年 7 月 29 日，在馬歇爾嚴重誤導下美國政府對國民政府實行武器禁運

(注 42)! 租借的物资、剩余物资、借款在内的美援全面被掐断。至于之前国民政府申请抗战时期美国专门为国民政府制造的 1.3 亿发 7.92 毫米大子弹也被禁止运输, 要知道这批军火已经在年初就付款了, 但却成为第一批被禁运的物资。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国军因为美国武器禁运导致所用的美式武器缺乏弹药, 不得不拿起库存的日本三八大盖, 推出日军的山炮搞防守, 而四野清一色美式装备——美国坦克、装甲车、美国榴弹炮、美国四轮卡车。

共军不是“小米加步枪”, 而是坦克加大炮。对比之下, 国军在美国断掉军援后, “小米加步枪”的称号应该由国军来扛。

1945 年 12 月共军在东北已有 20 万人, 且装备了日军武器, 使四野成为共军中最强大的军队。被苏军强行拆走的机器价值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 若重建则需花二十亿美元。苏军分期分批将大量日军武器装备移交给共军, 依 1967 年苏联塔斯社透露当年苏军予中共 70 万枝来福枪, 11000 挺机枪, 3000 重机枪, 1800 门大炮, 7600 门迫击炮, 700 东西坦克和其他军用装甲车, 900 架战飞机。随后东北共军迅速壮大成 30 万大军变成一支可怕的力量(注 42)。国军空军抗战胜利时有 1000 架飞机, 但到 1947 年中期, 仅 277 架能有效起飞。

斯大林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正式承诺, 不支持中国共产党, 并把东北交给民国政府接收。但斯大林欺骗了国际社会, 实际上他却要求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接管沈阳乃至东北全境, 一开始就把关东军的武器给了中共, 又把二战时美国支援苏联剩下的武器卖给中共。苏军想办法阻挡及拖延中华民国国军进入东北。苏联给中国反政府势力如此多的军火和支持, 如果说“外国政府挑动中国内战”, 非苏联莫属。

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不是白给的, 中共与苏联签订了许多卖国条约, 把许多国家利益给苏联人。赫鲁晓夫上台后, 主动解除了中国与苏联的不平等条约, 把部分利益归还中国人, 他是对中国人最好的俄国人。

1945 年 9 月 15 日, 八路军进入东北的部队司令曾克林乘坐苏联驻长春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出的专机飞抵延安。当天下午曾克林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共军私占东北的进展情况, 当晚又通过电报将情况报告给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据此, 中共最终确定了“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 最终促使中共及时快速地开辟了东北的局面, 成为共军在整个内战期间最重要的战略布局。苏军还用飞机运送中共东北局成员到东北。研究表明, 苏联在东北对中共的帮助, 是中共夺取江山的必要条件, 否则, 共军不占领东北也没有武器, 不可能夺取江山。这就是苏联承诺不支持中共的表现, 只是欺骗而已。

假如, 苏军严格按对国民政府的许诺办事, 不准中共军队进入东北, 不限制国民党先遣人员就地组织先遣军, 不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 那么, 中共决不会与苏联红军对抗, 强行进入东北。这样, 中国解放战争史、战后远东国际关系史和中苏关系史就将被改写。

中共用“人海战术”, 这是最奸险的一招。世界上只有共产党的字典里有人海战术这个词, 这是非常残忍的、非人道的作法, 用百姓的命换取共产党的政权。这种人海战术是以付出大批生命为代价, 东北 1946 年光复时统计有 5 千 7 百万人口, 而到了 1949 年毛登上天安门时, 人口下降到了 3 千 5 百万, 这两千多万人口哪里去了, 莫非都移民俄国了?!

中共兵围长春时, 饿死 30 万无辜百姓, 惨过南京大屠杀。有钱向国军买枪的, 共军就放出去, 有中共需要的技术专长的, 共军也放出去, 剩下的贫下中农全被饿死, 比南京大屠杀还惨。中共这种事都做的出来, 还有什么做不出来? 在

这次兵围长春事件中，共军使用了高射炮和高射炮部队。高射炮哪来？日本人在东北没有高射炮，在日本的东北武器库中肯定也没有。高射炮是苏联人给的，甚至操纵高射炮的也是日本人或者苏联红军。

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事实是：正常人与流氓打架，多数是流氓赢，因为流氓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什么招数都能用。而正常人是无法使用阴毒的招数，特别是不知道对方是流氓的时候。中共赢得江山，就是因为中共太流氓、太阴毒，饿死长春 30 万百姓这种事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国民党是一个正常的党派，哪里能顶得住这种阴招？中共一直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鼓励党徒暴乱，获得政权后又向中国人灌输“得人心者得天下”以洗脑，让人觉得它的江山得来正当，把中国人玩弄于指掌之间，非常歹毒。其实“枪杆子”与“人心”是两个不搭边的东西，既然用了“枪杆子”就不用多考虑“人心”了。中共的政权是靠暴力抢来的，与“人心”无关。

共军没那么利害，是靠苏联的巨大武器援助与各种援助，加上有 20 万日本关东军加入林彪部队，在中共的军队里，处处都能看到日本人的身影。傅作义说过：共军坦克里，不是苏联人，就是日本人。中共还联合苏联印国民政府的假币，造成物价飞涨经济崩溃，才赢得内战。中共没那么利害，只是邪术邪招很多。中共不利害，只是邪！邪术只能害人，不能救人，更不能治国。所以，中共搞倒中华民国很有办法，而治国却一塌糊涂。中共就是“害人有术，治国无方”！

共军兵围长春饿死了 30 万无辜市民的生命，中共用无辜人民的血换取它的江山，罪恶至极。

中共是内战内行，外战不行（行动的“行”）。

本节注释：

注 7：《迪克在延安》

注 21：数数林彪打的败仗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8751078&boardid=1&page=1&uid=&username=&userids=&action=>

注 42：郭國汀譯著：《匪首毛澤東》12、發動國共內戰的罪魁是毛澤東！

<http://www.wpoforum.com/viewarticle.php?cid=3&aid=57429>

十一、农村包围城市

中共很愚蠢，根本就不知道它自己夺取政权的根本原因，被自己编造的“小米加步枪”与“农村包围城市”骗了，不但骗倒了自己，更骗倒了世界许多人及革命组织，引来世界“农村包围城市”的小高潮，日本赤军也曾实践过，格瓦拉也曾实践过，都以失败告终，真是罪大恶极的谣言。

在农村游击战中，红军对农村经济与社会的破坏极大，除了像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对中共革命之路担心“中国的红军会把农民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那样，真做不了什么好事。没有日本侵略力量的牵扯、没有军阀的暗助，中共的所有根据地早被国民党铲除了。

大革命时期的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那里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革命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崇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红色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彭湃自身就是大地主，还如此残忍地杀戮阶级兄弟。后来，彭湃的少数亲人遭报复。

中共不但杀戮人民严重，中共杀自己人也严重，一个如此凶残的生命，不是那么容易对付得了的。经常听中共说，张国焘在红第四方面军肃反，杀富农以上成份者超过一半，女红军因长得漂亮也被以特务罪名杀掉。但是，他的杀戮按比例和数量都不是最高的。贺龙红军肃反，把3万多红军杀得只剩3千多。中共中央根据地肃反，在胡耀邦当政时被平反，当时仅有名有姓的被平反者就有八万多人，当然地主富农及反革命是不会被平反的，说明八万多人都是中共自己人，中共杀戮自己人达到泛滥的程度。

在《在红军肃反中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萧克将军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赣西南苏区肃清A B团时，屠杀7万多红军。红二十军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四、五任。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只剩下了6000人；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000人，杀得只剩下5名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中央苏区肃反累计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有这么多。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减少50万）；中央苏区人口下降70万……毛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名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由于被杀的红军太多，红军长征前出发前紧急扩红8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

《萧克将军回忆录》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赣西南苏区肃清AB团时，屠杀7万多红军。红二十军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000人，杀得只剩下5名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中

央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这么多……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减少50多万）；中央苏区人口下降70万……毛泽东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名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被害6352人、改组派被害2万多人……”、“为了节省子弹，红军中通行的处决手段是用大刀、梭标、木

蒋介石派几个军都无法实现的目的，中共的共产党人帮助实现了，用斗争思维帮助蒋介石实现杀戮红军的目的。在各种大清洗中，出身富有家庭的人受害最惨，而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最坚定者和最先发起者，工人出身者反而容易叛变，这是中国革命及世界革命的特色之一，革命必然会有内部大清洗（自我杀戮），这就是革命者无法回避的最大难题。相比起来，蒋介石对付共产党，远比共产党对付共产党仁慈得多多！

中共在农村这样的杀戮，对农村的破坏、使人口极大萎缩，经济也随之破坏，能攒积到夺取政权的资本吗？根本不可能！后来，分裂后的张国焘为什么率领他领导下的红军北上？因为那里的农村无法养活他的红军！

当国民党打败中共，中共不得不缩于几个根据地等待覆灭时，**日本人发动九一八，让中共躲过灭顶之灾！**九一八之时，蒋介石正在前线指挥对共军的作战，日军的进攻让中共得以在国难当头向国民政府背后捅刀——发展阶级斗争的根据地，**日军与共军互为呼应、互为帮助。**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人出于**事变期间红军发动赣州战役干扰正面战场抗战**等原因，正式确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来源作者：奉天老胡子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138887/>）。“**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被中共逼出来的。正当蒋介石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时，日军发起向长

城进攻，中华民国不得以进行长城抗战，红军再次躲过灭顶之灾。中共与日军频繁互动，中共吹嘘它如何英明神武般的几次反围剿胜利是在日本人的帮助取得的，中共从来没有公开表彰过日本人的功劳，只是直接免除了日本人的战争赔款。

当中国政府围追中共至贫穷的陕北，中共已经山穷水尽，当时中共的根据地才 **60 万人口**，根本养不活几万红军，**靠宋庆玲的支助才暂时勉强苟活**，没有全面抗日的暴发，即使国民党不围剿共产党，延安共产党也活不下去！这时，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引发中日全面战争，给中共得以喘气与发展的机会。当中国人为抗击日本侵略，浴血奋战、血流成河、心身疲乏之时，中共却在日军后方（敌后）发展壮大，共军还与日军合作攻击国军（把柄落在日本人手里）。当日本战败之时，中共却突然发难，抢夺日军武器，许多日军把武器轻易给了共军。当中国人心生厌占之时，中共却拿起枪，想实现它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梦想；当共军在东北被国军打得狼奔豕突、几近崩溃之时，已经放下武器的日本关东军被迫加入林彪部队，用他们的本领提升了共军的战斗力，为中共夺取江山立下汗马功劳。

日本人是中共的帮凶，是中共的救命恩人。难怪中共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

看看“中共沦陷大陆的五大责任者”，哪里有什么“农村包围城市”这部分？这条路根本难以通行。

“1945 年后苏联对中共 34 亿美金的武器援助”是中共夺取江山的最主要原因。可以明确地说，中共获取政权的最重要原因是苏联长期的大量的援助，中国与苏联有边界接壤，能运来大量武器，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与经济援助比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多得多；加上日本侵略对中国的摧毁；又加上中共躲在敌后发展不抗日攒积起来的力量；再加上毛泽东通过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把阶级斗争装进了没有阶级斗争的中共党人的心中；再再加上内战时日本战俘加入共军；才使中共有机会夺取江山。**否则，中共再打 100 年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再跑几个万里长征，也不可能夺取中国人的江山。**在中国这种没有阶级斗争的文化氛围里，根本就不可能在农村攒集到足够推翻政权的阶级斗争力量。

如果没有日本侵略把中国摧毁及日寇帮助中共坐大，中共再打 100 年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再跑几个万里长征，也不可能夺取中国人的江山，这也是中国人对日寇侵略无法释怀的原因；如果没有“1945 年后苏联对中共 34 亿美金的武器援助”，中共再打 100 年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再跑几个万里长征，也不可能夺取中国人的江山；如果没有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把阶级斗争装进了没有阶级斗争的中共党人的心中，中共再打 100 年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再跑几个万里长征，也不可能夺取中国人的江山。**在中共夺取江山的诸多因素中，没有一个是“农村包围城市”，可见中共的谎言有多大？！**

中共与无知者总是在宣传“农村包围城市”，耽误了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革命胜利。日本赤军（红军）实践农村包围城市，结果不敢见人、只能躲在农村别墅里自我残杀；格瓦拉实践农村包围城市，结果只能在农村抢劫以满足口腹之需，正如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担心**“把农民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那样，被当地民众唾弃并举报，格瓦拉高喊**“不要开枪、我活着对于您更价值”**也未能保住他罪恶的生命；缅甸共产党实践农村包围城市，结果其根据地成为鸦片种植基地；**中共宣传“农村包围城市”，耽误了多少人？！**

真希望共产党的党徒们都能看到本书，治治他们的愚蠢病，少走弯路。

十二、略述中共的暗黑战术

中共为了夺取政权，什么阴招邪招都用得出来。

中共获得政权，有许多摆在明面的原因，更多的是藏在暗处的手段，许多到现在都没有公开，没有这些中共的暗黑手段，中共根本不可能猎取得了江山。本人以自己掌握的一点点公开出来，抛砖引玉，请更多的人公开中共的秘密。

1、假承诺 真捅刀

国共合作抗日前，中共庄严承诺：“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分裂中国中央政府的苏维埃政权，不在国民政府、国民党、国军中安插地下党与间谍”。正是通过这些承诺，使得国民党与蒋介石答应中共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共同抗日。正是这些承诺，使得国民党与蒋介石降低了警惕，使得中共安插间谍轻易得手，相当于在国民党与中华民族的背后捅刀。

中共的这些承诺，事实上中共是处处违背了这些承诺，中共在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抗日时期，在中华民族的背后捅刀。

中共承诺不搞阶级斗争。《白毛女》就是在抗日时期在延安创作的，这就是宣扬阶级斗争，中共自己拍的老电影《苦菜花》讲的就是中共在抗日时是如何搞阶级斗争的。

中共承诺不搞分裂中国中央政府的苏维埃政权，中共却搞了个最不民主的所谓“民主政权”，共军打到哪里就把所谓的“民主政权”建到哪里，与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权分庭抗礼，这就是中共的政权，是不叫“苏维埃”的苏维埃政权。

中共承诺不在国民政府、国民党、国军中安插地下党与间谍。这一条更是最大的欺骗，中共猎取江山的第一依仗是苏联援助，第二就是抗日时在国民党内安插大量间谍。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机要秘书左洪涛、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冯玉祥的机要秘书、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投共前的傅作义的机要秘书阎又文，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而且都是借抗日的名义打进去的。蒋介石的速记员沈安娜也是共军地下党、中共至今还在宣传她是“按住蒋介石脉搏之人”，也是抗日时期安插的。这是著名且知道的，不知道的更多。蒋介石的南京作战室、电报室、警卫室、参谋室都有中共的地下党卧底，据说南京军话总站总共9名成员其中7人为中共卧底。有人这样调侃：委员长下令剿共，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刘斐负责审阅，确认后将计划交由沈安娜整理，并上报委员长过目，委员长满意，将定下的计划交由韩练成保管。这些有名有姓者都是共谍。有人形容：“情报是卧底给的，意见是卧底提的，作战计划是卧底拟定的，会议记录是卧底记的，命令还是卧底发的”。有的卧底还有意玩左右互搏，扰乱视线及人心，如郭汝瑰与刘斐，张克侠与何基沣，这两对表面上斗得死去活来，特别是郭汝瑰与刘斐，真的斗得死去活来，还得中共来调解。中共的间谍之广泛，有到处游走的阎宝航，有深藏大内的高干。另一个被蒋介石大骂“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的共谍，是总统府侍从室少将高参段伯宇，正是这货在国共内战期间策动了数万国军投共，还策应共军进犯江南。

中共不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干，而是背后捅刀，中共抗战时期安插的间谍

不是为了抗战，而是为了内战。中共间谍得到命令是“隐蔽精干，待机而动”，这个“机”不是“日寇侵略之机”，而是日寇侵略垮台后的“内战之机”。中共的间谍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夺取属于中国人民江山的内战。中共为了这个政权，真是什么阴招邪招全都用到极致，你想到的中共都能做得出来，而中共做得出来的，你连想都想不到！中共对待这些间谍，从来就没有论功行赏，而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字字带刀，句句见血，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几乎所有的中共间谍，全部都没有逃得过中共上台后的那些运动，**连伪造“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主角沈崇，**也被从对外安插特务的机构“对外联络部”挖出来批斗，泄露党不少机密。苏联还与美国交换间谍，而中共是见死不救。被中共国安部干员俞强生出卖的潜伏在 CIA 长达 30 多年的共谍金无怠，被捕后，中共拒绝承认他的间谍身份更不可能交换间谍，他失望之余选择自杀。中共如此对待它的功臣，连它的俄爹都不如，谁效忠中共，都没有好下场。

冯玉祥的几个机要秘书直接就是中共从中共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毕业生中派出来的，冯玉祥的死亡就是在这些中共机要秘书与他的中共老婆的包围下在苏联人的船上被燃烧胶卷的烟熏死的，死多年后，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中共为了批斗彭德怀，大肆宣扬“彭德怀是冯玉祥式的伪君子”。谁杀了冯玉祥？在这里表现得明明白白！

胡宗南的司令部里有一个中共的地下党党支部，也是抗日时期创建的，后来被揪了出来。共军间谍熊向晖离开后，胡宗南后来一个姓沈的参谋长也很可疑，在国共内战中，在保卫四川的部署会议上，他提议改变蒋介石保卫四川的部署，他的新部署正是共军最需要的，使得共军刘邓部队从容入川并轻易地拿下了四川。至今没人怀疑过这个姓沈的参谋长，我只好公开，他可能去了台湾。学者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里指证胡宗南也是间谍。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司令部里也有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都是借着抗日建立的。看看这个“秘密党员潜伏韶关助胡志明化险为夷(组图)”，

<https://www.chinanews.com/cul/2011/06-21/3124700.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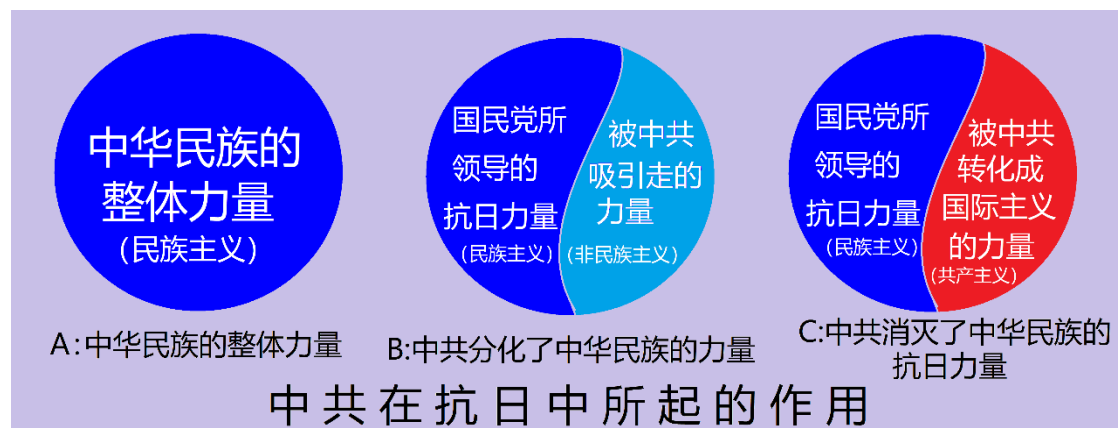
梁钧奉中共之命投考了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在最后确定的 60 名政工队员中，共产党员占到了 12 名。他们成立了“四政大”中共党支部，并制定了保密规则，比如尊重长官，不与小组外的党员发生横向联系等。

此外，中共还利用抗战时期中共的合法身份，在各大学里安插间谍。当时中共在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抓住了这个发展的好机会，趁着国民政府精力用在抗日之时机，诱骗学生走上马列主义的邪路，甚至在大学中以“民主”的名义搞学生运动，搞乱学校与抗战大后方，在大敌当前的抗战时期，以“民主”的借口破坏国民政府的战时法令，破坏国民政府的治国能力，实际就是破坏国民政府的抗日能力，实现了日本间谍想干而干不成之事。最后中共诱骗无知的学生为中共夺取江山出力出命。中共最可恶之处，是把这些被中共欺骗的学生称为“进步学生”。

中共给间谍的指示是：“**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个“时机”不是“抗日时机”，而是“内战时期”，是中共争夺政权时期。可见，中共安插间谍的“**潜伏**”，他们不是为了抗日，也不是真心抗日，其真心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所以，他们在抗战时不出死力，甚至消极怠工，等到真心抗日的将军战死后，中共的间谍就慢慢升上来，掌控国民政府及国军的实力，时刻想着如何使得中华民国政府失败。

与中共中央一样，这些中共间谍，用心用情不在中华民族的抗日上面，而是在如何让中共容易夺取江山上。中共在抗战时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分裂了中

中华民族的抗日力量——分裂民族，更阴险的是对在万分艰难中的中华民族伟大的卫国战争背后捅刀，这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是比秦桧更加恶劣的背叛，中共是叛徒党。中共在抗战时的所作所为，是中华民族抗战的最艰险因素。没有中共，中华民族的抗战更加轻松并容易胜利。中共是中华民族内部的大毒瘤，专门祸国殃民。



（中共在抗日时所起的作用是分裂民族与背叛民族）

中共在抗日时期的作用，就如蜂群那样，有两个蜂王必然造成蜂群的分裂，这还不是最恶劣的，最恶劣的是让这两个蜂群相互残杀。这就是中共在抗日时期所起的真实作用。日本侵略中国是全民族的侵略，而中共却分裂了中华民族的全民族的抵抗力量，这是在帮助日寇。我说过：“中共的抗日，最好是到日本去，用‘阶级斗争’分化日本民族，降低日本的侵略力量”。可是中共不这样做，而是在中国用“阶级斗争”来分化中华民族，并让中华民族内部相互杀戮，中共之罪，罪恶滔天，其罪当诛。

中共的间谍，极少部分是在大革命时期安插的，已经被国民党几乎彻底铲除了；中共的间谍，更大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安插的，为中共猎取江山出了最多的力；中共上台后对这些间谍进行了清洗，许多被杀害，更多的投入漫长的牢狱。国民党一心抗日，中共在背后安插间谍、为中共夺权所用，相当于在国民党与中华民族背后捅刀。一些间谍甚至随着蒋介石到台湾，身居高位，准备为中共夺取台湾出最后一把力。天不如中共之愿，金日成发动了侵略韩国的朝鲜战争，联合国国军进入朝鲜半岛，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从此共军再也没有能力进犯台湾、消灭中华民国，应了那句“人算不如天算”！

要知道，中共的这些间谍是在中共庄严承诺：“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分裂中国中央政府的苏维埃政权，不在国民政府、国民党、国军中安插地下党与间谍”之后安插的。中共违背承诺。中共不是违背承诺，承诺的当时就是假的、是假承诺，中共就是欺骗，它从来就不讲真话。

看看抗战中，彭雪枫的所作所为，与汉奸有什么分别？

看看抗战中，潘汉年的所作所为，与汉奸有什么分别？

看看抗战中，黄克诚的所作所为，与汉奸有什么分别？

看看抗战中，曾山的所作所为，与汉奸有什么分别？

看看抗战中，粟裕的所作所为，与汉奸有什么分别？

（请看《金剑：略述抗日时期中共的卖国行径》在《马克思谬论》中）。

几乎所有的中共间谍，结局都不好。在中共上台后，除了如熊向晖、冀朝鼎等那几个高位的，中共对为它出生入死的地下党，没有放过，不少死于中共之手，

更多的被中共投入长夜漫漫的牢狱之中，不少死于牢狱之中，剩下的在毛泽东死后才被放出，坐了 20 多年的牢，活该！中共上台前就对中共地下党制定下了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字字带刀，句句见血，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中共从上台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在大批迫害杀害中共地下党。

中共为什么如此极端迫害它的地下党？因为中华民国是正常社会，地下党人与中华民国深度接触，自然无法接受共产党的那一套邪乎乎的东西，于是就成为中共的眼中钉，受到逐步淘汰的命运。中共只信任经过延安整风后邪乎乎、森乎乎的干部。中共的最好打手是马列老太太，那些只背了马列主义口号的易冲动之人才是中共的最爱；至于那些曾经生活在正常社会的中华民国里、具有清醒头脑、逻辑发挥正常的中共间谍也是中共最惧怕的，中共不灭中共间谍灭谁？

辛灏年先生的《谁是新中国》中，对这段“中共籍借抗战之机向国民党派地下党”的历史有精彩的描述，摘录如下：

{
第三度是在抗战时期。在本时期内，中共重新开始合法地进入各级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布下了重重关系，并在毛泽东的一再指示和周恩来的长期布置下，“隐蔽精干和长期埋伏”（毛泽东语）。当毛泽东在延安大抓国民党特务，几乎将延安变成了一座恐怖血腥之地时，在后方，即在被共产党称之为“国统区”的重庆等地，成千上万有身份和无身份的中共地下党人，却始终地活跃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和场所，并在根本不用担心蒋介石和国民党会发动“抓特务运动”的安全条件下，为共产党进行“挖心”。工商学政各界风云人物中的亲共人物，如阎宝航（阎明复之父）等人的家，就是中共在重庆的联络中心。国民党上将胡宗南的亲信随从和机要秘书熊向晖早在一九三八年就被周恩来秘密安插到了胡的身边。一大批朝附夕叛的前地方军阀亦大多数在共产党那里留下了后路。更有许多不更事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人物的公子小姐，亦因共产主义理想的巨大诱惑而被秘密地拉进了共产党内，或很快就成了共产党所能控制的“进步青年”。这一次长达八年的“挖心”，实为嗣后中共发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为促进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暗结了一条特殊的并且是有决定意义的“战线”。

.....

这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因它早在抗战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被不抗战而有充分时间从事“挖心”的中共将它布置妥贴，所以，当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一旦陷于窘境时，政府军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军事势力，就叛变的叛变，反戈的反戈，“起义”的“起义”，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临极而生变，实际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时机罢了。由是而终于造成中华民国在内战中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

最后，似乎仍然值得一提的是，除掉苏俄的指使、中共的阴谋运作和日本的侵略以外，实际上，也正因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具有民主理念和性质的政党，中华民国政府治理下的中国社会又基本上是一个开放的和相当自由的社会，所以，才会为境外颠覆势力的思想入侵和直接指使，中共的阴谋运作和公然造反，提供了太好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机遇。

}

2、种鸦片 毒化民族帮助侵略者

毒化中国、用鸦片消灭中华民族本来就是日本的国策。日本人殖民台湾 51 年卖鸦片卖了 51 年，其中 47 年是殖民政府自行公开贩卖，被国际社会与台湾人抵制后不得以殖民政府停止公开贩卖，剩下 4 年放纵民间贩卖，直到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后，台湾的鸦片销售才停止。日本人从 1931 年九一八开始侵略中国东北，但是，从 1905 年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后，日本人即刻在东北推广鸦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在中国更是所到之处处处种鸦片卖鸦片，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东北到云南腾冲，处处都是日本人推广鸦片之地。鸦片正是日本人灭绝中华民族的第二战场，日本人甚至扬言：“只要中国人 40%染上鸦片瘾，中国就永远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这个永不吸毒的民族，成为世界最大的毒犯！

种鸦片几乎是世界共产党的通例，中共也不例外。抗日时期，中共变得巨大，苏联不可能再那么大的援助中共，国民政府也无法供中共的费用，延安人口稀少，在中共的残酷盘剥下民怨沸腾，曾经出现了“雷为什么不劈毛泽东？”的传言。中共眼看就要因经济垮台而垮台，这时中共就种起了鸦片，既搞活自己的经济，又破坏了中华民族的抗日力量，为它日后夺取江山打下基础。

中共种鸦片，用它毒害人民的体魄和精神，其实正是配合日本侵略者毒化中国的需求，成为日本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帮凶。。

中共的武工队往往用鸦片当作货币，方便他们进行活动。

中共种植鸦片的行为，连苏联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都看不下去，他在《延安日记中》记载如下：

{

1942年8月2日

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1943年1月29日

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

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

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严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不得对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力的作战活动。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

}

中共在延安种鸦片，破坏抗日时期中国人的体质、精神与经济。

抗战时，中共在延安南泥湾种植鸦片，并售往抗战大后方——国统区，一方面为自己带来暴利，一方面打击抗战的国民经济和民族的抗战信心，为它日后夺取江山打下基础。中共当政后没多久，就把当年替它贩毒的地痞、流氓全灭口。

中共在抗战时的所作所为，是中华民族抗战的最艰险因素。没有中共，中华民族的抗战更加轻松与容易胜利。中共是大毒瘤，专门祸国殃民。

3、中共对中华民国发动了五次金融战

中共为了夺取政权，什么阴招邪招都用得出来。

金融是最重要的领域，可以让一个国家战败。据说辽国正是在金融领域败给北宋，才导致辽国最终灭亡。

金融战，有一条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共对中华民国发动了五次金融战。

金融战之一：

二战时期，美国人对苏联的援助是 110 亿美元及贷款 109 亿美元（贷款几乎不用还），还有英国对苏联的 12.7 亿美元援助，加起来就是 122.7 亿美元援助及 109 亿美元的贷款，总数是 231.7 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援助仅有 8.45 亿美元及 5 亿美元的贷款，总数是 13.45 亿美元，不及援苏的 17 分之 1。同样是抗击法西斯轴心国，美国人何以厚彼薄此？这是白人优先主义者的所作所为。中国本来更穷，而中国抗击日寇比苏联抗击德国的时间长好几倍，中国更穷更需要援助。抗日战争后期，中华民国政府极度贫穷，到了无复以加的地步，物价飞涨，这时中共制造了四大家族贪污的谣言。

1943 年，国民政府又向美国请求贷款 10 亿美金，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时提出，罗斯福开始已经口头同意。中共适时制造了四大家族贪污 200 亿美金国家财产的谣言。开罗会议后，美国在中国的亲共分子（许多是美国共产党员）对美国政府适时放大谣言，使美国政府以“中国政府并不缺钱”为借口拒绝向中国贷款，并且拖延国民政府自己向美国购买的黄金运到中国，使得中国的物价暴涨，中共还想尽办法驱赶掌管财政大权的财经高手孔祥熙下台，使得中国的经济崩溃，使得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无比艰难，差点战败。

中共沦陷大陆的五大责任者之一是美国。美国这次拒绝贷款给中华民国，是造成中华民国经济崩溃、中共有可趁之机的最大责任者，罗斯福、杜鲁门、史迪威、马歇尔及在华的美国共产党及左派人士都有责任。

抗战时，中共就到处造谣说：“国民政府高官贪污倒卖美国援助的军火”，动摇了中国的军心民心，危害政府在国际上的形像。可见中共破坏抗战、用心险恶。到现在的电视电影中还是这么说的。我们可以想像，军火不是现金，怎么能贪污？总不能把炮弹扛回你们家吧！你得变成现金吧，卖给谁？不可能运出国门去卖，中国附近也没有需要军火的部队。国内哪支部队有钱？武器军火都是上级发的，没了就向上面要，不给就不打战，部队可能拿钱去买吗？有钱的话，买鸡蛋都不会买子弹的。唯一可能购买的，那就是中共。如果中共已经购买了，怎么会泄漏自己最大机密呢？难道又是在玩它惯用的“贼喊抓贼”的招术？可见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谣言。所有美国军援的发放权，都在史迪威的手里，国民政府为了争夺这

个权，与美国大闹也没能争回来，难道是史迪威倒卖的军火？

中共的这个谣言，严重地败坏了国民政府的形像，被美国的赤色人物利用，严重地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阻挠了美国的对华援助，使得美国政府拒绝了国民政府贷款 10 亿美金的请求，把中国推入非常危险的境地。中共在中国抗战的最艰难时刻，放出这个恶毒的谣言，可见中共明处暗处都在破坏抗战，破坏抗战统一战线，中共做到了日本人想做又做不到的事情，中共当了日本人的内应。中共为了将来打内战有利，甚至想办法阻止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你说中共有多坏？！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他一回到延安，即布置其秘书陈伯达写《中国四大家族》一书（注 20），造谣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抗战时贪污国家财产 200 亿美金”。（二战时，美国总共向中国提供了 8.45 亿美金的租借物资（不是现金）；中国四大银行的总资产（不是现金）才 30 亿美金，大部分落入敌手，如何才能把这些物资与资产变换成现金？如何能弄到 200 亿美金之多？可见谣言吹多大！）。如果有 200 亿美元，蒋介石政府何必向美国乞求贷款 10 亿呢？

“四大家族”中的除了蒋家外就是陈家权势最大，陈家兄长陈果夫，60 岁就贫病交加而死于台湾；弟弟陈立夫 50 多岁时，夫妻在美国靠摆地摊卖皮蛋度日，清廉程度世所罕见，竟然也把陈家列为贪污犯，中共无耻到什么程度？宋子文与孔祥熙也不算富翁，宋家与孔家的财产与贪污无关（注 15）。可见这是中共的政治谣言，很无耻。

蒋家也是清廉的，蒋家后人现在过着平常人的生活，哪里有几百亿美金巨款的痕迹？蒋经国去世后，他的夫人由于没钱，回不了娘家探亲。1992 年，当蒋经国的夫人接见故国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正、副市长时，两位市长请她回故乡看一看，她小声地说：“我没钱”。她穷得连一张机票的钱都没有，不知中共如何能造出他们家贪污 200 亿美金的谣言？钱哪里去了？可见这是中共的政治谣言。连“四大家族”都是造谣，还有什么是真的？

相对来说，整个国民党很清廉，非常的清廉，令人感动式的清廉！

这个谣言威力巨大、凶险程度巨高，连蒋介石身边的文胆都中招，何况普通百姓？这是打败国民党的重要一步。真想和平会干这种事？

“国民党贪污”、“四大家族贪污 200 亿美金”是中共制造的谣言，它是中共阻断美援、破坏抗战的最重要凶器，是中共窃政的最重要凶器。时至今日，中共一直在坚守着这些谣言、使用着这些凶器。中共不灭亡，中国没有近代史！一个谎言取国的政权，只能让谎言继续延续。

这是中共对中华民国第一次金融战，是在中华民族抗日的最艰难时期，发动对中华民国也是中华民族的金融战，使得中华民国差点战败，其实是在帮助日寇侵略者。其后果还有后劲，它是后来中国民国在内战中战败的原因之一。

金融战之二：

蒋介石评论抗日功臣时，他认为孔祥熙是抗日的最大功臣。这很有道理，因为打仗就是全部国力的拼杀，经济就是最大的实力与能力，当时中国国力那么差，银行体系建立没多久，刚从银本位走到纸币支付体系，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很差，这也是日本人敢于侵略中国的原因，并且许多银行也落入敌手。没有孔祥熙的高明主持，抗战时中国的经济很难维持得下来。中共发动种种势力硬赶孔祥熙下台，一是为了坐实“四大家族贪污”的谣言，二是为了破坏中国的战时经济。

中共动用了一切力量，包括它所操控的民主派人士，趁着物价飞涨之机，造谣抹黑，把经济失败的原因完全推给了孔祥熙，最终逼得蒋介石不得以把他赶下台。中共为什么硬要逼得蒋介石把孔祥熙赶下台？因为，一是孔下台，正好中共可以宣传孔贪污被赶下台，“印证”了四大家族的谣言，二是财政高明者下台，中共才好操控财政，实现中共搞乱中华民国经济的目的。

我认为：孔祥熙下台也是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失去高明者，就容易让持阴谋手段的中共间谍得手。

孔祥熙下台后，宋子文掌管财政大权，中共地下党冀朝鼎当上宋的秘书和经济高官。中共利用冀朝鼎制定金融政策，实现中共的意愿，甚至其政策来自中共中央。抗战胜利后，地下党冀朝鼎想尽办法把国民政府的货币与汪精卫政府的货币的比值定成 1:200，本来沦陷区货币的购买力是国民政府货币 2 倍，这样做，沦陷区人民一夜之间财富缩水 400 倍，于是出现了：“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国民政府一夜之间尽失沦陷区人民的民心**，实现了中共制造混乱的目的与搞垮国民政府的险恶用心。

金融战之三：

冀朝鼎推动了金圆券发行，造成金融雪崩，导致国民政府再次丧失民心，导致大陆败亡。

金融战之四：

国共内战时，大陆的物价飞涨，这是中共联合苏联印国民政府的假币造成的。当时，中共利用军调处的飞机，把苏联印造的假币从苏联运到北京和中共其它根据地，再转到国民政府的管辖地，当地共产党地下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分钱和花钱。当然，可能还有苏联自己的飞机直接把假钞运到中共根据地。当时中共各个根据地一般都有飞机场，苏联印的假钞可以用飞机直接运到各个根据地，然后再派发给地下党到国统区搞乱经济。这是一条非常歹毒的金融战计谋，既让国统区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国民党丧失民心，又让共产党员抢劫民财、肥得流油。

当时中共与苏联印的主要是金圆券，其设计是由冀朝鼎负责的，他的手中当然会多造一套钞版，然后再传给中共，中共又转给苏联。由苏联印，印得十全十美，质量可能都比中国印的高，当然看不出来。

我们都听说过，国共内战期间，国民政府的货币大崩溃，说下午货物的价格与上午不一样，要用麻袋装钱买东西，等等。那么大家想一想，抗战时间那么长，国民政府卷缩在西南，实际控制地盘那么小，还有军阀与中共瓜分地盘，生产力那么低下，中国那么贫穷，外国对中国的援助并不多，面对凶恶的日寇，中国的抗日战争都能坚持下来并最后获得胜利，且不出现像在内战时那样拿麻袋装钱上街买东西的事情？为什么当时国民政府的货币不崩溃、金融不崩溃？

而国共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的地盘很大、城市的经济并没有被破坏、战争的时间也不长，却出现金融大崩溃？那是中共实施的金融战的结果，那是因为苏联精良的印刷技术与冀朝鼎提供金版的结果，那是因为到处都是中共地下党——钱能花得出去！苏联用飞机把钱直接运到根据地，再分派给地下党花，既破坏国民党经济与人心，又让地下党发财，一举两得。

当时，台湾由于条件限制，并且单独发行了台币，金圆券对台湾影响不大，中共奸党这一计谋可能在台湾没有机会实施。但是，台湾物价飞涨，中共出于夺取政权的需要，是乐于看到的，也是会想办法推波助澜的，这符合中共给台湾共

党“尽量制造混乱”的指示的基本原则。

奸党与日本人一起，对国民政府发动了金融战，这是国民政府失败的根本原因。国民政府在台湾不搞戒严行吗？

这一金融战毒计，抗战时日本人就搞过，日寇因为没有多少转送假钞的渠道，所以该毒计没有成功，日本人由于没有中国的钞版，印得当然不能十全十美。中共因为地下党太多、苏联印刷技术高，特别有冀朝鼎参与设计的金圆券，估计印钞的模版也会给中共一份，苏联印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中共这一条诡计非常成功，导致了大陆的金融崩溃，物价一日数贬，中共这时还继续传播“四大家族”的谣言，使得“贪污”成为普通民众“认识到”“物价飞涨”的原因。中共这一计谋是中共获得政权的重要手段。中共到现在还在时时污蔑中华民国为“万恶的旧社会”，说什么内战时期物价如何暴涨，说的就是金融战后物价如何暴涨，却不说原因，也不说 1925 年安源煤矿井下工人的工资是多少，也不说 1932 年广州中学教师的工资是多少。中共奸得很，中共还在台上，就不会有真正的历史。

.....

我认为：孔祥熙下台也是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失去高明者，就容易让持阴谋手段的中共间谍得手。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在这本近 500 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1963 年 8 月 13 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词。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超出一个贸易促进会副会长应有的规格。1930 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出现在冀朝鼎的追悼会上。罗青长对冀朝鼎评价：“冀朝鼎在 40 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可能到此时，国民党才知道冀是中共间谍。

中共奸党与日本人一样，对国民政府发动了金融战，这是国民政府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金融战之五：

1950 年，大陆被中共占领，中华民国 60 万残兵败将退据台湾，据说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台湾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中共向英国订购了两艘 7000 吨级的重巡洋舰，从苏联买飞机，征调了 22000 多艘船舶，共军 8 个军 50 万人在粟裕的带领下，正要攻占台湾。

台湾不少人心向往红色祖国，在中共撺掇下对国民政府发动了金融战，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全部 80 多吨黄金与外汇（价值比 80 吨黄金还高），在朝鲜战争前夕已经被台湾人挤兑光，国民政府正要把最后带来的全部 120 吨白银（价值不高）拿来应付挤兑的最后挣扎，这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宣布介入并宣言保卫台湾，金融战结束，国民政府躲过金融崩溃致使政权崩溃的一劫。

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战败，金融崩溃是主要原因。朝鲜战争美国介入致使中共的第五次金融战失败，是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救下了中华民国！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都应该感谢金日成，他救下了我们最后一块民主基地！

4、发动军队“打内战”与策动学潮“反内战”

在辛灏年的忆《谁是新中国》中，有一节：中共打赢内战的五个关键手段。建议大家仔细看一看这本书，真的很精彩，辛先生眼光独特、言语辛辣，读起来回味无穷；中共太坏，中国人太傻，读起来也痛苦无穷。

书中有几个小题目：

假谈真打与中共利用美国又反对美国。

另一个题目：毛泽东的两条战线：发动军队“打内战”与策动学潮“反内战”。

抄录如下：

{

第二、毛泽东的两条战线：发动军队“打内战”与策动学潮“反内战”

中共虽然在日本投降当天就已经藉争夺受降权发动了内战，但直至他们在内战中获胜，竟自始至终地在“国统区”坚持策动不知真相的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内战”。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如前所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对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经交待任务说：“要保存力量，以便将来进行民主运动。”中共党人张执一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亦说：“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后，一方面继续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作隐蔽精干、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打算，一方面继续领导蒋管区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美帝的斗争。”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是“蒋管区”人民在“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而是中共为了打赢内战才要发动“蒋管区”的人民反对内战，并且绝不敢发动“毛管区”的人民反对内战，相反，而是强迫他们必须参加或支持内战。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当中共在内战中战况不利时，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动和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和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这个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和后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曾在题为“三个月总结”的对党内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说，“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要再歼灭敌人二十五个旅”。对发动内战和狠打内战供认不讳；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说，“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而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其重心就是策动和发动群众“反内战”。因为，就在双十协定刚刚签订、毛泽东刚刚回到延安就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全面进攻的命令时，中共又同时命令它的地下党策动和策划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昆明学生运动。它的口号就是“反内战与要和平”。嗣后的一二一学生反内战运动乃是这场运动的高潮。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说，即：“一二一运动，就是为开辟这条战线而吹响的第一声号角和点燃的第一堆烈火。”

此后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划沈崇事件所发动起来的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则在“性质、规模、影响和作用方面与历次学生运动相比，不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蒋斗争中，仅次于人民解放军”。

至于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划和领导的“红五月”学生运动，因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特别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学生运动，又把“经济斗争、生活斗争上升到了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小型的分散的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的斗争”，从而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新起点”。

诚然，这些“学生运动”都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说，就是“它都是在党中央、上海局的指导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体领导的”。更有党史专家们说，“它们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

诚然，这样的学生运动自然使中共兴奋不已。因为，后来曾用机关枪和坦克车来屠杀北京学生运动的中共，在那个时候却把有背景、有组织、有计划、有阴谋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内战”学生运动，当作了他们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蒋管区的斗争方针的指示电”就曾指示说：“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更在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文章中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对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页的注释，则这样地评述道：“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逐步形成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乃对中共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的作用，兴奋地评价说：“一是从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二是从军事上间接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三是从组织上为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大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战役的军事斗争。”

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的领袖们编剧导演，和由单纯的青年学生们上演的“第二条战线”，就是这样地为中共发动内战和打内战，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马功劳。一九八九年当中共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在北京屠城之后，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对他的后人说：“当年，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天天四菜一汤吃得饱饱的，可是吃饱了便跟着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国民党也不曾开枪打我们。今天想起来，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

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指学生运动是他的“第二条战线”，其实是谦虚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学生运动只是他的“第三条战线”。因为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就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们。而这些地下工作者们的“工作”，才是真正的“第二条战线”。这个真正的“第二条战线”，既是学生运动的“黑手”，又是群众运动的“黑手”，特别是中共第四条战线——“民主党派”战线的“黑手”。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说，就是“在民主党派中还有少数共产党员。在他们之中，一种人是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民主党派，从事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一部分是民主党派中的先进分子，在斗争实践中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部分是早年曾参加中共、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中共而转入了民主党派、后来又恢复了中共党籍者”。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一语便道破了当代中国大陆“民主党派”们的来历和本相，道出了为什么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死的时候一定要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原因，道出了他们当年是怎样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

身份，为中共发动那一场内战尽力和卖命的实情，道出了他们为何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竟能心甘情愿地为中共表演民主的根本缘由。

}

5、地下党贪污败坏国民党的形象

中共不但在国民党与国军中安插大量间谍，而且还利用间谍败坏国民党的声誉。大家想不到这一条吧？中共的暗黑战术有这一阴招，让地下党贪污败坏国民党的名誉与损毁国军的战斗力。

中共安插的间谍，他们不是真心抗日，其真心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所以，他们在抗战时不出死力，甚至消极怠工，等到真心抗日的将军战死后，中共的间谍就慢慢升上来，掌控国民政府及国军的权力，他们时刻想着如何使得中华民国政府失败，而败坏国民党及国军的形象就是一种极隐秘的手段。

张克侠就是其中的一例。张克侠早就是中共党员，听从中共的长期潜伏命令，抗战期间没有什么建树，其他人战死他慢慢提升。后来在内战期间，他有意贪污并有意克扣军饷（他不会说是他自己克扣的），说是上级没给钱，造成士兵对国民党产生怨气，致使部队人心混乱、败坏士气、使战斗力下降，处于崩溃边缘，使得他轻易地率部投共。士兵本来就只想打外战不愿意打内战，主官这样一窜掇，更恨不得调转枪口给国民党来梭子。

我看现在台湾名人当中，也有张克侠这种角色。这些人在电视上胡说八道，说一些常识性错误，如台湾某将军说三发 70%命中率的导弹能 210%命中，某名人说大陆的高铁无靠背，让大陆人觉得台湾的将军水平很低、是草包，可以不用花多少力就能拿下台湾，这是引发战争的带路党，更加严重的是败坏台湾人民的人心与士兵，这一条尤其严重，很类似张克侠的行为。某些台湾人甚至极端媚日，献媚于中华民族及世界的罪人——日本侵略者，体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并制造仇中反中情绪，令大陆人反感，也令台湾人反感，不但分裂了台湾，也加重了大陆人对中共统一的支持，起着了黄克侠的作用。

“三发 70%命中率的导弹能 210%命中”，就是退役少将于北辰说的，还说大陆都是土房子，被大陆人称为“土房哥”。我很怀疑他是中共间谍。他经常说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让人觉得台湾的将军就是这个水平，败坏了台湾人的名声，混乱了台湾人的团结，让台湾人丧失信心，同时增加大陆统派的信心，起到了中共需要的结果。大家不知道的是，他以前是统派、坚定的统派。怎么突然转向了呢？是不是领了张克侠式的任务了呢？令人怀疑。他曾经是台湾最年轻的少将，当上台湾 542 旅少将旅长，军中冉冉的新星，突然退役，形迹可疑。退役后担任过深蓝色色彩的[黄复兴党部](#)黄国园党部主委。2017 年，于北辰接受了香港中评社的采访时曾表示，“我是中国人，家住[台湾](#)！”。他不可能那么无知，他的“无知”是有意为之，用他的无知让人联想台湾人的无知。

还有的说“直到今天的北京没有下水道”。说话者真是想用无知来毁坏台湾人的形象，引诱中共攻台。北京如果没有下水道，早被屎尿淹没了。请说话者计算一下，这个 2000 多万人口的城市，一天产生的屎尿多少？废水是多少？没有下水道不是早把北京淹没了么？古代没有下水道的是巴黎，中国古代早就有了下水道。2000 多年前的秦始皇陵里都有下水道，何况今天的北京？



（1973 年，河南古墓里挖出陶瓷下水道）

1973 年，河南古墓里挖出陶瓷下水道，甚至有三通管与弯头，与现在的下水道没有什么不同。

还有的台湾人说：“大陆的高铁座位没有靠背”。

在车上，无论是公交、是汽车、是火车，座位没有靠背是不可能坐稳的，装靠背又花不了几个钱，为什么不装？说这话的人，请问他家里的凳子有靠背吗？家里的凳子那么稳定都有靠背，在摇晃的车上怎么可能没有靠背？可见，说这话的人多么弱智？！严重拖低了台湾人的智力水平！

这些人极度贬低中国，他们不敢向台湾人民公开事实，不敢公开：人类古代一半以上的发明创造来自中国。

这些贬低大陆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理智地贬低中华民族，让人多看一眼就能看破式的贬低，并且把中国人与中共捆绑在一起。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让人觉得台湾人很无知、无能，很容易就能攻破，从而引诱中共攻台的冲动；二是把中国人推给中共，让中共看起来无比的强大，在毁灭中共的同时毁灭中国人。这样做，也是中共所需要的。

我看坦言自己很像双面人的郑弘 X 也很像中共间谍，他以前是统派，后来才变成深绿，钻进绿营，他这种华丽转身就很可疑，中共的间谍一般都是如此，胡宗南就是这样得到蒋介石重用的。在黄埔军校时期，胡宗南一开始加入了中共的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突然转身加入国民党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自从他华丽转身，就得到蒋介石的青睐，从此平步青云，慢慢掌握军队大权，在内战中他有意败给中共，难保他不是中共地下党。台湾的某些人分裂台湾后，中共消灭这块中国的民主基地就容易许多。

中共很会搞这种在敌对阵营中派遣间谍，扰乱敌人。

其实中共不怕两岸分裂，就怕和平谈判，因为，在大陆有许多非常愿意以中华民国的国号与宪法统一的人，一旦台湾提出这两个条件，将给中共带来无法克服的不稳定因素，造成中共垮台。

6、假扮国军抢劫 打击民心

中共在战胜国民党的过程中，暗黑战术除了地下党贪污败坏国民党的名誉与金融战外，还有一个暗黑战术——假扮国军，为此拍了一些《侦察兵》、《渡江侦察记》之类的电影。只是在电影中把时间缩小、区域缩小、队伍变小、行为收敛。共军派出不少精干队伍，假扮国军溃兵，在国统区到处流窜，到处宣扬共军如何威猛、如何不可战胜。共军不带军粮，到处抢劫、绑架杀害有钱人，制造社会混乱，让本来支持国军的人不再支持国军，造成有钱人对国军的反感而支持换一帮人来当政想法，从而达到奸党的无耻目的。不是流行一句话：“不是国军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

7、强迫地主冲锋消耗国军子弹

中共还有一个从列宁那里学来的暗黑战术：对国军进攻时，先强迫地主、地主子女甚至是平民在前面进攻，当消耗国军子弹差不多后，真正的共军再杀出。这个战术对国军打击最大，许多士兵不愿意开枪，有时被军官强迫，有的士兵开枪后，趴在地上哭，有的士兵直接就投降了。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被共军合围，共军士兵像蚂蚁一样往上爬，打倒一批又一批爬上来，国军慢慢都停止了射击，有一个国军说：“如果是日本人，多好啊！”整编七十四师就这样战败了。国军只恨日本人不恨共军，在共军的人海战术面前，国军的善良开不了枪，连王牌部队都开不了枪，何况其他部队？国军士兵只愿打日寇、不愿意打内战，军官多数不愿意打内战，而共党被虚假的“阶级仇恨”所蒙蔽，像打了鸡血一样上一心地打内战。孙子兵法云：“上下同欲者胜”，战还没开始打，就注定国军战败了，蒋介石所做的正是在努力迟缓这种结局的到来而已，无力回天。

8、绑架百姓要挟国军

1947 年台湾暴发 228 暴乱时，共党暴徒参与杀害大陆在台无辜民众。当陈仪三次广播说“从宽处理、政治上容纳本省人、县市长可以民选”。但是中共及暴徒造谣说：“我们台湾人杀了那么多外省人，陈仪不可能放过台湾人，那是陈仪的缓兵之计”。暴徒继续抢夺武器库，继续扩大暴乱。共党暴徒非常阴险，他们是在绑架台湾人，继续作恶。

共党在大陆也是如此，当共军到达某地后，就把地主杀了，财产分给农民，然后说，你们杀了地主，国民党回来一定会报复。于是，中共就绑架了农民与中共一起打国民党。看到 228 暴徒的手法与中共一样，一般人是做不出如此阴险的事情，可见，暴徒中许多是奸党分子，不但知道自己罪恶滔天，还要绑架台湾人继续作恶。

中共一贯挑拨事端，制造恐怖，绑架他人，这种事情干得多了。1986 年，中共的陈云说：“我们共产党杀人太多，我们要是下台，人民一定杀我们。所以，我们只能小改小革，不能大改大革。一定要保住我们政权”（注 150）。陈云如此

说暴露了他无耻小人的身份，真想不到人会无耻到这种程度。

1948年，中共兵围长春时，饿死30万无辜百姓，惨过南京大屠杀。有钱向国军买枪的，共军就放出去，有中共需要的技术专长的，共军也放出去，剩下的贫下中农全被饿死，比南京大屠杀还惨。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0》对这段描述如下：

{

毫无恻隐之心是毛泽东的最大优势。一九四八年中共打长春时因强攻不得手，改为围困绝粮的办法欲迫使长春守敌投降，五月三十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守长春的是郑洞国将军，他拒绝投降。由于城里五十万平民的存粮只能维持到七月底，郑将军要平民离城。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这是为了鼓励国民党军人投诚。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即老百姓挨饿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虽然自己没有怜悯之心，毛却很懂得这一人之常情，懂得怎样利用它。可是尽管郑洞国内心“极度痛苦、绝望”，但他没有想过投降，一直坚持到最后。

围困长春三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林彪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

当时的长春市长记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九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五个月的围困下来，中共进入长春时，长春人口从五十万减少到十七万。

就是中共的官方数字也承认饿死十二万人。参加围城的中共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

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锁。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将说，利用饿死平民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在“若干城市采用”过——只是粟裕大将没有说是哪些城市。

.....

当时的长春市长记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九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五个月的围困下来，中共进入长春时，长春人口从五十万减少到十七万。

就是中共的官方数字也承认饿死十二万人。参加围城的中共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

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

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锁。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将说，利用饿死平民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在“若干城市采用”过——只是粟裕大将没有说是哪些城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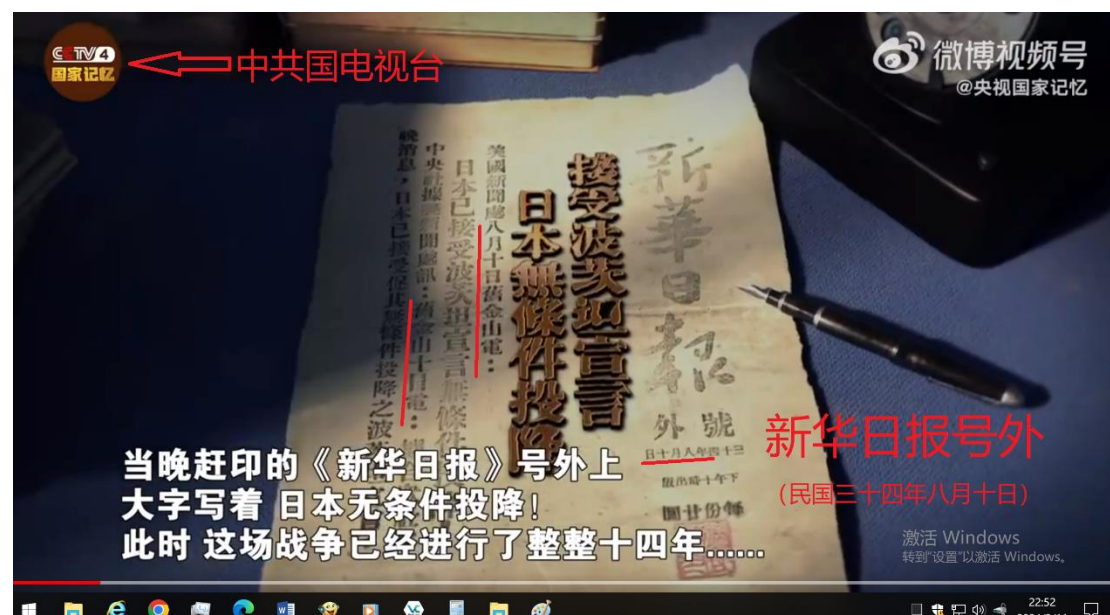
前些年，我在凤凰网的网站上看到视频，视频里有一个说，他亲眼看到，有一个男人用两块银元请人掐死自己的儿子。

看到自己的儿子活活饿死，实在不忍心，只好用钱请别人掐死。

被活活饿死，远比被子弹打死悲惨得多。被子弹打死，瞬间即走，被活活饿死，那是长时间的折磨。现在我才理解，那些挖坑埋自己的战俘，为什么那么心平气和！长春大屠杀比南京大屠杀惨烈得多。

9、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来发动内战

二战后期，美国向日本投下了二颗原子弹，苏联于 1945 年 8 月 9 日在东北发动了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当天夜里，日本皇帝（自称天皇）召开御前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第二天（10 日）凌晨，日本皇帝亲自拍板，接受中、美、英三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10 日早晨 7 点 13 分，日本通过中立国瑞典、瑞士向盟国通告了它的决定。10 日早晨大约十点钟，重庆街头出现了胜利大狂欢，接着延安等中国很多城市也出现了胜利大狂欢，全世界出现了胜利大狂欢。



（《新华日报 8 月 10 日发的号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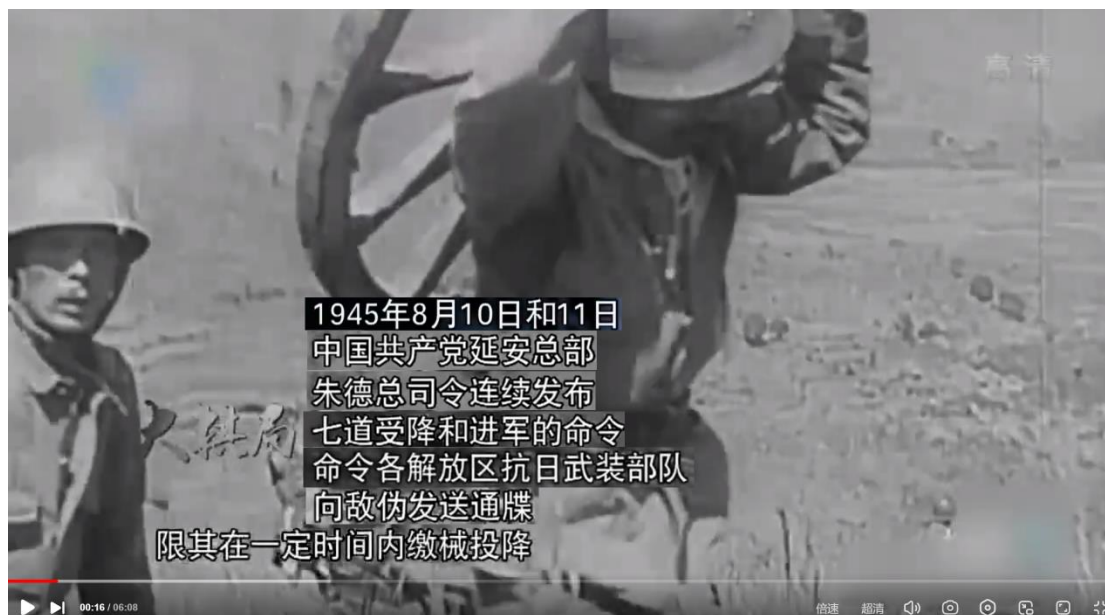
全世界知道“日本投降的时间是 8 月 10 日早上”。

8 月 10 日晚上到 11 日下午中共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这个命令，但是很多其它资料中记载是 8 月 15 日以后发表的这个命令。现在又看到有的书中

把“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改成了8月9日，甚至改成8月8日，共产党在不断地篡改历史。根据各种资料，中共绝对不可能在8月10日之前发布这个命令。这微妙的变化，就是想掩盖中共在日本投降第一时间发动内战的事实。

日本8月15日是正式投降的时间，真正做出决定是8月10日（凌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全世界是8月10日。全世界都认同胜利了、战争结束了的时间是8月10日。因为日本投降是逼不得已所为，是它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是不可逆转的事情，只是选择什么时间投降而已，一旦作出决定，战争就不可逆转地结束了。所以决定投降的时间远远比举行仪式的时间重要。

朱德“知道日本投降后的第一时间发布对日寇进攻命令”。



（中共自己说朱德是8月10日至11日发的命令，也是毛泽东的命令）

《延安日记》记载如下：

{

1945年8月19日

延安发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民兵，都开进了日本占领区。敌人士气低落，不作抵抗，但坚守据点。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军事机构空前活跃。延安忙得连打盹的功夫都没有。

惟一的目的是要赶在国民党前面，占领新的地盘和日本人军火库，并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央政府军前进。

延安发布了秘密指示：消灭一切坚持向前推进的国民党部队。而且，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可能，就把他们从新占的地区赶出去。

}

从以上可以看到，1945年8月19日还在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命令，这时日寇已经正式投降了，所以这个命令就是幌子，抢地盘和发动内战才是其真正目的。

毛与共军“惟一的目的是要赶在国民党前面，占领新的地盘和日本人军火库，并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央政府军前进。”命令明白无误的写道：“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央政府军前进”、“消灭一切坚持向前推进的国民党部队”。这不是“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这是内战的命令！是“对中华民国的首战”！

无论中共是8月15日以后发表这个“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命令，还是8

月 10 日晚上到 11 日下午发表了这个命令，都是中共知道日寇投降抢在第一时间发表的，这是一个八年抗战以来中共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命令，是在确认日本投降后发出的，是一个对抗战毫无用处的命令，是一个真正内战的命令。

中共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发动了隐蔽的内战，抢到了它想要的一切——地盘、武器、战俘、伪军，最后以这个为基础，打败了中华民国，抢到了中国人的江山。

8 月 10 日晚上，都是已经知道日本投降了，真正有一点点良心的中国人这时应该老泪纵横，然后刀枪入库放马南山，准备和平建国。毛泽东看到日本彻底的失败、真正的投降了，这时它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八年来都只抢地盘不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共的许多将军回忆录里，八年里几乎都没和日军打过战的记载，国民党的将军回忆录绝大部分都是与日本打战的回忆），这下终于出来了。

许多人被这个命令表面所骗，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就明白了：

日本已经投降了，马上就举行投降仪式，用得着再打它吗？牺牲那么多人值得吗？打烂许多地方值得吗？

投降后的日军执行的不是侵略任务，他们执行的是盟军和中国政府的命令——临时维持秩序等待中国政府正规的国军接收。这时进攻它不就是进攻盟军和中国政府吗？这如果不是内战又是什么？

这个命令的目的是什么？抢地盘、抢武器、抢战俘、抢伪军，抢这些干什么？打内战！可见，这个命令就是打内战！

共军抢战俘干什么？不是为了惩罚他们，而是想让他们加入共军共同打内战！结成号称“反战同盟”的“战争同盟”。

中共发表这个命令后，共军一边抢接收，一边搞大破坏，一边拦截并进攻政府军，这不就是内战吗？

日本一投降，共军就抢夺日军受降权，这时的共军一边玩了命抢夺接收，一边拼命阻止、进攻去受降的政府军（从逻辑上讲就是保护日军，不让它投降），八路军成了**“扒路军”**，把中国原有的道路和日本人修建的道路，凡是有利于国军前进的全扒掉（搞大破坏），共军在全国范围内大肆**决堤河流**：共军在河南决堤黄河，在江苏、山东决运河，在河北决永定河、子牙河（注 8）。决堤河流的危害巨大，中共这时什么都不顾，好象发了疯似的，连这种手段都如此广泛的使用，它坏到什么程度。1946 年 3 月 23 日毛致电东北局及林彪：“你们应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迟则无用。”（注 30）。看清楚了吗？1946 年 3 月还要求大力破坏铁路。



（1946 年本溪 被共军士兵和游击队破坏的铁路）

共军坚决阻击国军前进，攻击国军，短短的路程，国军走了好几个月，比战争年代前进还慢。中共还把这写在教科书上，以表现它的能耐，却是在无意中展示了它的罪行（注 1）。

怎么说，共军也不应该扒中国的铁路、决中国的河流啊，如此祸国殃民的事都能做得出来，中共的士兵绝对是被洗脑成残，中了邪了。

中共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发动了隐蔽的内战，抢到了它想要的一切——地盘、武器、战俘、伪军，最后以这个为基础，打败了中华民国，抢到了中国人的江山。所以，这个命令是打内战的命令！

谁发动了内战？

经常看到有人讨论这个问题，总觉得可笑，多数人是被中共洗坏了脑，总是跟着中共傻喊：1946 年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其实这完全是错的，是中共抢在日本投降的第一时间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来发动的内战，1946 年是国民政府不得不应战，而且已经晚了。

其实要找到究竟是共产党还是国民政府发动了内战，就看谁向它的信徒灌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共产党向它的党徒灌输，所以一定是中共发动了内战！一个向往“票箱子里面出政权”的党派，怎么可能发动夺权的内战呢？一个崇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党，怎么可能不发动内战呢？

一个号称是最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怎么会甘居人下呢？1922 年，当中共仅有党员 190 多人时，在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提出领导权（也就是政权）的问题；它在 1927 年以后的那么艰难的情况下，都坚持内战。1945 年，当中共有了彻底洗脑的一百二十万军队时，怎么会不发动内战呢？

（请看《金剑：中共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来发动内战》）

10、借助他国力量推翻合法政权

苏联不但给中共以思想，还给中共以金钱，不但提供所有革命运动需要的经费，还给中共革命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费用。

中共自成立的那天起直到上台，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苏联每年都给中共不少钱，中国所有的共党革命家，完全不从事生产劳动以赚取生活费，连他们的家人生活费也是苏联给的，他们家人还过的很滋润。初期中共搞那么多的刊物，经费都是苏联人出的。

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正式承诺：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并把东北交给民国政府接收。但斯大林欺骗了国际社会，实际上他却要求八路军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接管沈阳乃至东北全境，一开始就把关东军的武器给了中共，又把二战时美国支援苏联剩下的武器卖给中共。苏军想办法阻挡及拖延中华民国国军进入东北。苏联给中国反政府势力如此多的军火和支持，如果说“外国政府挑动中国内战”，非苏联莫属。

苏联把美国援助苏联的剩余武器 34 亿（也有 40 亿之说）美金，外加 80 万关东军武器，和日军在东北武器库的武器（东北是日本战争的大后方，和最重要的武器生产地与武器库，武器库的武器总量应该远远超过 80 万关东军的几倍。北满日军武器库，仅机枪就在万挺以上，炮数千门。

国军获得美式武器的援助是 8 亿多美金，大部分用在抗日战场，后来美国禁运没子弹。在武器上，共军对国军处于压倒性优势。

苏联承诺不支持中共，却用飞机把中共的干部送到东北，帮助印制国民政府的钱送给中共，给中共大量武器，给林彪部队，并用军舰送到山东给买卖人共军，估计也会用飞机送到其它中共根据地。

苏联给中共的军事帮助是中共夺取政权的最大因素。

即使是中共使尽了移山心力，用尽如下黑恶招数，在国民党中安插再多间谍，如果不是共军在力量上取得上风，中共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最后变成像法国与日本共产党那样，只能在议会当边角料，在议会里拌嘴而已，中共不可能上台，即使是像日本共产党外围组织那样偶尔上台，也会很快被赶下台，因为中国人天生就对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免疫，以致中共不能得逞，随着时间的流失，随着世界共产党恶行的暴露，随着马列主义理论被解体，中共也会随着世界许多国家共产党那样垮台与解体，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将会彻底失败。

11、用敌国士兵与战俘打内战抢江山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来发动内战。这时中共拼命抢武器抢地盘外，也拼命抓日军战俘！又不惩罚他们，哪要抓日本战俘来干什么？要日俘与共军一起打中华民国，为日本侵略者再提供杀戮中国人的机会。中共甚至让日军战俘享受超国民待遇，好吃好喝超过共军，中共只对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寇仁慈。中共真是卖国党。

中共成立了“反战同盟”，让日军俘虏加入。在很多大陆的电视电影中都看到：日军的军医、护士成了共军的军医护士，军医是军人，是为战争服务的，为中共的战争服务的，这就是“战争同盟”。

电影中看到了军医与护士，其实还有很多在电影里看不到的：日军的技术兵成了共军的技术兵及教练，日军炮兵成了八路军的炮兵，日军机枪手成了八路军的机枪手，日军的坦克兵成了共军的坦克兵。在中共的军队里，处处都能看到日本人的身影。傅作义说过：共军坦克里，不是苏联人，就是日本人。

被苏军俘虏关押在苏联境内的日本关东军有近六十万部队，当林彪部队最危急的时候，已经被国军撵得快逃进苏联国境，苏联在联合国和美国一起通过一项决议，让国民党部队立即停战，国共双方搞谈判（苏联的意思也就是不允许国民党在自己的家门口胡搞）。谈判当然只是苏联一时的缓兵之计，等国军发现上当了再次发起进攻时，发觉打不动了，林彪的部队好像个个吃了**蚁力神、大力丸之类的仙药**，战斗力不但大增，武器也焕然一新。战斗力增强主要是苏联把关集中营里劳动的日本关东军改编了二十万加入林彪的野战军，并威胁这些日本人如果在战场上逃跑，就把剩下的四十万皇军集体死啦死啦地干活！武器用的全是苏联红军的装备，只有军装是共军的，共军反攻，于是国军悲剧了。东北野战军中究竟有多少改编的日军，现在要搞清楚可能已经非常困难，毕竟已经过去了快七十年（注 23）。

根据当时日军官员回忆录：八路（其实是苏军）在 60 万关东军战俘中搞了个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部份人的代价换取大部份人的遣返。日本人在同胞之间是重视责任感，他们误认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团队中的精英分子和骨干便要求留下，换取大部份袍泽的平安归国。大约有 20 万日本兵加入林彪部队，坦克兵、炮手几乎都是日本兵。1948 年 9 月 28 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一共有 14 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以上记录见诸于 1948 年 9 月 29 日的《纽约时报》。

共军最能打仗的 38 军（号称万岁军）的日本人兵头义清说：“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 10 万日本人。**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注 23）。什么步兵班？**估计是狙击手班**，否则，一个连才一个班，占十分之一的兵力，哪能提高战斗力？中共又为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兵提供了杀戮中国人的机会。**兵头义青还透露日本有个共军 38 军战友会，大概 10000 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从兵头义清说的情况看，参加解放军的日本人不会仅仅从事技术工作。以当时的装备和编制，38 军哪里需要一万日本技术员？

最后，**兵头义清代表日本战友请求解放军总部：1、批准他们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老战士和以老战友的身份回老部队看看。2、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增加这段历史。3、为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本籍战士们树碑立传。兵头义清不向中共要退休金，已经很知趣了。**



资料图：2010年7月29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上将将在八一大楼与来访的日本籍老战士代表团一行合影留念。总正治部副主任吴昌德今天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以深泽芳藏为团长的日本籍解放军老战士访华团。吴昌德对深泽芳藏等来访表示欢迎。他说，日本籍老战士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回国后又为推动中日民间友好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对此，中国人民和军队将永远铭记。吴昌德向客人介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国防和

（资料图：2010年7月29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在八一大楼与来访的日本籍老战士代表团一行合影留念。）

日本人他们来华的最主要目的是要钱、要退休金。当然如意拿到。

共产党讲国际主义，利用他国人打内战、夺江山是它的最常规操作。

中共在1927年搞广州暴动时，指挥部就设在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内，暴动指挥是苏联外交官，暴动中不但有苏联人及苏联外交官参加，越南共产党、朝鲜共产党也组织党员参加，致使在崔庸健参与领导下的朝鲜共产党损失了巨大的力量，越南共产党也有很大损失，苏联副领事哈西斯及其他外交官更是被中华民国政府枪毙，枪毙前被游街示众，苏联政府都不敢吭声。

朝鲜战争前，朝鲜兵力不足，毛泽东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个朝鲜族师直接变成朝鲜人民军、去朝鲜（不是回朝鲜）参战。这三个身经百战的师，战斗力很强悍，是攻击韩国的主要力量。一些朝鲜战争研究者认为没有这三个师就没有朝鲜战争，于是把中共当成朝鲜战争的始作俑者——苏中朝三国同谋。朝鲜的其它部队，也主要是从中国回去的人当领导指挥着。这三个师的官兵去朝鲜后，随即被要求办理转党转团手续，即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团员转为朝鲜劳动党党员及团员，这时他们才发现中共是把他们变成了朝鲜国人，于是他们集体抵制，朝鲜要求中共派人作思想工作才解决这一难题。这些朝鲜族官兵，以为是派去帮助朝鲜国的，却被中共变成朝鲜国人，他们不愿意。他们多数人的父祖辈是在二战时才来到中国，最多是在清朝末年才来到中国，他们当中国人还没有多久，依然在感情上把自己当成中国人。战斗前，他们还被要求所有勋章、日记等全部上交（消除中国人痕迹）（注9）。

越南的抗法抗美战争中，中共也派现役部队参加。大将陈庚带队，防空部队及一些其他部队是中共部队，中共并且经济援助越南。截至1978年，中共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按当时国际市场价格计算），其中，无偿援助

占 93.3%，无息贷款占 6.7%（注 18、84）。1971 年中国大陆外汇储备净值为 0.37 亿美元，200 亿美金是天量的现金。中共是以吃奶力援助越南共产党，中共还把北部湾中间的、居住着几千中国人的白龙尾岛送给越南。我们什么都援助他们，武器粮食铁路……我们还派防空部队帮助越南打跑了美国人，使北越吞并了南越。越南人忘恩负义。1977 年刚统一不久的越南立即彻底废弃中文，并开始“排华”，驱赶 150 万华人奔向大海，并强迫每个离开越南的华人交纳 12 两黄金。这些华人被赶上破船上，导致大量人员被抢劫、杀害及饿死病死。约有近 50%至 70%的华人难民葬身海底（注 84）。越南南方比北方的华人更多、更富有，他们建有公益医院救助当地人，他们使用中文更广泛，更是越南共产党抢劫与残害的最大对象。越南人获得了白眼狼的称号，他们是无所谓的。现在，越南成为围堵中国的急先锋，越南愤青动不动就打砸中国人的工厂。中共干的是卖国贼的事业，中共比秦桧还坏。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共大力援助印尼共产党，在中共的援助下印尼共产党搞暴动，被印尼军方镇压，由此，印尼开启了排华，几十万印尼华人被屠杀。

华人又聪明又勤奋，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东南亚，华人的财富一般都是很多的。中共却向世界推广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千条万条，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有钱就有罪”，中共向世界推广马列主义，是迫害他国有钱的华人，其实是在迫害中华民族！中共干的是卖国贼的事业，中共比秦桧还坏。

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援助他国共产党颠覆他国政府最多的两个政党。现在，中共经常用干涉他国内政来攻击他人，中共何不说，当年它自己是如何干涉他国内政的？其实，最干涉他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政府的是共产党及其所宣扬的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

12、小结

中华民族是个仁义的民族。古代中国，大臣们如果认为皇上的命令是乱命，就不会执行。当然，这样做会付出极其重大的代价。最大一次反抗朝廷的是清朝末年的“东南互保”，就是东南各省串连在一起自保，集体抵抗清廷的对外国发动战争的圣旨。如果是日本民族，就不会如此，日本人是个听命于上级、没有反抗精神的民族，是一个对上级命令不折不扣执行的民族，日本人那种对上级无可奈何的心态，所以，他们的士兵不违抗上级命令，甚至不用明说、士兵也会坚决执行上级不明说的指示。日本士兵的屠杀，一般是在没有上级的明确指示只有暗示下自主执行的。

中华民族是个仁义的民族，不但人民不愿意打内战，国军士兵也不愿意打内战。在内战中，国民政府这边，最有战斗力的是“还乡团”，也就是民兵，他们不是地主武装，而是了解中共的农民武装，是经过中共土改、对中共彻底了解的农民武装，其中地主有一些，更多的是普通农民。他们不但参加游击战，也参加大型战斗。中共说农民对中共的土改支持，完全是胡说八道。了解共产党就会反共产党，这是一个有仁义精神与正义感人的必由之路，这就是中共为什么最怕中共叛徒的原因，这就是中共为什么控制媒体、不敢对它自己的历史公开、不敢公开讨论马列主义理论的根本原因——怕人民真正了解中共了解马列主义。

中国是个仁义的民族，有巨大的反抗精神，士兵对于他认为不神圣的上级命令，就会反抗、怠工，很能不折不扣执行。而共军用阶级斗争洗脑、迷惑它的士

兵，把他们变成所谓的共产主义战士，其实是为中共上台的名符其实杀戮机器人。所以，在内战中，国军士兵的战斗力的确不如共军（国军不想打内战）。再加上中共不顾人命的肉盾、也就是人海战术，再加上大量的苏联武器援助，中共武力夺取江山几乎成为板上钉钉的事。而在抗日战争中，共军受阶级斗争理论的蛊惑，听从中共的指挥，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宏大理想”，他们都在避战，甚至以“等待时机”之名避战、搞摩擦。但是，国军由于具有巨大的正义感，和为国为民族的仁义精神，所以，国军的战斗力巨大，远远超过共军。共军及共产党人，是一个为了党派放弃国家民族利益的团体，中共是一个卖国集团。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是卖国集团，苏共是，中共也是，因为马列主义造就它们的卖国性，阶级斗争就是卖国、卖民族的理论（请看《金剑：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和《金剑：马克思谬论》）。

看了上面中共的暗黑战术，加上苏联给共军的 34 亿美元的武器援助，加上 20 万日本关东军战俘加入共军林彪部队，加上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抛弃（1946 年 7 月开始对中华民国武器禁运），加上到处都是中共间谍，加上中共的谎言，中共武力打下中华民国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这些是中共的暗黑战术，有谁能打得赢？国民党是正常的党派，中共流氓成性、太坏了，所以，正常党派的国民党败了，中华民族惨了！

中共总是在说它自己如何英勇、如何英明，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政权，中共一直宣扬自己如何伟大光荣正确。其实通过研究，发现中共无比邪恶，中共为了夺取政权，什么阴招邪招黑招都用得出来。中共正是通过使用阴招、邪术夺取了政权。邪术只能害人，不能救人，不能济世。所以，中共害人有术，治国无方。

中共打赢内战，不是靠“小米加步枪”，不是靠“农村包围城市”，不是靠“得人心者得天下”，而是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是靠暗黑战术。在内战中战败不一定可耻，赢得内战不一定光荣，看如何做，中共赢得内战就是最可耻的，比苏共赢得政权更可耻，哪怕普京经常说：“我们败给了战败国、列宁建立的苏维埃是人间地狱”。

其实，中共这些暗黑战术并不高明，只要足够坏就能用得出来。因为成功与失败不是对等的，花 1 份力气可能就能致使失败，花 100 份力量都未必能获得成功。譬如对于一辆汽车，得经过多少道工序，得经过多少家机械、电器、橡胶等等工厂，经过多少技术工人与工程师甚至是科学家的人手，使用上多少高科技的工具，经过多少时间，才能造得出来；而要破坏一辆汽车，一个文盲，只需花上几分钟，拿着最原始的工具——石头、刀子，挥动几下，一辆几十万几百万元的汽车就完蛋了。可见，破坏汽车不能算本事，制造汽车才能算本事，能破坏汽车的人，多数不能制造汽车。中共只是搞破坏而已，如破坏汽车一样，算不上如何有本事，算不上智者。

中共的暗黑战术就是害人手段。从历史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共与毛泽东害人有术，治国无方。现在中国大陆在经济上能获得一些成功，是因为在经济上走上了蒋介石的经济道路，蒋介石才是智者，中共不是。

注释

注 1: 《最后一战——中国的 1945 年》，大陆出版

注 8. 《誰是新中國》辛灝年講演錄——中共是怎樣發動內戰、打敗國民黨的？

注 9: 解放军序列中的朝鲜族师结局

<http://tieba.baidu.com/p/2936784778>

注 15: 【私密档案】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的“贪腐”真相

https://blog.boxun.com/hero/201210/jjp/3_1.shtml

注 18: 沈志华: 毛泽东用领土换取邻国支持内幕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8/0505/1109498.html>

<https://5455.org/history/85858.html>

冷战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方针

事与愿违: 冷战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结果

<http://www.aisixiang.com/data/89119.html>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50610125631.html>

逆天而为痛悔迟 65: 1950——顺天出战逆天惨 两共欺天待天谴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9/6/9/n11310735.htm>

注 20: “四大家族的来龙去脉”——《凤凰周刊》2013 年 24 期

<http://www.ifengweekly.com/display.php?newsId=7161>

<http://www.ifengweekly.com/detil.php?id=922>

注 23: 按察使: 林彪的东北野战军 一个“国际联合部队”

注 24: 【私密档案】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的“贪腐”真相

注 30: 《林彪军事生涯——阎峻著》

<http://wx.cclawnet.com/linbiao/06%E6%9E%97%E5%BD%AA%E5%86%9B%E4%BA%8B%E7%94%9F%E6%B6%AF/lb15.htm>

注 84: 【海那边】中国人千万不能移民的国家: 150 万华人被驱逐

<https://zhuanlan.zhihu.com/p/66150905>

150 万华人被驱逐, 不交 12 两黄金被打死, 至今未道歉无赔偿

<https://zhuanlan.zhihu.com/p/4401184>

注 150: 辛灏年 (下): 联邦制是要分裂中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8HXITEBtG8>

十三、国民党把大量黄金运到台湾

中共在大陆的经济失败，就制造谣言，中共造谣说：“国民党把大陆大量黄金运到台湾，才使台湾建设得好”。

其实蒋介石带到台湾的资金并不多，大约 2.2 亿、2.3 亿美金而已，对台湾经济建设真正起作用的是《中华民国宪法》、各类精英与专家，而这两项正是中共所抛弃并且迫害的。

蒋纬国将军在《我的父亲蒋中正》称蒋中正给台湾带来五大宝贵资源：

- (一) 《中华民国宪法》
- (二) 八十吨黄金、一百二十吨白银
- (三) 六千八百位文教科技精英及政经专家
- (四) 六十万军人、兵工人士及工商义民
- (五) 六十万件文物国宝

其实在财物上，带来的还有外汇，它的价值比 80 吨黄金还高一些。总共带来的财产大约 5 亿美金，能用来作资金使用的不是特别多。文物国宝占了大头却不能作资金来搞建设，六十万件文物国宝不能转化成资金，对台湾的建设没有帮助，还得建房子装它，派人看它。所以，文物对于经济建设没有任何帮助。至于六千八百位文教科技精英及政经专家，如果不到台湾，早被中共弄死了，其实，留在大陆的精英与专家比去台湾的更多，多数都没有逃过反右派那一关，更难逃过文革。



各种资料都说带到台湾是 277 万两黄金（16 两/斤）， $2770000 \times 31.25 = 86562500$ 克 = 86.56 吨，但是纯度不高，提纯后能算 80 吨就不错了，与蒋纬国所说的相吻合。这只是能带来的，其实真正留在大陆的财产才是最多的。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货币统一》一文（署名：武力），1950 年 3 月物价趋于稳定以后，国家适当提高了金银兑换比价，加上人民币币值稳定，国家收兑的金银数量大增。以广东省为例，1950 年一年共收兑黄金 745.5 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 71.1%），银元 101.2 万枚（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 73.7%），纯银 5323.6 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 98.2%）。

从以上数据可知，仅 1950 年一年，在广东省收兑的黄金就有 745.5 万两（233 吨），下半年收兑 165.66 吨（530 万两）黄金、1633.68 吨白银，是蒋中正从大陆带走黄金的 1.91 倍、白银 13.6 倍，还多银元 7458.44 万枚。当时的广东并非最发达地区，全国（除港澳台之外）收兑黄金白银的时间也不止 1950 年下半年。（【资料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调查统计委员会：《1950 年广东综合统计》，1951 年 5 月）。当时广东刚解放，人心与社会还不是很稳定，1951 年收兑的黄金白银会更多。由此可见，蒋中正带到台湾的财富，不说是九牛一毛，也是一猪一毛而已，算不上多少。只是被有心人炒作，用来中伤蒋中正及台湾，为中共的经济失败找借口并推卸责任而已！不是蒋中正不想带，而是钱都在老百姓的手里，蒋中正拿不到。比起中共抢夺地主资本家的财产，那才真是九牛一毛！

1949 年 10 月至 1957 年 9 月，大陆的黄金兑换价格是 3.04-3.528 元人民币/克（95-110.25 元/两）（注 185）。 $2770000 \times 95 = 2.63$ （亿人民币）。带到台湾的外汇比黄金价值还要高一些，我估计有 3 亿人民币，再加上 120 吨白银，应该是 6 亿人民币左右。1949 年 100 美金可以换 88.8671 克黄金，1 美元兑换 2.3 元人民币， $6 \text{ 亿} / 2.3 = 2.6$ 亿美金。

这是通过人民币作为中间值算出来的，如果直接换算，会更低。1949 年 100 美金可以换 88.8671 克黄金， $86.56 \text{ 吨} / 0.888671 \text{ 克/美元} = 0.974$ （亿美元），这是纯金的价值，而带去台湾的金子纯度不高，估计换不了 0.9 亿美元。这些黄金加上白银和外汇（外汇比黄金多），估计最高不到 2.2 亿美元。所以，蒋中正带到台湾可用财产的价值最高为 2.2 亿美元，或者不到 2 亿美元更合理。

由于中共极缺美元，在国内的黄金收购价比国际市场还高是正常的，只能说中共高估人民币的币值。上面也说了，国民党带到台湾的财产大约是 5 亿美金，因为多数是文物，只有不到 2.2 亿美金是可用的资金。可见，蒋中正从大陆带来台湾的财产并不多。14 年抗战加上 4 年内战，中国已经民穷财尽，国民政府更是无钱可用！只有一点钱都在民间。政府真有钱也不至于在内战中发生金融崩溃，给政府及国民党致命一击，最终退走台湾！

86.56 吨黄金+120 吨白银+外汇，总价值不到 2.2 亿美元的资金，对于全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天文数字，说多真不多。提供七组数据作参考：

（1）1931 年 9 月 18 日，日军沦陷东北，仅几家官方银号库存的 66 万斤（330 吨）黄金和 200 万银元全成为日军囊中之物。仅东北政府官方的财产损失，估摸为 50 亿美元上下。

（2）打内战时（蒋中正带走黄金之前），苏联转给中共二战时美援苏的剩余武器 34 亿或者 40 亿美金。

（3）1950 年仅下半年，中共政权在广东收兑 165.66 吨黄金、1633.68 吨白银、银元 7458.44 万枚。

（4）朝鲜战争中，中国欠下苏联的外债为 40 亿美元。

（5）截至 1978 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总额为 200 亿美元左右（按当时国际市场价格计算），其中，无偿援助占 93.3%，无息贷款占 6.7%。

（6）1972 年，大陆与日本建交，中共宣布放弃日本战争赔款最少是 6000 亿美元。（1952 年，中华民国与日本国签订的是台湾与澎湖列岛的和平条约，不涉及大陆，中华民国没有放弃大陆的战争赔款。该条约的第一〇条：“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

(7) 中日建交，日本大量无息低息贷款给中国，之后，日本配合美国使得日元大幅升值。从 1982 年至 2003 年，日本从中国偿还的贷款中利用汇率、汇差净赚我国 1137 亿美元！

(8) 据《广州日报》2015 年 8 月报道，二战中日本从中国掠走 10 万件珍贵文物、6000 吨黄金，至今没有归还，**从中国掠夺的文物成博物馆镇馆之宝**。美国占领当局的结论是，日本有 300 万册从中国各地图书馆掳掠来的珍贵图书和手稿。截至目前，中国仅讨回 16 万册，不足其中 6%。**日本历史学家佐藤雄说：对亚洲的掠夺是战后日本复兴的基础。**

日本人夺走我们那么多的黄金、那么多的文物，中共不去追讨，甚至很少提及，却对蒋介石带走的那一点点黄金有意放大无数倍并且念念叨叨地宣传，为什么？因为中共是个卖国党！并为自己的经济失败找原因。

.....

国民党仅凭不到 2.2 亿美元的可用资金，在主要精力财力用于反攻大陆的情形下，还把台湾建设得如此辉煌，蒋中正的能耐真不错！如果蒋中正与国民党留在大陆，而中共跑到台湾，那么大陆将是多么辉煌，台湾将是多么烂？！

86.56 吨黄金+外汇+白银，约合不到 2.2 亿美元的可用资金。台湾人应该记住这些数字，我经常听到大陆人（五毛）造谣，说蒋中正带到台湾黄金多少多少（扩大千倍万倍），就用这些数字打脸五毛！

其实带到台湾的外汇比黄金的价值更高，**中共为什么不说外汇却只拿黄金来说事呢**？因为外汇是有具体数字的，无法起着放大效果，也很难造谣；而黄金很模糊，能起着放大效果还可以造谣，且不说一般人不知道具体的重量，即便知道重量也无法计算具体价值，中共就可以放大价值并造谣。中共很鸡贼！步步用心阴险。

中共国内到处传说蒋中正带到台湾多少多少黄金（我曾经听到说是千吨），中共从来不出面澄清，或者正是中共在背后造谣，为自己的经济失败找政治借口，为仇恨蒋中正及国民党找借口，为吞并台湾找借口。中共阴得很，小心！

如果说区区一个台湾岛，86 吨黄金、120 吨白银是个不小的数目，此言不虚。可是同一时期的广东仅半年，就从民间收兑了 165.66 吨黄金、1633.68 吨白银，是蒋中正从大陆带走黄金的 1.91 倍、白银的 13.6 倍。为什么大陆或者广东没有创造出经济腾飞的奇迹（改革开放是后话）？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两蒋为了对付中共而在台湾实行了持续 38 年的戒严，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虽有很大的耽误，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台湾的经济还大量增长了，台湾人均所得从 1951 年到 1987 年，足足长了 100 倍（注 61），如果算上人口的增长，整个 GDP 的涨幅更大。当然，如果没有戒严，经济成长会更早更大。而中共“解放”了大陆，经济大步后退。大陆占世界 GDP 的比重，在毛上台的 1949 年是 8%，在 1976 年毛死的时候是 4%，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6，如果算上人口的增长，人均 GDP 的跌幅更大。当时大陆经济已经全面崩溃，所有商品都要票（东西不够卖）。本来大陆的优势比台湾大得多，理应发展得比台湾快得多，却相反，可见，毛的经济政策是多么的烂，彻底公有制是多么的烂，对国家民族的危害巨大。1949 年，中国的 GDP 已经是很低了，因为中国打了几十年内战与卫国战争。毛泽东几十年的和平光景，GDP 没有增长还巨大倒退，可见，毛的经济政策是多么的烂，对国家民族的危害巨大。

1950 年，大陆被中共占领，台湾人心向往红色祖国，台湾风雨飘摇，台湾人（可能有中共撑掇）对国民政府发动了金融战，蒋中正带到台湾的外汇与黄金，

在朝鲜战争前夕已经被台湾人挤兑光，正要把最后的 120 吨白银拿来应付挤兑的最后挣扎，朝鲜战争暴发，美国宣布介入并宣言保卫台湾，金融战结束，国民政府躲过金融崩溃致使政权崩溃的一劫。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战败，金融崩溃是主要原因。是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救下了中华民国！这点资金，差点被台湾人挤兑光，再次证明，带到台湾的资金并不多！

蒋中正可以把黄金白银带走一些，但是，工厂设备带走的可能性更少。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工厂与建设的价值非常高，是中共多年的工业基础。

据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0》记载：

{

不管蒋中正多么仇恨中共，他逃跑时没有实行焦土政策。他带走了一部分宝贵的故宫文物和飞机，但当他打算把几个主要搞电子的工厂搬去台湾时，却由于主管工矿的孙越崎的抵制而未能如愿。孙等人把所有的重要工业设施都完整地交到中共手里。蒋中正临走时给中国工业造成的全部损失远不及苏联人掠夺东北的损害。毛继承下来的不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而是一千座“几乎未有一点破坏”（陈毅语）的工厂、矿山，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包括六十八家军工厂，外带一整套现成的政府经济、行政管理体系。

}

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中共在城市的建设很少，主要是在啃国民党留下的基业。中共不在城市搞建设，青年人没工作，毛泽东就把青年下放到农村，把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推给农民，还欺骗他们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辈子扎根农村。”毛时代城市青年为什么要下放农村？是因为不建设城市、城市没法就业！现在农村青年到城市工作，是因为城市需要工人。毛的经济路线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经济政策是巨大失败的。中国大陆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否定毛泽东的政策，否定一点，社会发展一大步！毛泽东的政策就是马克思列宁的政策，如果彻底颠覆毛的政策，中国就会迎来光明的未来！

建设一个国家，制度非常重要。中国近代清朝为什么失败于西方世界，就是缺乏很好的制度典章文化，而蒋介石把这些在大陆行之有效的东西完整地带到台湾来。有了这些制度典章，又有了资金和工程师，立即就可以建设台湾。

我认为，蒋纬国说的五大法宝前面四个缺一不可，特别是那六千八百位文教科技精英及政经专家，和二万多个工程师，这是全中国的精英，这是创造现代台湾经济奇迹根本的原因，中国虽然战乱，还是重视培养人才。

其实，国民党被迫迁台后，主要精力是用在对抗中共大陆政权的威胁和反攻大陆上面，主要的资源大部分用于对经济发展没有帮助的国防建设，才拖累并且延缓了台湾的经济建设，否则，所谓十大建设、二十大建设早就实施，台湾经济早就腾飞。

其实蒋介石带到台湾并能用于建设的资金并不多，对台湾经济建设真正起作用的是《中华民国宪法》、各类精英与专家，而这两项正是中共所抛弃并且迫害的，不过去就被中共糟蹋。是中共的无能与胡搞，才导致经济建设失败，与蒋介石和台湾没有关系。

（见《金剑：两岸统一该用什么国号》）

注 61：台湾历年 GDP 及人均收入数据 1951-2019

<https://wenku.baidu.com/view/09a376861837f111f18583d049649b6649d7095f.html>

注 185：人民币与黄金在 1949-2011 年间的比价 -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37c5b7a5284ac850ad024202.html>

十四、抗美援朝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

中共和国不是抗美援朝，而是抗联合国援朝，不是去抗击侵略者，而是去当侵略韩国的侵略者，是被联合国鉴定为侵略者。

1947 年秋，美国在联合国提出朝鲜半岛问题，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朝鲜半岛举行自由大选，选出政府后，占领军撤军。然而，朝鲜半岛 1948 年的“选举”在苏军与金日成的阻挠下仅在朝鲜半岛南部举行，选出总统李承晚。李承晚的政党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如果半岛北部参加选举，也是李承晚获胜。1948 年 8 月 15 日，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宣布成立。同年 9 月 9 日，北朝鲜在苏联的支持下，金日成未经选举就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此，朝鲜半岛形成了意识形态对立的两个政权。

此后，金日成发疯式向斯大林一次次请求发动吞并韩国的战争，至 1950 年 4 月斯大林才同意，5 月中旬老毛也同意。1950 年 5 月，苏联顾问团制定了平壤发动突袭消灭韩国军队的战略计划。6 月 25 日，朝鲜集中 9 个步兵师向汉城和春川两个方向进攻。在战争第一周，朝鲜人民军成功占领韩国近 95% 的领土，并抵近半岛最南端釜山（注 6）。

7 月 2 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罗申表示：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结 9 个师的兵力，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这些部队将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参战。7 月 5 日斯大林向中共发电：“我们认为…这个作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7 月 7 日，联合国决议组成联合国军参战。

（中共和国表示出兵比联合国决议出兵早 5 天）。

7 月 7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会议，决定以原四野第 13 兵团再加强部分兵力，合计 4 个军、3 个炮兵师、1 个高射炮团和 1 个工兵团，共 25.5 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而东北边防军的任务就是两项，第一保卫东北地区边防，第二在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也就是说，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就已经是在为入朝参战作准备了。到了 8 月上旬，中央军委就已经确定东北边防军将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参战，并传达到了东北边防军师以上干部（注 14）。

8 月底，中央军委开会起草《关于加强边防军的决定》，决定将东北边防军兵力由原来的四个军逐渐增至十一个军三十六个师，并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共三线部队，第一线为五个军；华东军区原准备渡海攻台的第 9 兵团和西北地区的第 19 兵团分别在十月底和年底集中，作为东北边防军的第二、第三线部队，“轮番作战”进入准备阶段。

从这可以看出，苏中朝三国同谋发动侵略战争，中共和国主动当朝鲜战争的总后盾，只要朝鲜战败，中国必定出兵，在美军仁川登陆前已经决定出兵，甚至比联合国决议出兵朝鲜半岛早 5 天，“三国同谋论”坐实。

在朝鲜军队高歌猛进之时，中共已经作好朝鲜失败中国参战的准备，金日成却蒙在鼓里把 8 月当成结束战争的胜利月。如果金当时清楚，他会想：“你们明知道我会败，还让我打，这不是坑我吗？”也许金后来也知道了，才对延安派与苏联派那么狠。

9 月 15 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朝鲜大败。

10 月，中国军队以志愿军之名参战，其兵力很快达到 100 万。大约相同数量的人员派遣到朝鲜负责军事物资运输（在飞机轰炸下，这些人牺牲也很大，应

该算在军队牺牲人员之列。却往往被忽视）。

苏联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中将被任命为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事总顾问。金日成和彭德怀都成为最高统帅部成员。在统帅部高层有大约 60 名苏联高级军官（注 6），指挥中朝军队与联合国鏖战。不但中共是同谋，苏联也是同谋。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

1953 年 7 月 27 日，中朝两国与联合国达成了停火协议，终结了这场没有意义的朝鲜土地上的兄弟厮杀。

战争发生前，朝鲜兵力不足，毛泽东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个师直接变成朝鲜人民军、去朝鲜（不是回朝鲜）。这三个身经百战的师，战斗力很强悍，是攻击韩国的主要力量。一些朝鲜战争研究者认为没有这三个师就没有朝鲜战争，把中共当成朝鲜战争的始作俑者，苏中朝三国同谋。朝鲜的其它部队，也主要是从中国回去的人当领导指挥着。

很多资料称这三个师为“朝鲜人部队”，其实这是误导、是错误的，应该称为“**中国人部队**”，或者“**中国朝鲜族部队**”。要知道，这些人是中国的朝鲜族，生活在中国，土地财产亲人也在中国，从国籍法上看，他们就是中国人，清政府早就承认他们的大清国籍，**中共分土地时也宣布只有加入中国籍**（口头上宣布也行）才能获得土地，于是东北朝鲜族人纷纷承认是中国人而分得土地，他们党籍也是中共，他们习惯以国家的概念来界定自己是“中国人”（注 9），这三个师是中共的部队。中共在东北征兵的时候，朝鲜族的征兵率（3 户征 1 兵）就比汉族高出许多倍（有资料说是 2.7 倍），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在汉族作为主体民族的国家里，其中一个少数民族征兵率奇高。这只能说明，在征兵的时候中共就想着为将来出兵朝鲜作准备。中共阴得很。

这三个师的官兵去朝鲜后，随即被要求办理转党转团手续，即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团员转为朝鲜劳动党党员及团员，这时他们才发现是被中共卖给了朝鲜国，**于是他们集体抵制**。据一些当事者回忆，开始很多人对转党表示不理解、有情绪、抵触。**朝鲜中央请中共方面派人去做工作**，才使转党转团工作进行顺利。从这可看出：这些中国朝鲜族官兵，以为是去帮朝鲜国打战的，而不是去当朝鲜国人的。这些人真糊涂，打朝鲜国内战不先变成朝鲜国人，那就是侵略者。**战斗前，他们还被要求所有勋章、日记等全部上交（消除中国人痕迹）**（注 9）。

这些人很悲剧，本来在中国打完仗有个好的前程，可以过安稳日子了，结果被中共利用“国际主义”摔包袱，顺水推舟送给金家当了炮灰，伤亡惨重，战后不少人回到中国，留在朝鲜国当官的又被金家清洗，有的被枪毙或整死。现在这些人很少而且很惨，侥幸没有战死的，在金日成清洗延安派时，他们如不能亡命他乡，就会成为金日成的刀下亡魂，还连累家人；经过金家的三代杀戮，现在在朝鲜找到他们及后人比找稀有动物还困难。**当时东北的朝鲜族人非常鄙视朝鲜政权，认为它忘恩负义。**

记得以前我看过文章，说是**东北的朝鲜族人最恨朝鲜国**。因为在朝鲜战争时，他们的许多亲人去了朝鲜参加战争，结果他们的许多干部被金日成清洗（屠杀），也逃回许多，他们就恨朝鲜国忘恩负义。上世纪九十年代朝鲜大饥荒，他们那里接收了很多从朝鲜国逃过来的难民，知道朝鲜国的残暴及谎言，所以，他们最看不起朝鲜国。这是相互的，就像蒙古国人最恨中国的蒙古族一样，说不定在朝鲜国的宣传下，朝鲜国人最恨东北的朝鲜人也有可能。

把自己的士兵建制地变成他国士兵，这是空前绝后的违反国际法行径；在外，可能引发国际舆论谴责；**在内，对待朝鲜族与汉族不一样，可能诱发民族撕**

裂。毛泽东被“国际主义”忽悠，什么都不懂，也不顾。

（请看《金剑：抗美援朝——一场时间地点对手名义结果全错的战争》）。

五毛们真无知，还在歌颂抗美援朝，甚至说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强大。殊不知，抗美援朝的最大得益者是日本。

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其实是不参战的苏联和日本。

朝鲜战争如果赢了，朝鲜的各个港口都会成为苏联的不冻港；如果败了，那也是别人的战争，与苏联无关。总之朝战别管是什么结果，苏联他都不亏。

结果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将美军牢牢钉死在了远东，欧洲几乎那就是苏联人的天下了。苏联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日本是朝鲜战争最大的得益者。

朝战三年，给日本带来最直接的收益就是日本至少收入了 23.7 亿美元。

第二点，就是日本的军工生产能力快速的恢复。

第三点，就是日本引进了许多美国先进的基础。

第四点，就是日本国内经济迅速摆脱了萧条。

而且也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给日本带来了间接的好处。就是促成了对日和约的签署，使得日本获得了正常国家的地位，为将来日本加入联大和恢复国际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对日和约，也顺势就解决了日本战争赔款的问题。当时许多欧美国家全都放弃了赔款，最后，日本只是针对于东南亚的一些个小国做了一些象征性的赔偿。

最重要的就是从此之后，日本就成为了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没有之一。

仅从表面上看，日本就获得了上面七大好处。

可以说，没有朝鲜战争，日本不会恢复得那么快，美国也不会那么看重日本，中国的经济也会快速赶上美国，今后的世界就没有日本人什么事了！日本人的神国论和八紘一宇梦幻也会在经济不如意、政治不如意中幻灭。

斯大林鼓动朝鲜战争，除了使苏联获得巨大利益之外，还顺便使中华民族的仇人日本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平添难关。加上由于该战，使得世界民主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围困。如果说斯大林不是想对中华民族动坏心思都难以令人置信。

日本意外地渔翁得利。日本是战败国，犯了巨大的战争罪行，本来要被清算的。金日成发动了这场战救下日本。美国为了应付意识形态战争，不得不放过日本，并且依赖日本，从而使日本不但没有被惩罚，还得到许多好处。日本人从战败国变成同盟国。

这是政治上收获，经济上的收获更多。

1950 年 9 月，中国比日本多了三年内战，经济上是“零”的话，日本却仍为“负数”。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与美国作战，无疑给垂死的日本病人注射一针强心剂，更如一股突如其来的鸡血针。吉田茂首相高兴得大叫：“此乃天助我也！”经济企划厅称“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

1951 年初，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达到战前水平。与战争有关的货物订单大量源源不断地流向日本，日本经济得以从战争的残破中恢复并得到长足的发展。日本国民象支援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一样努力生产，只是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是纯粹的消耗，日本则是大大获益。丰田卡车满足了美军需用，摆脱了积压，而中国从苏联购买的汽车 75%被摧毁。日本人一致认为，朝鲜战争至少使日本赢得 10 年以上时间。中国建设至少则推迟 10 年，中国死伤无数，消耗物资 560 多万吨，

军费开支 100 多亿美元，占财政支出 1/2 以上。原定渡海攻台计划被迫取消，购买苏联军火欠下债务 31 亿卢布，造成还债困难。

1951 年 2 月，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美国加速亚太战略调整，变中国为日本作为美国控制亚洲的基地，《旧金山和约》由占领变为扶持日本为反共堡垒，免除日本战争赔偿，援助日本建设，建立的军事体系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日本紧紧地抱住美国大腿，如同傍上大款和“老大”，25 年里得到援助至少 200 亿美元。作为这两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反而被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敌对；而战败国的日本，却赢得美国 60 多年的支持。

朝鲜战争使美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亚洲的投资大部分投在了日本，日本在朝鲜战争期间利用生产军需品大发其财，迅速恢复了在二战中崩溃了的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经济的快速恢复，使得日本的军国主义得到恢复。日本战后经济、科技快速发展，这里有金日成与毛泽东的大大功劳。

朝鲜战争后，美国为了对抗东方的共产主义阵营，继续扶持日本，日本经济一下子达到了世界第二，并且长期占据第二，甚至差点超过美国。美国不但扶持了日本的经济，还把日本的左派打压了下去，把右派提拔上来，以至今日日本右派与神国主义者泛滥，几近二战侵略时期。

日本是待罪之身，《日本国宪法》规定日本不保有军队。美国为了拉拢它，允许它逐渐建立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日本的国家武装力量初步成型，宪法中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一条名存实亡。日本的右翼势力对金日成与毛泽东可以说是感激涕零。

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上面的一切都不存在。

日本——不出兵的大赢家。

如果大陆的政权没有易主，还是中华民国，由于苏联抢走了蒙古并在东北施暴，还由于意识形态原因，中华民国将非常卖力地抵御苏联，日本在美国的眼里几乎没有存在价值，那么美国为了抗衡苏联的共产主义，将会大力支持中华民国。日本所得到的好处全部给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经济等各方面将得到极大的发展，日本将远远落在中国后头，世界第三肯定捞不着。凭着中国人的聪明程度与人口优势，中华民国的经济总实力在多年后已经超过美国，稳坐世界第一，其他方面也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人的强国梦早已实现。苏联由于在东西两方进行冷战，加上公有制对经济的负作用，苏联经济更加腐烂并快速崩溃，提前二十年解体；随着苏联解体，中国轻易收回了蒙古。中华民国才有权收回蒙古，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收回蒙古，因为已经承认它独立，可以从中华民国的地图上看出。从这个角度看，也是苏联赢中国输。

朝鲜战争的谈判，也是中朝阵营落败了，因为中朝方最初坚持的“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和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后来都放弃了，对中途冒出来的战俘遣返问题也放弃了，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是按照美国的条件达成的。

在美国人眼里，朝鲜战争也打击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嚣张气焰，教训了老毛。比如 1950 年代美国军舰无数次侵入中国领海，中国海军硬是不敢发一枪一炮，只是不断抗议和警告。1958 年炮轰金门，美舰进入（侵入）中国领海，为国民党护航，毛泽东的指令竟然是只许打蒋舰，不许打侵入者的美舰，就是美国开火也不许还击（注 7）！毛对美国只是怕、怕、怕…

朝鲜战争的大赢家是苏联、美国，最大赢家是中华民国、日本！四家之中，三家是不出兵的。谁说出兵才能打胜仗，真正的胜利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共的军队整体派到朝鲜，根本**不是人民志愿军，而是中共支援军。**

在朝鲜战争中，有一支真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华侨反共军**。

有一群**离乡背井的韩国华侨**，深刻经历两个国家的分裂局面，反共意识唤起他们的身份认同，这一群韩国华侨站在中共敌对的一方，义无反顾投身反共战线，热血走上前线与韩军并肩作战，为心中的祖国出征，也**让韩战有如国共内战的延长战线**。这一段鲜为人知的韩国华侨义勇军往事，埋藏散落在史籍片段和报导之中，不过，对下一代来说，父亲反共参战是抹不去的家族故事和历史记忆。

魏茂煌是战后在韩国出生的华侨，国共内战之际，他的父亲魏绪舫和祖父从中国东北移居朝鲜半岛，“我父亲曾经是所谓的国府军，属于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反共人士就志同道合地在北韩新义州进行地下工作。”他翻开泛黄的自传信纸，1947 年魏绪舫担任“中韩反共爱国青年团”团长，突袭敌营后防，“他们纠集了韩国人和华侨大概 7、800 人，像游击队一样去抢夺一些枪枝、武器。”自传中，魏绪舫悲痛写下共产党奸杀、凌虐村民的暴行，字里行间透出坚定的反共立场。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人民军越过 38 度线进攻韩国，双重反共意识激起魏绪舫参战的决心，“我父亲就带这些人到南韩，加入了陆军的第一师团，那就属于没有军阶的一个军人。”魏茂煌提起韩军里的“外国志愿军”，他的父亲被派任为“华侨义勇搜索队”队长。

这群没有军籍的华侨用生命捍卫自由、和平的信仰，韩国政府以勋章表彰部分人士在韩战立下的战功。2020 年 7 月，“韩华历史博物馆”在华侨奔走和汉城华侨中学的支持下落成。

我十分肯定地认为：朝鲜战争就是一场由斯大林策划的、旨在把中共拖入战争并长期与西方对抗泥淖的阳谋。斯大林完美地实现了目的。否则，斯大林为什么不让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用一票否决制否决联合国出兵、否决谴责中共国为侵略者？另外，战争期间，斯大林建成了图们江大桥充分表现了他的阳谋——封锁中国出海口。他要恶毒到什么程度才能建造这种桥梁？为什么答应出动空军而实际不出动？为什么斯大林不同意金日成要求早日停战的提议？为什么援助中国志愿军的武器还要钱？

朝鲜人民军从排级到参谋总部都配有苏联顾问。朝鲜人的作战计划实际上是苏联人员制定的，叫作先发制人的作战方案。斯大林消除一切苏联人参战的痕迹。一次性给朝鲜 3000 辆汽车，却不给驾驶员。



（图们江大桥——那个千帆出海的出海口被消灭）

1950 年，苏联以对朝鲜运送军事物资的名义，与朝鲜修筑了苏朝图们江铁路大桥，锁住中国北面的出海口。大桥故意修成仅 7 米高，河道淤塞等原因，仅能通行 300 吨以下的小船。并且俄方还提出苛刻的条件，仅允许季节性捕捞渔船出海，不准商业运行船只出海。中国历史上，在那里本来就有出海口，连地方也是中国人的，那个清末之时曾经千帆出海的图们江出海口就这么被不见了。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为保卫社会主义阵营、为捍卫朝鲜政权而浴血奋战之时，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与小弟朝鲜竟然做如此恶行，估计中国的敌人不会做出如此恶行，什么叫做背叛，这就是背叛。

本节注释：

注 6：（来源：《文史参考》）朝鲜战争的历史教训

<http://www.people.com.cn/GB/198221/198819/198856/12320774.html>

注 7：颜昌海 | 朝鲜战争的谎言与真相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625/11/22092811_480702540.shtml

注 9：解放军序列中的朝鲜族师结局

<http://tieba.baidu.com/p/2936784778>

注 14：抗美援朝战役评点系列之一：仁川登陆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C24DG91G052384RH.html>

十五、联合国裹挟志愿军战俘去台湾

朝鲜战争中大量的志愿军战俘拼了命地选择去台湾，中共却造谣说“联合国（美国）裹挟志愿军战俘去台湾”。真正的事实是“中共裹挟志愿军战俘回大陆”！这才是千真万确的！

联合国 1951 年 1 月 23 日提出“就地停火”建议，被中共拒绝后，联合国军 1 月 25 日开始从 37 度线附近全面北进，第四次战役随即展开，联军把战线推到 38 线附近。中共不同意停战，是朝鲜损失领土的原因。第五次战役，志愿军往南打，又被联军打回 38 度线附近，联军主动停止了进攻，想结束战争。

第五次战役后，双方寻求停火。1951 年 5 月 31 日，苏联代表雅科夫·马立克与美国国务院的代表乔治·坎南秘密会面，接洽有关停火事宜。

谈判在最不起眼的战俘问题上绞住，使得停战迟来 2 年 2 个月。联合国军为了敌人——志愿军战俘能自愿遣返，战争多打了一年多，多牺牲了十几万联合国军的生命。

可以说，朝鲜战争是二场战争：一场是领土之战，只打了不到一年，从 1950 年 6 月 25 日到 1951 年 5 月 31 日，基本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另一场是战俘之战，打了二年多，从 1951 年 6 月 1 日，到 1954 年 1 月 20 日，从谈判桌到战场，打得热火朝天。在美军陆军第八军的护送下，530 辆卡车把反共战俘送到仁川。转乘 15 艘美军运输船去台湾，美第七舰队和美空军第五军则一路随行保护。1 月 23 日，战俘到达台湾才彻底摆脱共产党的威胁，中华民国把该日定为“123 自由日”，本人建议联合国也把 1 月 23 日定义为“世界自由日”。

朝鲜战争中，中共以极端漠视人命的铁腕将成百万的中国青少年驱赶到战场上去。志愿军部队在寒冷饥饿肮脏和疾病的折磨下苦撑度日，每天都有大批人员悲惨死去。一上火线，当局更是硬逼着“人海闯火海”。整连整营的部队瞬间伤亡大半，战场上处处可见成片倒毙的中国人尸体。悲惨恐怖的环境致使大批志愿军士兵逃亡。在火线上，经历九死一生后，少数人抵达了战俘营。在本方境内，还有大批士兵开小差当逃兵。志愿军总政治部主任杜平的回忆录中透露说，他甚至远在中国的丹东也看到了成群结伙的逃兵。而当时能够返抵中国的逃兵仅是极少数侥幸者。更多的逃兵只能在朝鲜境内逃亡。

中共军队向来以枪毙加恐吓来制止逃兵现象。已有多位志愿军战俘提起过部队里枪毙逃兵的案例。例如战俘王遵铭回忆，志愿军 12 军 31 师为了阻止士兵掉队开小差，先是警告士兵们说周围有很多土匪，一旦掉队就会被土匪逮住杀掉。部队并且有意枪杀了两名逃兵并把他们的尸体摆在行军路线上，旁边挂一盏马灯并贴上“掉队的后果”的告示以恐吓其他士兵。另一位志愿军战俘高文俊则叙述了两个案例。一例发生在他所在的 180 师。有一名士兵故意开枪打伤自己的脚以图逃避上火线。结果他被处决，该连指导员也被撤职。还一例是他听战俘营中一位姓诸的战俘所说的。诸说他们部队里有不少士兵逃入附近的乡村去当女婿。战争消耗了大部分朝鲜的青壮男性，所以志愿军士兵很受当地妇女欢迎。志愿军各部队经常突击搜查周围地区以抓回逃兵。他们部队有一次捉获了四名“逃兵女婿”。部队随即召开“公审大会”将他们当众处决（注 18）。



（中共送飢寒交迫的志願軍戰士上戰場）

中共搞階級鬥爭、打仗不顧志願軍的生命、困難時中共幹部不顧戰士自己逃命等等原因，引起戰士對中共的仇恨，於是，許多人向聯軍投降。這些也是造成志願軍戰俘大部分反共的原因。



（中共的阶级斗争恐怖使得部分志愿军不愿回国）

开斗争会的对联是：穷人要翻身抓住地主老财挖苗断根。从 1950 年到 1953 年，共有几百万被划为地主和反革命的人被中共处决。尽管土改与镇反只是中共无数政治运动的开始，其后果已经让许多前国军人员不寒而栗。他们投降解放军后，发现自己也不受共产党的信任，不少人于是伺机重新投奔国民党，而韩战被俘就成为天赐良机。共军还宣传说已经有两个师的国民党军打到朝鲜，原来被中共俘虏的国军士兵反而想投降。不少志愿军投降后，向联军提供了大量情报，让联军抓到其他共军或者摧毁弹药库。1951 年 12 月，巨济岛上有共军战俘达到 18 万，包括近 2 万名志愿军战俘。

志愿军战俘群体形成之初，中共尚未能够在其中建立组织进行控制。大多数战俘早已厌恶中共，被俘后很快公开反叛共产党。战俘中亲共人员势单力薄，加上他们自己也背负“叛变革命”等精神包袱，也采取了随大流不作为的态度。因此，初期的中朝战俘与联合军当局关系相当融洽。那时美军觉得管理中朝战俘比他们几年前管理日本德国战俘还轻松。他们的管理方式也很放任，甚至不派一兵一卒就把整火车的志愿军战俘从前线送到后方。战俘们自己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鲜有逃跑或者抗拒行为（注 18）。



（战俘得意洋洋的展示身上的反共刺字）

志愿军有 21000 多人被俘，其中超过 70%坚决不返回中共国。为了实现目的，他们在身上刺字：“反共抗俄 消灭共匪”、“反共抗俄 打倒共产党”、“誓死灭共 杀朱拔毛”甚至刻上英文反共标语。那段时间战俘提出的要求最多是“请发给我们武器，我们打回老家去”。

多数战俘不愿意回到大陆去，随着在战俘营中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按《日内瓦公约》，战俘营由军官管理。中共的干部极力掩饰自己的干部身份，在共产党的眼里，被俘就是犯罪，而且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要比普通士兵承担更大的罪责。共产党军官不敢露头，于是原国民党的军官露面后就被安排管理士兵。这之后，一批中共政工干部转变了立场投入反共阵线，而这批变节政工干部，策反战俘“比台湾人更卖力”。他们对中共严厉的组织、军事纪律熟稔无比，作为以往组织纪律的执行者、政策的宣讲者，他们非常清楚，被俘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带着“反共抗俄、杀朱拔毛”刺字回中共国后会有什么结局。

反共的军官们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他们把战俘营搞成国民党军营，最早收容志愿军战俘的巨济岛 72 战俘营就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国民党党徽不但成了战俘的帽徽，还被镶嵌在战俘营的大门上，新战俘一来还以为到了台湾。甚至有很多志愿军战俘接受联军的指挥，化装成志愿军潜回朝鲜半岛北部甚至东北侦查志愿军的情报，有人估计大约 500 人。



（新战俘一来战俘营还以为到了台湾）

反共人士当了家，“青年反共救国团”、“国民党六三支部”等组织就在 72 战俘营相继成立，利用警备队管理战俘营。他们在共产党的军队里呆过，学会了共产党的手段，利用共产党的手段来管理，效率高，把想捣乱的亲共战俘压了下去。战俘营还经常组织篮球及拳击比赛，战俘们苦中作乐，纷纷登台表演各种传统剧目，养猪养狗都有。

反共战俘营，营地到处国旗高竖，门前大书标语二联曰：“一条命灭共匪、一颗心向台湾”。十月十日国庆、十月三十一日蒋总统诞辰及元旦等日，各营均举行隆重庆祝活动。

1951 年 10 月 10 日，中华民国双十节，中华民国国旗在战俘营升起，战俘们集体向国旗致敬。中国战俘的这一行为同时引发联军方面的高度重视。12 月 29 日，美军陪同红衣主教斯佩尔曼视察了 72 战俘营，受到热烈欢迎，战俘代表再次向美方递交了请愿书：希望摆脱中共统治，要求去台湾。



（战俘们集体向中华民国国旗致敬）

美国惧怕中共，把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政府刻意排除在外，联军需要汉语翻译人员，先找来一些曾在中国生活过、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充当，其次在美籍华人、香港、新加坡等地招募，不足时才从台湾招募。

其实，在战场上还有一支**华侨反共军**，最少有 7、800 人，他们这些具有双语人士，被韩军用在空降、敌后破坏、搜集情报等特殊战场上。也许韩国很珍惜使用他们，不让美军知道，才没有在管理战俘营中看到他们的身影。



（志愿军战俘生活照）

志愿军战俘在战俘营很自由，他们打球、自编自演表演戏剧等等，甚至许多战俘搬迁时也不派军队看管。有一个记者参观时，觉得太自由了，他就向美军管理者说，他们跑了怎么办？管理者说，跑了正好，不用遣送了。

最初，**美国政府并不愿意把战俘送往台湾**。1951 年 8 月 27 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称：“压倒一切的考虑，应当是尽快地让所有联合国和韩国俘虏回来。美国的利益要求我们严格地遵守日内瓦公约。” 11 月 15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发出指令：“为了使得全部或者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与韩国战俘返回，或者为了**避免不可接受的拖延**，或者出于防止停战谈判的破裂，如果有必要，**你有权同意全部交换战俘**。”看到了吧？美国人非常在乎自己的利益，他们甚至想出卖志愿军战俘、想出卖人类最伟大的抗共事业！谈判双方立场接近，按照日内瓦公约遣返战俘，似乎顺理成章。



（反共义士“解释”后走出中立区）

《凤凰周刊》在某期刊登的系列文章中，有一篇是对美军招聘的台湾文职人员黄天才的回忆采访记。作为来自台湾的美军翻译兼审讯员，黄天才说，当他们得知好多志愿军战俘提出要去台湾，他们认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第一，台湾没有参加这次战争，接受战俘没有道理；第二，台湾哪能承受得起这个负担？所以，“我们听到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时，都劝他们打消这个念头，去台湾不现实，也不可能。”事实也是如此。台湾虽然一直密切关注韩战，但最初真没有接受战俘的想法。1949 年突然间有二百万军民涌到台湾，当时岛内经济也很困难，已经不堪负荷。直至后来志愿军战俘中发生多起刺血上书要求去台湾事件，这个问题才受到重视。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在**国际上赢得政治和道德斗争**胜利的大好机会，于是通过外交途径介入的力度越来越大。

黄天才指出，美国人那套程序复杂的“自由遣返”，就连战俘也不理解。而美军与志愿军战俘交流时，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人回大陆，以便给停战谈判、交换美军战俘创造良好气氛，结果到后来，许多战俘甚至不信任美国人，认为这是想方设法哄他们回大陆去。这就造成了韩国和台湾有许多人抨击美国人准备牺牲战俘，“谄媚中共”；而北京和莫斯科又指责“美蒋李”勾结起来挟持战俘。这实在是两大阵营意识形态有趣的一次大碰撞。

志愿军战俘大部份坚决不肯回大陆，**战俘集体跪求联合国译员**，自动组织“反共抗俄同盟会”，并在身上刺“**反共抗俄**”等字样（注 12）。不久，中华民国政府宣称愿意接收反共战俘，并**引导国际舆论给美国施压**，战俘们的决心，传遍世界。并未直接参战的中华民国，却有效地控制了停战谈判议程。在舆论压力下，美国立场软化，1952 年 1 月 15 日美国参联会重新发给李奇微的指令：“作为最后的立场，你获得授权同意全部交换战俘，但是**不能使用武力**强制遣返。”（讲鬼话，用武力都不能全部遣返不用武力如何做到？一旦宣布全部遣返，志愿军反共战俘必然大面积自杀。闹到这个份上，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自杀中共会当成烈士，远比回去被辱后再杀并连累亲人强百倍，参考最后回去后不见踪影的 440 人）。

前有中苏强硬要求按日内瓦公约遣返全部战俘，后有中华民国不断制造舆论压力，**夹缝中的美国政府**，只得在两种立场间不断摇摆、反复辩论。美国政府急

于甩脱战俘包袱。国际舆论的压力，使美国再次改变了的立场，从同意全部回大陆到同意中共提出的让步方案——**80%回大陆**。

1952年初，中朝勉强同意对战俘进行甄别，4月8日开始甄别。为了降低中共的抗拒而早日实现和平，**联合国军鼓励战俘回国**，同时设置障碍**刁难反共不归国者**，实际是帮助中共把尽可能多的战俘弄回大陆。甄别就是一场战斗。美国本来不愿意更多的人不回国，甄别时，提出的问题很刁钻，其中有一个是“如果强行把你送回中国怎么办？”只有回答“我就去死、我就暴动”等极端回答时，才能获得送往“自愿遣返”战俘营，像“我会抗议”这种软暴力式回答可能送去“归国战俘营”。所以，送往“归国战俘营”里有些人是想去台湾的，只是当时回答不激烈而已。



（志愿军战俘走出中立区）

甄别结果：72 战俘营要求去台湾的比例超过 90%；86 战俘营将近 80%；70 战俘营选择回国的超过了 85%；71 战俘营几百名战俘**没有经过甄别**，由领导人说了算，全部回大陆；也就是 1 万 4 千名、超过 70%的战俘选择去台湾，回国的只有 6064 人。这个结果不但中方无法接受，也大大出乎美国的预料。

战俘们只是选择求生存的地方，并不是单纯的亲共与反共。如此低贱的要求都未能满足，我不知道联合国与美国用什么标准维持世界的安全？从志愿军战俘之战就可以看到：美国与联合国处处献媚中共，很怕中共不停战，怕得要命。美国人的这种作派，真的不配当世界老大，也难当世界老大，只要中共吓一吓、横一横、赖一赖，他们就把人类卖给中共。蒋中正领导下的中华民国当时虽然弱小，却依然是人类正义事业的最担当者。从这个问题中还可看到：美国人无法理解中共有多邪恶，他们的反共事业需要中国人（中华民国）的引导。

超过 70%战俘不愿回大陆，不但重重打脸了中共及世界共产主义，也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美国政府又经历了一个月激烈的内斗，再度改变立场，再度否定中共的 80%遣返议案，美国总统杜鲁门力排**众议**一锤定音，支持志愿遣返。5 月 7 日，杜鲁门宣布：“强制遣俘与我们在韩国行动的基本道义和人道原则相背。我们不会为了**买一个停战协定**，而置人于被屠宰或者奴役的境地。”美国摇摆不定的战俘立场由此终结。学者指出，这主要是吸取了二战苏联战俘回国的教训。许多苏联战俘不愿意回到苏联，却被送回，结果受到苏联的残酷迫害。杜鲁门是

“力排众议”，有苏联战俘的悲惨遭遇、有国际舆论的压迫，杜鲁门总统还竭力排众议！可见，叫嚣出卖志愿军战俘的人在美国政府中是多么盛行！美国人多糊涂啊！反共战俘好险好难啊！

朝鲜愿意接受美方这一立场早日结束战争，而斯大林与毛泽东不能接受，板门店停战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战争接着打。金日成对彭德怀说：“我们每天牺牲的人数就超过（战俘）不肯回来的人数”。斯大林与苏联是朝鲜战争的大老板，毛泽东与中共是二老板，朝鲜与金日成是小弟说不上话，金从此埋下对中共与苏共的仇恨，后来彻底清算共产党延安派与苏联派。斯大林与毛泽东非常乐观，认为美国人怎么可能为了敌人战俘而继续战争？但是，他们错了，美国人的确为了14000名敌军战俘的自由，牺牲了自己几万名士兵的生命。

战俘遣返问题，联合国谈判代表在全部遣返与自愿遣返之间摆动一段时间之后，最终出于人道定在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自愿遣返上（可以违反公约不能违反人道）。斯大林和毛泽东坚决要求全部战俘回来，不愿停战，战争多打二年多。自由的代价是高昂的，自由世界的人民为争取这一天的到来，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总数大约5万的“敌军”（包括朝军）被俘人员的自由，联合国军浴血奋战多出近两年，付出了十几万官兵伤亡的代价。可以说，共军战俘的“自愿遣返”是用敌军——联合国军军人的生命换来的。这场战俘遣返之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战争。

战争接着打期间，反共战俘营的战俘们自由轻松，而亲共战俘中的战俘恐怖度日，甚至血溅当场，魂漂他国。

选择去台湾的那一万四千多反共志愿军战俘中，有四千四百多人是中共党员或者团员，超过30%。一般说来，只有中共一些被称为“特别能战斗”的“坚强集体”才有如此高的党团员比例，谁能料到他们竟是最坚强的反共集体？这帮反共战俘，他们继续升中华民国的国旗，过中华民国的节日，继续篮球拳击，苦中作乐，种菜养猪养狗养牛，生活轻松，甚至可以逃跑。



（狗也获得了自由——去了台湾）

被甄别到归国的红色战俘营，回答不坚决者也被甄别到这营。“71 战俘营几百名战俘没有经过甄别，由领导人说了算，全部回大陆”。这里就有猫腻，或者已经被裹胁。

本来应该官阶高的战俘管理战俘营，但是，在甄别之前，共军的军官们都在自保，不敢公开自己的军官身份，以致管理权落在官阶较小的反共战俘手里，致使战俘营里的反共气氛浓厚。进入亲共战俘营后，原本隐藏起来的亲共军官们马上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平常缩头缩脑的共产党员此时站了出来，担任各种职务，口号是“**带领所有的战俘一起回到中国**”，并下令杀害亲共战俘营中回国意志不坚定者。有的战俘在甄别时可能回答不坚决，所以被甄别到亲共战俘营，他又想到台湾去，这时一旦表露出来，可能会遭到杀害。在这种情形下，**肯定会有不少人被裹胁加大陆**。“共产主义团结会”的头头们，甚至为了攒积回国表功的资历，鼓动暴乱，致使 60 名亲共战俘被杀，96 名受伤。

“共产主义团结会”组织了自己的“地下法庭”和“纠察队”，要求割掉战俘身上的刺字，他们惩罚、严刑拷打、甚至屠杀自己的狱友——不坚定者，不少人被杀。选择回大陆的 6064 名战俘被“共产主义团结会”监视，出工都派人监视，没有机会再表达意愿，最后一步也没有自由选择机会，里面肯定有被裹胁者。美国人本来就不想让更多的人去台湾，当然也没有对首次甄别回大陆的人再次进行甄别。如果有人一开始选择回大陆，后来再想去台湾就不可能了，流露出这种念头就被认为“不坚定”而杀害。有几名“共产主义团结会”的**军官**，由于杀害自己的难友——“不坚定者”而被**美军军事法庭审判**（注 10）。

大陆作家靳大鹰、于劲、胡春生等人都揭露过红色战俘营的红色恐怖。

靳大鹰在其《志愿军战俘纪事》一书的续集《生命只有一次》中对此略有提及：“在战俘营里，告密者是最遭痛恨的。丁先文曾经亲手扼死过一名告密者，南阳珍曾把一名告密者埋在地铺下面，自己上面睡了两个月，曾德金也曾亲用手用棒子打死过告密者……”应该不是告密而是**不坚定者**。战俘林模丛（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的第三期毕业生，他父亲林春华曾经给蒋介石当过十年的秘书。他与父母在台湾的战俘安模元一度被视为可疑的对象，受到暗中监视，一旦发现异常动向，“**随时可以被判处死刑**。”

于劲写了《厄运》、胡春生写了《PW 蔓蔓》。胡春生写的内容与《厄运》有相似之处。胡春生说：“战俘营的情况实际非常复杂，我们看到的都是志愿军战俘如何遭到敌人残酷杀害和战俘如何做斗争的一面，其实**我方战俘营中残杀嫌疑分子的情况更多**，总数大约有 40 多个”。胡春生还表示：“他必须站在客观立场，把红色第八战俘营那些事也说清楚。在这个战俘营里，那些被怀疑**可能告密，或者从铁丝网跑出去的回国动摇分子**，经过‘共产主义团结会’裁决后，**可以秘密处死**。”

这就是中共党组织裹挟战俘的证据。“**我方战俘营中残杀嫌疑分子**总数大约有 40 多个”。哪是多么大的红色恐怖，逼得更多更多的不坚定者隐瞒自己的愿意，这些人被裹挟回大陆。也正因为如此，中共才对 95% 的归国战俘迫害。归根到底是美国人的偏向性“甄别”造成这些恶果。如果归国前对红色战俘营再次甄别，估计最少会有 1000 人从归国队伍中出来，投奔台湾。再如果中华民国也能像中共那样派人“解释”，那么，3000 人可能从亲共队伍中出来。这不是胡猜，金门战役中超过 86% 的战俘留在了台湾，比例比这个还高。

斯大林的死亡，为结束战俘之战带来转机。斯大林的继承者不愿再战，金日成早就不愿再战，毛泽东孤掌难鸣只得同意。最终联合国与中朝双方商定的战俘政策是：“停战后所有愿意回国的战俘立即遣返；不愿回国的战俘则由波兰、捷克、印度、瑞士、瑞典这 5 个中立国看管，战俘所属国家向战俘解释期限为四个月；解释期满后仍不愿回国的，则交由高一政治会议处理。”**中国基本同意了**

联合国关于战俘的全部立场，联合国大胜利了！

联合国军于1952年9月正式把两万二千余名中朝战俘移交给印度监管部队。

对共产党来说，来到中立区“印度村”的这些反共战俘比上面那些逃兵更该枪毙。他们不但投降而且还进行反共活动。依照革命老传统，对于这批人根本用不着多废话，把其中的一部分毙掉，其他人马上就愿意返回祖国了。可是今天在中立区里，这革命传统被废了。共军政工干部们既无铁腕镇压的力量可用，能否把人动员回国就全看其货真价实的“说服教育”功夫了。但他们那糟糕的成绩单向各国证明：共军政工干部们最不能胜任的工作，恰恰就是说服人（注18）。



（志愿军战俘扛着中华民国国旗抬着蒋介石头像走出中立解释区）

在中立国（波兰、捷克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印度心向中国）的帮助下，中共组成了庞大的解释团（**其实是诱逼团**），出台《金日成彭德怀告被俘人员书》，宣称对战俘不追究政策，忽悠了90天，在全世界记者的观战下几十个帐篷同时进行诱逼。

“解释代表”们用超长时间对战俘重复相同意思的话语。是当时“解释帐篷”中多次出现的一景。据现场各方人员回忆，重复“父母等你回家”这个句型的最高记录是三小时。那天有三个志愿军解释代表在场。中共好像是在用催眠术。他们对着一个战俘，或“独白”或“二重白”或三人“合白”，反反复复就是这几句话。数小时的煎熬，使接受“解释”的战俘渗出了鼻血。单调顽固的语音使不懂中文的“中立国代表”们也疲劳不堪。捷克与波兰代表打起了瞌睡。后来，在场的联合国军观察代表，美军上尉劳伦斯·菲尼根终无法忍受跳起来用汉语破口大骂：混蛋！这样不行！虽然菲尼根的行为违规，但主持“解释”的印度主席听完菲尼根的申辩后却表示赞同他的意见。他下令中止了“解释”。这位战俘的磨难方告结束。

作为志愿军里的政工干部，这些解释代表们早已熟知志愿军官兵们怀乡思亲的情感。他们过去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压制和批判这种情感，以防止官兵们因思念家人而影响士气。他们曾反复教育官兵们要“放下家庭包袱”、“抵制资产阶

级个人主义”、“抛弃反动封建的仁义孝道”等。然而今天他们的态度都转了一个180度的弯，比任何人都需要这些“反动封建的仁义孝道”。他们只恐“个人主义的家庭包袱”不够沉重，“反动的封建孝道”不够威严。他们不厌其烦地帮助战俘们想念父母家人，巴不得对父母的思念愧疚之情早点压垮战俘们抗拒遣返的意志（注18）。

每一场诱逼，都是五六个志愿军军官围着单个战俘用尽父母亲情等等中共一直批判的“反动的封建孝道”手段及可能想到的其它手段，欲攻垮战俘。对单个战俘诱逼时间最短的为七十五分钟，最长的竟达到一百五十三分钟。

中共的诱逼团，也经常被战俘骂得狗头喷血、羞愧不已，但因有印度武装人员持枪在旁负责保安，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伤害解释代表（可怜到这种程度），就算如此，参与解释的139师政委贺明日记里记载，仅10月17日一天，就发生了22起打伤解释代表的事件。印度为了不让中共代表被战俘们集体耻辱，在接收人数多的战俘时，故意把中共代表藏起来（当事代表的回忆，注13）。可见战俘们对中共怨恨之深。最后无计可施的中共施了“美人计”，找漂亮的女人过来，当场甚至说出“只要你回国，愿意和你组成家庭”一类话语，战俘们趁机高喊“要蓝苹姐姐”等手段污辱。

美方希望黄天才他们作为观察员在旁倾听，如有不妥便马上抗议。“比如说，按规定应该这样问战俘，你想去台湾，就从这个门出去，想回大陆，就在那个门出去。但中共干部会说，你愿意当卖国贼，背井离乡，永远见不到亲人的话，就从这个门出去……所以美国人希望我们在场制止这种言论。”不过，黄天才他们未被允许进入讲解现场。

解释失败，中共继续加强宣传攻势，每天在中立区外通过高音喇叭向战俘播放广播，主要是强调对战俘们在战俘营中的各种表现表示理解，回国后既往不咎。中共总共不厌其烦地忽悠90天之久，真有“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的势头，就差声泪俱下集体跪求了，还被战俘们的极度污辱，中共解释团不但遭人厌，也受人怜。从解释团的结果中我终于明白了枉作小人这个成语的意义了。估计解释团的团员们想死的心都有了，不知他们如何向后代述说这段历史？

“解释四个月”，实际是90天就没人再听，就不了了之。可见，联合国的战俘政策是多么有利于中国与朝鲜。这就是大陆常说的“国民党裹胁战俘去台湾”，凤凰网上还配有照片呢，真是胡说八道。经过中共90天忽悠的14000多名战俘（注11），最后一步是个人自由选择进入中国的一边还是联军的一边，即使前面存在裹胁，到这一步任何人都无法裹胁，所以去台湾的战俘不存在裹胁。



（志愿军战俘扛着中华民国国旗抬着蒋介石头像走出中立解释区）

中共最终也只能从那 14000 人中忽悠 440 人回国，多数是中共安插的特务及一时糊涂之人，结果这 440 人一踏上大陆，在人间蒸发，从此再无音信。可能是被灭了（中共连自己的特务都杀），因为中共知道这些人的心里并不想回国，是被用亲情骗回来的。其他回国战俘下场也非常惨，在中共的字眼里，战俘与叛徒相同，每次运动少不了让他们运动运动。

中共争取了“解释四个月”的政策，说明中共很无知与狂妄，还以为利用亲情等手段就能骗战俘回国，不但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反而是中共的解释代表们受尽战俘们的污辱，仅 90 天就草草收场。中共自己愚蠢相信马列主义，却以为世界人民也与它那样愚蠢而相信马列主义，实在是愚蠢加愚蠢。这个“解释”政策，实际只起到了洗刷了美军“裹胁”战俘的谣言。



（志愿军的少年战俘有 150-200 人）

大部分女战俘去了台湾，只有 1 名回到大陆。选择回大陆的 6064 人中许多是被裹胁的，而去台湾的 14000 人是没有被裹胁的。中共也正是知道了这一点，才导致回国战俘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遭到中共当局不同程度的迫害，就是因为中共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本不愿回国，只是战俘营中的共产党组织威胁欺骗成功地控制了他们。他们回了国，厄运从此临头。更有一千多位归国战俘（包括最后的 440 人）一踏入大陆再无音信，可能已被中共秘密处决。中共最恨的是去了台湾的战俘，中共一直高喊解放台湾、统一台湾，一旦中共拿下了台湾，那批去了台湾的战俘估计都得死无藏身之地。

在去台湾的战俘中，还有当初被安插在反共战俘营中执行潜伏的亲共战俘，其中有 609 人自首，承认自己是匪谍。可见，中共阴险得很。就这样，去台战俘也没有受到国民党的普遍歧视。在解释区控告美军的、并主动投奔共军的 440 名战俘，应该都是中共的卧底，在这个全世界都注目的舞台上为中共卖力地表演，以博得中共的不歧视。609+440=1049 人，中共在反共战俘营中差不多安插了 1/13 的匪谍，中共真邪。



（去台湾兴高采烈的志愿军战俘——在他们的脸上能看到裹挟的味道吗？）

（https://pic4.zhimg.com/80/0b45c8230e29e281531e3a0970e2a355_hd.jpg）

真正裹胁战俘的是共产党及其信徒。共产党要实现的共产主义，也不是共产党人自己搞共产主义，而是裹胁天下百姓进行的，可见共产主义理论就是裹胁理论，共产党的行为就是裹胁行为，最可恶的就是这一条。觉得共产主义好，党人

们去找个小岛自己搞就行了，又没有人反对他们的选择，凭什么强迫天下百姓落入共产党人的选择？共产党人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裹胁（说是代表什么的），却诬赖别人裹胁。到现在，大陆还在宣传国民党“裹胁”志愿军战俘去台湾，说只有3000人想去台湾。中共怎么那么无耻？其实，只要联合国军稍为公正一点，并禁止“共产主义团结会”，且允许国民党像中共那样派人到选择回国的战俘营中几个人围着1人解释90天，我估计回大陆的战俘不会超过3000人，如果联合国军偏向反共战俘，或者接受他们加入联合国军对中共作战，那么选择回大陆的战俘可能更少。



（韩国民众在仁川欢送反共义士）

1954年1月23日，伤病战俘到达台湾，同日，美军正式把14220志愿军战俘正式移交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在台北举行庆祝集会，这一天因此定为“123自由日”。14220人，加上大约500人为盟军作情报员从战俘中除名，加上在韩国越狱早被送到台湾的65人，超过70%战俘坚决反共。蒋介石对他们非常好，把他们当成反共义士的典范，开始他们在军中服役，退役后蒋介石建了退役军人最漂亮的家——“忠义山庄”给他们住，后来他们融入了台湾社会。



（反共义士抵达基隆 举着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像走出港口）

志愿军战俘反共义士们的伟大行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亮丽的图画，为世界倾

废的反共阵营打了一针**强心剂**，让迷茫的世人信心大增，向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黑暗世界撒下了光明，在世界范围内抵御了马列主义瘟疫的疯狂传染，拯救人类于无形之中！



（台湾人民欢迎志愿军战俘）

（欢迎人群中美女比蓝苹漂亮多了，难怪中共的美人计不起作用——哈哈）

选择回国的战俘有 1064 人回国当时即下落不明。联合国军和印度监管军正式移交给中方的志愿军战俘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甄别时就选择归国的，共计 6670 人。第二类是在解释时选择了归国者，计有 440 人。两类合计 7110 人。而根据贺明所著的《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一书所提供的资料，由昌图志愿军归国人员管理处（归管处）正式处理结论的志愿军战俘总共只有 6064 人。那么还剩下 1046 人去哪里？莫非杀了不成？



（义士军队在台湾游行—义士兴高采烈意气风发）

1988 年，台湾开放老兵回乡探亲。那些去了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也纷纷回到家乡看望亲人、看望战友。家乡亲人们把他们当成状元回村式的欢迎，此时的他们，个个衣着光鲜，多数甚至腰缠万贯，让家乡的乡亲们羡慕不已，也让那些选择回国的志愿军战俘们懊悔不已。

把志愿军战俘争自由的事迹拍成电影，就叫《奔向自由》，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电影，什么敦克尔克与它无法相比，它将震撼所有人的心灵，也会将中共厚厚的黑幕凿开一个巨大的孔，向大陆人民洒向光明。



（欢迎反共义士的人 人山人海）

比较一下金门战役的战俘，就知道志愿军战俘的选择并不意外。

1949 年 10 月，金门战役中共惨败，共军参战 9 千余人，战死 2 千人，被俘 7 千人，78%被俘，共军如此不堪打。国军对这些战俘很和平，带他们到台湾教育，对于有意捣乱者，也只是警告**不捣乱就可以送回大陆**（注 5）。国民党把**军官**和不肯留在台湾的共**915 名**战俘送回大陆。超过**86%的人**留在台湾，比志愿军战俘去台比例还高。**军官中还有人想留在台湾而不得**，因为是共军官军，台湾不想留下来造成管理的麻烦，那些**回去后立即被枪毙的军官肯定想留在台湾**，实际想回大陆的肯定少于 915 人。也许正是看到金门战役中战俘回大陆后被杀，中华民国政府出于人道，才主动要求收留朝鲜战争志愿军战俘。金门战役之时正是中共如日中天、台湾朝不保夕之时，又是中共最纯正的共军部队打的仗，还有那么多共军战俘想留台湾。可见，志愿军超过 70%的战俘选择去台湾，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是有相当一部分被“共产主义团结会”裹胁回大陆了。



（台湾民众英雄般欢迎志愿军战俘）

当时，如果国民党也能派人对志愿军战俘像金门战俘那样教育，那么去台湾的人会更多，因为中共在朝鲜战争中的非正义性、惨败、伤亡率和无理智性指挥都比金门战役更高，战俘会更恨中共，仅“抗联合国援朝、支持侵略者、当侵略者”这一条，就可以让被儒家“仁义”理念熏陶几千年的中国人反叛；如果再把中共兵围长春饿死 30 万百姓一事（四野人人皆知）大肆宣染，可以煽动起更多的人对中共的仇恨；再告诉战俘，分田到户的土改是欺骗，因为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是公有制，而分田到户是“反动”的私有制，很快会把田地收回（苏联早就收回）；再把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黑历史，抗战时中共在延安种鸦片历史，说一说，会有更多战俘反叛。二战中，苏联战俘很多反过来协助德国军队打苏共，他们要消灭苏维埃。**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其实很虚弱**、很见不得光，一捅就破，中共的历史更是黑暗无比，暴露一点中共就必死无疑。中共不给人民出版自由、封锁互联网，就是因为这回事。**美国不让中华民国派兵参加朝鲜战争，本来就是不敢招惹中共、巴结中共的软弱行为**。美国这种软弱心态（战俘政策是被逼的），才使得中共没有更大惨败。

如果现在再来一次抗美援朝，中国军人的投降率更高，这回百分之百争取自愿遣返，估计多数争取去美国。这是最低廉的移民，比偷渡更安全、快捷和便宜。中共还会继续制造“裹胁”谣言。所以，中共这次即使看到金三胖被剥皮抽油，也不可能再“抗美援朝”。如果中共愚蠢到再次抗美援朝，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中国人为争取志愿军的名额打得不可开交，于是中央出台政策：处级干部家庭有一个志愿军名额，司局级干部有二个，中央政治局级有八个。炒志愿军名额热过当年炒股票。最后全部由干部子弟们组成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地去朝鲜，接着投降，成了几百万干部子女移民美国的最佳途径。



（反共义士到达基隆 兴高采烈）

共军战俘回到共军的地盘受到歧视迫害甚至屠杀，而留在台湾并没受到歧视。金门战俘不少人在国军中服役，共军最高指挥官 253 团政委陈利华使用化名（可能是怕被送回大陆）在国军中服役，后来升至政战总局上校，1981 年才发现。可见国军对他们多宽松！而被送回大陆的战俘，不少人被直接枪毙（主要是党员与干部）（注 2）。915 人中只有一人保留党籍、一人保留军籍。对这批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国民党都不肯杀他们，费尽周折把他们送回共产党的地盘（枪毙比送回大陆省劲得多），共产党却把他们杀了。现在大陆有的历史论坛上说，是国民党想借刀杀人才送他们回大陆的。说这话的人真无耻。台湾与大陆没有直接联系，送回大陆很曲折，杀掉他们远比辛辛苦苦送回去方便得多，何必多此一举，何必借刀杀人，**直接咔嚓不更爽快吗？**可见，没有金睛火眼，大陆写的历史没法看，净是谎言与瞎编。陈利华如果被送回到大陆，很可能早就在被屠杀之列，他用化名藏在台湾，已经多活很多年了，可悲的是他还贼心不死，收集国军情报想送往大陆。如果他后来公开自己的身份，请求宽恕，就不会悲剧了。

杀自己人的战俘，也是共产党才能干得出来。金门回国战俘被杀被整时，肯定后悔没能留在台湾。后来，当年留台湾未归、加入了国军的金门战俘，以“老兵返乡”回到大陆，在大陆受到贵宾式接待；而不愿留存台湾，冒死回归的战俘，却早已受到严厉制裁，有的坟墓上长成大树了！其荒唐可见一斑。

从这一点上看，国民党怎么可能从朝鲜“裹胁”战俘去台湾呢？联合国能听国民党的？战俘最后是在中立国的主持下自己自由选择的，难道是中立国裹胁的？看到这些战俘的坚定决心（刺字），也增强台湾人民的反共信心，因为台湾的人口密度本来就高，战俘里可能还夹杂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收留他们还是有风险的。联合国站在了人道主义立场，做法没有错。

超过 70% 战俘坚决去台湾，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脸面扫地，泄露了共产主义在共军心目中的地位，暴露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弱，增强了蒋介石和世界上反共阵线的信心，使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在世界上遇到巨大阻力。志愿军反共战俘的这一点作用不可小觑，他们真的是英雄。

超过 70% 战俘冲破各种利诱与威迫，冲破共产党的牢笼，坚决去台湾，这才是真正中国人的意愿与选择，也只有我们这个仁义且无畏的民族才能做得到，直

至今日都是。如果再把中共的历史与理论翻开细嚼，会有更多的人抛弃中共，这才是真正中国人的意愿与选择。

也正是因为早就看到这一点，中苏（不包括朝鲜）才花巨大的努力要把他们弄回去，不惜多打二年、甚至更长时间，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斯大林没挺住，斯大林的继任者又没那么黑，老毛孤掌难鸣，只好认栽，全部同意美国的谈判条件——战俘自由遣返。

中共经常教育人民的一句话叫做“新旧社会两重天”。以台海两岸志愿军战俘截然不同的命运来验证，确实有道理。归国志愿军战俘的遭遇活生生地警告一切有心投奔自由的人们：如果你打算反叛共产党，那就得背水而战一反到底。绝不能考虑回头。绝不能对共产党再存一丝幻想。共产邪教政权没有一丝信义，没有一丝宽容。任何寄希望于中共良心发现的妥协迁就行为都只能招致更加惨烈的伤害和更加深重的屈辱（注 18）。

本节注释：

注 2：金门战役解放军战俘归宿：部分归乡士兵遭枪决——《快乐老人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08/28/17145314_0.shtml

<http://view.news.qq.com/a/20120913/000041.htm>

金门战役解放军战俘回大陆境遇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628/07/30542790_571289203.shtml

注 5：金门战役幸存者---真相三《我的战俘经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03ebe5a0102uy97.html

注 10：志愿军战俘为何去台湾

<http://view.news.qq.com/zt2012/zyjzf/index.htm>

注 11：在自由的意愿下，志愿军战俘的选择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908/08/34748_234947980.shtml

注 12：1954 年 14000 名志愿军战俘去台湾的真相

<https://news.qq.com/a/20120427/000617.htm>

注 13：抗美援朝的被俘的中国人民军士兵不愿意回国的真实内幕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605/07/18247_539269.shtml

《红色滑铁卢》

<http://m1.aboluowang.com/uploadfile/2018/0617/20180617115008255.jpg>

一只狗也去了台湾——奔向自由的狗。

注 18：穆正新：志愿军战俘系列之一——红色滑铁卢

注 19：解密时刻-志愿军战俘第一至五集

十六、蒋介石放弃大陆的战争赔款

中共与周恩来经常说，蒋介石放弃了大陆的战争赔款！

其实，蒋介石没有放弃大陆人民的战争赔款，是中共放弃了大陆人民的战争赔款。

1952 年，中华民国与日本国签订的《中华民国与日本国和平条约》是台湾与澎湖列岛的和平条约，不涉及大陆，中华民国没有放弃大陆的战争赔款。其第一〇条如下：

“第一〇条 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

条约只是台湾与澎湖的条约。国民政府因为对大陆没有管辖权，无法而且无权代表大陆。而日本人在台湾并没有毁坏多少财产，且日本人在台湾的财产是巨大的，蒋总统认为“日本过去在台、澎的财产都是‘中国民众的血汗结晶’”，将日本及其国民在台澎之财产扣下。

蒋介石签订的台澎条约并不吃亏，而是日本吃亏。日本对这一和约非常不满，日本国会坚决不通过，甚至不惜和谈破裂相要挟，在美国的强力压迫下，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几个小时，日本国会才被迫通过。日本国会如果不通过这个《中华民国与日本国和平条约》，日本和中国的战争状态就无法结束，日本将被踢出国际社会之外，连主权国的地位都无法获得，更加会受到美国的全方面刁难，日本国的前途将步履维艰。两害相权选其轻，日本人不得已而通过。

而 1972 年，中共与日本签订的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中日联合声明》，宣布放弃战争赔款，日本议会快速地全票通过！从日本议会的这个动作，就知道什么样的条约对日本最有利？谁是卖国者？中共放弃战争赔款而日本没有任何补偿。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本人有专述。请看《金剑：两岸统一该用什么国号》中的“第五章、沿用民国国号能追回战争赔偿”，中的“中共放弃日本战争赔偿最少 6000 亿美金”与“秦桧卖国有这么大吗？”，最少请看这二节，这二节九千多字。

中共放弃大陆人民的战争赔款，这是卖国行为。

十七、一穷二白与万恶的旧社会

中共污蔑中华民国是万恶的旧社会，其实中共国的毛泽东年代才是一穷二白与万恶的旧社会。

中国人在中华民国时代，可以自由，可以有言论自由、财产自由、迁徙自由等等，所有自由人的自由中华民国国民都有。特别是出版自由，那是自由民的标志，那是知识分子与精英们的终身追求。中华民国的各种自由，创立了中华民国的辉煌，那时，人才辈出、大师辈出。看看，中国近代的人才集中出现在什么时期？就是中华民国时期，甚至是战火连连的抗战时期及其前后的内战时期，连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是当时培养出来的。当时，中国的经济也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华民国各方面的辉煌，为中华民族赢得卫国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人才基础、精神基础等等基础。

中共夺政后，中国人失去了所有的自由，成为了中共不折不扣的奴隶。

中共夺政后，中国人不但失去了自由，经济生活也是巨大的倒退，人民被中共剥削及洗脑，变成又穷又蠢又仇恨的不良人。

中共上台后，抢劫所有的企业都变成公有制，极端耽误了中国的发展。

1949 年中共上台时，中共国的 GDP 占世界 8%，到毛死的时候，中共国的 GDP 只占世界的 4%，相当于全世界人民平均赚 6 元时，中共国人才赚 1 元。

到毛死前的几年，中共国百姓的生活异常艰难，所有的物品都要票，粮食的黑市价高得惊人（没有普通市场）。普通干部退休前的工资是 50 元/月左右，在黑市上只能买到 50 斤左右的谷子。工人的收入比干部还低，农民更低。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农民一天的工分（劳动报酬）才 0.1 元左右，一年能吃几次肉就不错了，这个时候才是真正“万恶的旧社会”。1925 年 1 月毛泽东刘少奇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罢工前，煤矿井下工人薪资每日最高可达 1 元

（大洋），当时 1 元可以购买 150 斤谷子，罢工后不但增加薪资还缩减工作时间至 4 个小时/天甚至更少。50 年前安源煤矿井下工人的日收入竟是毛泽东年代普通干部月收入的 3 倍，在科技进步无数倍的 50 年之后，竟然如此，谁更剥削？谁更是万恶的旧社会？1971 年中共国外汇储备净值为 0.37 亿美元，中共国贫穷到一种可怕的程度。

1932 年时，广州的中学教师最高月工资可达 562.5 元大洋，相当于现在的 5、6 万人民币，当时可购买黄金 211.8 克，如果按照现在的金价，那就超过 10 万人民币。这是现在中共国大学教授都远远无法达到的水平。谁更幸福，生活在中华民国的国民更加幸福，生活在中共国的人民更加痛苦。

即使到毛死 4 年后的 1980 年，也就是改革开放 2 年之后，美国的人均收入依然是中共国人的 282 倍，甚至更高。

现在，台湾人还记得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厕所没门。那是真的，只是记错了时间。毛泽东年代，多数百姓吃不起茶叶蛋、厕所没门。当时，大陆人民连酱油都吃不起，豆腐乳论块买、香烟论支买，怎么可能吃得起茶叶蛋？多数人一辈子都没见过、闻所未闻过茶叶蛋，本人也是在毛泽东死后才听说过、才吃过茶叶蛋，许多百姓甚至连盐都吃不起，饭都吃不饱。中国人如此聪明，却被毛与中共搞成这个样，可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多么的可怕、可恶！什么都要票。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是真正“一穷二白与万恶的旧社会”，“文化大革命才是最最万恶的旧社会”，这还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写照，与奴隶差不多了。而黑五

类就是贱民，连奴隶都不如，甚至猪狗不如，只是随时被羞辱与杀戮的会喘气的生物，是为恐吓其他奴隶的待宰人牲。

中华民国不是万恶的旧社会，而是伟大的中国。

中华民国具有十大荣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中日战争战胜国，联合国四大发起国，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亚洲及中国 2000 年历史中第一个共和国（共和制之国），亚洲及中国 3000 年历史中第一个民国，废除中国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之国，把台湾从黑暗的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救出来，守住并建设台湾为民主基地免遭马列病毒的茶毒。

中共推翻并污蔑伟大的中华民国，真是罪该万死！

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为什么都从经济失败走到全面失败？因为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违背人类发展方向的，它们必然失败，早死早解脱。

中共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能获得成功？因为改革开放不是改革而是复辟，在经济道路上复辟蒋介石道路，也就是孙中山道路，在文化上复辟中华文化。这个事大陆人民早就知道，就是不说破，以免邪乎乎、猥乎乎的马列党徒阻挠及破坏。当时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半酸半甜地喊：“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明白的人在感叹与高歌！中华民国的蒋介石道路在台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 1951 年到 1987 年，人均所得足足长了 100 倍，半导体等硬件行业至今还屹立在世界的最高峰。中共看到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成功，所以中共就抄中华民国的作业，抄蒋介石的作业，这就是经济复辟。而蒋介石道路就是孙中山道路，而这种道路正是中共所污蔑所诽谤的道路，中共不得不走。另外，在全国人民的逼迫下，中共不得不从批判、消灭“孔孟之道”与中华文化，走回到歌颂“孔孟之道”，中共不得不复辟中华文化，这就是文化复辟。

改革开放能获得成就，就是因为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文化上复辟中华文化，在经济道路上复辟蒋介石道路，政治上坚持马列主义。改革开放就是部分否定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摸着孙中山过河，摸着蒋介石过河，摸着中华民国过河。

十八、翻身作主人

中共说，它解放了中国人民，人民翻身作了主人。其实是翻身作了奴隶。

中华民国时代的中国人才是国家的主人，毛泽东年代的中国人民，是被剥夺言论权、财产权、信仰权、信息权等等权的奴隶，而且是极其贫穷的奴隶。毛泽东年代的普通中国人是奴隶，还是为保卫毛泽东及共产党且满怀仇恨准备杀戮四方的机器人。而黑五类就是贱民，连奴隶都不如，甚至猪狗不如，只是随时被羞辱与杀戮的会喘气的生物，是为恐吓其他奴隶的待宰人牲。

真不知道中共要无耻到什么程度才能造出这等无耻的谎言。

最悲惨的是中国农民，本来还是自由之身，有行动自由、有择业自由、有迁徙自由等等自由。中共夺政后，农民就被变成二等公民，被中共户籍制度限制在土地上，当兵、当工人、上大学、进城市都没有份，连去个县城都要公社证明，多少人一辈子被束缚在土地上，多少人因为农民身份，被棒打鸳鸯，上演了一出人间悲剧。农业户口比无地的非农业户口惨得多。

后来人无法想像当时农村户口的二等公民身份的悲惨状况，农民看不到一点点希望。2021年10月，一位网红博主讲述了她自己的悲惨身世：在毛时代后期，她的母亲由于出身原因（出身不好），被定为农村户口，她的父亲是城镇户口；根据中共的政策，四个孩子都跟随母亲的户籍成为农村户口。母亲为了孩子的户口，多次与管理官员交涉无果。母亲在交涉中知道，如果她不在了，她的孩子就会随父亲成为城镇户口，于是，这个伟大的母亲就自杀了，为了孩子的户口而自杀。苛政猛于虎。让我们永远记住牺牲在中共邪教奴隶制暴政下的人们！永远记住中共统治下中华民族的斑斑血泪。

中共用了虚假的一招，表面上从地主手里夺得土地分给农民，很快又从农民的手里夺走土地，从此中国农民虽未上无片瓦，却已经下无寸土。要知道，中国的人均耕地很少，农民被限制在土地上之后，无异于断绝了农民的一切发达机会，又由于集体所有制，导致懒惰成风，中共还用高额的农业税压榨农民，贫穷愚昧成为农民的另一个名字，农民一辈子在饥饿线上挣扎。毛泽东让农民贫穷，贫穷让农民看不到希望。至今，中国农民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就是毛泽东年代的城乡户籍政策余留的恶果。中共夺江山的道路号称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民是中共的恩公，中共就是这样对待恩公的，中共还骗农民对它歌功颂德。强盗做了坏事，不会让受害者对它歌功颂德，只有邪教做了坏事还欺骗受害者对它歌功颂德，这是邪教的特征与本质。这里再次证明：中共是邪教！

十九、民众支持中共？——77%民众坚决远离中共

中共是用枪杆子夺取的江山，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中共的用枪杆子夺江山的手里面也有日寇的手。既然是用枪杆子，就与“得民心”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是相反关系。

在许多地方，当中共白天把地主的农具分给农民，晚上农民就把农具送回给地主；同村人不斗同村的地主，中共就调外村人来斗。如果有剥削，地主会先剥削同村人，与外村人关系不大？为什么同村人不斗地主？可见，当时农民并不相信中共鼓吹的剥削理论，也不支持中共搞的阶级斗争，马列主义与阶级斗争是中共强加给中国人民的。

淮海战役初期有 75%的民工选择逃亡、朝鲜战争中超过 70%战俘选择坚决去台湾远离中共、金门战役中超过 86%的战俘选择坚决留在台湾远离中共，这才是真正的民心， $(75\%+70\%+86\%)/3=77\%$ ，就是说，77%的中国人选择远离中共，这是有机会选择的民众做出的选择。留在中共那里的民众只有 23%，这 23%的民众中有很多是亲人难离、故土难离的缘故，除开这个缘故，真心跟中共跑的民众更是很少很少。就如抗日战争中，沦陷区也有很多民众，这些民众不是真心跟日寇跑，而是离不开故土。中共得到 23%的民众也是这个原因，中共说“民众支持中共”，那是天大的谎言！

淮海战役初期只有 25%民工不逃亡，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来说，这是何等的反抗？而且是在中共最信赖的支前民工中才有这个比例值，在普通市民农民中，估计还达不到 10%。如果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占人数的 90%，10%远远没达到一半，只有 1/9，中共号称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奋斗，却远远未得到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心！

朝鲜战争中超过 70%战俘坚决选择去台湾远离中共，不到 30%回大陆，是中共在极度忽悠之下才拿到这个近 30%回国的成果。志愿军战俘中的中共党团员比例达到 1/3，可见，有许多共产党党团员背叛了中共、选择远离中共。

金门战役中超过 86%战俘坚决选择留台湾远离中共，这才是真正共军的军心——远离中共，是在中共最信赖的共军中、在中共党员团员密度极高的共军队伍中才得到这个成果： $1-86\%=14\%$ ，中共只得到 14%的军心，远远达不到共军中中共党员团员的比例。而且有许多共军营团级干部要求留在台湾而不被国民党当局允许，可见，选择留在台湾的人超过 86%，中共得到的军心不到 14%。这些共军中营团级干部被送回大陆后，很多很快就被中共枪毙，中共反过来污蔑国民党借刀杀人。如果国民党要杀他们，直接推到海里就行了，何必用船把他们送回大陆呢？多麻烦啊？可见，中共处处谎言。国民党如果知道他们回来后会被杀，都不一定会送他们回来。

超过 86%的民众想远离中共，这才是民众真实的想法。看看中共夺政时，大陆民众争先恐后地逃往香港、逃往台湾、逃往外国，就知道我所言不虚！这还是在毛泽东的恶政没有施行之前的想法，在毛泽东的恶政之后，想脱离中共的人就更多。看看大饥荒时那么多人冒着死亡的威胁也要投奔香港，看看文化大革命之时，那么多人冒着死亡的威胁也要投奔香港，就知道，我说的没错。



（毛泽东年代大陆民众大逃港潮）

超过 86%的民众选择远离中共！多数民众是没有选择的机会。

可见，中共根本就没有得到中国人的民心。中共裹胁了中国人民。



（香港民众往被遣返大陆的难民车中掷面包饼干）

大量大陆逃港民众被香港当局遣返，香港民众无法阻挡香港当局的遣返恶政，他们又心痛大陆同胞的贫穷，往难民车中掷面包与饼干。

革命者对付革命者比反革命对付革命者还要凶狠得多。大革命后，国民党颁行《共产党人自首法》和设立“反省院”。共产党员只要自首忏悔，不但可以活命，还可以恢复正常且自由的生活。从 1933 年秋到 1934 年秋的一年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捕获的共产党员是 4505 人，而自首叛变者则达到 4213 人，“自首叛变率”竟达 95%，他们变回普通人。国民党逼迫共产党人自首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像陈独秀这样不肯自首的匪首也只是坐坐牢而已，而且是那种可以让老婆进

来培睡、可以著书立说漫骂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的那种高级且自由的牢房，且很快释放。国民党对待中共最著名的、祸害最大的首恶陈独秀尚且如此温柔与放纵，对待一般的共产党小喽啰估计更没有太严厉、太压迫。说明，中共高达 95%的“自首叛变率”，是这些自首者他们内心的自由选择。中共很清楚这个事实，所以，中共夺政后，对于这些曾经向国民党自首的人进行了极端迫害。

在《在红军肃反中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萧克将军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赣西南苏区肃清 A B 团时，屠杀 7 万多红军。红二十军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四、五任。红二十五军原有 1.2 万人，43 天的肃反过后只剩下了 6000 人；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 5 万多红军减员为 4000 人，杀得只剩下 5 名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中央苏区肃反累计杀了 10 万红军。国民党在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有这么多。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 15 个县，人口减少 50 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减少 50 万）；中央苏区人口下降 70 万……毛死后的 1983 年，江西有 238844 名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由于被杀的红军太多，红军长征前出发前紧急扩红 8 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

看看这些中共的大屠杀，如果那些被屠杀的人都是中共的真实党徒，中共为什么还要屠杀他们？可见，被杀之人都是会抛弃中共之人。

蔡孝乾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很轻易地背叛了共产党，他领导下的台湾共产党大批大批宣布脱离共产党。

以上所述足以证明，中共所说的“中国人支持中共”是天大的谎言。

1、中共用恐怖裹胁农民车轮滚滚

中共造谣说，中国人民支持了中共，才使它获得江山的。甚至拿出了淮海战役百姓推车子支援前线的事来证明，还拍成《车轮滚滚》欺骗世界。

事实是：淮海战役初期有 75%民工逃亡——推车支持不是自愿的。这才是人民在那种状态下的最大反抗，如果让老百姓自由选择，估计连去作民工都不愿。民工逃亡回去后，那些村干部迫害他们。在中共精致的洗脑和迫害下，不反抗的地主都被枪毙，谁还敢反抗？谁还再敢不去？谁还敢再逃亡？中共兵围长春敢饿死无辜民众 30 万，还在乎多杀几个农民？

淮海战役推车的民工中还有地主。地主不知道国军在为他们打战？难道地主是支持中共对他们的抢劫、迫害和杀戮？不是。不去怎么办？不去，当时丧命村头，子孙皆为贱民！不但得去，还得推得比别人多、推得比别人快！别人逃跑了，地主还得推得飞快。估计那 25%不逃跑的民工都是地主！

我们看到，国军的战俘被迫为日军修工事、被抓的民工为日军修工事，难道也是支持日军？不是，是被绑架的。日本人在缅甸修建了一条铁路，累死了 20 万战俘及民众，难道也是战俘支持日寇、喜欢给日本人修建铁路累死自己的？不是，是被绑架了的！

共军对民工也是绑架和半绑架。中共害人的手段多的是，绑架、欺骗这些老实的农民容易得很。不能以中共提供的历史为依据证明它的结论。

据张戎的《毛泽东一鲜为人知的故事—30》记载：

{

毛毫不留情地利用平民为战争服务。“解放区，大多数青壮年男子被征入中共不断扩大的军队，或当为前线服务的民工。”后者数字尤其巨大，在辽沈战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达一百六十万，二夫一兵。平津战役中的民工数是一百五十万。淮海战役中高达五百四十三万。这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前线修工事、运弹药、抬伤员、送饭菜。农活归留在家里的妇女干，帮她们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残疾人。她们还得照料伤病员，洗补军服，做无穷无尽的军鞋，给军队和民工碾米磨面做饭。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在淮海战役期间农民出的粮达到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斤。（粮食也用来做向国民党军队劝降的心理战武器。一个老兵对作家桑晔讲到他在摄氏零下十度的天气里被困了整整一个月，“连皮带和皮鞋底子都煮了吃”。“过阳历年那天，我在前沿刨出来个冻得硬梆梆的死耗子，连毛都没褪干净，生着就下肚了。多少年来我还是觉得那死耗子好吃极了。”“一到吃饭的钟点解放军那面就开喊：‘小蒋介石们快过来投降吧，我们还有红烧肉，今天刚宰的大肥猪……’当官的把能想出来的办法都使上了，还是挡不住人跑。”）为了提供做饭的燃料，农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军搭的桥、铺的路上有不少农家的房梁。在中共“解放区”，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毛的“人民战争”。

是什么使农民“踊跃支前”？——用毛的话说，“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中共宣传说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没错。但那是什么样的土地改革呢？

毛泽东式土改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共派“工作组”到农村，组织“斗地主”大会。会上对那些相对富有的人家和其他牺牲品打骂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们说起的都是这些记忆，分土地倒成了其次。

.....

毛毫不留情地利用平民为战争服务。“解放区，大多数青壮年男子被征入中共不断扩大的军队，或当为前线服务的民工。”后者数字尤其巨大，在辽沈战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达一百六十万，二夫一兵。平津战役中的民工数是一百五十万。淮海战役中高达五百四十三万。这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前线修工事、运弹药、抬伤员、送饭菜。农活归留在家里的妇女干，帮她们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残疾人。她们还得照料伤病员，洗补军服，做无穷无尽的军鞋，给军队和民工碾米磨面做饭。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在淮海战役期间农民出的粮达到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斤。（粮食也用来做向国民党军队劝降的心理战武器。一个老兵对作家桑晔讲到他在摄氏零下十度的天气里被困了整整一个月，“连皮带和皮鞋底子都煮了吃”。“过阳历年那天，我在前沿刨出来个冻得硬梆梆的死耗子，连毛都没褪干净，生着就下肚了。多少年来我还是觉得那死耗子好吃极了。”“一到吃饭的钟点解放军那面就开喊：‘小蒋介石们快过来投降吧，我们还有红烧肉，今天刚宰的大肥猪……’当官的把能想出来的办法都使上了，还是挡不住人跑。”）为了提供做饭的燃料，农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军搭的桥、铺的路上有不少农家的房梁。在中共“解放区”，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毛的“人民战争”。

是什么使农民“踊跃支前”？——用毛的话说，“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中共宣传说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没错。但那是什么样的土地改革呢？

毛泽东式土改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共派“工作组”到农村，组织“斗地主”大会。会上对那些相对富有的人家和其他牺牲品打骂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们说起的都是这些记忆，分土地倒成了其次。

为了让“工作组”的干部们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办，一九四七年三月到六月，

毛派专门整人的康生到晋西北的郝家坡去创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斗争大会后，康生对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指着鼻子骂。”“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要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要死人，但死也不怕。”“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康生指示把整家人作为斗争对象。斗争大会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着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剥下衣服，被厕所里舀来的粪淋在头上。孩子们被别的孩子唤作“小地主”，打得头破血流。康生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地主”这顶帽子可以戴在任何人头上。郝家坡早已在共产党统治下多年，富人地也卖了，人也穷了，按中共《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里就找不到地主了。没有斗争对象怎么行呢？康生规定群众不喜欢的人可以作为斗争对象，于是村民们嫉妒怨恨的人、通奸的人便成了靶子。

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干部们的教科书。和彭德怀一道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说：“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我看见的一个村子里，四根绳子一齐吊了四个人。”其中一个女的，“丈夫死了，女的那时都是小脚，在田里做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请个长工进来。他们问她粮食藏在哪儿，为什么房里粮食不多。我知道她家并没有很多的地，没多少粮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他们把她的上衣剥掉，她有个吃奶的小孩，奶水往下滴，小孩在地上哭着爬着要舔奶吃……人们都把头低下来不敢看。”“村子里男女老少都要来，连小孩子都要来看，强迫着来。叫你举手，你是不敢不举手的，不举手你也会遭殃。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

周小舟和夫人反对这类做法，但他们接到的指示说这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复仇的正义行为。当时的口号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毛实际上要的是干部们鼓励暴行。周小舟等人被指责为阻碍群众运动，被当作“石头”“搬掉”。

毛对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陕北佳县。根据给他的报告，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淹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毛那年底住在陕北杨家沟时不引人注意地去观看了斗争大会，会上的残忍作法连出身贫雇农的警卫也觉得“过火”，会后他跟警卫们讲到土改中的各种刑罚如“吊、打、拉、磨、杀等”，“有的甚至连小孩子也学习”。

一九四八年初，中共占领地区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都经历了土改。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地主富农”，这意味着仅就这两种人，还不算康生新加上的斗争对象，起码一千六百万人成为受害者。死亡难计其数。

土改的结果，据给毛的报告是“人人都害怕”，“农村极度紧张”。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hackBelden)在河北看到土改后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被消灭。”“在中共地区的农民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

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中共要农民出兵、出夫、出粮、出钱时，他们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山东农民负担决定性的淮海战役。毛嫌那里的土改制造的恐怖气氛不浓，于一九四七年底派康生去搞第二次土改。康生对斗争对象采取“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政策。有一个镇，康生到来前没有什么暴行发生，来了以后一百二十人被打死。有的罪名是“同情地主”，其中两个年仅七岁，被儿童团的一帮孩子折磨死。正是山东的第二次土改为淮海战役

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

毛也利用土改想使中共干部学习残忍，适应残忍。大多数新党员都得下乡参加土改“受锻炼”，其中一个就是毛二十五岁的儿子岸英。

岸英虽然在斯大林的苏联长大，像土改那样的场面他还从未经历过。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毛派他去跟康生当学生，在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组里充作康生妻子的侄儿，化名小曹。不久岸英就充满苦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来到郝家坡不到十天，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问题。”他受到很多批评，说他“思想有右倾的嫌疑”。他睡不着觉，“晚上躺在床上，我左思右想地检讨了一翻（番），难道我的思想真是含有右倾成分吗？”他责怪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味道”，“我还没有无产阶级化”。他感到“无限的痛苦。这种痛苦使我流下了好久没有流过的眼泪。”两个月后岸英给父亲写信说，他“认清了自己所站的无产阶级立场”，“不把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掀起到最高程度是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

但是岸英仍对土改保持了相当的反感，这在他的“工作笔记”里明显反应出来。笔记详细记载别人讲给他听的一次“万人大会”。岸英记道，大会足足开了一个星期，搅得老百姓“小搬家”、“大搬家”：“大会前一天各村各路真是人仰马翻，大车小辆，男女老少扶老携幼……”。开始那天“天气很冷，冻得大家都说：‘今天真要活冻死个人，真是受罪！’”“第三天让各村研究斗争对象，另一方面组织预演斗争。”“第五天进行斗争。指定地点方向”，“让所有群众听到口令将武器（梭镖）举起来，并喊几声杀杀杀。”“一个村把斗争对象打倒在地，宣布胜利时一响炮一擂鼓，其他村也沉不住气了，大家都争先斗争胜利，于是会场更加乱的不可收拾，结果打死八名。”“有一些不是地主也被斗了。第六天召开祝捷大会，选举新村干。大会提拔的积极分子，一部分是流氓地痞伪军狗腿。”“万人大会的结果，许多农民只弄了二斗粮食，这是翻身吗？”

厌恶土改暴行的中共党员纷纷上书反对，中共领导中也有人担心这样搞会使中共失去民心，影响夺权。但对毛来说要夺权就得这样搞，民心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毛只是在恐吓农民的目的达到之后才于一九四八年初制止了暴行。毛清楚党内反对土改暴行的呼声很高，为了保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转嫁党内愤怒的矛头，他装作这些事他都不知道，推出刘少奇作替罪羊。三月六日毛给刘写信说：“请你们加以检讨。”刘开始还想为自己辩护：“我要负责的，但不是说，各处‘左’的偏向错误就是我的主张。”后来他就大包大揽了，对中共高级干部说：土改的责任“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直到毛主席系统地提出批评并规定了纠正办法才得到纠正。”至今中共干部提起土改骂的还是刘少奇。

刘少奇承认错误只限于中共党内，对普通老百姓一句道歉话也没有。身在国统区的人不是不知道土改的暴行，但他们既无力阻挡毛势如破竹的攻势，又对国民党没太多好感，只能是听天由命，尽量朝好处想中共。国民党军官徐枕曾想把土改的真相告诉他家乡宁波的亲戚故旧，他“舌枯唇烂，声嘶力竭地，来一人说一遍”，但“没法劝醒他们的迷梦，反而引起他们的反感”。有的说：“这种话都是国民党宣传，怎能完全相信？”有的说：“现在在武力战争中，这种清算斗争没收私人财产不过只是过渡时期一种手段，将来长治久安了怎会还能如此呢？”还有的说：“抗战沦陷，日寇占领时期，一样过去了，共匪来了总不能说比日寇还要坏。”

}

2、刘少奇是毛泽东的背锅侠

刘少奇为毛泽东背黑锅是常态。刘少奇不但是毛泽东的轿夫，还是毛泽东的打手，什么累活脏活黑活都得他的来干，甚至当毛泽东的挡箭牌，替毛泽东担下所有的罪责。如此看来，刘少奇肯定是有把柄落在毛泽东的手里，否则，这个万人之上的人如何肯卑贱如斯。我看，1937年刘少奇写给张闻天及中央的那封信就是把柄，信中把工人写成“流氓性很重”。

这就是大量民工其中还有地主支援淮海战役的原因。

中共用恐怖驱赶民众，反过来宣传民众支持它，中共真邪。在中共的根据地也是如此，先把地主杀光，说是农民杀的，再恐吓民众“国军回来就会报复他们”，如此控制民众，反过来说是民众支持它，还编成什么《十送红军》等等的优美歌曲，让不知情的人在美好的歌声中不知不觉地相信了中共的谎言。中共的邪术真是无所不用。

中共不但迫害与威吓农民，强加伪造的“得民心”进入他们的头脑；中共也迫害所有的国民，同样强加“得民心”之说。对付国民党也来这一招。中共把中华民国的战俘分成两种，做精致的迫害，继续伪造“得民心”说。

中共对于排长到团长旅长及中华民国政府一般的办事员，就安上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几乎全部杀害，一点活路都不给。共产党用一个概念模糊的“反革命”一词就胡乱杀人，真是个邪教。

中共把师以上的、级别高的高官、反共反得有名望的，就安上战犯的罪名，关在监狱里做所谓的改造，中共把这些高级国民党战俘洗脑洗脑又洗脑，把某些糊涂者洗得更糊涂，通过几十年的洗脑及威逼利诱，的确有人糊涂了，然后就利用他们来对中共歌功颂德，甚至也跟着中共说什么“得民心”之说。但是，还是不少人坚持不转化。

战俘在中共的手里，越反共越有活命的机会，这是什么道理？！

中共的“得民心”之说，是中共几十年孜孜不倦地伪造出来的，是假的。由于长期的潜移默化及威逼利诱，的确也被某些人相信了。真相就是真相，永远不可能篡改，即使是人糊涂了，老天爷还记着呢。继续伪造就是欺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劝告中共，别那么无耻，让老天爷有借口把你们留下。**

3、20万日军战俘加入林彪部队

共军得到日军的帮助更大，或者说，**中共得到了日军的军心。**

抗战胜利后，蒋总统坚决尽快遣送日本战俘，他表面上宣传“不要报复”，实际上一是想让日本人早点放心地放下武器，二是不想让日本人被中共迷惑，为中共所用，用来打内战。

当时日军在中国占领广大地区、驻扎很多部队，实力很大。日本突然投降，许多军人不想投降或者不敢投降，日军本来就有一个没被批准的“总决战计划”，就是对中国进行彻底破坏与杀戮，非常残忍与疯狂，一旦日军听说中国人要报复，那么会让更多的日军不想投降与不敢投降，肯定会有不少日军对当地中国民众进行屠杀与破坏，中国的损失将是巨大的。蒋介石的“不报复”口号下面的人也能确实执行，使得日军投降顺利进行，如果没有共军的内战，中华民族将迎来伟大

的复兴时代。

共军是要打内战的，这一点蒋介石很清楚。如果日军不能从中国政府处得到最低的安全保证，那么就会奔向给他们开出非常优惠条件的中共，就变成共军反过来打国军。从华东日军和东北日军被中共吸引加入共军的事实可以看出，蒋介石的看法非常有先见之明。

蒋介石要尽速遣返所有战俘，只留用日本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服务。战后中国，恢复经济和各项公用事业的正常运转及将来建设需要，亟需大量专业技术人员。蒋总统后来连最能打战的青年军和第七十四军都编遣了，怎么可能还用日本人来打战？蒋总统到台湾后的“白团”是聘请反共人士共同反共而已，属于政治上的合作，人数很少，更没有一线战斗人员，与中共利用日军打内战的人数根本无法相比，中共让日本兵打内战是拿着武器杀害中国人。共产党只要对它有利，什么都敢来，中共没有任何底线。文明人与流氓打架，一般是流氓赢，因为流氓没有底线。

阎锡山违抗了蒋介石的命令，悄悄留用了 6000 名日本战俘，蒋知道后很愤怒，要求遣返，认为这是败坏国民政府声誉，并派徐永昌上将规劝。日本兵思乡心切，借故逃走，到 1946 年春，只剩下 2600 名官兵。

抗战甫一胜利，中共便马上以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名义指示各地，作出：“各大军区敌工科要开始研究和处理日俘工作，今后凡战场俘虏日人，必须严格执行不侮辱不虐待政策，教育启发他们认识本国的殖民地地位（日本被美军占领并殖民），争取和我们共同反对美蒋”（注 18）这个指示。充分表明了中共利用日军打内战的企图，也表明了中共的一切为了内战的企图，这哪里是“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简直是“对美蒋的最先一战”。如果美国人发现了共军这个指示，指示中有美国殖民日本的说明，不知做如何感想？！中共为了吸引日军，竟然利用美军军事占领日本的事实来煽动日俘的反美情绪，再利用日俘的反美情绪来反蒋，“教育启发他们认识本国的殖民地地位，争取和我们共同反对美蒋”，真是机关算尽，中共真是天生的阴谋家，胆小且处于劣势的日俘难以完全识破中共的迷魂阵，中共好阴毒的这句“教育启发他们认识本国的殖民地地位”。二战后，日本穷极困极，差点大面积饿死人，靠美国的援助才渡过难关。如果日俘知道这一点还会认为美国是在殖民日本吗？

中共中央作出指示后，华东地区的中共领导人陈毅也马上作出指示：“俘虏之日军官兵和侨民等，原则上大部即时遣送，小部争取自愿留下（如医生、技师、炮手等专门人才及能做日军工作的）”。看清楚了吧，有“炮手”。共产党劝你留下，异国他乡当俘虏的你敢不留下吗？争取日俘日侨的政策如此，其效果果又如何呢？

“抗战胜利后，华东部队在津浦路战役中招降日军 4000 余人，高邮战役中俘虏 900 余人，加上各地招降之日军，总数颇不少”（注 18）。估计仅新四军招降留用日军就远远超过阎锡山。

中共拼命抢武器地盘外，也拼命抓日军战俘！又不惩罚他们，哪要他们干什么？要日俘与共军一起打中华民国，中共真是个卖国党。

中共成立了“反战同盟”，让日军俘虏加入。在很多大陆的电视电影中都看到：日军的军医、护士成了共军的军医护士，军医是军人，是为战争服务的，为中共的战争服务的，这就是“战争同盟”。



（日军医疗兵加入中共军队）

记得，朝鲜发动向韩国进攻的战争后，联合国成立了联合国军，有的国家只派出几名军医，也算是派军队加入了联合国军参与了对朝鲜的战斗。按照这个标准，日军加入了共军，即使仅仅是当军医，日军也是参加了共军的“**战争同盟**”，共同进行对中华民族的战争。日本人又多了一项对中华民族的犯罪。日本军医护士，四野的人评价：“个个都是白求恩”。日本人敬业的工匠精神，使他们犯下更大的罪恶。

电影中看到了军医与护士，其实还有很多在电影里看不到的：日军的技术兵成了共军的技术兵及教练，日军炮兵成了八路军的炮兵，日军机枪手成了八路军的机枪手，日军的坦克兵成了共军的坦克兵。在中共的军队里，处处都能看到日本人的身影。**傅作义说过：共军坦克里，不是苏联人，就是日本人。**共产党 1946 年在东北成立了空军，所有的飞机都是日军飞机，机场是日军原有的机场，所有的地勤也是原来日军地勤人员，日军的飞行员成了教练员（见人民解放军空军史），当然这些日军都是“反战同盟”的盟员。可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关东军空军一手调教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之父——日本鬼子林弥一郎**，当时带部队 300 人投共，没多久，中共仅一次就送给他 5 头牛和 50 只羊，一个月送多少次就不知道了，当时东北百姓生活困苦异常，很少能吃上大米和肉，好东西都喂肥了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关东军战俘。



（日军医疗兵加入中共军队）

共军要组建航校，林弥一郎在与林彪谈判时提出了让共军耻辱的条件：**让共军学员向战俘鬼子兵敬礼**。中共的学员过去都跟日本人打仗的，有的家里面的人甚至被日本人杀了的，叫给日本人敬礼，真是太屈了。没看到林彪反对的资料，那就是执行了。

同时，作为战俘**林弥一郎很放肆地当着共军司令林彪和东北局书记彭真的面，缴（要走）了共军参谋长伍修权一支自己长年佩带的精致手枪**，这是世界战争史的奇辱，估计林彪和彭真没有带手枪，否则也被缴枪了。作为战俘，因为刚刚缴械，而又要提出缴**共军参谋长伍修权的枪**，在任何人眼里，日本人太放肆了，全然不把中共放在眼里。

这支手枪，伍修权非常舍不得！因为从长征开始，就一直伴随着他走到 1945 年，它也是伍修权革命的一个象征，一个纪念物品。但是，当时伍修权是忍痛割爱送给了林弥一郎，为了共军空军航校，伍修权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林弥一郎拿手枪的那一瞬间，他就觉得特别大特别大的荣耀。

林弥一郎带领的**鬼子兵教练平时能经常吃到大米、白面等细粮，而中方人员吃的是玉米面、高粱米等粗粮**。共军还解决了鬼子兵的性（婚姻）问题。他们回到日本后生活困苦，很怀念在共军老航校的生活，林弥一郎就成立了“航七会”，在日本各地设有 7 个支部，会员达 1000 多人。可见有多少鬼子兵为共军的空军服务。

也有不少国军空军和汪伪空军投奔共军后参加东北共军航校的工作，这些**国军后来在各种运动中被杀了不少人，只有鬼子兵们安然无恙**。

外间传言“东北有日人 400 万”（注 29）。中共在东北留用了很多日军战俘，**林彪的百万大军中，除了从内地去的十几万土八路，30 万伪军，其他的主要是土匪和关东军**，当时东北人对苏军非常恨，连带着对共军很反感，主动加入林彪部队并不活跃。根据当时日军官员回忆录：八路（其实是苏军）在 60 万关东军战俘中搞了个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部份人的代价换取大部份人的遣返。日本人在同胞之间是重视责任感，他们误认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团队中的精英分子和骨干便要求留下，换取大部份袍泽的平安归国。1948 年 9 月 28 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

属，一共有 14 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以上记录见诸于 1948 年 9 月 29 日的《纽约时报》。



（共军中的日军女医护人员）

被苏军俘虏关押在苏联境内的日本关东军有近六十万部队，当林彪部队最危急的时候，已经被国军撵的快逃进苏联国境，苏联在联合国和美国一起通过一项决议，让国民党部队立即停战，国共双方搞谈判（苏联的意思也就是不允许国民党在自己的家门口胡搞）。谈判当然只是苏联一时的缓兵之计，等国军发现上当了再次发起进攻时，发觉打不动了，林彪的部队好像个个吃了**蚁力神、大力丸之类的仙药**，战斗力不但大增，武器也焕然一新。战斗力增强主要是苏联把关集中营里劳动的日本关东军改编了**二十万**加入林彪的野战军，并威胁这些日本人如果在战场上逃跑，就把剩下的四十万皇军集体死啦死啦地干活！武器用的全是苏联红军的装备，只有军装是共军的，共军反攻，于是国军悲剧了。东北野战军中究竟有多少改编的日军，现在要搞清楚可能已经非常困难，毕竟已经过去了快七十年（注 23）。

（四野）七纵队的**日俘田中勇**，曾为中共**立大功一次，小功两次**。1949 年 3 月 15 日，共军战车队表扬了**3 名战斗英勇的日本人和两名模范工作者**（注 29）。一名叫田村义男的日本战俘，在鹿道战斗中，国军的一个碉堡久攻不下，田村架起自己拼装的山炮，两发炮弹就把钢筋水泥碉堡打了一个大洞。攻打五凤楼时，又是他两发迫击炮弹击中目标。**田村也愈战愈勇，被战士们誉为“神炮手”**。田村后来为共军测试八八式掷弹筒被炸死（注 18）。

在日本有个四野战友联谊会，这个联谊会每年都要搞活动，一大帮当年在中国战斗过的日本皇军聚在一起回忆当年在中国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打国军打的太爽了，皇军当年没做到居然跟着解放军做到了。日中经济贸易中心理事**兵头义清**，当时在共军**38 军 112 师 335 团**。他透露日本有个**38 军战友会**，大概**10000**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335 团的有好几十人。兵头义清说：“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120 万将士中，曾有差不多 10 多万我这样的日本人。**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注 23）。什么步兵班？**估计是狙击手班**，否则，一个连才一个班，占十分之一的兵力，哪能提高战斗力？中共又为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

本兵提供了杀戮中国人民的机会。



(我的 38 军“日本战友”兵头义清——共军回忆日本战友——《中华儿女》2003 年第 2 期“)

笔老墨健

核心吧友

兵头义清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部队里有 10 多万日籍战士的人。

——兵头义清(姓“兵头”，他自己也是“四野”的日籍战士)

共军的日籍战士兵头义清。他说：“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120 万将士中，曾差不多 10 多万我这样的日本人”。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平民大概有近百万之数，关东军在 70 万左右。文中说十万日本人参军，有人认为大部分应该是前日本关东军士兵。否则招募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日本人还不如招募同样的东北人。从兵头义清先生说的情况看，参加解放军的日本人不会仅仅从事技术工作。以当时的

装备和编制，38军哪里需要一万日本技术员？最后，兵头义清先生代表日本战友请求解放军总部：1、批准他们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老战士和老战友的身份回老部队看看。2、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增加这段历史。3、为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本籍战士们树碑立传。



错失红尘

中將

15

核心提示：总政治部副主任吴昌德今天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以深泽芳藏为团长的日本籍解放军老战士访华团。吴昌德对深泽芳藏等来访表示欢迎。他说，日本籍老战士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对此，中国人名和军队将永远铭记。



资料图：解放战争时期至少数万日本人曾参加解放军。图为伪满时期在卫生学校学习的护士后来大多参加解放军四野。



资料图：2010年7月29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上将将在八一大楼与来访的日本籍老战士代表团一行合影留念。总政治部副主任吴昌德今天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以深泽芳藏为团长的日本籍解放军老战士访华团。吴昌德对深泽芳藏等来访表示欢迎。他说，日本籍老战士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回国后又为推动中日民间友好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对此，中国人民和军队将永远铭记。吴昌德向客人介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国防和

（资料图：2010年7月29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在八一大楼与来访的日本籍老战士代表团一行合影留念。2012-08-02）

.....
在中共的军队里，处处都能看到日本人的身影。傅作义说过：共军坦克里，不是苏联人，就是日本人。

这哪是“反战同盟”？实际就是共军与日军的“战争同盟”。

4、东北民众抵抗共军极度欢迎国军

中共经常造谣说，东北农民如何欢迎中共、支持中共拿下中国。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东北民众强力抵抗中共、极度欢迎国军。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当时由于苏军在东北抢劫强奸，东北人恨透“老毛子”（苏军），也带着恨共军，甘心情愿主动参加共军的很少。

东北光复后，1946年4月，当新1军、新6军进驻沈阳时，沈阳全城沸腾，民众涌上街头夹道欢迎国军入城。国军解放长春时，市民也夹道欢迎。



（1946年东北人民欢迎国军）

而林彪率领大军初到东北时，部队在东北没有丝毫群众基础，更谈不上获得民众支持。刚从日寇铁蹄下获得解放的东北民众，只把国军视为国家正统！



（1946 年沈阳人民欢迎国军）

在沈阳人民欢迎国军的标语中，有“**民族至上**”一词，这明显是讽刺与反驳高举“**阶级至上**”的一切共产党组织，也是东北人民以致中华民族的真心表达。刚被日本民族残酷迫害的中华民族，怎么可能相信“阶级至上”呢？

本来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东北表面上平静，当共军进入东北时，东北沸腾了，各地拉起了“杆子”（拿枪），这就是中共在东北所谓的剿匪，其实他们不是匪，而是反共的民众。如果是国军先到东北，绝对就没有这些“匪”。受尽了日本人欺压的民众，知道和平的珍贵与知道中华民国的伟大，更知道和平来之不易，哪里会反抗国军并且把自己变成扰乱中华民国的“匪”呢？他们多数不是伪满洲国的伪军与警察，而是当年抗击日本人的起义人士与普通民众。他们袭扰共军后方、断共军交通、抢共军补给、杀共军伤员，他们抗击共军的热情比当年抗击日本人的热情还高，**他们多达百万之众**。可恶的是，中共到现在还把他们称为匪。所以，中共不灭亡，中国没有真正的现代史。



（抗击共军的普通民众——中共诬称为“匪”，哪里像匪？）

东北冬天天寒地冻，根本不适合搞游击战，这是日本人能占领东北的根本原因。普通民众要抗击共军，也是十分艰难的，不是出于对中华民国的热爱与对中共的怨恨，就不至于如此抗共。

而共军（号称东北民主联军）内部也是问题多多，共军从各个根据地抽调来的两万名军政干部刚刚分批到达，就马上分配到同样也是由关内抽调拼凑而来的共军部队之中……兵不识将、将不知兵，使得出关初期的共军在组织上、指挥上都大受影响，进而使得战斗力大打折扣！

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必然导致共军根据地的发展受限；四方反共人士的袭扰，更使得各个战区交通受阻，后勤补给接续困难。这一时期的共军处境极为困难，差点就死掉了！

中共为了使得重庆谈判桌上多一张底牌，并且想在苏联的帮助下霸占东北，为夺取江山创造条件，1946年4月的四平，就是在如此窘迫的境况下，共军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与杜聿明死拼，结局当然早就注定……所以尽管明知不敌，共军也只得坚决的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说打就打……但一看打不赢、拼不过，那就只好机断专行了，司令员林彪被迫一声命令：撤！共军十余万部队便被杜聿明一路狂追，极为被动的北退松花江……林彪四平这一撤，不但救了东北的共军，也救了整个中国共产党。

共军在1946年至1947年间的屡战屡败。从1945年山海关失守、1946年二战四平完败，再到1947年德惠攻坚、三战四平的两仗全输，两年间，共军从号称“东北人民自治军”一直输到号称“东北民主联军”！如果没有苏联人的帮助与武器援助中共，没有20万日本战俘的加入共军，没有美国1946年开始对中华民国的武器禁运，那么，中共根本不可能获得中国人的江山，苏联、日本、美国这三者，是中共夺取中国人江山的三大助力器。

当林彪的部队在四平战败溃退时，路上百姓卖给他们的**水是一块大洋一碗**，估计这是世界上最贵的水了（《最后一战》），可以上世界记录。村民们还有这样问战士的：“**大侄子，听说你们那枪呀炮的都是用大姑娘和老毛子换的，这是真的吗？**”东北中共军队司令部的《阵中日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记载：“顽

区群众条件极坏，我军通过时沿村抗击”。一位老战士回忆：“又饥又渴赶到吉林市，满指望能吃点喝点，大街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像座空城。”离城过了桥，炸了桥，隔江看着国民党脚跟脚进了城，“老百姓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涌到大街上，挥动各色小旗，呼喊口号”。



（1945 年东北人民极度欢迎国军）

战士们把气发在林彪司令头上。一天，林彪的吉普车堵塞在北退的队伍中，警卫员请战士让道：“后面是首长的车，首长有急事。”四下里七嘴八舌起了叱骂声：“什么手掌脚掌的，这时候了还摆臭架子耍威风！”“问问你们那个首长，是不是要撤到老毛子那边去？”（《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7》）。

当时共军在东北正像黄克诚所说的七无：“无党、无群众、无政府、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帽……到处吃一处，吃空烧尽，犹如蝗虫。”共产党真是无耻与邪恶，“吃空”也罢，竟然还要“烧尽”。

当然共军投降也很利害，在东北，曾经一个星期就有几万人投降，他们说“国民党是革命，共产党也是革命，国民党还是政府，我们为什么打他们？”（《最后一战》和注 1）”。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到一九四六年初，十天左右，“先后叛变共约四万余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7）。

不但东北是如此，其它地方也是如此。

大家都知道，中共一篇宣传文章叫做“南京路上好八连”，用来证明共军纪律好。我们再仔细想一想，正是这篇文章证明“上海人不欢迎共军”。南京路上好八连，民众是围观而不是欢迎。这篇文明让人感觉说共军是晚上悄悄溜进上海的，共军那么多人，上海人不可能不知道，再说，白天进城更安全，为什么还要而晚上进？共军在上海入城没人欢迎，连中共的地下党也不敢出来欢迎，就用一篇含糊其词的文章，用共军的纪律来代替没人欢迎的入城来糊弄人民。如果有人欢迎共军，那么中共早就大书特书了，一定会拍许多民众欢迎共军入城的照片甚至是电影，用来证明中国人都是欢迎中共的。

看看上面的照片，东北人是那么欢迎国军，而全中国都没人欢迎共军，中国人对共军的欢迎程度，远没有苏联人民对德军的欢迎程度高。

共军开进广州时，也没人出来欢迎，连中共的地下党也不敢出来欢迎。与国军进入吉林市时中国人民载歌载舞的情形天差地别，甚至连苏联人民欢迎德国大

兵的程度都不如。由于苏共对人民进行残酷迫害，人民极度困苦，二战初期，苏联人民曾经异常热烈地欢迎德军，**苏联人民对德国纳粹的欢迎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人民对共军的欢迎。**



（二战初期苏联人民欢迎德军）



（二战初期苏联人欢迎德军）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0）有如下记载：

{

即使这样，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也只是少数。一九四九年初共产党胜利在望时，在上海工人中——据毛告诉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国民党远比中共号召力大。中共开进广州时，**苏联领事留心到那里“几乎一个共产党地下党员也没有”，“没有人出来欢迎”。**在华中，**林彪一九五〇年一月对苏联情**

报人员说：“群众对改朝换代没有太大的兴趣。”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一百二十万中共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长江，二十三日夺取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国民党二十二年的统治崩溃了。这天蒋介石飞回老家溪口，心里明白这是最后一次回老家了。蒋含着泪长时间地在母亲墓前徘徊跪拜，依依不舍，不忍离去。接着，一艘军舰载着他驶向上海，以后又辗转到了台湾。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受到毛泽东的保护。

毛请求斯大林派飞机、潜水艇助他进攻台湾，时间在一九五〇年，“或更早一点”。他告诉斯大林有好些红色代理人跟随蒋“逃”去了台湾，位居要职，可以里应外合。但斯大林不肯冒跟美国对抗的风险，毛只好把计划束之高阁。（斯大林帮毛镇压了西北沙漠地区强烈反共的穆斯林部队。斯大林对毛说：“可以很容易地由大炮对付。我们可以给你四十架飞机，一下子就能把那支骑兵部队一扫而光。”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嘴里“嗒嗒嗒”的，手比划着机关枪扫射的样子，对我们描述苏联空军是怎样在戈壁滩消灭穆斯林骑兵的。）

}

对比吉林市民对国民党的欢迎，中共真不得人心。

大家知道“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号称 20 万大军进大别山（实际 12 万人），出山时只有 5 万人，战斗与**非战斗减员 7 万接近 60%**，就是战死病死饿死逃兵，战死病死饿死的很少，剩下的就是大量逃兵和投诚起义的。中野共军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战斗，除了高山铺等几个仅有的胜仗外，在与桂系部队的交手中几乎是十战九负，面对胡璉的 18 军更是能避则避。共军大量逃兵是减员的最重要原因，其实对当兵来说，哪个政党上台，与他们有什么关系？用不上为政党去卖命，只有被共党洗坏了脑的才不明白这一点。

进入大别山后，当时大别山人口不多、人民生活艰难，人民对中共很反感，很难也根本不想养活这么多的共军。

用共军自己的话说：“严酷的现实让一些指战员产生了想法，觉得大别山根本就不像个老根据地，老乡不帮忙不说，还经常给部队出难题。强烈的思乡想家情绪和对现实的失望情绪出现了，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多指战员的普遍感受。这对部队的影响很大，个别部队出现了战斗意志衰退，一些能打的仗不打了、不该放跑的敌人却放跑了等等。这些还是次要的，最严重的是，一些部队连人民军队的宗旨也置之脑后，**出现了打老乡、抓向导、拉水牛、拖猪捉鸡、抢东西等现象，甚至还出现了调戏妇女的现象。**”（爱历史：红军挺进大别山的历史原因，<https://lishi.vshare.tech/hd/c2ec2de380c5478b4eb359923693b094.html>）。这时的共军就是一支流氓部队，与被打垮的军队没什么不同。

刘伯承、邓小平对这段经历觉得非常不光彩，多年后还念念不忘。许多共军对于这段历史记忆犹新，对毛泽东的指挥能力极为不满。

没有日本鬼子的加盟，共军在东北很快死掉，哪里还有机会抢江山。请看《注释 21：数数林彪打的败仗》，看看共军的所谓军事天才林彪是如何无能的。里面有许多林彪惨败的战例，其中一例：**共军八个团，被国军一个团加一个营打得“望风而逃”，死伤人数超过国军的参战人数。**

中共的江山不是得民心得来的，是枪杆子夺来的。

日本人是中共的帮凶，是中共的救命恩人。

当国民党打败中共，中共不得不缩于几个根据地等待覆灭时，**日本人发动九一八，让中共躲过灭顶之灾！**九一八之时，蒋介石正在前线指挥对共军的作战，日军的进攻让中共得以在国难当头向国民政府背后捅刀——发展阶级斗争的根

根据地，日军与共军互为呼应、互为帮助。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人出于事变期间红军发动赣州战役干扰正面战场抗战等原因，正式确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来源作者：奉天老胡子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138887/>）。“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被中共逼出来的。正当蒋介石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时，日军发起向长城进攻，中华民国不得以进行长城抗战，红军再次躲过灭顶之灾。

当中国政府围追中共至贫穷的陕北，中共已经山穷水尽，当时中共的根据地才 60 万人口，根本养不活几万红军，靠宋庆玲的支助才暂时勉强存活。这时，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引发中日全面战争，给中共得以喘气机会。当中国人为抗击日本侵略，浴血奋战、血流成河、心身疲乏之时，中共却在日军后方（敌后）发展壮大，共军还与日军合作攻击国军（把柄落在日本人手里）。当日本战败之时，中共却突然发难，抢夺日军武器，许多日军把武器轻易给了共军。当中国人心生厌占之时，中共却拿枪，想实现它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梦想；当中共在东北被国军打得狼奔豕突、几近崩溃之时，已经放下武器的日本关东军被迫加入林彪部队，用他们的本领提升了共军的战斗力，为中共夺取江山立下汗马功劳。

苏联还把美国援助苏联的剩余武器，价值大约 34 亿（也有 40 亿之说）美金转给共军，甚至苏联用军舰送到山东给共军。日本人是中共的帮凶，没有日本人的帮助，再加上中共祖宗——苏联的明暗相助，就没有中共上台的任何可能。共军为什么要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一是出于感恩，二是被要挟（把柄落在日本人手里）。

中共用“人海战术”，这是最奸险的一招。世界上只有共产党的字典里有人海战术这个词，这是非常残忍的、非人道的作法，用百姓的命换取共产党的政权。这种人海战术是以付出大批生命为代价，东北 1946 年光复时统计有 5 千 7 百万人口，而到了 1949 年毛登上天安门时，人口下降到了 3 千 5 百万，这两千多万人口哪里去了，莫非都移民俄国了？！

中共兵围长春时，饿死 30 万无辜百姓，惨过南京大屠杀。有钱向国军买枪的，共军就放出去，有中共需要的技术专长的，共军也放出去，剩下的贫下中农全被饿死，比南京大屠杀还惨。中共这种事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在这次兵围长春事件中，共军使用了高射炮和高射炮部队。高射炮哪来？日本人在东北没有高射炮，在日本的东北武器库中肯定也没有。高射炮是苏联人给的，甚至操纵高射炮的也是日本人或苏联红军。

中共说“民众支持中共”是天大的谎言！中国人民并没有选择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选择民心，而是选择枪杆子！

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事实是：正常人与流氓打架，多数是流氓赢，因为流氓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什么招数都能用。而正常人是无法使用阴毒的招数，特别是不知道对方是流氓的时候。中共赢得江山，就是因为中共太流氓、太阴毒，饿死长春 30 万百姓这种事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国民党是一个正常的党派，哪里能顶得住这种阴招？中共一直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鼓励党徒暴乱，获得政权后又向中国人灌输“得人心者得天下”以洗脑，让人觉得它的江山得来正当，把中国人玩弄于指掌之间，非常歹毒。其实“枪杆子”与“人心”是两个不搭边的东西，既然用了“枪杆子”就不用多考虑“人心”了。中共的政权是靠暴力抢来的，与“人心”无关。

中共是谁都骗的，骗工人说：“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领导阶级”，结果工人长期低工资低劳保生活困苦，失业就说下岗。骗农民说：“没有农民就没

有革命”、“我们是工农联盟的政权”，结果**农民成了二等公民**。要骗城市青年移民到农村、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就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面再加上一句“一辈子扎根农村”才是真正目的。骗民主人士说：“**互相监督**”、“**长期共存，肝胆相照**”，结果多少民主人士**肝胆俱裂、照亮黄泉路**。

如果中共以“**推翻中华民国**”为口号进行造反，连中共的党徒都无法聚集；如果中共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口号进行暴乱，没有多少国人跟随。于是毛用的是“打倒国民党独裁、建立新民主主义”为口号，欺骗了天下人。中共骂国民党独裁，其实中共比国民党独裁一千倍，中共骂国民党贪污，中共比国民党贪污一万倍。中共高呼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共上台后，从来没有搞过一天“新民主主义”，搞的是“新独裁主义”，以前是皇帝一人独裁，中共是一党独裁，最后集中到毛自己独裁。那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只是花瓶党，成了共产党的应声虫和打手。毛贼东很阴。所以中共一直感恩毛贼，是因为毛贼想出了这么一些阴招，才打败国民党。对于国民党来说，只是逃跑而已，最可怜的是我们民族，被中共糟蹋。

1949年后，中共杀戮无辜的中国人是日本14年侵华战争的三倍多，中共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超过日本人的千倍，中共比日本人更坏。现在有不少中国人仇恨日本人却爱戴中共，真是认贼作父啊，被中共骗死而不自知。**中共杀了中国人却自称是中国人的父亲，你见过杀自己儿子的父亲吗？中共很邪。**

“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和充足的證據說：中國共產黨是從內部分裂國家的罪魁禍首。它是一個投敵叛國的黨，它是一個賣國求榮的黨。1979年2月26日，胡耀邦在中央禮堂向全國中長篇小說座談會全體與會者作報告的時候冒出一句話：「要是讓人民知道了我們共產黨的歷史，人民就要起來造我們的反，就要推翻我們了！」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注190）

5、本节注释：

1.《最后一战——中国的1945年》，大陆出版

18.国共双方内战中如何使用日军战俘

<http://view.news.qq.com/intouchtoday/history.htm?0216>

21：数数林彪打的败仗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8751078&boardid=1&page=1&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22：“美国援华军备揭秘：国民政府忍辱负重讨来多少美械”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zhuanzhedian/detail_2010_04/14/524422_0.shtml

23：按察使：林彪的东北野战军 一个“国际联合部队”

29：战后中共东北解放区对日本人才的吸收与运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6c456c0102dxk5.html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曾大量使用日俘

<http://view.news.qq.com/a/20121106/000039.htm>

注190：胡耀邦79年报告：人民知中共历史会推翻它

<https://www.tuidang.org/2015/12/03/70890/>

日本作家：胡耀邦知道的真相 习近平知道吗？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nnews/aboluonews/20160905/581326.html>

二十、三年自然灾害与苏联逼债时期

首先，这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与苏联逼债”，里面三个错误：一、不是三年而是五年；二、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三是苏联没有逼债。

1958 年底开始，下面饿死人的电报象雪花般地打到中央，毛用铅笔在电报上写着：“教群众吃稀一点，参树叶吃”。其实早就没有稀的吃了，如果还有稀的吃，怎么能饿死人呢？连树皮都啃完。毛把群众赖以活命的粮食夺走以供出口。

大饥荒从 1958 年开始，到 1962 年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政府采取了改正大饥荒措施，饥荒才结束。这里证明是五年，是政府的措施才导致饥荒结束，那么，也是政府的措施导致饥荒的发生，大饥荒是人祸！

下面是本人十多年前用金剑平的笔名写的两篇文章（“五年大饥荒，最少饿死 6288.93 万人”与“精心策划的大饥荒，五年最少饿死 6288.93 万人”），这两篇是姐妹篇，我把两篇文章的精华部分，采括过来并修改让大家看一看：

“五年大饥荒，最少饿死 6288.93 万人”：

{

1958 年至 1962 年，长跨五年，中国发生大饥荒，最少饿死 6288.93 万人。当政者说“三年自然灾害”，这是巨大的谎言，一九五九年还是个丰收年，这次饥荒完全是人祸，是当政者一手所为，特别是 1959 年大饥荒加重以后国家当权者的作为，实在不能不令大多数历史研究者万分愤慨，也迷惑万分。

当政者为了堵住人民的口竟然嫁祸于天：“三年自然灾害”。气象专家根据 20 世纪 100 年中国气象统计资料，经过中科院电脑计算，1959-1961 三年期间是中国 20 世纪最风调雨顺的三年。此事的科学数据见上海学者金辉撰写的长文《风调雨顺的 3 年—1959-1961 年气象水文考》，发表在《方法》杂志 1988 年第 3 期。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灾害”！

老天非常争气，那五年根本没有发生大规模瘟疫和特大毁灭性自然灾害，竟然出现了一年之内（1960 年）人口总量净减少 1000 万人的奇迹！——即使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也没有出现过此等奇迹——除了饿死（人祸），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如此惊人的人口非正常突变？当政者为了推却罪责，竟然嫁祸于天：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无耻。从 1999 年起到 2010 年，中国才真正是年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没听说哪里饿死人。

饿死完全是人祸，是当政者一手造成的，特别是 1959 年大饥荒加重以后国家当权者的作为，实在不能不令大多数历史研究者万分愤慨。

作为这桩空前的人间惨剧的祸首，毛展示出什么道德良心？6 千多万冤魂在他心里留下了多少悔恨？没有，什么也没有。在 1961 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很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又说：“有一点损失，我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1962 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的错误，毛泽东生气地打断邓的话说，“这几年错误就那么一点，谁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

六、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1、疯狂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造成大饥荒第一个直接原因是 1958 年大跃进的最高潮“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压倒一切压倒秋收，劳动力去炼钢，妇女老人秋收，很多粮食烂地田里，直接导致了大丰产之年的秋粮大减收。但这是次要的，它只能造成 58 年和 59 年的饥荒，不能导致五年大饥荒。

三年大跃进中，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花了 245 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仅 1961 年度全国报废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币达 150 亿元”。1958 年的大炼钢铁，就使我们损失了 2000 亿以上，1957 年国民生产总值才 1068 亿。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 1986 年说：“据有关部门统计，大跃进给国家经济上造成的损失近 3000 亿元。”

从《一个村饿死人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一文中可看出：五九年并没有自然灾害，而是丰收年。

毛趁全国大饥荒百姓挨饿之时，在全国各地建了 61 座行宫。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甚至修了防核防空的防空洞。这些行宫却往往只是为了住上几天，有的甚至一天都没有住过，从此白白空关在那里。这 61 处行宫是老百姓的尸骨堆集成的，如果用这些钱买粮食，可让很多人活命。

1960 年中国食物不足，人相食。茅台酒厂无米酿酒，周恩来闻讯，特批 2200 吨粮食给茅台酒厂酿酒。此期间，中国数千万人饿死，但茅台酒厂 1959 年到 61 年的产量并没减少，且更具收藏价值。1958 年土陶瓶茅台酒以 145.6 万元创中国白酒最高价。

大饥荒期间中共还用大量粮食制造航天用酒精，甚至还不停止研制原子弹。粮食被中共大量提炼高纯度的酒精作为核工业原料。1958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宣布中国粮食太多，吃不完。所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要给粮食找工业方面的出路，比如搞酒精作原料”，光是导弹试验，每一枚导弹要消耗一千万公斤的粮食。周恩来说中国制造原子弹非常便宜，一共只花了几亿人民币，但是事实上中国制造原子弹的费用高达 40 亿美元，按 1957 年的比价，实际上高达 120 个亿人民币，但是周恩来欺骗人类社会，说只花了几亿人民币。而这 40 亿美元，若不用于制造原子弹，足够拯救 3800 万免于饿死。毛泽东因为研制原子弹造成中国人死亡，超过日本因为挨两颗原子弹造成的死亡一百倍！毛的荒唐野蛮到了个什么程度了？

2、高额的粮食出口

造成大饥荒第二个直接原因是粮食的高出口——毛泽东、中共中央最迟于 1958 年 10 月底发现大饥荒已经降临，但此后的 1959 年，粮食更加疯狂地出口——创了建政以来第一个高峰！大量出口粮食援外（基本上都是无偿的），在大饥荒时期创造了一个粮食出口高峰——当时，世界一片欣欣向荣，唯独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援国随意浪费，竟使中国大米发霉。

1953 年中央指示：“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58、59 两年已发生饥荒，粮食出口（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出口）却高达 700 万吨，可保证 3,000 万人日常所需。此外，在大饥荒期间我国还向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古巴等 20 多个国家无偿援助大量粮食。

古巴的格瓦拉一九六零年十一月访华，毛泽东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而毛对国内粮食问题的批示是：“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饿就用“薯叶填补”。当时的中国人那么节减，会吃得过多吗？会浪费粮食吗？

对阿尔巴尼亚的大批援助是在 1961 年阿苏关系破裂以后提供，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援助达到了最高点。中国对阿援助累计高达 90 亿元人民币。中国为了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费尽心力，支援该国平均每人高达三千多元人民币，这对当时每月工资仅二、三十元的中国广大工人和年收入只有十几元、几十元的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如果不出口粮食，中国一个人也不会饿死。仅 1959 年出口粮食 415.8 万吨，相当 3465 万成年人一年的口粮（注：六、七十年代，城镇居民成年人每人每月口粮定量是 10 公斤，儿童更低，这里是按成人算，如果按年龄比例来计算会更多），因此造成 1960 年饿死人最高峰。如果不出口粮食，1 个人也饿不死。

饥荒发生时，贸易部的官员建议，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进口粮食，周恩来反对，并指示，趁国际金价走低，大量吸纳黄金，用中国几千万人的生命换回了一堆黄色的金属。后来刘少奇拍板，花了些黄金进口粮食，解决了一些问题。

1958 年底开始，下面饿死人的电报象雪花般地打到中央，毛用铅笔在电报上写着：“教群众吃稀一点，参树叶吃”。其实早就没有稀的吃了，如果还有稀的吃，怎么能饿死人呢？连树皮都啃完。毛把群众赖以活命的粮食夺走以供出口。

3、粮食高征购

造成大饥荒第三个直接原因是粮食高征购，发现大饥荒发生以后反而高征购，净征购量也创了建政以来第一个高峰——4172.5 万吨（1958 年 4172.5 万吨，1959 年 4756.6 万吨），比此前的平均年征购量 3324.3 万吨高出 848.2 万吨。

1958 年底饥荒已经发生，在 59 年的庐山会议上，把想阻止饥荒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接着开展一场向群众追查所谓剩余粮食的“反瞒产运动”，干部和民兵用非常暴力的手段从农民手中“拿”走最后的粮食，甚至连种子粮都拿走。七百万人口的河南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运动”中，各级干部打死逼死群众八万余人（比鬼子抢粮还狠，仅信阳商城县的基层干部就用 45 种非常残酷的刑罚来污辱和杀害人民，见参考资料 13）。囤积粮食是信阳饿死人的主要原因。当信阳大面积饿死人时，信阳粮仓里的粮食是满满的，政府把粮食收起来，百姓饿死也不给，百姓也没人敢去抢，有人就饿死有粮仓边，甚至干部民兵封村不让人逃荒，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很和谐的社会，很稳定的社会，真正的“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

当时中国的仓库里实际上屯满了粮食和其它食品，但中共有令，由军队和民兵把守，饿死不开仓；宁愿让粮食烂在仓库里，也不能够开仓拯救农民，当百姓接近粮仓就开枪扫射。这种做法只有在共产党政权才存在。只有在中共、包括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在饥荒期间饿死不开仓。所以中共是蓄意谋杀性的大饥荒。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谢韬说：这是人类历史最大的最野蛮的..。

安徽省当局用机关枪扫射向城市逃难的农民，凤阳死于机枪扫射的农民达 800 人以上，凤阳另有 2.8 万农民受到各种惩罚，农村死亡率极高，有些村庄的幸存者仅是干部家属。社会学家周孝正说：整村整乡的饿死，而且严禁逃荒，迫使农民就地饿死，河南 1000 多个自然村就此消灭。

1961 年饥荒很严重，饿死很多人，1962 年当然要继续延续饥荒，1962 年 2 月份七千人大会刚结束，还没有进口粮食，也没到收获季节，为什么大饥荒就结束了？因为仓库里有粮食，干部们得到中央的许可，回去开仓放粮，饥荒就结束了。而之前，所有开仓放粮的干部都受到严厉的处罚。

（注：第 2、第 3 相关联，但又有区别。因为粮食高征购更主要的是缘于大

跃进，再者，当时还有大量粮食储备，并没有全部出口。）

4、拒绝接受外援

毛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都用在工业特别是军工上，没钱就把中国人赖以活命的口粮出口，这是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毛在 1958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武昌会议上讲：“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1958 年就知道要死五千万人以上，真不愧是阴冥灵柩啊！死五千万人都不能杀他的头，天下有这么毒的人吗？

苏联 1959 年撕毁了与中国签定的原子弹合同，1960 年又因为中共中央于在北戴河讨论“反（苏）修”问题，会议期间，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 600 个合同，撤走在华专家 1390 名，但这些合同是工业特别是军工方面的，与农业无关。这些项目许多停建，用来买这些军工项目的食品就不必出口了，人力物力财力又回流到农业上来，对缓解大饥荒有很大的帮助。也许苏联是看到这一点才这样做的。而且，苏联并没有逼债，是毛为了赌气提前还债。把大饥荒的原因赖给“撤走专家”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而且，几个月后，苏联马上恢复专家。中共只告诉我们“撤走专家”，却不告诉“恢复专家”。

怎么能逼债？欠苏联的债是 16 年期的，毛泽东当时硬是要 4、5 年内还清？还赖说别人逼债！怎么能逼得了？你欠别人 16 年的债，谁能逼得了你 5 年内还？你欠银行 16 年期的债务，银行 5 年内要你还清，你不肯还他能怎么样？中共从来没说过苏联人用什么手段逼的债，是不还债就派兵攻打还是直接用飞机轰炸北京？从来没见过！

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用粮食而不用黄金或者其它如矿产来还债？苏联缺的是黄金与其它矿产而不缺粮食。

赫鲁晓夫是对中国人民最好的苏联领导人，所有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几乎都是他做出的。斯大林 1953 年死亡，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才决定对中国大力援助，而且还受到了苏联其他领导人的反对。赫鲁晓夫不但没有对中国逼债，还减轻了中国债务。他重新调整了卢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使中方得益。据苏联计算，这一调整把中国欠的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五（欠他们 100 元只须还 22.5 元）。

一九六一年二月，赫鲁晓夫主动向毛提出借给中国 300 万吨粮食和 50 万吨古巴蔗糖。毛接受了蔗糖拒绝了粮食，说我们没有挨饿！

毛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提前还清”。毛把欠苏联人十六年期的债就提前在那五年还清。每年比如只要出口 50 万吨粮食足够，毛泽东决定每年出口 200 万至 400 万吨。也即毛泽东逼迫中国人勒紧裤腰带，逼迫农民死亡，来提前还债。毛泽东难道不是故意饿死农民？

事后毛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

——笨青听到又要高呼万岁了，多大度啊！多伟大啊！多高瞻远瞩啊！几千万条人命只如草芥！

——老大哥的救难之善举就是“嗟来之食”？粮食是嗟来之食，蔗糖就不是？为何只要蔗糖？向老大哥求那么多的技术包括原子弹技术就不是“嗟来之

食”？是“求来之食”，这就有面子、有骨气了？按这种逻辑，当年打战时，就不应该用敌人的枪，那是“抢来之食”啊！

而且，苏联人知道中国正在饥荒而坚决不要中国的东西，苏联人想办法推托、拒绝中国的食品，一个猪只要一个猪尾巴，鸡蛋大的不要，小的不要，只是象征性要不大不小的。不要的东西，周恩来说：“他们不要，我们也不要”，周恩来下令把苏联人不要的中国鸡蛋、茶叶、粮食、猪肉等东西倒入海里（黑龙江）。这个事情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听说过。中国人又被代表了一把——面子一把，中国人民有志气？！而当时不少地方的农民吃死尸、吃小孩以暂时活命，中国人真有面子了吗？这是千百年的耻辱！

1961年，中国就近向苏联远东借20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主要原因。可中共却封锁苏联借粮的消息，一味煽动反苏情绪，使老百姓误以为“困难”来自“苏修”“背信弃义”……

这就是毛告诉中国人民：苏联乘人之危“逼债”的历史真相。

苏联逼债这个谣言，造成苏联人民对我们的印象极差，导致俄罗斯人民对我们长期怀有怨恨心。

1969年，中共与苏联再起吵架，中共又一次煽动全国人民对苏联的仇恨，苏联高层决定“用核武器对中国所有城市做外科手术式的切除”。幸得美国政府制止，中国人民才度过这场真正民族毁灭的危机，（在《共和国演义》一书上也记录有这段史实），但是，至今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印象还是很不好。

美国人后知后觉，也来援助。

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毛泽东有一整套欺骗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机制，所以当年连美国中央情报局都上当受骗。后来美帝国主义知道了中国大饥荒，他们并未袖手旁观。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这必将导致更多的中国人死亡，因此，决定通过粮食援助帮助中国，并制定了援助方案。

一九六二年二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说道，如果中方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在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传达了毛的立场：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绝不会依靠别人、尤其美国人的施舍过日子（后来的唐山地震也是这么说的）。美国人再三表示，他们的500万吨小麦是援助计划，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甚至可以以硬通货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兑现，还可以给穷人发救济包。中方仍然断然拒绝，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中国再一次展现了她的“骨气”。（中国人又被风光了一把）（《王炳南回忆录》）。

……

可以说，以上四项，当时如果少一项或者纠正一项，大饥荒完全能够挽救，甚至可以不发生。

看看上面所列的大饥荒原因，每一条都是人祸、是毛祸，与天地何干？当政

者还嫁祸于天：“三年自然灾害”。气象专家根据 20 世纪 100 年中国气象统计资料，经过中科院电脑计算，1959-1961 三年期间是中国 20 世纪最风调雨顺的三年。此事的科学数据见上海学者金辉撰写的长文《风调雨顺的 3 年—1959-1961 年气象水文考》，发表在《方法》杂志 1988 年第 3 期。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灾害”！

老天非常争气，那五年根本没有发生大规模瘟疫和特大毁灭性自然灾害，竟然出现了一年之内（1960 年）人口总量净减少 1000 万人的奇迹！——即使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也没有出现过此等奇迹——除了饿死（人祸），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如此惊人的人口非正常突变？当政者为了推却罪责，竟然嫁祸于天：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无耻。从 1999 年起到现在，中国才真正是年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没听说哪里饿死人。

饿死完全是人祸，是当政者一手造成的，特别是 1959 年大饥荒加重以后国家当权者的作为，实在不能不令大多数历史研究者万分愤慨。

作为这桩空前的人间惨剧的祸首，毛展示出什么道德良心？6 千多万冤魂在他心里留下了多少悔恨？没有，什么也没有。在 1961 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很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又说：“有一点损失，我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1962 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的错误，毛泽东生气地打断邓的话说，“这几年错误就那么一点，谁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

“精心策划的大饥荒，五年最少饿死 6288.93 万人”

{

通过细心分析，发现这场大饥荒根本不是天造的——“自然祸害”，而是人造的，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大阴谋，下面从多方面分析这个大阴谋：

一、大饥荒是出自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

马克思理论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在民族内部划分两个敌对阶级，挑动同民族的人们相互仇杀，说白了，阶级斗争就是分裂民族，阶级斗争就是群体迫害、群体灭绝，“无产阶级革命”有纯洁阶级队伍——对所谓的敌人、落后的阶级进行消灭的要求，就是对他们所认为的异己分子、落后分子的清洗。从战争年代的大清洗，到和平年代的大清洗，哪个共产党国家都有，这是出自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饥荒是最有效的清洗手段。

马克思理论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因为工人阶级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又有高度的纪律性”。而农民既不使用先进的工具，又自由散漫，当然是最落后的阶级了。在正牌的共产党国家里都看不起农民，认为农民落后，不可能革命，在内战中，中共骗农民作炮灰，甚至不惜用农民的命作人海战术（其实是人肉战术），为它夺取了天下，执政后马上把农民打成二等公民，也只有这个“畏光症”的党才能作得出来。农民就是农村户口，到现在都是最贫穷的群体，最弱勢的群体，最没权利的群体，最被剥削的群体。

那么清洗对象当然是落后的阶级了，从这次饥荒看到，是人为的针对落后阶级和落后分子有选择性地饿死。这次饿死的都是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落后分子。许多地方对病者、弱者、反对者、开会睡觉者、所谓的坏因素和右派，采取了禁食的惩罚，这些人最终被清洗。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阶级淘汰落后阶级

的自然过程。《共产党宣言》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所以，当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知识分子）被打倒之后，就轮到“落后”的农民阶级被共产党“有计划”地淘汰掉了。

早在1950年10月，因介入朝鲜战争财政吃紧，在11月15日的中央财委会会议上，陈云曾说：“请农民帮忙。现在还不能向工人求援，亦不能向资产阶级找出路，公务人员亦没有什么油水……还是多剥削农民”。1962年邓小平承认“过去剥削农民多了”。从1953年秋开始，中共便为了军事强国计划，大量出口粮食换取苏联援建的项目，从而与农民展开了全方位的争夺粮食的战争。毛泽东说“要教育农民少吃，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饿就用“薯叶填补”。薄一波（薄熙来的父亲）承认，“农民绝大多数粮食均被强制抢走，被驱向死亡的境地”。1953年10月2日，毛泽东在决定统购统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正在为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展开一场战争，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毛特别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是好的**”。很明显，当时的政府已经明摆出一副你农民要死就死去的架式。几天以后，陈云向各省领导干部传达毛的指示：全国即使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的事件，仍然要征粮，“要准备十万个农村村民暴动。换句话说，要准备1/10的村庄暴动，但这不会危及共产党的统治”。他举例说：满洲国也搞过严厉的强行征购，“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换言之，共产党是垮不了的，不管它怎样对农民巧取豪夺。

1955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杜润生透露：浙江农村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像已续有发生。1955年4月，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椽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披露，浙江被活活整死农民为134人。一些有正义感的人上书毛政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给毛写信说，他的老家江苏，“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农民说：我们吃不饱，哪有力气去种田呢？”毛不为所动，反说：“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他一下。”毛还理直气壮地说：“缺粮户，也不是一年到头都缺粮，顶多缺4个月”，“**顶多缺6个月**”。有的高级干部用“良心”这个概念恳求毛手下留情。毛斥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确没有良心，马克思主义是残酷的，良心是不多的”，“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毛能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是好的”、“马克思主义是残酷的，良心是不多的”、“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这说明，毛的确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为了更方便的夺取农民的粮食，中共发起了农业集体化运动。1955年5月份，在谈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毛说，“我们必须在五年内逮捕150万反革命，反革命占人口的5%”。河南信阳地区1959年秋天至少有1万名农民被逮捕，其中的许多人饿死在监狱中。

毛泽东在农村搞人民公社，推行全面公有化；土地、工具、种子、房屋一律公有，甚至连农民的锅、口粮都公有了，都在干部的控制下；农民只能到公家食堂吃饭才能活命，上级要饿死谁，谁就得等待饿死。如果是“自然灾害”，那么

饿死人就没有选择性，所有人皆在其中，甚至城市居民比农民更加饥饿，但实际上饿死的都是“落后”的农民，而党员干部及家人往往可以吃小灶。这就实行的有选择性地饿死——他们对病者、弱者、反对者、开会睡觉者、所谓的坏分子和右派，采取了禁食的惩罚。例如四川许多县，80%的人死于这种禁食惩罚。饥饿被用来作为惩罚的武器，用来处罚那些无法跟上工作要求之人，政府扑杀弱势者和孤苦无依的人。官方送出好几百万人到劳改营，劳改营中每年的死亡率在 40～30%之间。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后，1200 名右派、犯人饿死 1000 人，没有饿死的 200 人中的 190 多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见戴煌：《九死一生》）。

二、各国共产党都有大清洗、大饥荒的历程

苏联：斯大林进行大清洗，镇压了 1950 万至 2000 万人，人口不算太多的苏联被镇压了 2000 万人，这是多么庞大的数字啊。苏联的大饥荒也相当惊人，死亡的人数很多，仅乌克兰就有近 500 万人被饿死，这些死亡人数还没统计在斯大林的镇压人数中。苏共给人民带来的是灾难。

列宁的老师说列宁宁可把一半的人杀死，也要把剩下的一半人赶入共产主义。

红色高棉：共产党柬埔寨也称红色高棉，它的最高统治者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极端崇拜者，他在周恩来的具体指点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屠杀了柬埔寨人口的 1/3，其中包括大部份华人。波尔布特也是靠使用饥饿这个最有效的武器来消灭人民的，他是向他的老师——毛泽东和周恩来学的，毛还夸奖他做得好，一举消灭了阶级，毛盛赞波尔布特：“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这也证明毛也有用饥饿来消灭阶级的思维。

朝鲜：朝鲜现在每年都缺少粮食，也号称“自然灾害”。外界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数量，达到朝鲜五分之一人口一年的口粮，可见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朝鲜不知要饿死多少人。有人说是外国的经济制裁导致朝鲜饥荒，真是胡说八道，经济制裁只是不与它作生意，朝鲜是农业国家，连粮食都不够，拿什么来作生意出口赚外汇？难道拿工业品吗？有没有经济制裁有什么差别？中国与俄罗斯不制裁它，任何国家制裁都不起作用。不过朝鲜还算不错，它不但愿意接受援助，还主动要求援助——当它需要粮食时，它就试射导弹，于是就有国际上的援助，金正日能为人民谋粮食，可见金比毛强。

欧洲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没有我们的援助，也饿得完蛋了。正因为中国援助了它们，它们过上了美好日子，而使我们的灾难更加深重。

总之，许多的共党国家都经历了大饥荒的历程，这是执政者消灭阶级异己的最好武器，是求稳定的最好武器。

三、《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中规定中国消灭一亿人口

[俄国解密前苏联档案《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http://hi.baidu.com/%C8%D5%D4%C2%D3%C0%C3%F7/blog/item/fa885634f3b29d1c91ef390c.html)

<http://hi.baidu.com/%C8%D5%D4%C2%D3%C0%C3%F7/blog/item/fa885634f3b29d1c91ef390c.html>

1950 年 2 月 12 日中共同苏共所签定的条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这是毛泽东与外国人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毛后来都说这个《特别协定》是丧权辱国条约，在激烈批判苏修的“中苏论战”

时期都不敢透露一点，可见这个条约如何见不得人，苏联垮台后，俄国最近才把它解密。

《特别协定》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

中国人的人命还要外国政府来定夺，**五亿人要消灭一亿，只留四亿，那么十三亿就得消灭九亿**，多么荒谬的理论啊。中共说自己是兄弟党，其实中共是儿子党、孙子党、奴才党。主人对奴才也没有这么狠的啊！

这是马列主义者站在农业文明所能承载人口的思维上作出的决定，后面的大饥荒与计划生育只是按照这个《特别协定》执行而已。

这个《特别协定》之后发生的“土改大屠杀”、“镇压反革命大屠杀”、“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大肆屠戮中国人事件，当然不一定是照苏俄指示行事，但这个协定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抗美援朝中又不惜以中国人的性命用人海战术对付联合国的先进武器，不是间接屠杀中国人是什么？

在大饥荒发生之前，毛在大会小会上都说，要打（世界）大战，打核大战，牺牲中国一半以上人口来战胜帝国主义，都表现了毛想用战争来减少人口的思路。在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时候，相信他也会继续坚持“牺牲”中国一半人口的思路，当然饥荒是最有效的武器。

大饥荒和后来的计划生育都是顺这一条思路，都是人为的减少中国的人口，只是手段不同而已，都是思维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虽然赫鲁晓夫上台后主动废除了这个条约，但毛还是继续坚挺斯大林的，还要执行与其签定的条约，不折不扣地减少中国人口。周恩来（《特别协定》的签字者）也心领神会的坚决执行。大饥荒时苏联不要中国的鸡蛋、茶叶、粮食、猪肉等东西，周恩来下令全部倒入海里（黑龙江），说他们不要我们也不要。

饥荒发生时，贸易部官员建议，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进口粮食，周恩来反对，并指示，趁国际金价走低，大量吸纳黄金，用中国几千万人的生命换回了一堆黄色的金属。

四、消灭中国一亿人的细腻步骤：

在和平年代，要实现消灭中国一亿人口的计划，实在是一个天大又艰难的系统工程。想想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才死亡几千万人，要在和平年代消灭中国的一亿人，难，实在难，没有实实在在的步骤根本不可能，没有一套完整措施不行。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没有这些细腻的准备工作的，根本不可能如此大面积、长时间的饥荒。

我们就来看看这一阴谋是如何实施的：

1、搞起人民公社，作好大饥荒的组织准备

本来粮食是在种植粮食的农民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饥荒实在太难，农民在明明白白要饿死的时候，要从他们的手里弄走粮食，要进行一场人民战争都未必能做得到。

于是这个时候毛来一招，搞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骗农民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毛在农村搞人民公社，推行全面公有化；土地、工具、种子、房屋一律公有，甚至连农民的锅、口粮都公有了，甚至把农民的房子拆掉，把锅碗砸掉，粮食就

集中的公社的手里，农民只能到公家食堂吃饭才能活命，上级要饿死谁，谁就得等待饿死。

彭德怀看不惯百姓被饿死，在庐山会议上对毛的政策进行批评，结果毛打倒了彭德怀及一大批正直的官员，毛扫除了大饥荒时可能来自中共内部的最后障碍，从此再也没人敢说话，百姓只有束口等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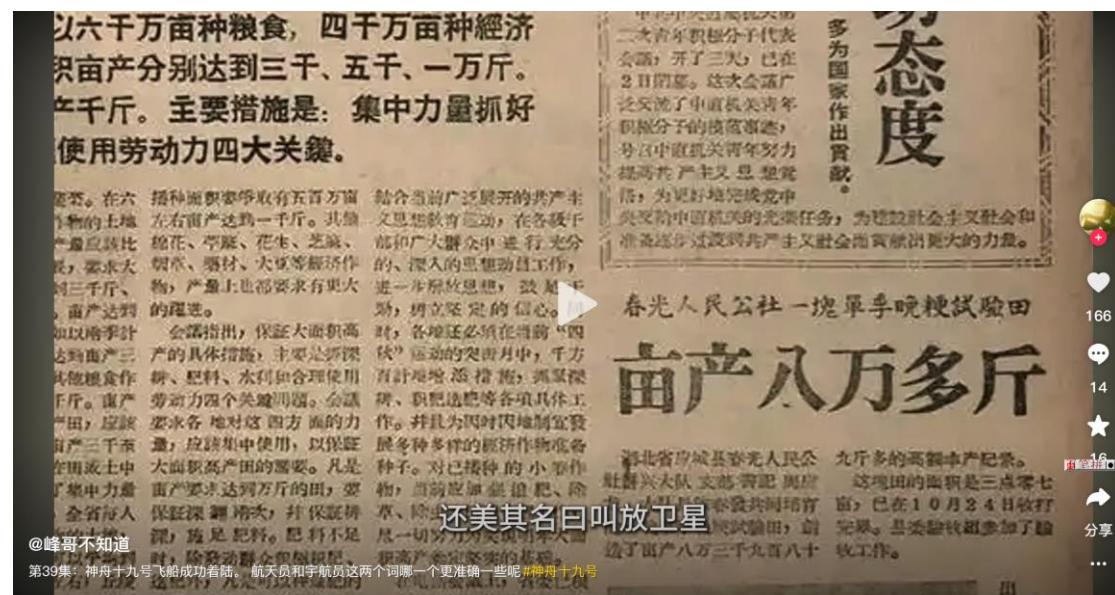
要饿死中国一亿人，没有人民公社这一坚强有力的组织根本就不可能，毛作好了大饥荒的组织准备。

2、粮食亩产被万斤、十万斤，拿到了夺粮的借口

毛为了名正言顺地夺粮，强迫下面大吹、特吹亩产万斤、十万斤。下面在上级的压力下，上报亩产万斤，最高的达到水稻亩产二十万斤（湖北省麻城）。于是上级要粮食，下级没有理由不给，连种子全上缴都不够。

毛到处说：“现在不是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而是粮食怎么样才能吃得完的问题”。其实农民出身的他，怎么会不知道粮食能出多少呢？大吹大夸正是他需要的，下中他下怀。

毛拿到了夺粮的借口——粮食太多了。



（粮食亩产八万斤）

记得当时武汉粮食吹得更高，亩产 20 万斤。

3、毛大讲历代如何饿死人、饿死人有好处——作好大饥荒的思想、舆论准备

从大饥荒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开始，毛在各种大小高级会议上大讲特讲中国历朝历代如何饿死人，告诉干部饿死人是正常现象，不饿死就不正常了。让各级干部作好了饿死人的思想准备，让他们对饿死人习以为常、麻木，让他们草菅人命。当饥荒发生后，各级干部往往解释说，哪个朝代不饿死人？！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用这句话来继续坚持他的害人政策，让更多的民众饿死。

毛明知大饥荒饿死人，却没有采取任何救灾措施，他的措施反而都是加重灾害，他是故意的，他不是不知道大饥荒真相。毛在 1958 年 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专门讲了红白喜事。他说：“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白喜事，

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至于死，老百姓也叫喜事。……也确实是喜事”。1958年10月9日，毛泽东就对他的亲信圈中人说：“死人有好处，可以肥田”。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河南淮滨县期思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蒋学成，用饿死的人（其中有100个小孩）来炼化肥。

1958年毛在武昌会议上讲：“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1958年就知道要死五千万人以上，真不愧是阴明领袖啊！死五千万人都不能杀他的头，天下有这么毒的人吗？

荷兰历史学家冯克出版的《毛的大饥荒》一书中提到，毛泽东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大幅度提高征缴粮食。当有人担心饿死人的时候，毛说了如下魔鬼语言：“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冯克在外媒还称：“大跃进时期饿死的中国人和二战的死亡总数相似，都在4500万以上。这个数字令人震惊，是毛制造的最大的人祸。由于中国政府信息的不透明，造成国内外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死亡人数存在很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人至5000万人不等。

大饥荒发生之前就开始大讲特讲饥荒和死人，说明毛知道饥荒要来临，因为这一切是他一手安排的，他要先给干部们洗脑，别坏他“好事”。就彭德怀等人不想领会，结果彭德怀死得很惨。

要饿死中国一亿人，没有事先作好干部的思想工作是根本就不可能。他的洗脑工作非常成功，干部们都成了蔑视人命、非常残忍的杀人机器人、刽子手。仅在河南信阳的商城，干部们为了挖出粮食，对民众使用了包括“**锄头砸大脑、剁手指头、活埋、割嘴唇、灌大粪、逼迫吃屎**”等**40多种**惨绝人寰的毒刑。谁看到这份材料，都心惊肉跳，悲哀不已。（<http://blog.ifeng.com/article/2523016.html>）。

就是因为干部已经作好了饿死人的思想准备，才使饥荒得以进行和继续。

毛作足了大饥荒的思想、舆论准备。

4、人为的有选择性的饿死

如果是天饿的——“自然灾害”，那么饿死人就没有选择性，所有人皆在其中，甚至城市居民比农民更加饥饿，但实际上反过来饿死的都是农民，而且是有选择性的饿死——清除异己，干部民兵积极分子及家人往往可以吃小灶。

许多地方对病者、弱者、反对者、开会睡觉者、所谓的坏因素和右派，采取了禁食的惩罚。例如，四川许多县，80%的人死于这种禁食惩罚。饥饿被用来作为惩罚的武器，用来处罚那些无法跟上工作要求之人，政府扑杀弱势者和孤苦无依的人。地方领导者送出好几百万人到劳改营，劳改营中每年的死亡率在4~30%之间。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后，1200名右派、犯人饿死1000人，没有饿死的200人中的190多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见戴煌：《九死一生》）。

5、坚定不移地坚持饿死人的既定方针

中央早就知道饥荒，坚决不改变政策，甚至还在加强，好象饥荒的力度还不

够似的，人为的让饥荒继续蔓延。

1958 年底开始，下面饿死人的电报象雪花般地打到中央，毛用铅笔在电报上写着：“教群众吃稀一点，参树叶吃”。其实早就没有稀的吃了，如果还有稀的吃，怎么能饿死人呢？连树皮都啃完。毛把群众赖以活命的粮食夺走以供出口。各地粮仓也是满满的，就是不打开救济，甚至干部民兵封村不让人逃荒，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

毛拿着饥饿的电报问那些高级干部怎么办？他就是不下令开仓赈灾，还增加粮食出口。那些干部能有什么办法？有办法的彭德怀已经被打倒，谁还敢有办法！开仓赈灾和减少出口这些办法还要问别人吗？很明显毛是在寻找彭德怀式的干部，坚决剔除可能隐藏的“坏他好事”分子。

毛一边“教群众吃稀一点，参树叶吃”，一边把大把大把粮食送到外国，同时把大把大把粮食囤积起来，还拒绝接受外援，除了是想把人民饿死，不可能有任何其它的目的。这也是令大多数历史研究者迷惑不解之处——大饥荒是毛的既定方针。

作为这桩空前的人间惨剧的祸首，毛展示出什么道德良心？6 千多万冤魂在他心里留下了多少悔恨？没有，什么也没有。在 1961 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很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又说：“有一点损失，我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1962 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的错误，毛泽东生气地打断邓的话说，“这几年错误就那么一点，谁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毛是地主的儿子，他出身于剥削家庭，他对农民充满仇恨。他骗农民为他打江山，过后马上把农民打成二等公民，千方百计地要饿死农民，几千万农民就这样倒在他的屠刀下。（如果有一天中共拨毛，肯定会写上这段话）。

1958 年中国开始饿死人，1959 年中国粮食出口达到第一个高峰，为什么？不知道粮食出口会饿死更多人吗？

许多历史学家到底不明白，饥荒发生后，中共和国政府的每一项政策都是指向加重饥荒和饿死人更加严重，为什么？说明大饥荒本身就是设计好的政策。

1961 年是饿死人最惨的年份，如果没有这个七千人大会，那么 1962 年饿死人会更多，因为前面那些年份特别是 61 年，把能吃的东西都吃完了，62 年会更饿。但是，1962 年 2 月份七千人大会之后，还没有到收割季节，也没有接收到大量外国援助，中国马上就没有大面积饿死人。为什么？因为仓库里面有粮食，开仓即不会饿死人。这说明，当时的中共和国并不是很缺粮食！之前是毛泽东心心念念想饿死中国人才不让开仓放粮!!!

在这之后，毛泽东逼不得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等一大批在七千人大会上批判毛泽东或者阻挠毛泽东饿死人政策的人，被毛泽东修理，其中刘少奇与批判最利害的陶铸被整死。之后，毛泽东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那些人刚修理差不多的时候，毛泽东就又发起了计划生育政策，几亿中国人口又被中共与毛泽东消灭。大饥荒与计划生育的目的是一致的——消灭中国人。

可见：1958 年—1962 年的大饥荒是另类的计划生育政策。

五、刘少奇的功德——打破毛的饿死人政策

1961 年初，刘少奇到下面调查，也回家乡调查。他的姐夫吃了半块女儿像宝贝一样留给他的糠粑粑，饿瘪的肠胃无法消化，活活憋死，在床上打滚而死，死状极其惨痛。姐夫刚刚死去，他的姐姐饿得躺卧床不起。刘少奇甚至保护了在电

线杆上写着“打倒刘少奇”的全家被饿死的小孩。刘还下令地方当局不得惩罚“偷”食物的农民。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里记述：

{

大跃进开始时，刘少奇虽然心里不满，行动上仍随波逐流。当大饥荒铺天盖地而来，彭德怀在庐山大声疾呼时，刚当上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没有跟彭站在一起。

但刘少奇心里越来越不安。到一九六一年初，他知道全国已饿死了三千万人。这年四、五月间，他回到湖南老家去视察。故乡行使他亲眼目睹人民的极度苦难，给了刘少奇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下决心要设法制止毛。

回乡期间刘少奇去探望他的姐姐。姐姐早年出嫁的家庭在共产党掌权后算作“地主”，是“阶级敌人”，她偶尔给刘写信讲到艰难的生活，刘回信给她讲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如今他带来的是更人情味的东西：五斤大米、两斤饼干、两斤糖果、九只咸蛋、一瓶猪油。他看到姐姐躺在床上满脸泛黄，昏暗的眼睛充满泪水，死灰色的嘴唇不停地颤抖说不出话来。她挨饿受冻患了病，卧床不起已经有好些日子了。刘少奇问起姐夫，她双手捂着脸呜呜地痛哭起来。她的丈夫刚死去，原因是吃了半块女儿像宝贝一样留给他的糠粑粑，饿瘪的肠胃无法消化，活活憋死。没有医生可看，没有医院可去，人死在青筋暴起、大汗淋漓的痛苦翻滚中。这位姊夫曾在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以后给刘写过一封信，讲了村民们饿肚子的真实情况，信被截下来，他被扣上“破坏大跃进”的帽子受批斗，被绑在水塘边的树上任北风撕打，快要冻昏过去时才放回家。

刘还下令地方当局不得惩罚“偷”食物的农民，说：“社员这样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这等于说共产党政权对老百姓像强盗一样，刘少奇的痛心疾首可见一斑。他甚至公开向老百姓道歉，临别时对村民说：“四十年没有回过家乡了，没想到父老乡亲们今天的生活这么苦，没想到解放十多年了家乡还是这么贫困……看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各位父老乡亲呀……”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低低地向大家鞠了一躬。

回到北京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

毛对他性命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甚至在中央警卫团里，在那些保卫他的人中，对他都是怨声载道。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一九六一年初给毛的《关于中央警卫团的思想情况的报告》说：“战士董方会说：‘毛主席住在北京，知道不知道农民生活？粮食打那么多都到哪里去了？’战士许国乱说：‘叫人们吃菜是不是毛主席下的命令？中南海修建工人每月六十斤粮食还没劲呢，农民光吃菜和白薯，吃不到粮食。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战士张立臣说：‘现在农村老百姓吃的连狗都不如，过去狗还能吃到糠和粮食，现在人饿得没劲，小猪饿得站不起来。社员反映说：毛主席是不是叫我们饿死？’”中央警卫团因此受到狠狠的清洗。

近在眼前的威胁是在党代表大会上被选掉，或者落到有职无权的地步。最了解毛的林彪在笔记里写道：“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一九六一年九月，照党章规定中共应该开“九大”，毛得尽一切努力避免“九大”。早在一九五九年毛已经感到中共高层对他政策的强烈不满，他在四月的讲话提纲里写道：“如果你们不投我的票了，拉倒。”随后的大饥荒强烈地震撼了中共干部，有代表性的是安徽一九六一年元月开的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会上讲话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他们在吐(冤)气时，百分之百的悲痛流泪。会场上看到他们哭，

特别是大量人口死亡的情景，都十分沉痛。绝大部分同志都被感动得心痛流泪多次。有不少人自上午诉苦开始，**到下午七点钟散会终止，眼泪都没有干过**，尤其是妇女，哭得更厉害。”

中共干部和他们的家庭都得勒紧裤带，一人一个月二十来斤粮、几两油、一点点肉。在中南海的红墙内，刘少奇的身边工作人员因为吃不饱饭，把花园和草坪改成了菜地。饥饿使毛的干部们几乎人人都渴望改变政策。

毛把责任推到基层干部头上，说问题的原因是“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他又怪罪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他还说中国发生了“特大的天灾”——根据气象记录，大饥荒的几年不但没有全国性的天灾，天气还比一般年景好。干部们对全面情况不了解，毛的嫁祸于人还能骗些人，但是，看到全国人人都在饿肚子，大批饿死人，干部们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党总是有点什么问题。

}

大饥荒是精心策划的，当然这是最高机密。毛泽东当然不能也不敢直接告诉下面的干部。由于大量饿死人，下面的干部也非常害怕，他们出于自然反应而发生了许多抵制行为。毛泽东为了使得这个饿死人计划能够更加顺利实施，就主动召开了七千人大会。

毛想让饥荒继续下去，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说：“现在不是有没有粮食的问题，而是**考虑如何把粮食收缴上来的问题**”，听得下面的**干部毛骨悚然（注：张戎语）**。毛还说一九六二年要大抓的一年，各方面都要“跃进”。毛想让大会认可他的政策，逼代表们回去后继续横徵暴敛。毛的目的显而易见——**饿死人数还没达标**，还要继续饿杀百姓。这是毛泽东下的一盘大棋，一盘饿死中国人的大棋。如果毛的意愿得逞，中华民族可能被连根拔起，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

毛泽东的发言已经定调，这个调就是“继续饿杀中国人”。所有的干部都抵触但是也没办法，中华民族命悬一线。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必须在这么大的大会上发言，作为毛泽东轿夫的他理应为毛泽东的政策保驾护航，但是，刘少奇准备对毛泽东至命一击，这一击必须一击必中，否则，不但救不了中国人还可能白白牺牲自己。刘少奇写了三次发言稿，毛泽东都没有通过，刘少奇一直没能发言。刘少奇拖到了第二天必须发言的时候，他的发言稿还是没能通过，他说明天我即席发言吧，毛泽东只好同意。刘少奇在发言中大谈特谈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记得有的资料上说刘少奇甚至还说“有的地方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打破了毛泽东定下的“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与“一个指头的错误与九个指头的成绩”的这种定论。不知情（或者假装不知情）的干部看到了机会，于是趁着这个时机，大家都起来围攻大饥荒政策，把大饥荒的原因推给了党中央的政策（中共的干部们也很鸡贼），最后逼得毛泽东在大会上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好像是为别人承担责任似的。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一次突然袭击，刘少奇把握了好时机。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里记述：

{

毛泽东一贯把他制造的灾难说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刘少奇直接针对毛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毛马上插话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地区不少。刘反驳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刘的讲话在与会者心里激起强烈共鸣。有国家主席出头，当天的小组讨论就像洪水开了闸，与前些天大不一样。干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反对大跃进政策再继续下去。激烈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毛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亲手提拔的刘少奇居然会来这么一下。刘不念《书面报告》是毛会前同意的，说刘可以“放开讲一讲”。毛的狂怒不难想像，但毛压住怒火。刘显然有七千名中共政权骨干的支持，毛不能跟他们硬碰硬。他也不能把代表们现在就放走，要先把对他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再说。于是毛装作他跟刘之间并无不同政策的样子，宣布延长会议，对代表们说这是让他们“出气”：“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背地里，他把最后一句改为“**完全放屁**”。

毛总得对七千人有个交代，在三十日那天做了个“自我批评”，这是掌权以来的头一遭。他仔细地遣词造句，给人的印象是他在以高姿态承担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既然承认犯了错误，毛只好改变政策，他被迫容忍从一九六二年起把征粮指标大幅度降低。**数千万人因此免于一死**。

二月七日，七千人大会一结束，毛就甩袖子去了上海，跟亲信柯庆施待在一起。在随后的日子里，毛眼看着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对他的政策作了大量修改。虽然基础性的核项目未受影响，但核潜艇一类昂贵而又不切实际的项目下马了。军工投资减少了，而对民生工业的投资大增。向世界推销毛主义的努力也受了点挫折，一九六二年的外援几乎等于零。毛的大把对外撒钱但凡知道点内幕的人没有不心痛的，曾具体承办对外军援的总参外事局常务副局长朱开印说：“每看到一次援助协议的签署后外国人的笑脸时，我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对人民犯了罪的沉痛之感！”

中共政权甚至允许一批人出境。通常试图越境的人抓住后不是劳改就是枪毙，这次当局在通往香港的边界铁丝网上开了个大口子，让五万人逃出去。那些天香港新界遍野都是人在跑，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往外跑。边防军还帮助把小孩举起来送过铁丝网。

一九六二年，中国享受着毛上台后罕有的放松的时光。刘少奇等人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千万人平反，同时试图给五七到五八年打的右派分子“摘帽”。文学艺术有了点欣欣向荣的景象。正是在这一年，班禅喇嘛敢于把他的七万言书交给周恩来。西藏的状况有了好转，抓的人在放，有的寺庙在修复，藏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得到些尊重。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突然袭击”对毛的惊吓在毛掌权后还是第一次。毛最害怕突然袭击，只有这才可能使他转瞬间失去权力。毛恨刘少奇，恨之入骨。他也恨参加会议的人，因为他们跟刘站在一起，迫使他改变政策。复仇成了毛刻骨铭心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在数年之后毛发起文化大革命，让刘少奇、与会的绝大部分人以及他们代表的其他干部都饱受折磨，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像江青所说：毛“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文革不光是复仇，也是大换班。毛看得很明白，现有干部不愿意按他的意图来管理国家。他要清洗他们，换上另一套人马。

参加七千人大会的不少人既佩服刘少奇，又为刘担心。刘本人也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毛决不会饶了他。但是面对数千万人继续饿死的前景，刘少奇于心不忍，不得不挺而走险。在这一段“非常时期”里，通常沉默寡言、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刘是不寻常的冲动，不寻常的慷慨激昂，有着“豁出去了”

的气概。

几年过去了，刘少奇等人在着力于恢复中国的元气，而毛泽东，他在策划复仇。

}

毛泽东要饿死中国人的政策，知道内情的刘少奇最后看不下去，在不知道内情的官员的帮助下，扭转了局势，而且还逼得毛检讨，毛差点被赶下台，由此引发了文化大革命，最终刘丢了性命并身败名裂。由大饥荒演变成文化大革命，两害相倾择其轻（大饥荒的祸害比文革大得多），这是刘为中国人的贡献。

如果不是刘少奇拼死一搏，把毛的饿死人计划打破，饿死将达一亿人。刘是为中国人牺牲的，虽然他以前也跟着毛作了许多坏事，但他最后的觉悟及勇气，他的这一搏功德无量。刘多次和毛说：历史上饿死人是要上（史）书的，你我都要上书的。周恩来就不同，为保自己，同流合污，没有周的推波助澜，大饥荒没有这么酷烈。周曾让人统计过饿死人数，只给他与毛看，看后连原始数据都销毁。当然这是最高机密了。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和其他官员轰毛下台，而知道内情的周恩来极力保毛的地位，使祸害继续延续。轰毛比较利害的是陶铸，他说“主席下去”。在政治局会议上，除了毛和林彪投弃权票，其他人都投了同意毛下台的票，结果周恩来说：

“主席还是主席，退居二线就行了”，事后朱德对周恩来非常不满。周又一次保了毛，大饥荒虽然被扼制，但是几年后转化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又经历了一次大浩劫。刘少奇、陶铸被整死，许多在七千人大会上轰毛下台的官员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共八届中央委员 123 名，其中有 88 人分别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坐监的坐监，整死的整死。周恩来是文革时整这些人的专案组组长，没有周恩来的推波助澜，文革或者发动不起来，或者没有那么残酷。

陶铸曾经对手下的人说：“不能跟他（指毛）干了，否则就成为历史的罪人”。由于陶铸的关系，广东饿死人少。

不管刘少奇之前做过多少坏事，在关键时刻至少他敢于跳出来，不顾身家性命，敢为中国老百姓搏一把，我觉得这是很值得人尊敬的。他救下数千万人，功德无量。

之后，毛泽东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当毛泽东把那些人刚修理差不多的时候，毛泽东就又发起了更加祸国殃民的计划生育政策，几亿中国人口又被中共与毛泽东消灭。大饥荒与计划生育的目的是一致的——消灭中国人。

我们普通人无法揣摩邪恶者的心术，所以不敢相信人为制造大饥荒一说。但是想一想这些原因，特别是计划生育，就不难明白大饥荒是人为地为了消灭中国人口的政策。

六、保守计算：五年大饥荒，最少饿死 6288.93 万人，总人口减少 6595.55 万。

本人以 1983 年《中国统计年鉴》（表 1）为依据，以 1957 年至 1970 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剔除发生饥荒的 1958 年至 1962 年），得到这九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是 27.07%，1971 年中共实行计划生育，就不能再用它的增长率。

以 1957 年底的总人口为基数，以 27.07% 为每年的人口增长率，计算得到：五年大饥荒，最少饿死 6288.93 万人，总人口减少 6595.55 万。仅天府之国四川，官员承认饿死 1250 万，实际高达 2616.52 万！详见《五年大饥荒，最少饿死 6288.93 万人》（<http://blog.boxun.com/hero/jjp/>）。

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计算：平均自然增长率 27.07‰是从九个年份中得来的，但是这九个采样年份里，竟有六个是政治大动荡年份，那么得到的这个平均值一定低于真实值，所以只能算是保守计算。

表 1 是 1983 年《中国统计年鉴》，从 1983 年起，到 2002 年以前，所有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年鉴》都是这些的数据，这证明了多年来中国政府早就承认了它，权威性十足。

表 1:

年份	年末总人口(万人)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6	62,828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9,19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表 2 是以 27.07‰为人口自然增长率，算出每年的人口差额。

表 2:

年份	年末总人口(万人)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实际增长率‰	正常人口(万人)	人口差额(万人)
1956	62,828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29.05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20.74	66403.16	−409.16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8.38	67780.46	−573.46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4.88	69026.29	−2819.29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5.26	67999.22	−2140.22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21.80	67641.80	−346.80
1963	69,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1966	74,542	35.05	8.83	26.22			
1967	76,368	33.96	8.43	25.53			
1968	78,534	35.59	8.21	27.38			
1969	80,671	34.11	8.03	26.08			
1970	82,992	33.43	7.60	25.83			
1958 至 1962 年人口总差额							−6288.93

用另一种方法，算出五年实际总人口减少数量：6595.55 万

1962 年底应得人口数－1962 年底实际人口数：

$$64653 \times 1.02707^5 - 67295 = 73890.55 - 67295 = 6595.55 \text{ (万)}。$$

得出结论：

五年大饥荒，最少饿死 6288.93 万人，总人口减少 6595.55 万。

}

大饥荒秘密政策由于刘少奇的阻挠与全部干部的惧怕而被迫中断，毛泽东被迫检讨。毛泽东当然不会认错、认输与放弃。大饥荒过后才五年，毛泽东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在七千大会上反对他的刘少奇等干部通通打倒甚至消灭，在 1962 年到 1967 年这五年，毛泽东一直没有闲着，全部都是在做着发动文革的准备工作。1971 年正是文革中期，当时干部与刘少奇已经被彻底打倒，毛泽东马上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计划生育政策，用两户绝一户的方法来屠杀中国人，这就是大饥荒的延续，或者说是大饥荒的另一个版本。可见，《中苏特别协定》对毛泽东的思维影响有多大？

共产党的经济思维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模式下的，因为人口可容纳量与地皮的大小、与耕地的面积紧密相联。正是这种思维的误导，才有世界共产党各国的大屠杀与大饥荒存在，这些大饥荒是用来屠杀人民的手段。“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注 25）。

不同的经济模式，人口的可容纳量是不同的。在游牧经济模式下，万亩草原可以养活一个家庭；在农业经济模式下，万亩田地可以养活上千人；工业模式与信息模式下，一万亩土地可以养活海量的人。不同的经济模式下，人口的可容纳量是不同的，而共产党不懂得这一点，把经济模式是死死地建立在农业经济的模式下，看不到人口多的优势，才会限制与减少人口，幸好共产党的经济模式不是放在游牧经济上，否则，更大的大屠杀会发生在各个共产党国。

共产党的经济思维放在农业经济模式上，才导致大饥荒产生。这是极其荒唐的。五亿人要减少一亿只留四亿，那么按照当时的思维模式，十四亿人就要减少十亿。但是，当中国十四亿人时，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倒退、并没有发生大饥荒的饿死，经济反而高度发展，社会高度发达，为什么？因为中国进入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与共产党减少人口的思维模式是极端错误的。

计划生育更加荒唐，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过中国，他们的国土面积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也没觉得人口过多，而且承载得好好的。印度同样有许多山区不适合于耕种，多数人挤在南方。按照印度的人口密度，中国最少可以达到印度 3 倍的人口。

大饥荒最少饿死 6288.93 万人，计划生育减少的人口是大饥荒的十倍左右，造成各种社会危机，2023 年，中国 14 亿人，还觉得人口过少，使得许多工厂招不到工人，许多工厂纷纷外移，房地产坍塌，整个中国各方面在坍塌。计划生育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平添了一个巨大的、深不见底的坑。这都是毛泽东与共产党经济思维惹的祸。

“不同的经济模式，人口的可容纳量是不同的。”毛泽东与中共连这个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毛与中共，骗人有方、治国无术，连如此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这样的本事也敢抢夺中国的执政权，真该千刀万刮，应该与秦桧一起跪。就凭着大饥荒与计划生育这两条，毛泽东与中共都应该与秦桧跪在一起。

金剑不得不惊叹：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共帮助洋教打败了中华本土宗教，中共是最大最凶残的洋买办及外国代理人。也难怪，中共的马列主义信仰本来就是洋教，中共这样做，本来就是它的使命或者说是本分。本来，一对夫妻生 2.2 个小孩才能保证人口平衡，中共却强迫中国人只生一个小孩，使得中国人口巨大衰

退，什么手段能如中共的计划生育如此恶毒地祸害并消灭中国人？中共难道还不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吗？大饥荒就是另一种计划生育政策，消灭的是马列主义者所认为“落后的农民”。

1959 年大陆大饥荒，蒋中正训示台湾“救总”拟定救济办法，号召台湾人民每人省下一元钱支援大陆。他呼吁各国敦促北京开放港口，又想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大陆提供 10 万吨粮食，北京断定是“反攻计划”，坚决不开放运送物资的港口。台湾又利用空飘、海飘向大陆放送各类物质……

发生饥荒时，有人建议蒋介石反攻大陆同，蒋介石以“不义”来否定。其实蒋介石不知道大饥荒是人为的，否则，可能发动反攻大陆，有可能成功，打进来大陆百姓肯定响应，有不少大陆人在惦念着蒋介石中饿死。

参考资料：

注 1.《中国统计年鉴 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9

注 2.岩石__评张宏志：“饿死 3000 万人纯属捏造”（伪造数据和伪造历史的张宏志）

<http://club.dzwww.com/viewthread.php?tid=21474204&extra=page%3D4>

注 3.张戎《毛泽东__鲜为人知的故事》

注 4.杨继绳《墓碑》

注 5.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注 6.《“大跃进”四川饿死千万人》（原刊于《现代快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2/0227_2664_415017.shtml

注 7.岩石《令人震惊的国家统计局造假：篡改大饥荒时期的人口数字——一个明目张胆的大阴谋》

<http://www.chinavalue.net/Blog/126310.aspx>

注 8.原中央党校教师余习广的凤凰博客 <http://blog.ifeng.com/1399605.html>

注 9. [“1959-1961：有关于大饥荒与饿死人的记忆（专题）”](http://news.ifeng.com/special/dajihuang1958/)

<http://news.ifeng.com/special/dajihuang1958/>

注 10.江苏省宝应县从 1959 年冬到 1960 年 4 月，共死亡 35391 人，绝大部分为缺粮饿死。（见《70 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48 页）

注 11.江苏省高淳县在 1958 年冬至次年春，“非正常死亡 6000 人（见：钱刚、耿庆国合著：《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80 页、第 582 页）

注 12.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在 1997 年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波动》，曾刊登于《人口研究》1998 年第 1 期。

注 13.河南省信阳商城县档案馆馆藏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文件《敌人残害人民的主要刑罚、手段汇集》（信阳事件:商城惨案中干部对民众毒刑汇集）一九六一年元月十五日。

余习广 BLOG: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523016.html>

注 14.《毛制造的大饥荒》（MAO ‘S GREAT FAMINE）作者，伦敦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迪克特(Frank Dikotter)。

注 15.《“山鹰之国”亲历》，王洪起著，新华出版社 2008 年 1 月出版

注 16. [俄国解密前苏联档案《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

<http://hi.baidu.com/%C8%D5%D4%C2%D3%C0%C3%F7/blog/item/fa885634f3b29d1c91ef390c.html>

注 17.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注 18.班禅喇嘛《七万言书》。

注 19.铁流《一个村饿死人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e6ec0a0102dqxw.html

注 20.林辉：饿死四千万人的大饥荒是由于“自然灾害”吗？

注 21.余习广 BLOG：大饥荒中化肥是怎样炼成的：饿死的小孩炼化肥！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717193.html>

注 22.毛主席的 61 座行宫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331091&PostID=26921600

注 23.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 年气象水文考》

<http://bbs.yuwenonline.com/TopicOther.asp?t=5&BoardID=5&id=508>

注 24.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55097.shtml>

注 25：《二十世纪俄国史》

注：在某些网站刊登时，文中的“6s”的“s”为“4”；“8j”的“j”为“9”，请读者自我修正。

2011 年 7 月 2011 年 11 月修改 欢迎转载

金剑平 blog:

[Http://blog.boxun.com/hero/jjp](http://blog.boxun.com/hero/jjp)

<http://laojin.blog.epochtimes.com/>

廿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上山下乡”是毛转嫁经济失败与骗人的移民政策。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对经济失败的处理，把经济失败的灾难转嫁给青年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骗青年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面还有一句“一辈子扎根农村”。最后那一句“一辈子扎根农村”才是目的。这是一种移民政策，是转嫁经济失败的灾难给青年人。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黑暗是一个时代的黑暗，个人哪里能逃脱？不只是黑五类，所有人在毛泽东时代都受迫害了，只是受害程度不同而已。

下乡不只对城市青年和家庭的迫害，也是对农民的迫害。农民的田地都不够农民自己种，青年下乡后，不但抢走农民的田地，摊低农民的收入，不少青年心里有怨气，在农村偷鸡摸狗、作奸犯科、行恶胡来，农民也苦不堪言。正如邓小平所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也就是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对青年的迫害，对青年家长的迫害，对农民的迫害。

一般人的子弟非常惨，为了回城、当兵、上大学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有不少女青年甚至付出了珍贵的贞操，成为黑心干部愚弄与免费发泄的对象，许多人内心产生了一辈子阴影。如果不是后来改变政策，多数人会一辈子留在了农村，留在那个土地缺乏的农村，从此祖祖辈辈贫穷。

至于那些有后台的人、或者干部来说，即使是子女下乡也无所谓，可以说是短期体验生活，更是上升捷径，因为可以不通过考试而进入大学、招工、当兵，下乡只是他们镀金的时期，为了他们将来飞黄腾达筑基础。习近平能上大学甚至是清华大学，靠的就是这一条捷径，否则，像他那么那么笨（我写的书他不一定看得懂），如果需要考试，高中能不能上还是问题，更不说大学，更更不说清华大学。又如当年毛岸英去朝鲜参战，是去镀金的，在志愿军总部当俄语翻译，与普通志愿军战士在前线拼命不同，毛岸英很安全，只因他违反纪律早上吃蛋炒饭未入防空洞，被美军轰死。真是毛算不如天算，中国人民躲过一劫，否则，现在的中共国就是毛二毛三毛四世的天下，西朝鲜巍峨地出现在东方。

习近平也上山下乡，没多久就在父亲部下的安排下上大学走了，像他那种水平，考上高中都很难，何况大学？而一般的知识青年就没有机会上大学，只能真的一辈子扎根农村，农村青年更加没有机会离开农村，被中共户籍制度锁定在农村。直到 2020 年，我的老家有一个什么下乡青年协会，这一帮子被骗青年有的还在歌颂毛泽东。毛泽东真是骗死人不商量，可见毛泽东的骗术之高难以有人相比，真是骗人有术治国无方。

毛泽东当政 27 年，在城市几乎不建设工厂，吃的是中华民国留下来的根基（还骗人说什么一穷二白），到毛泽东死前，中国经济已经崩溃，城市容纳不下青年人就业，就把青年赶到农村，更清楚一点在说是骗到农村。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已经有多波压缩城市人口的行动，中共国从立国开始就执行的摊薄、疏散城市人口政策，把许多城市居民迁往（其实是押送）农村，特别是成份不好的人，难逃劫难。“压缩城市人口”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中共摊薄城市人口的既定策略，是往农村移民政策。

大家都知道：城市化率越高，社会越发达。现在，是农村青年到城市里打工，而不是城市青年到农村打工，是农村人口往城市移民，而不是城市人往农村移民，这才是正常的、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毛泽东与中共的摊薄城市人口政策，极大

地违反了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是中共国不发展城市经济造成的灾难。

要知道：中国的人均耕地很少，农民自己都不够耕种，还从城市撒下那么多人过来，不但改变了青年原来生活的环境，给他们造成极大的灾难，也造成农村更加困难。对青年、对青年家庭、对农村都是巨大的灾难。

这正是毛泽东造成中共国的经济失败根本原因，毛泽东与中共又把经济失败的原因诿过给人口多，才有从 1971 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中华民族的更大灾难。计划生育与上山下乡几乎同时进行，1971 年时，中国才 8.52 亿人口，竟然觉得过多，不但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要搞二户绝一户的计划生育，而 2023 年，中国 14 亿人，还觉得人口过少，使得许多工厂招不到工人，许多工厂纷纷外移，房地产坍塌。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过中国，他们的国土面积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也没觉得人口过多，而且承载得好好的。印度同样有许多山区不适合于耕种，多数人挤在南方。按照印度的人口密度，中国可以达到印度 3 倍以上的人口。

无论是上山下乡，还是压缩城市人口及计划生育等抑制人口政策，都是一种小农经济思维下做出来的。中国的发展不是靠农村经济，而是靠城市经济，全世界都是如此，人口越多越集中社会越发达、经济越高速发展。中共国从立国开始就执行的摊薄、疏散城市人口政策，就是削弱城市经济能力，走一条与经济发展相反的道路——毛与中共真愚蠢。毛泽东想移民农村直接移民也就罢了，对热爱他的青年人，竟然利用青年人的正义之心与胸怀天下的博大胸怀，祭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骗人旗帜，毛泽东真是奸险无比。

如果毛泽东不死，那么，现在的中国就与朝鲜一样，贫穷落后，**人民困苦无比且幸福感无比，甚至满怀着要解放全人类四分之三受苦受难的人民**。朝鲜与韩国是相同的民族，现在，在韩国干活一天相当于在朝鲜干活半年，朝鲜的当兵高度是 1.43 米，而韩国的当兵高度是 1.61 米，朝鲜人民被饿成侏儒了。朝鲜是撮尔小国，我们与世界可以接济得了他们，我们是世界大国，谁能接济我们？

毛当政 27 年，不在城市开工厂，把青年赶骗到农村，不搞经济建设，全靠啃国民党留下的根基。1949 年中共上台时，中共国的 G D P 占世界 8%，到毛死的时候，中共国的 G D P 只占世界的 4%，相当于全世界人民平均赚 6 元时，中共国人才赚 1 元。到毛死前的几年，中共国百姓的生活异常艰难，所有的物品都要票，粮食的黑市价高得惊人，农民连饭都吃不饱。白人平均 I Q 值是 100，黄种人是 106，我们比白人还聪明，竟然被毛与中共搞得如此破败！

廿二、改革开放经济上走的是蒋介石道路

中共搞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修正主义，就是对马列主义的修正，所以，叫做修正主义。就是理论上不对马列主义进行否定，脚下却很老实走马列主义的相反道路，是世界上最大的挂羊头卖狗肉，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骗局。朝鲜的金正恩早把这个看得很清楚，所以，金正恩说：**那个无原则的国家**！朝鲜搞原子弹就是要对付修正主义的中共，可怜的中国人民受到威胁。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原则”，从这一条出发，现在的中共国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共的改革开放就是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进行部分否定，连根本原则这一条都否定，还是什么社会主义？如果中共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进行部分否定，中共国早就崩溃了，看看毛年代的经济就知道。

蒋介石在台湾实行部分公有制的经济道路，对于影响国计民生的行业，主要由公有制主导，如供水供电铁路航空港口航运能源交通建筑制糖等等，都由公有制企业主导；台湾连半导体行业，也由公有制全力打造，这些半导体企业的许多创造者连股份都没有。但是，蒋介石在台湾不限制私有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国，全面公有制并且极端限制私有制，使得经济失败、社会倒退。

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经济上走的是蒋介石道路，只是走得不彻底，而政治上还是马列主义的那一套阶级斗争理论，而且时刻可能在经济上再走回马列主义道路，这才是最可怕的。

我们呼吁中共，不要挂羊头卖狗肉！要挂羊头卖羊肉、挂狗头卖狗肉！不要再欺骗世界了！

廿三、一分为二及辩证法

中共推广一分为二与辩证法，其实这两种理论都是害人极深的谬论，把人的思维搞乱，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特别是辩证法，它是马列主义的基础，但是它又是错的，它的三大规律都不能成立，所以，辩证法从头到尾都是错的。建立在辩证法之上的马列主义也必然是错的。

请看《金剑：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20 多万字，请各位品评，也不怕五毛来踢馆。<https://readmoo.com/contributor/92680>

廿四、灭共是人类共同事业

凡是令人满怀正义地去做坏事的，都可能是邪教！马列主义很符合这一条！马列主义邪邪的、全是错的，却让人热血沸腾去实现它！它指引共产党往邪路上走，而共产党又硬地把人类往邪路上拖！共产党不灭亡，人类没有未来，真的没有未来！灭共是人类不得不做的事业，是自卫的事业，也是伟大的事业，是所有人的事业，包括台湾人。

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事实是：正常人与流氓打架，多数是流氓赢，因为流氓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什么招数都能用。而正常人是无法使用阴毒的招数，特别是不知道对方是流氓的时候。中共赢得江山，就是因为中共太流氓、太阴毒，饿死长春 30 万百姓这种事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国民党是一个正常的党派，哪里能顶得住这种阴招？中共一直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鼓励党徒暴乱，获得政权后又向中国人灌输“得人心者得天下”以洗脑，让人觉得它的江山得来正当，把中国人玩弄于指掌之间，非常歹毒。其实“枪杆子”与“人心”是两个不搭边的东西，既然用了“枪杆子”就不用多考虑“人心”了。**中共的政权是靠暴力抢来的，与“人心”无关。**

共产党为什么叫奸党，它真的很好，它真的就是奸党。

灭共是全人类的事业，部分人很难成事，须要人类同心协力同时进行，不能按下去这个葫芦起那个瓢。

现在，印度共党已经有 200 万党员（远比中共上台前多），其下属群众组织的总人数接近 4000 万。该党宣称：“在承认资本主义秩序在 21 世纪全球占上风的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认为资本主义方式不能克服经济危机，只是从一场危机到另一场危机，全球化的结果是不平等，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解放和解脱的灵验药方。该党的目标是改变世界现状，找到一种取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印度共产党甚至叫嚣：“将在 2050 之前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如此毫无掩饰的狂妄和血腥的口号都敢公开发表，可见印度之危。

美国也正在一步步走在共产党理论所指导的道路上。现在美国的大学里，教社会学的、教历史的，左派教授与右派教授的比例是十三比一，这个比例可能比现在大陆都高。大陆的许多教授对马列理论很鄙视，不少教授由于反马列被学生告发，而美国左派教授灌输给学生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那套东西，美国能不向左转吗？美国掉入社会主义的泥淖并非不可能。美国大学里教经济学中，左派教授占七八十；在教技术方面，右派教授也不占主导地位，看看美国的左派与共产主义者多么猖狂。由此可见，白种人的文化与马列文化有天生的相亲性。

打败马列主义，还得靠我们中国人与中国文化。

共产党的问题是理论问题，不在理论上打败马列主义，共产党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苏联共产党垮台了，东欧共产党垮台了，还有中共，即使是中共垮台，还可能又有一个印共、美共上台。反共的义士们，努力啊，好好做好马列主义的基础研究，捅破马列主义，才是解决中共及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必要步骤及最佳途径。马列主义从头到尾全是错的，这都捅不破的话，就没能力与共党作对。

中共很阴，搞阴谋诡计没人能及，但是，共产党的理论太假，很容易就把它推翻，我们也只有在理论上打败共产党，中共及一切共党才能退出历史舞台。这里有几本推倒中共理论的书 <https://readmoo.com/contributor/92680>，《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马克思谬论》、《日本文化的十大特质之八、侵略性——八紘一字》等书，大家常来这个网址看看吧！有更多的书。

后记

特别声明：本书有些内容是从其它地方抄来的，积腋成裘，由于本书收集资料的过程时间太长，存在着当时只顾收集，忘了注明出处的情况，如果有人发现本书引用了某人某文某书的言论而不注明出处，那是我的疏忽，在此特表歉意！写本书并非出于经济目的，看到好的言论当时就只是收集，以致后来整理时找不到出处，出现这类情况，也请作者谅解！

中共对中华民族犯的最大的罪行，就是灌输荒谬无比的马克思谬论与辩证法谬论，扰乱了中国人的思维，破坏了传统价值和道德观，破坏了人们心中的美好的东西和对美好的向往，纵欲、贪婪，只求今朝，不想来日或来生……

共产党叫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实就是杀天、杀地、杀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就是一个大规模屠杀的历史，数以千万的人被共产主义者残酷杀害，连环境都遭破坏。如果你问马克思主义留给后人什么，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杀人机器。在共产主义控制的每一个国家，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被杀害。在和平年代被大规模屠杀的人数比历史上所有战争加起来死的人还要多。

笔者认为：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机器，每一个人（甚至生命）都是这部机器的一个小零件，每一个群体是由小零件组成的部件。零件与零件之间，零件与部件之间、部件与部件之间，必需和睦与协调，这部机器才能健康地、高效率地运转，反之他们之间出现争斗、仇恨和残杀，这部机器就会低效率、病态甚至毁灭，这就是“家和万事兴，家斗万事败”，地球只是一个村。马克思哲学是斗争哲学，是煽动各零件和各部件之间的斗争、仇恨和残杀，所以马克思理论就是毁灭世界的理论，是反人类的理论。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已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但现实是资本主义却反而发展愈加迅猛，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却一个个灭亡，让马克思颜面无光。马列主义学说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已发展到了腐朽的、垂死的程度，要依靠革命夺取政权。列宁已经去逝 98 年了，他所说帝国主义没有一个死亡，反倒是自己的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了。

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垂而不死”。本人认为，最重要原因资本主义社会提倡“平等、自由、博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念，实行民主宪政体制。通过在金融业、股份制、民主宪政等经济、政治的元素中，进行相互制约、自我更新，自我调节，自我新陈代谢，使矛盾的各方在竞争中互学借鉴，磨合碰撞适应认同，从对立走向认同，以达到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和谐富裕。

由此可见，阶级斗争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哲学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大量的社会悲剧。

马列主义把人的社会和精神独特作用、感情和意识这些无形的因素排除掉，抛弃宗教的精神寄托和道德伦理制约；解放兽性，丧失人性，扩散恶的东西，如仇恨、暴力、非理性、残忍。马列主义是弃善扬恶的丛林法则哲学，往往造成良知与理性，德性、悟性与人性的丧失，造成天、地、人秩序的混乱，使人类的精神萎缩凋枯致使物质世界的异化。造就道德沦丧、放纵权力，造就专权，产生腐败。最终在唯物的泥潭里沉沦而被埋没，缺德和斗争成为了习惯，导致社会失序走向崩溃。

虽然共产党现在表现的是独裁制，但是，共产党最邪恶的是它的理论——马

列主义，共产党无论是采取民主制还是独裁制，都是邪恶的，不要认为中共走向民主它就变好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共的民主制，它的邪恶性甚至远比其他时间段高，是毛鼓动起来的学生民主运动，毛就用共产党的民主运动打败魔性不够强的刘少奇及其他中共干部。大革命时期的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罢工后，工人自动把每天的工作时间降为4小时或者以下，还可以任意缺勤，连领导罢工的刘少奇都无法阻止，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民主行为和强烈的当家作主愿望。所以，最害人的是马列主义，无论它是实行民主还是实行独裁，都是害人的。

马列主义、纳粹都是妖魔邪说。很不幸，马列主义在人间到处横行，迷倒不少人，人世间被纳粹和马列主义搞得血流成河、腥风血雨、哀鸿遍野，使人类几乎走向灭亡。现在虽然纳粹已经灭亡，社会主义也在世界上奄奄一息，但最恶的中共还在，中共还在高呼“理论自信”——坚信马克思的妖魔邪说，世界上还有一大批马列主义的追随者，马列主义的幽灵在世界上还未驱除，随时得以还魂，继续行恶。人类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我认为近代世界上最邪恶的十人，其中的八人是：列宁、马克思、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洪秀全、黑格尔、波尔布特。前面三大邪头是马列主义者，十大邪头五个是马列主义者，可见马列主义有多么邪恶。

共产党很邪，它的理论如此这般的荒谬，只要多想一会就能推倒，共产党却把它认为是宇宙真理，并且强迫世人认同它、实行它，对不认同者或者批评者杀戮。共产党强令它治下的人民只能相信它的理论，用尽一切手段达到这个目的，甚至对无知的儿童进行诱导，让小小年纪的他们加入共产主义的所谓少先队，发毒誓把生命献给共产主义，打上共产党魔性的兽印，上共产党的贼船，任何一个邪教组织的罪恶手段都无法精致到这种程度。共产党是集古今中外一切流氓下流法则于一身的邪教组织。

在《冰山上的来客》的电影里，当解放军达到西藏某地时，喇嘛高喊“红魔来了”，共产党真的是红魔，喇嘛不愧是修炼人，知道共产党的根底。

共产党的邪恶根源是马克思理论，对马克思理论进行解剖，以肃净人世间的魔性和共产党的流毒，才能跳出马克思谬论的黑色桎梏。现在我们就戳破共产党的理论，看看它是如何的荒谬。希望我以自己呐喊，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起来批判马克思谬论，开启肃净马列主义流毒之风气，让光明在人间再现，让人类走向正道。

邪不胜正，“魔高一尺，道高万丈”！神佛一定战胜妖魔，人性一定战胜魔性，但是，人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为了您与家人的永远，为了世界的永远，人一定要站在神佛的一方，站在善的一方。不要怕，神佛与我们同在！

本人经过认真思索，看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成立的谬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也是非常荒谬的，计划生育理论更是非常错误的，所有这些理论根本不值得一驳。相信能看到这些人很多很多。

张东荪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说“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都会饿死。”、“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他真是智者。

中国的封建制度是秦始皇结束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必然出现的奴隶社会，人只有民族性没有阶级性。马列主义的谎言随处可见。马克思理论是假理、是谬论，不能拿出来讨论，更不能拿来研究，一讨论就破，一辩论就倒，中共只能暴

力维持，放开媒体中共就得死。

出版自由就是言论自由，是人的基本人权，中共敢在大陆出版本人的《马克思谬论》吗？敢拿马克思理论出来辩论吗？

在这里，笔者向习近平及中共的中科院提出挑战，本人已经看穿了马克思诸多理论的谬误，你们敢把俺的文章在大陆主要媒体上刊登吗？这些理论包括：剩余价值与剥削、阶级先进论、阶级与阶级感情（阶级性）、无产阶级专政论、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中共的法律是恶法、对国家和法律的定义、唯物论、辩证法、中国人应不应该纳税。顺便给你们提醒一下，让你们心里有底，不要无知加狂妄：本人给一些人讲过辩证法，听过的人，就不再相信辩证法了。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你们捧之为圣经般的东西啊，轻易地倒下了！马克思理论就更不用说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帝的新衣，五年级水平就能驳倒它！

真理越辩越明，只有谬论才需要暴力来维护。现在中共公开叫嚣：“坚决打击敢于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挑战的人”，就是说中共也看到马克思理论很假，怕人家点破，才出此下策。中共用暴力来维护马克思理论，说明马克思理论就是谬论，也说明中共在否定出版自由，在否定服贸中的出版条款。

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在取缔苏共的文告中宣布：“马列主义这一套荒谬绝伦的邪说经过俄罗斯七十年的试验，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失败了，并用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祸害人类的谬论邪说。……为推行这个极权暴力恐怖的社会制度，给不少国家造成内战、饥荒与极大的罪恶和灾难，世界任何角落只要出现共产党，就把烧杀、掠夺、暴乱、篡国夺权、血流成河带到哪里。……”这是过来人的呐喊，国民党听见了吗？这是用几亿人的生命才换回来的真理，中国人明白了吗？共产党把世界祸害到如此地步，扭过脸来高喊三个呆婊：“始终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始终代表最广泛人民的利益……”世上有一个厚颜无耻到如此地步的生命，这是整个世界的羞辱，是所有人的污辱。习近平还高喊“俄罗斯无男儿”，可见他愚昧到什么地步？

前几年，中共向中共的社科院开刀，指责社科院“穿上學術的隱身衣，製造煙幕；利用互聯網炮製跨國界的歪理；每逢敏感時期，進行不法的勾連活動；接受境外勢力點對點的滲透”。也许是有一点点智力的中共科学家们看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说了点什么，中共找他们算账。社科院是中共最高级别的御用智囊团，连智囊团都在拆台、造反，中共还能撑多久？看吧，中共的后院燃起了熊熊烈火！中共的气数已尽！

中共到处打黑社会、黑恶势力，共产党就是最大的黑恶势力！

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被包括共产党国家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所抛弃，连中共的党员中也很难很难找到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现在贪官遍地，是因为贪官不相信共产主义了。薄熙来也不相信共产主义，他在大连是要把大连建成小香港，他唱红是为了骗取政治资本。**稍有思维能力的人就能看出马克思主义的荒谬来，习近平却还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宇宙真理”来供奉，并要全党学习，真的要把共产党变成真理教，可见他智力是如此低下。

习近平学习了马列主义与辩证法，就以为掌握了宇宙真理，到处树敌：在内，打击民运人士、连律师都抓了不少、向社科院开刀、断网络、封微信、继续暴力拆迁、揭开新疆维吾尔族妇女的头巾、打击西藏民族宗教、继续强征强拆农民土地住宅，否定香港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在外，膀挎北极熊对抗世界、东逗日本、南压东南诸国、携朝鲜玩耍美国及国际社会，真有点笑傲江湖唯我独尊的真理教教主的派头。拿 300 亿美金收买英国，以失败告终。

中共与习还是暴力加金钱那一套，忘记了世界上还有精神存在，还有正义存在，中共终究会彻底失败。习，满脑子暴力思维，真像暴力五毛党的作派，狂妄之极，是最后的疯狂，中共将在狂妄中死去。

五毛要好好看清楚什么是世界潮流，**什么是天意**：非洲的共产主义失败，苏联解体，两德统一，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乌克兰禁止共产党，越南正在去共化，朝鲜摇摇欲坠，大陆风起云涌的抗暴潮。**现在大陆人坐在一起就骂共产党，就算不反党的人也骂共产党，这就是民心，民心就是天意！**共产党垮台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世界的潮流。共产党罪恶滔天，不垮台就没天理了，不被清算就没天理了。“君子不立危墙下”，五毛可得看清楚啊！

共产主义是魔鬼向人间施以的魔咒，可怜的人类受其所害。

马列主义者以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为谎言，诱骗人们跟随它行恶。共产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大部分推行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并不是共产党，也没有对共产主义深入了解，他们是列宁口中的那群“有用的白痴”。看到马列主义者如此丑恶，我以一己之力写成此书，试图拆解这个美丽而丑恶的谎言。本人能力有限，希望读者包容，更希望这是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世界看破共产主义美丽且丑恶的谎言，

马列主义的荒谬是整个理论体系的谬论，它的根是辩证法。所以，本人强烈推荐，在阅读《马克思谬论》的同时，也请阅读本人的《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日本文化的……》。本人还有许多能让人耳目一新的书，大约能写十几本，希望各位看客，常来这里看看：<https://readmoo.com/contributor/92680>

非常遗憾的是，如果《金剑：马克思谬论》与《金剑：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能在 100 年前出版，将极大地抵制马克思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没有中共的胡闹，日本人也不敢侵略中国，中国就可以躲过日本侵略与共产党占领这中华民族近代二大巨难！亡羊补牢，我们只能寄托于将来！把这两本书传播开来，把中国及世界共产主义打败，让人类迎来光明的明天！

说起来，共产党总是觉得自己聪明，其实共产党是够笨的，竟然相信得了马列主义与辩证法如此荒谬的理论，他们一旦发现一辈子所信仰的东西是如此的荒谬，不知如何面对？

中国人应该搞一场文化反思运动，一旦这样做了，马列主义与辩证法会垮台，接着儒家文化回归，日本文化也会垮台，如果还能把纳粹与 I S I S 搞垮，那就更好了，人类从此远离这些有毒文化，人类就会有美好的未来。人类应该经常搞文化反思，不断地去除恶质文化，人类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最需要文化反思的是日本，这是拯救日本民族最好办法，否则，日本民族没有未来！

其实，打败共产党很容易，把共产党员抓起来，然后给他们每天看《九评》、《延安日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红太阳是如何升起来的》、《抗战时期中共之扩张策略》、《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欺世大观》的油管视频、《庐山会议实录》、《中共壮大之迷》、《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二十世纪俄国史》……再加上《马克思谬论》、《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等对共产党理论的批判，看着看着，共产党员就变成反共义士。对付共产党间谍也是如此，保证间谍一个个叛变，一个个变成共产党的掘墓人。其实，共产党已经知道了这个灭共的办法，所以，共产党国家都是控制媒体、废除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共产党为了保命行恶政。

再大的泡沫，终有破灭的那一天，马列主义理论是巨大的谎言泡沫，共产主

义也是幻想泡沫，终破灭之时，只是人类，特别是中华民族为此受伤惨重。共产党员们，清醒吧，为了人类、为了中华民族、也为了你们自己。

中共制造了巨大的罪恶，为了掩盖它的罪恶，它创造了更多谎言，本书只是揭露了其中的一些而已，并不是全部，希望这是投石引玉，会有更多的人揭露中共的谎言。中共最大的谎言在理论上，是马克思理论、辩证法、唯物主义等等。

共产党的最大罪恶，不是在历史上做了多少坏事，当然，它做的坏事是绝对的多，共产党的最大罪恶是，用邪恶的理论为迷惑世人，让世人相互残杀，扯把人类拖向地狱。马列主义不灭，人类就灭亡。

本书引用了不少人的研究成果，多数我都没有列出来，很抱歉。今天我把书中所引用文章的作者列出来，明天中共的特务就去绑架他们，给作者带去不必要的祸端。由此，特意向未出原作者的事向作者道歉，也感谢他们的好成果。

金剑的《马克思谬论》系列书籍：

《马克思谬论》

《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

《两岸统一该用什么国号》

《中共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来发动内战》

《中华民族之觉醒与反抗》

《简述中共谎言录》等。

还有其它书籍：

《日本文化的十大特质之八、侵略性——八紘一字》

《通共媚日的二二八 可怜的外省同胞》

《日殖台七大罪》等。

欢迎各位观看及评论。

金剑

2024 年 1 月 2025 年 1 月修改

版权声明

《墓碑》作者杨继绳先生在北京大街上碰到销售盗版《墓碑》的人，销售者说：这个是写大饥荒的，写的可好了，看了都哭。杨先生把封面折页打开说，这个人就是我。摊主大惊失色随即道歉。杨先生问这个卖得好吗？销售者说还不错，又是道歉又是感谢。两个人站着聊了半天。杨先生最后说，这就是中国很荒谬的地方，一个作者与盗版卖家居然能够如此和平相处。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张戎女士也在北京遇到同样的事情，她也与盗版卖家和平相处，并鼓励他们盗版。

如果有某一天，我的书在中共国有人盗版，我会对他们千道谢万感激，因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很伟大，中国的未来靠他们。

本书版权属于作者，未经允许，不得篡改，可以随意引用，可以不注明出处，在大陆可以自行印刷、赠送与销售。

特此声明。

金剑

2024 年 1 月